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

切勿在他处转发！强烈建议购买正版纸质书！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Guillermo A. O' Donnell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7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  
(Guillermo A. O'Donnell)著；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301-13728-4

I. 现… II. ①吉… ②王… ③申… III. 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  
南美洲 IV. D77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872 号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y Guillermo A. O'Donnell  
© 1973, 197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著作责任者：〔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责任编辑：都 娟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728-4/D·204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194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译丛总序

宁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

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的,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19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个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

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未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引导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年4月12日



## 译者前言

这本书是阿根廷籍著名政治学家奥唐奈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奥唐奈1957年毕业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法律专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政治学,197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获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学校,现为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和国际研究 Helen Kellogg 讲座教授,同时在阿根廷和巴西数个研究机构担任负责人或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主席,1995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奥唐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威权主义、民主理论和民主化、拉美政治与社会,主要著作除了《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之外,还包括:《民主巩固中的问题:比较视角下的南美新民主政体》(*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2)、《拉美的贫穷与不平等》(*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1998)、《另一种观点:威权主义和民主化文选》(*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1999)、《民主的质量:理论与实践》(*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Theory and Practice*)(2004),他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和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民主化研究著作。

《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是一部在比较政治学中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军队在拉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阿根廷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政权。这一事件对二战以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关于更高级的工业化导致民主出现的假设构成了有力挑战,它很快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在拉美背景

下反思工业化—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文献,《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这些著作形成了一种与此前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假设:在后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可能与民主的崩溃同时发生。这就使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范式突破了此前的简单而乐观的线性思维,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经济现代化与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奥唐奈在这部著作中最早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概念后来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挥,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概念。在属于这类体制的国家,军队作为一个机构进行统治,而不是像传统的军事独裁那样由一些军队统治者个人排他性地进行统治。此外,军队在政策制定中更多地采用了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而不是“政治的”方法,即政策由不同社会群体通过选举、议会、政党、工会等渠道表达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塑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奥唐奈等人在“威权主义”之前加上了“官僚性的”,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参阅大卫·科利尔编《拉美的新威权主义》一书的导言,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论文集代表了对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早期评论,建议感兴趣的读者阅读)。这个概念甚至被用来指称一种独立类型的国家政治体制,但是,严格来讲,关于它是否具有超越拉美政治环境的一般意义,即一个不属于拉美世界的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非民主政体是否可被界定为“官僚威权主义”,是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思考任何现代化背景下的非民主政治问题,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启发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我们翻译了奥唐奈写于1979年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一文,作为附录。

王 欢 申明民

2006年7月

## 序 言

这本书写于我在耶鲁大学读政治科学研究生的时候。1971年5月，我返回了阿根廷，当时由于有其他事情要做，我在交付出版之前，只能对手稿做非常小的修改。因此，我并没有将1972年已发生的重要的相关事件融合进我的分析，也没有用我对其他作者的几个颇有价值的贡献——它们引起我的注意太迟了——的检验结果来丰富它。然而，我觉得，把这个文本依其现状呈现给读者来评判，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它的基本论点并未因过去一年所发生的若干事件而失效；毋宁说，这些事件似乎与本研究所认识到的总趋势十分吻合。

形成本书最初想法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这样一个显著事实——婉转言之，即，南美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多重变化似乎并未提高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出现和巩固的可能性，也未提高可有效减小这些社会中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这一观察与那些仍广泛流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念十分矛盾。根据这些观念——它们将在正文中得到详细讨论，体现于某些社会经济指标中的“进步”必将反映正在导向更有效政治安排的变迁过程。与此相反，正是在南美各国——这些国家在过去20年内现代化进行得最为深入——唯一成功的尝试是植入了一种新的威权政治体制，我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

为了使读者能够评判这一命题及一些更重要的含义，几个预备性的步骤是必需的。首先，关于“现代化”这一术语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必须得以讨论。这需要使与政治学和社会学主流之间的一些重要分歧明朗化——这是一场我担心对许多读者来说将会十分沉闷无趣的讨论。第二个要求是展示出支持以下观点的分析和数据，即，官僚威权主义是一种只存在于相对较高的现代化情形中的政治现象。一个直接相联的观点是，在“官僚性的”威权主义和被多数文献

描述为南美大陆之典型的其他类型(我称之为“平民主义的”和“传统的”)之间,具有至关重要的区别。对官僚威权主义具体性质的描绘,通过置之于比较视角,并表明它与非拉美的其他高度现代化情形中体制的类似性而得以实现。

在界定“现代化”概念以及提供“官僚威权主义”的类型学特征的预备性步骤完成之后,就可以探讨高度现代化——它似乎是促成创设和巩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最有影响因素——的要素和过程了。正是关于该历史过程的这一动态的、具有时限性的部分,缺乏最重要的分析性贡献:解释新政治形式的出现及其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该研究的几个局限性(缺乏充足数据是其中之一)使得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个分析。能够实现的最多是使分析方式显得合理且开放,以用未来的经验工作来检验如下假设——用韦伯的话来说,即,在当代南美高度现代化的情形和官僚威权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选择性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y)。

因此,本研究只是一项初步的探索,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或未来将要做的其他研究的出发点。按我的考虑,它需要完成清理概念根基并提出社会-经济与政治维度之间特定的重要一致性关系的工作。如果不完成这一初步的步骤,就不可能建立起对这些一致性关系的严格解释,不可能详细考察它们之间历时的交互作用,不可能就新政治体制的演化做出可靠的预测,不可能使诸单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前的高层次的总量分析将这些区别归类于同一类“箱”中——进一步精确。

在此再做两点说明是适当的。第一,在可能的范围内,在我的分析的静态部分,我更倾向于使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早期的数据,因为这一阶段刚好处于创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是本研究主要集中考察的对象——的尝试之前。第二,本研究的经验参照是南美洲国家的范围。中美洲国家被排除在外是因为,除了地理上的连续性和模糊界定的共同文化(二者都有拙劣绘制的政治后果)以外,似乎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将所有拉美国家包括进同一语境。毋宁说,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在一个选定的分析层次上,将经验参照物划定到其相关的共同背景性特征能被明确界定的单位上,那么似乎所得甚丰。出于本研究的目的,这里划定在南美国家的范围。<sup>①</sup>

吉列尔莫·奥唐奈

<sup>①</sup> 然而,为了忠于其他作者的概念,我将在提到使用“拉美(的)”这一术语的著作时使用该术语。



## 致 谢

我有幸在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度过了三年(1968—1971),它从许多方面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最有帮助和最适合的环境。那里的几位学者给我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本研究。特别是 William Ascher, Natalio Botana, Ronald Brunner, Robert Dahl, John Fitch, Carlos Floria, Alfred Stepan 以及 Joseph Tulchin,他们十分慷慨地付出他们的时间和耐心,对整个草稿的前几稿提出了极其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享有与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其人其作保持十分密切联系的特殊优待,他在本研究的所有阶段都提出建议、批评、激励和鼓励,这令我至为感激,难以为谢。Paul Gilchrist 用只有他的耐心才可匹配的才智,承担了编辑我的西班牙式英语的繁重任务。我在政治科学领域研究的起初阶段得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支持。这本专著是丹佛斯基金会(Danforth Foundation)慷慨资助的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的早期结果。然而,这些个人和机构都不应对他们的支持或批评的后果而承担责任。

# 目 录

译者前言 .....	(1)
序言 .....	(3)
致谢 .....	(5)
<b>第一章 假设与分类</b> .....	(1)
最近的研究 .....	(1)
拉美研究：分级与分类 .....	(7)
数据与均值 .....	(13)
定义与指标 .....	(22)
实际值的近似值 .....	(27)
<b>第二章 南美政治的替代性概念化</b> .....	(41)
阿根廷与巴西：从包容到排除 .....	(43)
当代南美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	(70)
阿根廷和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运作 .....	(75)
附录：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概略 .....	(83)
当代南美其他政治体制概览 .....	(86)
提议的分类 .....	(89)
<b>第三章 1966年的阿根廷：一个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发端</b> .....	(92)
阿根廷历史遗产的某些方面 .....	(94)
1966年政变的社会背景 .....	(106)
1966年政变 .....	(125)

<b>第四章 一个不可能的“博弈”：1955—1966年阿根廷的党派竞争</b> ...	(135)
背景 .....	(137)
模型 .....	(139)
历史事件 .....	(149)
一些实质性含义 .....	(157)
一些总结性评论 .....	(162)
<b>后记：1979年</b> .....	(165)
<b>参考文献</b> .....	(171)
<b>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b> .....	(187)

## 图表目录

- 表 1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南美国家人均 GNP: 1966 年 / 10
- 表 2 估计的南美国家间结构差异: 1965 年左右 / 20
- 表 3 南美国家农业和非农业地区生产率与收入比较: 1965 年左右 / 21
- 表 4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 GNP: 1966 年 / 28
- 表 5 南美国家的“城市”地区: 1960 年左右 / 30
- 表 6 南美国家“动态的”和“缓慢增长的”产业按美元计算的产出总值  
( $\times 1,000$ )及其总价值百分比: 1960 年 / 31
- 表 7 南美国家的进口系数: 1963 年 / 32
- 表 8 按照用途对 1960 年南美国家工业产出构成的估计:  
绝对数和百分比数据 / 33
- 表 9 南美国家产业工人和工会成员数量: 1960 年左右 / 34
- 表 10 南美国家的人学人数(千人): 1968 年左右 / 35
- 表 11 南美国家每年出版的书籍和译著数量: 1965 年左右 / 35
- 表 12 南美国家作为登记国在美国专利局注册的发明总数:  
1951—1961 年 / 37
- 表 13 南美国家的电话装机数(1967 年)与日报发行量(1960 年) / 37
- 表 14 南美国家的交通数据(汽车): 1965 年左右 / 38
- 表 15 南美国家用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补偿性国际融资以及  
净货币储备的减少: 1946—1961 年 / 48
- 表 16 美国在南美国家的直接私人投资和直接私人工业投资:  
1960 年左右 / 49
- 表 17 年度平均通货膨胀率: 1960—1965 年 / 50
- 表 18 南美国家工业(工厂)就业在整个非农业就业中的比例:  
1945—1960 年 / 52
- 表 19 依照现代化水平对当代南美政治体制的分类 / 90
- 表 20 几项主要经济指标: 阿根廷, 1870—1914 年 / 99
- 表 21 几种关键经济指标的年度测量: 阿根廷, 1946—1966 年 / 109
- 表 22 阿根廷经济指数: 1925—1964 年 / 110



- 表 23 以每个部门的收入分享百分比表示的部门间收入变化：  
1958—1965 年 / 112
- 表 24 若干年份阿根廷家庭平均的真实收入  
(以 1953 年数据为 100) / 113
- 表 25 阿根廷和若干其他国家税收数据 / 115
- 表 26 阿根廷直接税占政府总收入的百分比：1946—1964 年 / 116
- 表 27 若干国家的认为全国性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  
受访者百分比 / 121
- 表 28 对问题“谁对政府有最大影响力?”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1
- 表 29 对关于阿根廷最重要的问题的提问之回答的百分比 / 122
- 表 30 对问题“谁从伊利亚政府获益最多?”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3
- 表 31 对问题“你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在接下来数月将改善、  
维持原样或恶化?”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3
- 表 32 对关于政府绩效的问题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4
- 表 33 选举结果——宪政会议：1957 年(迪杭特比例代表制) / 150
- 表 34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58 年 / 150
- 表 35 选举结果——州长与议会：1962 年 / 153
- 表 36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63 年(迪杭特体制) / 156
- 图 1 三种具有相同均数的假设分布 / 15
- 图 2 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异质性的示意图 / 17
- 图 3 对达尔关于政治体制产生模型的修改 / 70
- 图 4 阿根廷政治意见(庇隆派对反庇隆派)分布  
图示：1955—1966 年 / 138

## 第一章

# 假设与分类

我们是如此适应于那种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不同要素之间紧密关联的观念,以至于当我们发现某种现代化的迹象时,我们就刻意寻找并渴望发现那些与许多西方文明的国家中的现代化相联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sup>①</sup>

## 最近的研究

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社会分析者就主张,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它可能拥有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具有重要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性质、政治方面可能变化的范围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看法很不一致。历史经验清楚表明,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类型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鲜有疑义的是,关于前者的知识可使我们对后者做出某种预测。在给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些类型的政治体制极不可能,而另一些类型则强烈倾向于出现并(或)得到巩固。特别是自马克思和韦伯以降,这一假设已为研究政治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向。然而,正如本书将要努力表明的那样,它只不过提供了对一个极为复

---

<sup>①</sup>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iley, 1964).

杂主题的切入点。关于概念的界定和测量、假设的互动模式以及分析手段的历史背景有效性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作出可以得到实质性结论的尝试之前必须得到回答。

在对经验证据的追求中，在日益丰富的总量数据和计算工具改进的帮助下，现代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继承了探索社会-经济与政治维度之间关系的传统。这已成为一项巨大的努力，它产生了关于这些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的有价值的新知识。然而，该努力并没有对不同学科处理这一主题时所用方法的理论假设和后果进行相应的反思。后面将会看到，起码对概念化当代南美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来说，这样的理论不足已经导致了某些很成问题的结果。

似乎很清楚的是，在目前提到的层次上，认为当代世界多数较富裕的国家是“政治民主”<sup>①</sup>、而在较穷的国家中政治民主十分罕见的基本理念，已经渗透进了现代“西方”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对经验证据的追求。在所有层次上都存在重要的例外，但如果看一下当代的图景，就会发现这似乎是普遍的类型。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通过利用一种或多或少正式的相关性研究——它提供了一幅目前社会-经济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的静态图景，这一类型对观察者来说变得显而易见。虽然相关值十分高<sup>②</sup>，但它们几乎不能标示出本书将主要考虑的问题。一种相关性就像一幅快照。它告诉我们被描绘的行动者站在哪儿，但它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他们如何到达当前位置或他们未来可能朝哪个方向移动的信息。后两者分别包括一个发生学的(genetic-explanatory)和预测性的问题，它们要求十分不同的研究技术。我们需要某种更近于“电影”而不是快照的东西来回答这个起源性问题(诸行动者如何到达他们现在的位置?)所引起的问题。他们重复同样的移动并沿着同样的路径吗？一些行动者以前的移动如何影响其他行动者的移动和路径？电影可以使我们察觉出行动者运动的方向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重复形式，因而也会帮助我们解决预测性问题。预测总是一项有风险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想要减少错误的可能

---

① 概念上更准确的术语是“多元政体”(参见：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但我在这儿更愿沿用这个更为约定俗成的用法。

② 在对这一相关性的许多研究中，参见：Bruce Russett,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性,就应谨慎地选择看电影而不是仅仅看一下过去景象的快照。

快照和相关性是有用的,但却有重要局限。它们对要求时间维度分析的任何事情(比如解释、回顾和预测)都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如果我们试图从相关性来做推断并设法说出事情如何发生或要朝哪儿发展,那么相关性可能是十分具有误导性的。许多当代的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之间关系的解释,似乎就是这种状况。在相关性(也就是说非历史的)角度的基础上对当前最富裕国家的经验进行外推,已成为支持以下预期的基础:(1) 如果其他国家变得与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一样富裕,那么它们就极有可能变成政治民主体;(2) 随着较贫穷的国家变得较为富裕,即使它们达不到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变为政治民主体的可能性也将增加;(3) 假设有两个“欠发达”国家,那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家更可能是一个政治民主体。

尽管有严厉的批评以及对其有效性产生严重质疑的案例研究资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积累<sup>①</sup>,这些“预期”仍可以说构成了比较政治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发展文献的基本“范式”<sup>②</sup>。该范式的第一个定量的——或许还是最有影响的——表述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给出的,可以概括为以下或许可称作“乐观方程式”的形式:

**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大可能性的政治民主<sup>③</sup>**

自从李普塞特的开创性努力以来,难以数计的研究已对方程式的“左侧”

<sup>①</sup> 关于这些批评,特别是参见:F. Cardoso and E. Faletto,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6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3 (1971); Joseph LaPalombara,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J. Powelson, ed., *The Disciplin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即出)。大多数当代拉美的社会科学文献从不同观点挑战这一范式。关于一个美国学者所做的集中于拉美背景的开创性批评,参见: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X, No. 2。正如亨廷顿正确指出的,就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趋同假设”所显示的那样,该范式遍布我们诸多学科的其他领域(参见: S. Huntington and C.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一书的“导言”)。

<sup>②</sup> “范式”这一术语在这儿使用,类似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用法: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sup>③</sup>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进行了细化，加上了诸如识字率、通信、预期寿命以及其他许多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定义性组成部分或相关变量的因素。<sup>①</sup>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常很高，它们的共同影响大概会提高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方程式的“右侧”）。产生自该基本范式的这些研究被认为对该范式以及它所体现的预期提供了经验支持。

这一基本范式以及源自于它的总量数据研究——它们看起来好像给予了它经验有效性——值得在几个重要方面更仔细的检验。首先，它们是新瓶装旧酒：它们重新表达了启蒙的希望——社会“进步”将会产生政治生活“更好的”（从观察者的观点出发）组织形式。政治民主通常得到分析者正面的评价。许多富裕国家是政治民主体，反之亦然；因此，随着国家变得更为富裕，政治民主出现并（或）巩固的可能性也将在这些国家得以提高。

第二，这些预期能够得以解释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假设今天正在进行的因果过程同于（至少是在最基本的方面同于）那些在许多最富裕的国家导致了“高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综合结果的过程。这个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些经济正在增长的国家将可能不会趋向于变成政治民主体（反之亦然）。而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个“欠发达”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富裕，所以那个更穷的国家是政治民主体，而较富的国家却不是。这些可能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假设因果过程的等效性就能排除，必须提供经验证据。<sup>②</sup>

---

① 关于这些文献的一篇有用的导论是：Raymond Hopkins, "Aggregate Data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XXXI, No. 1 (1969)。

② 诸分析单位的“因果过程”，我理解指的是它们的初始条件、随着时间延续而变化的因素，以及决定它们之间关系的参数。这些过程的等效性假设意味着假定这些方面在根本上是相同的，或者如果不相同的话，在它们被比较时对于决定诸单位的状况是无关系的。然而，可以正式证明，如果这三个方面中的任何方面有不同的话，那么被比较的单位的行将倾向于是不同的，并且这些差异将倾向于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关于这一点，参阅 R. Brunner 和 K. Liephelt 的精彩讨论：“Data Analysis, Process Analysis and System Change”，递交 1970 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论文）。这样的假设很明显具有很强的反历史和形式主义的偏见。它否认不同历史背景（或结构）的因果重要性。它假设，一个因素（比如社会富裕程度）无论如何界定和测量，都对政治现象施加相同的影响，而这跟与它产生相互作用的诸因素的组合无关。然而，如果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时期和（或）不同国家之间是不同的，那么就没有理由期望相同的社会富裕程度会对这些单位的政治现象有相同的影响。

第三,通过把多种观察到的与该范式(及其关于因果过程等效性的假设)推导出来的预期不一致的现象当作因“障碍”(被认为是外加到更基本的等效过程上的特殊因素)而产生的“偏差”或“退化”,这个基本范式得以免于经验性歪曲的损害。据假设,如果这些障碍能被“去除”,那么那些想象中运行的更基本的过程就会没有“扭曲”地对政治现象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如果该基本范式是有效的,那么它将通过建立跨越时空的重要共性而极大地简化一个极端复杂主题的概念化。但是,如果有良好的理由去怀疑,认为该范式严重地扭曲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关系与趋势的理解,那么就不可逃避地要对历史背景——对这些相互作用的概括因为该背景而有效——十分清楚。<sup>①</sup>

第四,与前一点紧密相关,产生于这个基本范式的总量数据研究和理论的经验性参照物通常是全部或大多数当代政体的集合。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某种正相关能被发现,所以就推断这种关系对包括在该集合中的所有单位(比如说地区)都是有效的。这是谬误的。<sup>②</sup>在整个集合层面上的正相关,并不排除在所研究单位的子集层面上缺乏关联性或甚至负相关的可能性。

第五,该基本范式和那个将它“翻译”用在总量数据研究中的乐观方程式,假设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可能性之间的线性关系(或者更准确一点,正向单调的关系)——这就是说,随着发展的推进,民主的可能性也被认为(通过某种未知的函数)增加。但是,如前所述,所用的数据指的是在单一时点上的一组国家,而所假设的关系指的是在每一个国家内一段时间内的变

<sup>①</sup> 对广泛概括趋势的一个尖锐批评,参见: J. LaPalombara, “Macrotheories and Microapplic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Widening Gap,”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No. 1 (1968)。

<sup>②</sup> 这被称为“普适主义谬误”。关于该问题的一个杰出的明确针对拉美研究的讨论,参见: Philippe C. Schmitter, “Nuevas estrategias para el análisis comparativo de la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5, No. 3 (1969)。按照统计学的说法,该谬误是因忽视了部分协方差成分而产生——比如,通过在横向列表显示中假设组内值等于边际频率(或与边际频率呈现同样的关系)。该谬误和下文中提到的谬误都被证明形式上等同于更为人所知的“生态谬误”。关于这一点,参见: Hayward Alker 的重要文章: “A Typology of Ecological Fallacies” in S. Rokkan and M. Dogg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9)。

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它们大概对政治维度的变化所导致的趋势，只能用每一个单位的数据，在假设的关系所包含的最短的时段内进行研究。用关于许多国家在仅仅一个时点的“横向”数据代替这个“纵向”数据，并且仍然试图对每一单位内因果性的、跨越时间的过程说三道四，这在形式上与前一段所讨论的那个谬误（显然）是一样的。<sup>①</sup>使用横向数据的学者可把诸国家置于一个发展性的连续体上（比如说，根据作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标示的人均国民收入），并决定似与每个发展值或“阶段”相应的政治体制的类型。直至这一点，它们还是在静态相关分析的逻辑之内，但在该分析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因果性的推论，都涉及无依据地跳入回归分析的逻辑。唯一可被合理地用于研究趋势、因果关系以及一个单位内部历时变化的回归线，是运用来自该单位的数据做出的回归线。总之，这个基本范式的假设可能十分适合于构建连续体、做回归分析（明确的或暗含的）和（或）运用几个国家仅仅某一时点的横向数据对因果关系及变化进行推测，但它为了使我们能够推测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趋势、因果关系和变迁，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那个谬误。

第六，该基本范式及其“乐观方程式”为了有用，必须概念上明确，而这造成了一些问题。我们后面将回到这个主题，但现在应当指出，该方程式的“右侧”——政治维度——可能会被错误界定。在其历史的某一刻出现政治民主，是目前更为“发达”的国家的普遍经历，但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不可置疑，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了政治多元化，或者说与政治多元化高度相关。<sup>②</sup>但是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并不相同。政治多元化指一个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单位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而政治民主是对许多因素——包括政治多元化——的一种可能的制度表达。如已指出的，政治民主是许多更为发达的国家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但无以（除了从已知解释未知的趋势之外）证明这样一个先验的预期：该制度表达将在目前较不发达的国家中再度发生。毋宁说，政治多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见 Brunner 和 Liephelt 的杰出讨论。也可参见：Alker, and James Coleman, "The Mathematical Study of Change" in H. Blalock and A. Blalock, eds.,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sup>②</sup> 我后面将详细解释这一观点。现在让我们姑且把“政治多元化”界定为出现更多的以更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政治单位。

元化可能有利于一些类型的政治体制的出现,这些政治体制即使用最不精细的“概念延伸”方法也不能符合政治民主的条件。<sup>①</sup>因而,权且修正一下那个“方程式”(它开始失去其“乐观”特征)以反映这种可能性似乎是明智的:

**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大的政治多元化≠更大可能性的政治民主<sup>②</sup>**

另一个概念上的要求是,该方程式的“左侧”——社会-经济维度——得到明确界定,并且它的指标应当测量出它们想要测量的东西。可以发现,与现在普遍使用的所不同的定义和指标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经济维度。如果新的定义和指标改变了发展排序,那么在以前的概念表述下观察到的关系可能会被极大地改变。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一点,但在这儿指出它似乎是当代南美的状况,或许是有用的:政治威权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更可能是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sup>③</sup>

至此我们已经在—一个十分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了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问题。现在可能转向明确集中于拉美国家的研究,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应用这一基本范式于该地区,以及有什么后果。

## 拉美研究:分级与分类

该基本范式既可以其最初形式表达,也可通过逻辑上相同的陈述来表达——比如,“X国家是‘异常的’(或‘反常的’),因为考虑到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它本应达到的那么民主(或‘政治发达’)”或“考虑到它比较而言低(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X国家比(没有)它本应达到的更(那么)民主”形式的陈述。这类陈述可能基于定量数据和(或)定性判断,而且它们可能指整个的国家集合(比如拉丁美洲)、一个子集或仅仅一个国家。但是——

<sup>①</sup> 参见:G.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XIV, No. 4 (1970)。对我而言,为了使一些国家够得上“政治民主”而在总量数据研究中常用的完全形式主义的标准(比如举行选举或议会的存在——不管它们实际的政治重要性),似乎是萨托利(Sartori)正确批评的“概念延伸”的一个极好例子。

<sup>②</sup> 符号“≠”表示“并不必然意味着”。

<sup>③</sup> “现代化”概念将在下文界定和讨论。

为了强调这一点——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表达了那个基本范式，并且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政治民主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同样，无论数据和结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我们都保持在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模型的逻辑之中——作为界定社会-经济维度的那个(那些)“独立”变量之价值增加的函数，政治维度的预期价值单调递增。<sup>①</sup>

在所有情况下，以下工作必须被明确或隐含地完成：(1) 诸国家必须沿“社会-经济发展”维度单个或按组排序；(2) 诸国家必须按它们的政治体制类型进行分类；(3) 政治和社会-经济维度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遵奉，如果基本范式成立，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陈述就能得到简洁而明确的表达。不仅基于总量数据的研究是如此<sup>②</sup>，而且数量更大的基于定性观察和资料的研究是如此<sup>③</sup>，那些主要集中于阿根廷的研究也是如此——它们断定这个国家是“反常的”，因为缺乏政治民主以及周期性发生的政治危机并不符合于根据它相对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当被预期的”那样。<sup>④</sup>接下来，将对基于定量数据的研究予以特殊关注。它们只是应用该基本范式并藉此达到相同结论的大量研究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具有其方法论允许对它们的共同方法和假设进行细密检验的优势。

---

① 实际上，因为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线性的，所以将要引用的研究所包含的模型比较简单。关于这一陈述——回归分析的逻辑也适用于这一类的定性判断研究，参见福格尔(R. Fogel)关于“subliminal regressions”的讨论，“The Spec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XVII, No. 3 (1967)。

② 除了其他文献以外，参见：Robert Putnam, “Toward Explain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XX, No. 1 (1967)；Robert Dix, “Oppositions in Latin America” in R. Dahl et al., eds.,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即出)；Martin Needl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以及一个范围更广泛的例子，A. Adelman and C. Taft Morris,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③ 除了别的文献以外，参见：John Johnson,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Robert Alexander,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Edwin Lieuwe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0)；以及 M. Needler,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7)。

④ A. Whitaker, “The Argentine Paradox,”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334 (1961)。对有关阿根廷的社会科学文献的仔细研读显示，这类主张是多么频繁地被提出。



现在重要的是记住我们在缩小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一直在处理针对所有(或至少是一个跨区域的样本的)当代国家的研究。现在我们将专注于那些针对拉美地区或该地区特定国家子集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在对普遍或跨区域基础上运用该基本范式的分析中曾提到的一些问题,经验参照物的这一改变看起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利的结果。特别是,集中于一个较小的样本将使收集和分析更详细的数据成为可能,这可能对解决不精确概念化的问题有所帮助。它也可能有助于对每一分析单位使用“纵向”数据。此外,一个地区内的各种不同背景因素(比如殖民历史、文化和在国际权力关系中的作用)的共性似乎将导致一定程度的区域内同质性——这会使学者们在做出关于该地区的结论时避免“普适主义谬误”所带来的问题。于是,在拉美国家范围内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一种实质程度的正向联系,可能被解释为一个合理的证据,即,在对共同背景因素的影响进行控制的条件下,基本范式所假设的基本关系和趋势为真。所以,关于该范式及其所假设的基本因果过程的有效性,区域内的研究发现似乎有特殊价值,因而能够经得住细密的检验。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维度,我们将要分析的这些研究根据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对它们进行分级(参见表1)。如果通过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其他人均变量相结合产生较为复杂的指数,那么委内瑞拉的等级就被降低,反映了石油萃取的“科威特效应”对委内瑞拉GNP的影响。一般会产生以下几组国家<sup>①</sup>:(1)处于“顶端”——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有时还包括委内瑞拉);(2)处于“中间”——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sup>②</sup>(3)处于“底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接下来,这些等级对应到政治维度上,概念化为

---

① 这里不包括中美洲国家。

② 在有些情况下,巴西和墨西哥作为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发展内部的一个子群被包括进来。例如,参见:R. Vekemans and L. Segundo, “Essay of a Socio-Economic Typology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de Vries and J. Medina Echavarría, eds., *So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Vol. I (Paris: Desclée, 1963), 以及 G. Germani and K. Silvert, “Politics, Social Structure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No. 2 (1961)。



“政治民主”<sup>①</sup>、“竞争性政治”或“多头政治”<sup>②</sup>，或者(非)军事干预及“政治发展”<sup>③</sup>。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基本范式所假设的联系的测度都相似于，甚至优于用全体或跨区域样本得到的测度。在“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智利和乌拉圭是所谓的南美的政治民主国家，而委内瑞拉已经连续选举了三位宪政总统并在多数党的变化中“存活”了下来。在最低的水平上，政治体制一定是非民主的。在中等水平上，会出现一些有问题的情况，但假如对该基本范式的有效性有一种坚定的先验信念，那么这些国家的混合记录可被解读为朝向政治民主——由于其相对低的社会-经济发展，它们仍然相对虚弱——的“拉力”的一种反映。然而，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外。考虑到它相较而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根据任何标准，阿根廷在政治维度中的位置都与在该范式基础上所预期的十分不同。

表 1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南美国家人均 GNP: 1966 年 (美元)

国家	人均 GNP
委内瑞拉	879
阿根廷	818
乌拉圭	613
智利	576
哥伦比亚	334
巴西	333
秘鲁	271
巴拉圭	220
厄瓜多尔	219
玻利维亚	178

来源: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Latin America—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69)。

尽管有阿根廷反例以及为了解决中等程度上的模糊性而需要的额外假设，这里考察的那些研究却都得到了对存在于拉美国家的联系的测度——它们被解释为确证了该范式的有效性。分析者们能够视那些(明确或隐含地)

① 例如，参阅尼德勒依据“稳定民主”对 GNP 的设计，见：Needl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② Dix, “Oppositions”。

③ Putnam, “Toward Explain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s”。

靠近回归线<sup>①</sup>的情况为“已经得到解释”，而将其他情况解释为“异常的”。在他们看来，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检验“不正常”的情况，来确定对该范式所包含的推测性的普遍趋势造成障碍的特殊（具体到国家）因素。<sup>②</sup>

这个程式的含义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短脱离主题。

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它们的现状事实，以及它们的解释和理论意义，都依赖于观察者的参照框架。对定性资料研究来说，这在直观上（以及相当不值一提地）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对得自正规或定量数据研究的结果来说也是如此。例如，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技术的使用，并没有排除清晰界定概念以及充分选择指标的经典要求——否则它们的结果就失去了表面上的“硬度”。任何统计技术的使用都意味着用数学形式具体描述一个供研究的现实模型。模型的适当性取决于参照框架和指引研究的基本预期（或者如我们在这儿所称的“范式”）。因此，无论它是否得到明确表述，用作统计分析的模型都预设了对以下问题的决定：要提问的是什么问题？概念如何界定？要研究哪些相互间的关系？要选择什么指标？

从一个不同的参照框架出发、按照一个不同的（定量或定性的）模型所分析的同—经验指示物可能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处于所有分析层次以及所有分析形式的概念化<sup>③</sup>都受经验观察结果的检验，但这些结果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检验的概念化。这个循环即使在最坚实的概念化中也产生了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

正如这里的情况一样，如果证据最多也是脆弱的，那么对替代性概念化的特殊关心和持续性的试验就是可取的。也许结果是存在“更好的”概念化（在它们更紧密地适合于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上），并且在这些概念化之下，过去“正常”的情况将变为“不正常”，反之亦然。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只要以前的研究和关于一个特殊主题的诸模型应用了一个支配性的范式，那么进

① 用不太正规的话来说，分析者们能够视那些其政治体制（根据该范式）适合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为“已得到解释”。

② 例如，关于拥护这个策略的一个主张，可参阅迪克斯（Dix）和普特南（Putnam）前引文。同样的概念构成了国别研究——它们寻求解释为什么某个国家是“例外的”或“反常的”——的基础。该策略只有在创造了“已得到解释的”和“异常的”情况的概念化有效的条件下，在方法论上才是合理的。

③ 这儿所使用的“概念化”，是一个十分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从松散表达的参照框架到十分具体的正式模型在内的一切东西。

行研究的后果将是严重的。通过假定某些基本关系,这样一个范式将观察者对一个高度复杂主题的认识组织起来,产生出要提问的基本问题,引导形成要被检验的具体假设。例如,如果一个范式假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行,存在政治民主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分析者们(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期望从包括在“发展”定义中的社会-经济变量的明显变化中得到的东西。这种模式的“正常的”(或“已得到解释的”)和“异常的”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期望有效时才有意义。主题的概念结构极大地简化了。例如,如果基本范式假设的趋势发生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那么所研究的问题就能主要集中于确定哪些具体到国家的特性能解释其中一些国家的“不正常”。然而,在当代南美国家,可能有一些重要的趋势在起作用,它们与这些基本范式所包含的那些趋势十分不同。<sup>①</sup>对主题进行理解的基本范式组织可能以假设了错误的趋势、并因而提问了错误的问题为代价而实现。

试想如果不是把南美国家拉向政治民主,那么它们的社会-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因果过程实际上是在把它们拉向政治威权主义吗?我们将愿意设想政治民主是“自然的”或“正常的”结果吗?我们将愿意——比方说——根据她被假定的“不正常”来思考阿根廷,并努力发现是什么因素将她与大多数其他南美国家区别开来的吗?如果这是事实——在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政治威权主义倾向于变成标准模式,那么我们仍将愿意假设在不太“先进”的南美政治民主体中随着增长的进行,其结果将是进一步的民主化吗?这些不是产生于对那个基本范式有效性的信念的那类问题,但是它们可能是与探询当代南美现实更为相关的问题。关于这些可能性,个案研究证据的积累给人印象深刻,但是正如上面所考察的,它总是能被解释为不能证伪该范式。这突显了一个支配地位的基本范式的重要性。只要最初的、在研究之前对主题及其基本趋势的认识不做修正,相反的证据就几乎不可能被利用。虽然观察者记录了他的具体研究之内的证据(比如一个国家的个案研究),但当它变成一个确定那些发现的理论意义的问题时,支配地位的范式——无论两个分析层次上的不一致性如何——就成了引导该阶段分析的线索来源。没有一些

---

<sup>①</sup> 或者说,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最近许多南美公共政策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所暗示的趋势。

关于它们的基本趋势和方向——被揭示的过程似乎正在导向该方向——的想法或假设,分析和评价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似乎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隐含的层次,在该层次上,最初对于主题的理解承担着一种关键的智力功能——特别是当这样的理解表达为一个支配地位的范式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特殊性和学术共识的时候。<sup>①</sup>该范式对经验证伪的抵制强烈暗示着,必须在一个高层次的概念化上批评它。<sup>②</sup>接下来的这些篇幅可被解释为对这个理论任务作出初步贡献的一种努力。<sup>③</sup>

## 数据与均值

这里讨论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指标是全国平均数(统计均数)。这

---

① 在第二章引用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形成替代性概念化的努力,这些著作强调了拉美“依附性”的问题。然而,这一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概念上澄清,在经验性工作上分解,并融合进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视角。

② 通过看一下总量数据研究——它们使用统计技术建立和检验它们的结果——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可以被更正式地审视。其结果完全依赖于这一要求——统计模型正确规定了所研究的部分现实的相关方面。如果模型被误述,而且如果它还没有被正确认定,那么它的结果实质上就是无意义的。经济计量学家已分析了这些要求并坚持对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模型所引起的问题提出警告。关于这些重要的(虽然在我们的学科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参见:W. Hood and T. Koopmans eds., *Studies in Econometric Method* (New York: Wiley, 1953); F. M. Fisher,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E. Malinvaud, *Statistical Methods in Econometrics* (New York, 1970); P. Dhrymes, *Econometrics: Statistic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以及其他的文献。关于一个比较初级的讨论,参见:R. J. and T. H. Wonnacott, *Econometrics* (New York: Wiley, 1970)。如果一个错误的理论或纯粹疏忽导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模型(或导致对它认定不足或过分认定),人们将会对该模型的显然“确凿”的结果是对所研究之现象真实价值的一个合理近似丧失信心。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通过对所使用模型的技术处理,可以得到微小的(以及差不多总是不确定的)改进。正是在修正该模型本身(以及它所规定的理论或概念化)的层次上,这些问题才能被解决。

③ 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对这里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一个精彩的讨论:“除非理论具有分析深入性和逻辑严密性,不管‘数据’多么‘优良’,结果都将是不确定性的。因为原初概念——它们支配在不同国家获得的数据的性质——以及收集和提出信息的方法,是由引以完成任务的社会理论所决定的,按我的估计,不存在可被称为国际性‘原始数据’的东西——它处于社会科学之外,但却可被社会科学利用。……事物只有就特定标准而言才是可比较的。如果标准在科学上没有重要意义,那么单纯的比较也将几乎没有重要性。收集无数的表面上好像可比较的信息是可能的,但除非就这些材料的分析上有重要意义的特征而言,这些信息是可比较的,否则这些信息就将是无用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误导性的”(“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for Social Science Purposes,” *Population Reprint Ser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是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当前的做法，但就特定目的而言，难以证明它的合理性。在一项基于总量数据的研究中，卡曼·谢尔弗特(Kalman Silvert)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种拉美国家的分类法，但他的文章中包含了一个评论，暗示了这里将要详述的观点：

这个作为发展指标的(分类体系)最显著的困难在于巴西和墨西哥相对低的位置。当然，数字是平均值，它意味着这些国家大量的农民人口压低了它们的等级。如果统计学只涉及墨西哥的非印第安人口和巴西的东南部分，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发达地区将取得它们实际上占据的(高)位置(括号内的字是后加的)。<sup>①</sup>

全国平均数是总量指标(比如说 GNP)除以居民数得到的均数。我们从描述性的统计学得知，均数是对分布的中心趋势的测量，其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两个关键因素的任何情况：观测数据的分布形式，以及它们围绕均数离散的程度。<sup>②</sup>这些方面不能被忽视，可以从一个假设的例子——具有相同均数的三种分布——中看得出来(参见图 1)。

尽管它们的均数相同，但是，因为它们的均数相同所以整个分布相同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在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人们经常对整个分布感兴趣，但总量数据研究几乎总是局限于依赖并关注均数。对于单纯以均数为基础的分析 and 推论的缺陷，已经提出了好几个警告，但明显没有什么效果。<sup>③</sup>为了使跨国比较研究单纯建立在全国平均值的基础之上，必须假设或者观测资料的分布形式与它们的离散度可被看成是不相关的，或者假设这二者据信是大

---

①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334 (1961).

② 关于对中心趋势的不同测量方法的性质和局限的一个杰出讨论，可见于：J. Tukey,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0)。然而，我的观点的基本点可从任何一本初级统计学的教科书中得到。

③ 参见：Bruce Russett, "The Yale Political Data Program: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in S. Rokkan and R. Merritt, eds., *Comparing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R. Tufté, "Improving Data Analysis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21, No. 4 (1969); and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tandards and Levels of Living" (E/CN3/3/179 and E/CN/5/299) and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tandards of Living: An Interim Guide" (E/CN3/270 Rev. 1, E/CN. 5/353; Geneva, n.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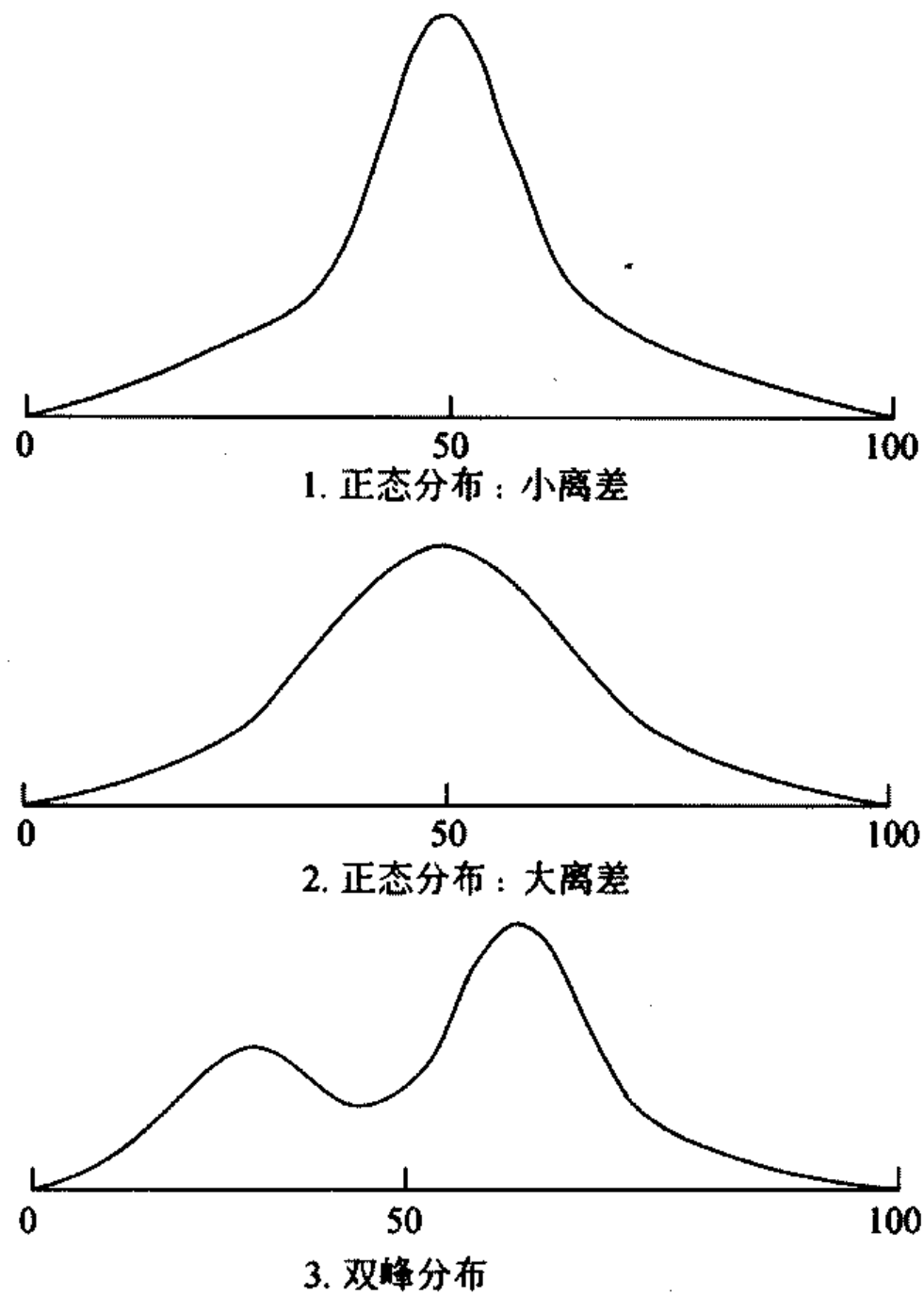


图1 三种具有相同均数的假设分布

均数 1 = 均数 2 = 均数 3 = 50

体相同的。图 1 的假设例子清楚表明，第一个假设十分难于被证明是合理的。第二个假设需要进一步的讨论。首先，它意味着“是什么的平均值”（这个问题随之决定了什么分析单位适合于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个问题有“显而易见的”、几乎总是得不到检验的结论——整个国家是观测资料的总体，均数从中计算出来。其次，分布形式与离散度方面大体相似性的存在，在好像全国平均值是有影响的数据的恰当概括一样发生之前，必须被独立地（和以经验为根据地）确定。

多数变量的内部分布在“发达”国家比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要均匀得多，而且，这些分布及其离散度在不同国家通常大致相同。在这些条件下，把整个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评价社会-经济对国家政治现象的影响，并且根据它



们的平均值来对国家进行比较,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并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分析单位的跨国比较来说,对平均值不加鉴别的运用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平均值是些指标,而指标只有在反映分析单位特征(在给定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分析单位的特征就是基础性的)的时候才是有用的。指标是关于分析单位的过程和结构的;因而,如果它们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所分析单位之现实的社会现实构造,那么它们除了误导以外不会有任何助益。

在那些将该基本范式应用于拉美地区的定量研究中,能使我们测量所用变量在国家内部分布形式以及所做观测资料的离散的那些参数,没有被公布,在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sup>①</sup>因此,国家仅仅在一些变量之平均值的基础上沿社会-经济维度进行排序。<sup>②</sup>从这一观点出发,关于拉美国家发展水平的异同做出论断,并进而界定独立变量“社会-经济发展”——它将被用于预测政治现象。这里,又一次地,指标是平均值,而经验上所指的是整个分布。因而,如果我们处理的是在那些国家内不同分布的变量,那么诸国家沿“发展”维度的排序可能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对于这些研究提出的排序所带来的强结论,基于平均值的推断是很弱的支持。<sup>③</sup>

这一点可由另一个例子来解释,它由处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水平(无论如何测量)的三个国家构成,如图 2 所示。

假设国家 A 是相当同质性的,因为生活在可称为“边缘地区”的人口比例小。因为这意味着围绕许多变量之平均值的比较窄幅的离散,因此,一种情况是:平均的全国数据给予了一个可接受的“一般图景”——至少对于全国层次的初步描述目的而言是这样。假设国家 B 就人口和领土而言是个大国。它是高度异质性的,因为人口的举足轻重的比例属于“边缘”,在那里多数社会-经济变量的值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有影响的变量的分布将倾向于双峰的并(或)围绕均数宽幅离散,均数的用处因而极大地降低了。最后,假设 P

---

① 例如,考虑一下在最小限度可靠的收入分配数据常常缺乏的国家里最常用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GNP。

② 或者更糟的,在总平均值或多种变量的平均值的某种加权平均数的基础上。

③ 公正地说,除了已经提出的理由之外,这里应当加上,出于跨国比较目的而使用平均值,是以下因素助长的:平均值的一些方便的统计特征,以及通过控制(取消)分析单位不同规模的影响来增进可比较性的愿望。但是,如果像我希望揭示的那样,在一些情况下规模本身就是一个有极大重要性的因素,那么技术方便性与实际知识似乎就将处于尖锐矛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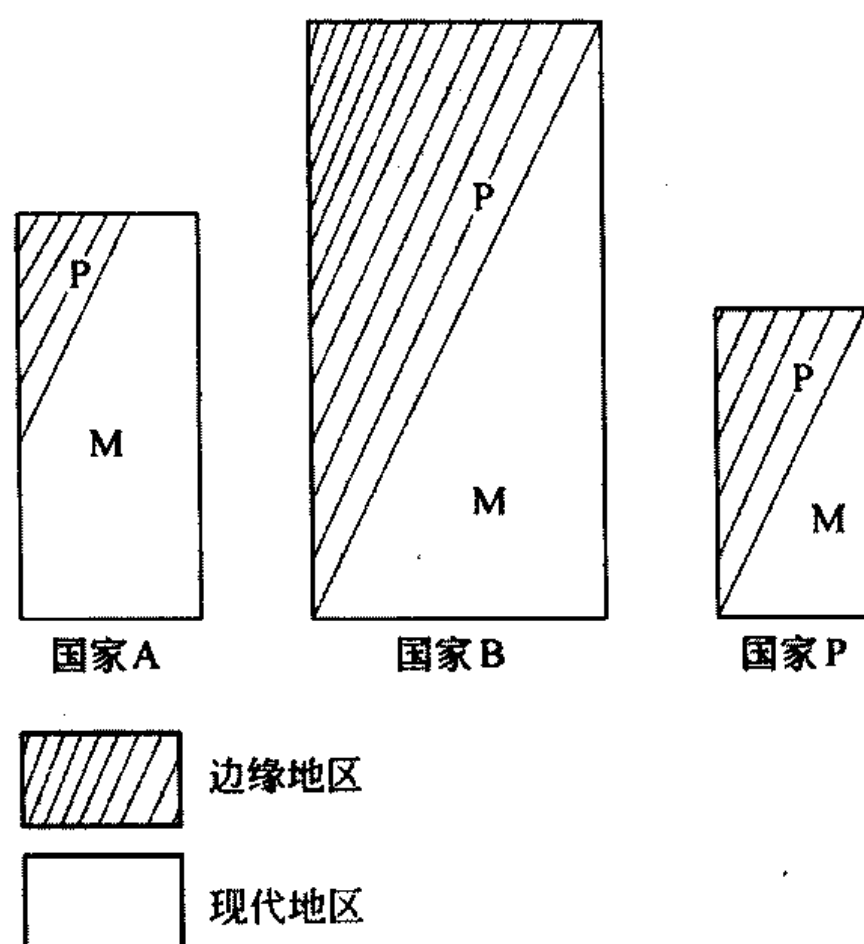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异质性的示意图

是一个小国，其异质性类似于B；则适用相同的解释。

注意，根据图2所示的十分简单的国家内部分解，B的“现代中心”至少与A的一样大。然而，B的大面积边缘地区将决定，如果计算全国平均值，那么她的现代中心的数据将完全被边缘的数据所吞没。其结果是，B的平均值将接近于P而大大低于A。将这个例子往前推进一步，那么情况可能是：A和B的“现代地区”（或“中心”）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而P的相同地区与这二者截然不同。

诸变量的全国平均值适合于比较这三个国家吗？因为A的总体分布（或者换句话说，即“结构”）十分不同于B和P，所以这个问题不可轻率地不予考虑。现在假设分析者们同意以下各点：（1）所有这些国家边缘地区的人口仅仅最低限度地参与和现代性广泛联系的生产、消费及文化品和物质品传送。（2）在那些以某种形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人们中，“现代”地区占压倒性的比例。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对出于比较目的而使用全国平均值的有效性，甚至更严重的质疑也会被提出来。如果这些是良好确定的经验条件，并且，如果（就如在已分析过的研究中的那样）研究目的是评估社会-经济现象对政治体制类型和国家政治其他特征的影响，那么，根据“跨现代地

区”的比较来思考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策略吗？这样的一个比较难道不是可能更好地表示所有那些将解释政治维度中观察到的大多数变化的因素吗？

让我们假定国家 A、B、P 分别是阿根廷（1966 年按市场价计算人均 GNP818 美元）、巴西（333 美元）和秘鲁（271 美元）。在这些人均（也就是平均值）数字的基础上，前引研究（定量和定性的）将巴西和秘鲁置于大体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阿根廷比二者都高。然而，正如将要揭示的那样，巴西的“现代”中心大大超过了秘鲁“现代”中心的全部值，而它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阿根廷的“现代”中心十分相似。假设这些研究和本研究有共同目的，同时假设前述的经验条件，那么，这些标准哪一个“更加重要”？<sup>①</sup>即，就数据和概念化而言，这些标准哪一个可以更好地洞察影响重要的（政治）因变量状况的过程？我的建议是，更重要的数据是那些指出每个“现代”地区结构特征的数据。

在这一点上，这应当是显然的：质疑不经检验地使用全国平均值，导致质疑出于比较目的总把整个国家作为“自然的”分析单位的做法；一旦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国家内部异质性的不同影响问题变得明显，那么后一个警告就成为一个逻辑步骤。<sup>②</sup>现在可能开始探讨从所提出的替代方法中能到什么分析收益。从理论上说，在每个国家中数据应当沿这些条线分解：“现代地区一边缘”分裂大体位于这些条线上，并且，因而产生的诸“现代”子集与此类似。不幸的是，当前的数据分析惯例与当前数据收集和报告的做法高度相关。全国

① 当然，不必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如我将要指出的那样，我正在提出的分解强调每个现代地区结构特征的决定性政治影响，但它忽略了国家的异质性程度可能对那些特征的影响。然而，鉴于这些严重的数据局限性——我的建议将不得不在其中提出，讨论中提出的替代方法似乎是讲求现实的。

② 应当强调，分析单位的选取依赖于研究目的。这里提出的分析单位似乎最适合于初步确定对形成当代南美政治体制特征最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也适合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研究目的）。比方说，如果目的更直接地是规范性的，那么注意的焦点将转向居住在边缘地区的人口所处的部门。或者，如果是更有野心的目的——解释现存的资源分配是如何产生并维持的，那么对整个全国性单位（包括“外部”因素对它的影响）的关注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任何这样的解释：这里运用的分析范畴意味着赞同最初由兰伯特（J. Lambert）在 *Os dois brasis*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Brazil, 1957] 中提出的“结构二元主义”理论。这个概念及其大量派生概念已在其他地方受到了恰当的批评。特别是参见：Cardoso and Faletto, and R. Stavenhagen, “Seven Fallacies about Latin America” in J. Petras and M. Zeitlin, eds.,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8].)

以下层次的南美数据缺乏,而且,可以得到的话,也只包括很少的只有有限可比性的维度。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将要求使用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方法将仅使试验性的结论——它们将不得不等待更详细的数据来做仔细检验——成为可能。

### 国家内部的异质性

“现代”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十分粗略的区分。出于现在的目的,足以能够把“边缘”地区界定为一个具有以下特征的地区:(1)它是一个人均年收入少于200美元的农业地区;(2)它的人均生产率少于该国城镇平均值的一半;(3)它有最少量的工业品生产与消费;(4)它的工薪收入者的组织(特别是联合)程度十分低。根据这个首要的近似值,所有其他地区被界定为“现代的”。重要的是记住,根据这个定义,每个国家的“现代”地区不仅包括“巨大的”<sup>①</sup>城市中心,而且包括有些农村地区——明确规定的条件中有一个对该地区不成立,其原因比如说是因为其人口相对高的人均收入或联合程度。因此,这里提出的区别并不总是与传统的“城—乡”分离相符。(进一步的分解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缺乏必要的数据库。有令人满意的理由相信,通过区别对待每个南美国家中的“巨大的”城市中心,可获益甚多。)<sup>②</sup>

有几项关于拉美收入分配的研究已经建立起了与我们的目的高度相关的模式。阿根廷与乌拉圭被发现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初级(边缘)部门”而成为“该地区的例外”,不过这些模式在其他国家——有关这些国家的相当详细的数据是可得到的——“在许多方面都与阿根廷的情形相反”<sup>③</sup>(参见表2)。

① 这个概念在后面界定。

② 政治学家关于更多研究巨大的拉美城市中心(以及对可用数据的令人沮丧的状况的评价)的一个强有力诉求,可见于:R. Rabinovitz, “Data Resources for Cross-National Urban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A Proposal,”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IX, No. 3(1970)。

③ UN-ECLA,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Estudios especiales: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New York: 1970)。也可参见: UN-ECLA,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XII, No. 2 (1968); A. Pinto, “Naturaleza e implicaciones de l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 en América Latina,”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Vol. XXXI, No. 1 (1970); and D. Lambert, “Repartición de los ingresos y las desigualdade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XXXI, No. 2 (1969)。

表 2 估计的南美国家间结构差异：1965 年左右

国 家	“初级部门”百分比		“边际水平以下人口” (人均年收入低于 100 美元)
	占总就业量	占 GNP 总量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阿根廷	7%	2%	10%
委内瑞拉	26	5	35
智 利	24	5	25/30
巴 西	42	10	35
秘 鲁	56	14	N. A.
厄瓜多尔	N. A.	N. A.	50
乌拉圭	N. A.	N. A.	10

资料来源：“初级部门”数据：Pinto, “Naturaleza”; “边际水平以下人口”数据：D. Lambert.  
注：“N. A.”表示数据无法得到或在资料中未出现。

有充足证据表明,边缘地区的大多数人口被剥夺以至于“除了最少量的衣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被排除在工业制成品的消费之外”<sup>①</sup>。而且,在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工业产品。极低的识字率、用电量、卡路里摄入量及其他因素表明了这些地区大多数人口赤贫的生活水平。除了或许被过分强调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影响以外,说社会-经济上处于边缘的边缘地区很少或不受现代性的影响,似乎并不算夸张。对本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正在进行的全国性导向的政治活动水平在这些地区十分低。即使就他们的“精英”而言,他们最典型的代表——“离乡地主”——也可能是在大的城市中心政治上活跃。这些条件对南美国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可被概括为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除了短命的“爆发”以外,当在全国性舞台上做出决策时,边缘地区压倒多数的人口的偏好根本不起作用。只有当人们移入城市中心,他们才开始有微弱的机会对全国性政治产生某种影响。

通过根据它们的收入和生产率来比较每个国家的农业和城镇地区,表 2 中反映的南美国家内部异质性的程度可以通过更间接的方式来考察(表 3)。再一次,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相对同质性(与其他南美国家相比)得到了证明,

<sup>①</sup> 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6), p. 252.

它是由可得到的(如果说是不足的话)调查数据支持的。一项阿根廷 1966 年的全国性调查表明,就政治意识、信息、行动主义、忠诚、参与以及这里有影响的其他政治维度而言,大多数地区具有相似的反应模式。<sup>①</sup>相反的情况似乎对其他南美国家是正确的。<sup>②</sup>

表 3 南美国家农业和非农业地区生产率与收入比较: 1965 年左右

国 家	人均生产率		平均收入	
	(非农业指数=100)		(农业指数=100)	
	农业地区	非农业地区	农业地区	非农业地区
阿根廷	111	100	100	115
巴 西	49	100	100	273
智 利	41	100		N. A.
哥伦比亚	60	100		N. A.
秘 鲁	25	100		N. A.
乌拉圭	120	100		N. A.
委内瑞拉	23	100	100	250
厄瓜多尔	45	100		N. A.
其 他*	27	100		N. A.

资料来源: UN-ECLA, *Estudio Economico*。

\* 资料来源中的“其他”类别不仅包括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而且包括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我们关于内部同质性的初步结论可概括如下:

**命题 1:** 国家内部异质性的程度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相对低,在智利比较大,在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十分高。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是同质性的,但却是在一种相反的含义上——也就是说,“现代”部门只不过是刚刚出现。

**命题 2:** 考虑到命题 1 中所指出的差异,出于评价社会-经济特征的全国政治相关性的目的,一个“跨中心”的比较策略可能优于目前使用全国平均值的做法。

① 该调查见: J. Kirkpatrick, *Leader and Vanguard in Mass Society: A study of Peronism in Argentin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1)。感谢作者授权下面从其待出版的手稿中抄录她的一些调查数据。

② 关于巴西的情况,参见: J. Lane, “Isol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 Northeast Brazi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pring 1969。



## 定义与指标

到现在为止，由于它们的多余含义，我们不无担忧地使用“现代”（或“中心”）和“边缘”术语。在本阶段，通过使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分析贡献，可能精炼我们的概念：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主要是一个派生的过程，它由角色和制度向“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扩展构成，而这种扩展起源于更为工业化的社会中的工业。<sup>①</sup>这个定义对我们的分析具有重要优点：

(1) 它为操作性提供了简单易懂的指导方针；

(2) 它打开了利用主要由经济学家收集的关于南美国家生产结构（特别是其工业部门）的数据的理论通道。<sup>②</sup>作为现代化之特征的角色和制度的“移植”产生于（反过来又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的生产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有关工业生产及其多样的、基于城市的、直接相关的互补活动——工业活动的营销、广告、通信、运输和筹资——的方面。社会的生产结构中的比较性差异、历时的变化——特别是它们的基于城市的工业结构的比较性差异与历时的变化——是研究社会-经济对政治现象影响的经典基础，在这里将被广泛使用。

(3) 它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和与“发展”术语相关的含义之间的一致性。它因而避免了界定和测量“发展”的恼人问题，这些问题或者产生于指标（一些指标问题已经被提到了），或者产生于某种绩效标准（比如持续的增长或日益提高的平等主义），所有南美国家都明显在这些问题上正遭受失败。

(4) 通过强调在每个正在现代化的环境中由于从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

---

<sup>①</sup> 参见：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以及 *Choice and the Politics of Allo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关于具体集中于拉美背景的相似的、虽然不太精细的概念，参见：UN-ECLA, *El cambio social y la política de desarroll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New York, 1969) 以及 R. Adams, *The Second Sowing*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7)。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的开创性贡献也应当在这里提及；特别是参见：*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sup>②</sup> “工业部门”这个术语用于指工业和与它直接相关的活动，“工业”指工业品的生产，“全国中心的生产结构”指这些地区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活动。

“移植”角色和制度而产生的影响,它把注意力引向了研究导致前者(正在现代化中的环境)的特殊因素群。每种情形下的动态要素产生于这些移植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它们是更为自发的内在来源的表示——的相互作用。这个“现代化”概念表明了详细说明这些特殊因素群的必要性,这些特殊因素群把每个分析单位刻画为用最大把握性和确定性说明、解释和预测构成每个单位的诸要素的行为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sup>①</sup>

(5) 它提出,对“外部”联系和超国家的权力关系在形成每个国家状况中的影响,赋予适当的重要性。<sup>②</sup>

① 关于按照“结构的”(或“背景的”)传统对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详细阐述,参阅后面的第三章。这一点似乎相当明显,但对它的忽视导致了如下谬误,即,不管行动者在其中活动的诸多特定背景如何,而期望名义上相似的行动者作出相似的行为。例如,“中产阶级的出现”不应将我们引向期望包括在这一种类中的行动者像在西欧那样行事。即使相似性比在名义上更大(在这儿的情形下并非如此),行动者被嵌入不同背景这一事实也使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按同样方式行事。这样的行为取决于与界定了具体背景的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关于对“中间部门的出现”文献的一个有力的批评,参见: J. Graciarena, *Poder y clases sociales en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Paidós, 1967].)但是,正如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所指出的,同样错误的期望遍及对其他部门(城市工人、农民)的分析,这些部门受到左派更多的关注(“Latin America as U. S. Empire Crack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5, 1971)。在所有情况下,这样的期望都导致了错误的预测和不幸的公共政策,以及引起赫希曼(E. Hirschman)在 *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3)中评论过的“喧嚣狂”(fracasomania)现象。

② 拉美的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重要因素付出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关注。特别是参见: Cardoso and Faletto, T. dos Santos, “La Crise de la théorie de développement et les relations de dépendence en Amérique Latin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2 (1969) 以及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 2 (1970); T. dos Santos et al., *La crisis del desarrollismo y la nueva dependencia* (Moncloa Campodónico Editores, 1969); H.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70); A. Quijano, “Dependencia, cambio social y desenvolvimiento social” in F. Cardoso and F. Weyfort, eds., *América Latina: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sociológico-polític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Chile, 1970); C. Furtado, *Dialéctica del desarrollo* (FCE, 1965), 以及 *Subdesarrollo y estanca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Eudeba, 1966); M. Alonso Aguilar, *Teoría y polít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UNAM, 1967); J. Nun, “Marginalidad y participación social: Un plateo introductivo,”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1969 [mimeo]; G. Cárdenas, *Las luchas nacionales contra la dependencia* (Editorial Galerna, 1969); O. Sunkel, “Politica nacional de desarrollo y dependencia externa,”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I, 1 (1968) 以及 “La universidad latinoamericana ante el avance científico y técnico: Algunas reflexione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III, 4 (1970); O. Ianni, *Imperialismo y cultura de la viol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70)。但也可参见: Apter, *Choice*; D. Chalmers, “Developing on the Periphery: External Factor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J. Rosenau, ed.,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1969); I. Horowitz, *Three World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7)。

(6) 最后,显而易见的是,它背离了那个基本范式,因为它摒弃了通常的“迈向民主”的目的论,并促进了对在现代化不同水平上不同类型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和结果的探讨。

使用阿普特的概念,有可能对“现代-边缘”两分法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边缘地区是指在那里除了已经叙述过的条件以外,只有十分有限程度的现代化可以被观察到:与工业和现代技术相联的制度与角色的渗透是最小限度的。相反,与工业和现代技术相联的制度与角色的渗透变成了研究每个现代地区的基本标准:它是抽出进行跨国比较的现代地区的“现代化轮廓”的主要指南。作为每个现代地区结构特征的一个指标,我相信这个“轮廓”是可用于对当代南美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政治伴生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的最好工具。

当然,已提出的“现代-边缘”区分仅是第一步。将会看到,甚至在这个层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问题。但对本研究的目的而言,这样的两分法可令人满意地用来反映人口中的特定部分对全国性决策缺乏政治影响。这里的假设是:在全国性政治层次上的大多数不一致可通过集中关注每个南美“现代地区”——以及在其内部特别是由“(激发起来的)政治行动者”和“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形成的“政治需求”——而得到解释。这些将在这项分析中担当重要作用的概念,定义如下:

**政治需求**(或简洁一些,**需求**)是政治行动者所持的关于政府政策的偏好,他们能将这些偏好置于全国性政策制定者关注(无论是服从、拒绝,还是抑制)范围内的持续性基础之上。

**政治激活**指生活在现代地区的人口群体将他们的政治偏好转化为政治需求的能力。为了使政治激活存在,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该群体必须具有一个永久的组织基础,它不完全从属于其他群体的支配。第二,该群体必须处于一个信息网络之中,以使它能容易地被其领袖所联络,并能迅速对其领袖作出反应。否则,该群体就不能建立起将其偏好转化为需求的充分

政治能力。<sup>①</sup>政治激活具有广度(scope)和强度(density)。广度指在一个地区内政治上激活起来的个体的数量和比例,强度指政治需求的频繁程度和组织支持的程度。<sup>②</sup>

政治行动者是这样的社会群体(阶级、集团和组织),他们的政治激活能使其领袖在一个持续性基础之上参与全国性政治过程。如果一个群体内举足轻重比例的个人直接参与了需求的形成(比如,通过罢工、示威或策划军事政变),那么他们就构成了一个“(政治上)被激活的群体”。

技术官僚角色是社会结构中这样的职位,他们要求把运用现代技术作为其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sup>③</sup>为了履行这些角色,每个任职者必须接受过长期的学校教育以适合提供必要的技术性专门知识。另外,他必须赶得上更加工业化的社会——这些角色大多数起源于此并且符合条件的专门技能正在此发展——中的发展(在学校教育期间以及之后)。技术官僚角色的广度指他们在每个地区已渗透进了多少社会部门和活动;他们的强度指他们已渗透进每个社会部门或活动的程度。技术官僚角色是一种精英现象。这些任职者是“政治上激活的人口”的子集和“政治精英”的子集。<sup>④</sup>

---

① 如果不用这个笨拙的词“激活”,这个概念的一个更好的术语可能会是(政治)“动员”(mobilization);但我担心后者会与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金勒·杰曼尼(Gino Germani)有影响的著作中使用的“动员”相混淆(参见: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1961], 以及 Germani,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una época de transición* [Paidós, 1962])。在我的用法中,这个概念并不需要任何从“传统”社会的崩溃开始过渡的假设(而且,只要这后一种情形存在,它似乎就不可能包括在这里所指的意义上“政治上被激活”的那部分人口)。我的概念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政治动员”(参阅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的关系更为相近,但我更强调组织和通信变量,把它们作为连续的、全国性导向的、引人注意的政治活动——它们将微弱或零星表达的偏好转化成为“政治需求”——的必要条件。缺乏这些必要条件的群体可能偶尔能使他们的偏好在全国性政治层次上得到表达,但是他们将不能使它们受到全国性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② 这个概念与本分析中所使用的其他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在下面集中讨论动态过程时予以清楚说明。在第二章将会看到,政治激活被认为依赖于生产性的工业结构和每个现代地区社会分化的程度,以及后者的政治表达——政治多元化。

③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这一类别是由应用现代技术的个人所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主要关注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人所构成。

④ “精英”这个术语这里是在十分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指那些有合理的机会抓住全国性政策制定者注意力(只要他们觉得所面临的问题值得这么做)的个人。因此,即使他们的需求被体制性地拒绝或压制,这些个人仍可能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

一些例子将进一步阐明这些概念。在现代地区内部，一个重要比例的“工钱收入者”（比如产业工人）和“工薪收入者”（比如小学教师）可能在政治上被激活。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的领导人将成为国家的政治精英的一部分：激活他们的支持者使他们能够制造政治需求（在一个不只是零星的基础上、通过抓住全国性政策制定者注意力的方式表达政治偏好）。但这些领袖的大多数将不属于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构成的精英子群体：他们的活动并不经常要求广泛的教育和日常性地运用现代技术。技术官僚角色倾向于围绕管理诸如非手工业生产、规划、政府、军事、通信与控制之类的活动发展起来。这些角色渗透到这些活动领域的程度具有根本重要性。他们渗透的“广度”越广，这个子群体在其中拥有专业技能的社会活动就越多；渗透的“强度”越大，这些角色的任职者就越多。就某一点而言，渗透的广度和强度深深地改变了支持性制度。“现代的”或“职业化的”军事官员能够支配军事机构，重新界定它们的目标和战略，改造军事学院的课程。以前的庇护人被受过正规的行政管理培训的个人所取代。商业创造了组织并促进了公关活动——它们适合增加受过“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经理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之间的联系。主管经济的部长们不再是律师，而是得到专业化培训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职员也相应地改变了。新出版物以及新消费和威望“市场”出现了。<sup>①</sup>

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政治激活的程度和技术官僚角色渗透的程度（以及下一章将要分析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多元化”的程度）与每个南美现代地区的生产结构密切关联，特别是与这些地区工业化的类型密切关联。所有这些因素都一起变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政治多元化和激活程度越高，技术官僚角色的渗透程度越高。这个概念将成为“国家 X 比国家 Y 更现代化”这种形式的陈述的基础。这样的陈述是以下看法的省略表述：这几个维度在国家 X 比在国家 Y 都要高。

根据可得到的数据，“现代”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区分充当确定每个国家的政治行动者的首选近似标准。鉴于源于国家以下层次的南美数据缺乏的严重局限，问题就是发现与政治激活明确关联的指标。例如，有关医院床位

<sup>①</sup> 在下一章，我将更详细地论述这些现象，并探讨它们的政治后果。



和收音机的数据几乎没有价值,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它们与组织支持和连续的需求形成密切关联。另一个困难源于这一事实:全国性数据常常是不能分解的。它必须被适当地建立起来以使这些指标反映在现代地区压倒性地集中的变量——比方说,工业(产出、就业、复杂技术的使用)、高等教育设施、创新活动、熟练劳动力和专业管理人员、现代类型的通信和运输、劳工联合。只要在现代地区压倒性集中的条件适用,就有可能把总体的、非平均的全国性数据作为每个全国性层次上的现代地区内部重要维度的首选近似值。对国家研究的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有 20% 的可被安全地从全国总计数中“扣除”,以接近每个现代地区的数值。<sup>①</sup>然而,在接下来的表中,为了避免给人一种对准确性的易产生误解的印象,报告了总的全国性数字。此外,因为这些数据的解释可能基于在不同国家不同的重要性次序,所以并未尝试做精确的统计比较。然而,全国性数据的这些差异是一贯的和巨大的,足以支持关于在当代南美国家十分不同的现代化水平的结论。这将是第二章将要做的探索政治相关性的出发点。

## 实际值的近似值

### 规模

各个南美国内市场的规模显示在表 4 中。尽管像瑞典和以色列那样的例子证明这不是一个普适的命题,但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南美国家中,国内市场越大,则其工业化推进得越深入。<sup>②</sup>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UN-ECLA)的一份研究评论道:

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的国家通常是那些已经更深入地进行了进口

<sup>①</sup> 在图 2 中可以看出,依赖于每个国家异质性的程度,每个现代地区覆盖的“范围”是不同的。但是,鉴于所选指标的性质,所有的指标都压倒性地集中于所有南美现代地区,而不管这些地区在整个国家领土内所占的“范围”如何。

<sup>②</sup> 关于国家内部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参见: E. A. Robinson, e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0)。然而,对拉美地区来说,市场规模与工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十分强。拉美的对数规模和对数工业产出之间的决定系数( $R^2$ )是.906(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Annex[mimeo])。



替代、并且工业化已经达到最高阶段的国家……国外部门仍然相对重要、并且似乎有一个[进口]替代活动的广阔领域的国家,实际上是那些国内市场的规模甚至在它们正在经历的[工业]发展的最早阶段就施加了最严重约束的国家。<sup>①</sup>

本研究根据它们的工业发展,将拉美国家分类如下:最发达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中等发达的——哥伦比亚、智利、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最不发达的——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以及所有中美洲国家(不包括古巴,其数据无法得到)。<sup>②</sup>

表 4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 GNP: 1966 年(百万美元)

阿根廷	18,733
巴西	27,711
智利	5,150
哥伦比亚	6,209
秘鲁	3,256
乌拉圭	1,686
委内瑞拉	7,938
玻利维亚	668
厄瓜多尔	1,169
巴拉圭	460

来源: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1969*。

另一方面的规模是人口。如果策略是把政治上“不活跃”的边缘地区的人口“扣除”,那么考察城市单位的数据将会是一个有用的方法。这是一个普

① 同前引 UN-ECLA, p. 54。

② 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划分在方式上接近于这些国家根据相对经济发展,在拉美自由贸易联盟(LAFTA)中对它们自己的分层。国家的决策者关于相对发展的这种理解(它决定了在 LAFTA 内部承认的偏好中十分重要的差异)类似于本研究中提出的分类,但十分不同于我曾经批评过的全国平均数据策略所创造的发展等级。

遍的共识：在当代南美，大城市越来越成为全国性政治的主要舞台。<sup>①</sup>这里又要提出一个稍微有点异端的概念。城市规划专家远没有就“什么时候一个城市成为城市”形成一致意见，但对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来说，把某个数字（比如 2,000 或 20,000 个居民）作为一个武断的截止点，已经成了标准做法。这——似乎对我来说——常常是一种避免困难的概念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评价城市地区对全国政治的影响，那么使用像 2,000 或 20,000 这样的数字作为截止点显然是绝无意义的。它需要给予处于 2,000（或 20,000）截止点之上的单位中的任何公民以相同的政治分量，而将小城镇与巨大的城市中心放在了一起。这种做法对许多目的来说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发现城市对全国政治的影响来说，似乎需要使用不同的定义标准。“城市”这一分类应用于这些地方，在那里内部复杂性、非手工业生产、内向和外向的通信以及全国性政府机构与服务的存在，创造了一个与全国政治舞台有至关重要的紧密接触的政治激活之地。<sup>②</sup>在总体上凭印象的基础上，我相信在当代南美，“城市”的下限应当是大约 300,000 个居民。表 5 提供了一份合成性的数据。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用的调查是：F. Rabinovitz, “Data Resour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R. Daland, ed.,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69), 以及 I. Horowitz, “Politics,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 March 1967. 然而,关于大的南美中心(更不用说它们的政治相关性)的系统研究,还几乎没有开始。在这个方向重要的近期贡献,参见: J. Hardoy and C. Tobar, eds., *La urba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Editorial del Instituto, 1969), 以及 F. Rabinovitz and F. Trueblood, eds., *Latin American Urban Research*, I (Sage Publications, 1970)。

② 在思考这个定义问题时,金勒·杰曼尼(Gino Germani)说:“它们[城市化指标]的有效性的问题仍未解决,然而,这是指它们对所研究现象的切合性和代表性。它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任务是界定城市化的概念,随之考察在该概念的许多可能的指标中,有一些——比如强度和规模——将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对其研究更有用。这个概念的社会学定义应当基于那些特别是与刻画了城市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相联系的特性(*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Paidós, 1969], p. 147; 笔者译自西班牙语)。关于人口统计学家就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有益讨论,参阅 Eduardo Arriaga, “A New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s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VIII, No. 2 (1970)。阿里亚加(Arriaga)在与这儿所提出的类似的基础上批评了目前关于城市化的定义和测量指标,并且更为复杂地对更详细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出了关于城市单位中城市人口集中程度的测量指标,它类似于表 5 所示的模式。

表 5 南美国家的“城市”地区：1960 年左右

国 家	居民多于 300,000 的城市数	主要城市人口(千人)
阿根廷	9	6,000(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 西	10	3,250(圣保罗) 3,000(里约热内卢)
智 利	1	1,900(圣地亚哥)
哥伦比亚	4	1,100(波哥大)
秘 鲁	1	1,900(利马)
乌拉圭	1	1,150(蒙得维的亚)
委内瑞拉	2	1,250(加拉加斯)
玻利维亚	1	450(拉巴斯)
厄瓜多尔	2	450(瓜亚基尔)
巴拉圭	1	300(亚松森)

资料来源：UN-ECLA, *Statistical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IV, No. 2(1964)。

这些数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角色、政治激活、通信、创新等方面存在相关模式吗？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尝试给这些及其他密切相关的问题中的一些提供答案。

### 工业化

斯拉文斯基(Z. Slawinski)区分了工业发展的五个“阶段”，其中的第五阶段——还没有被任何拉美国家所达到——是由更发达的经济体所代表的。第四阶段——据斯拉文斯基认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已“开始”了这一阶段——包括

更复杂的加工形式以及复杂装备的生产。一些显著的特征是：特殊钢铁的生产、化工工业的产生；合成化学产品的生产；一方面是高精密电冶工业，另一方面是重装备工业；而且，一般而言，高品质机器的生产和复杂设计的装备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来制造或装配。这一阶段所要求的高技术水平需要广泛使用熟练技工。<sup>①</sup>

①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Latin America’s Development,”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X, No. 2 (1965), p. 166.

###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

生产简单装备的基础工业……钢铁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补之以简单金属产品的加工;补之以水泥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补之以石油精炼和基本化学工业的发展;补之以简单的化学产品的生产。<sup>①</sup>

第一和第二阶段——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位于其中某一点——的标志分别是家庭和手工业生产以及传统的消费工业的盛行。

这个排序得到了可用数据的良好支持。例如,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将南美国家分为三组,并将每个全国性工业部门分为“动态的”和“缓慢增长的”工业,其结果显示在表6中。

表6 南美国家“动态的”和“缓慢增长的”产业按美元计算的产出总值(×1,000)及其总价值百分比:1960年<sup>a</sup>

	产出总值(Gross Value of Output)		
	动态的	缓慢增长的	合计
I组 <sup>b</sup>	17,750	18,284	36,034
II组	3,862	6,260	10,122
III组	289	1,386	1,675
	构成百分比		
	动态的	缓慢增长的	合计
I组	49.3	50.7	100.0
II组	38.2	61.8	100.0
III组	17.3	82.7	100.0

资料来源: 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 87.

<sup>a</sup> “动态的”工业指纸张及纸张产品、橡胶产品、化学制品、石油、非金属矿产、冶金和金属转化; “缓慢增长的”工业指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鞋类、衣物、木制品、家具和印刷及相关工业。

<sup>b</sup> I组: 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 II组: 智利、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III组: 厄瓜多尔和中美诸国。古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因缺乏可比较数据, 不包括在内(后两个可能被分在 III组, 但将它们包括进来也只会最低程度地改变以上的数字)。

在这儿做两点说明是适宜的。其一, “动态的”和“缓慢增长的”工业之间

<sup>①</sup>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Latin America's Development,”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X, No. 2 (1965), p. 167.

的两分法没有充分说明组之间的区别；如果数据被分解到更为技术复杂和更为资本密集的工业的层次上，那么这些区别甚至将会得到更好的说明。其二，如果采用“手工业生产”（雇佣 5 人以下工人的生产）与“工厂生产”之间的区分，那么手工业雇工占总的工业雇用人员的比例在 I 组中是 40.7%，在 II 组中是 48.6%，在 III 组中是 82%。<sup>①</sup>

另一个关于不同类型工业化的重要指标——进口系数——在 I 组的国家中比在其余的国家中低得多（参见表 7）。<sup>②</sup>

表 7 南美国家的进口系数：1963 年

国 家	进口系数
阿根廷	5.5%
巴西	4.4%
墨西哥	7.0%
智利	12.8%
哥伦比亚	8.2%
秘鲁	13.8%
乌拉圭	10.0%(1961)
委内瑞拉	19.4%
玻利维亚	16.9%
厄瓜多尔	11.6%
巴拉圭	7.7%

资料来源：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统计附录[油印本]。

观察同一现象的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垂直的产业整合。表 8 显示，在工业上越发达的南美国家，消费品的份额下降而半成品与资本品生产相应上升。这种模式表明，当朝更加发达的工业化运动时，以下方面的重要结果将会随之产生：不断增加地采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以及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员的更大作用（这一点将在下面进行探讨）。

现在，已经考虑过的数据能够使我们形成以下命题：

**命题 3：**在当代南美诸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越大，且人口在城市单位的集

① 计算自 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 75.

② 同上。



中度越大,那么它们的工业机构就越发达。

### 角色与分层

遵循追问“有多少?”而不是“平均值是多少?”的策略,可以显示出,命题 3 中概括的区别与角色和分层模式方面的区别相关联。I 组的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更大量的联合起来的、产业性的工人,他们高度聚集于大城市地区,表 9 显示了这一点。

表 8 按照用途对 1960 年南美国家工业产出构成的估计:  
绝对数和百分比数据

	绝对数(千美元)			
	半制成品	消费品	资本形成	其他
I 组*	12,903	18,272	2,868	
II 组	2,696	6,004	239	
III 组	375	1,106	20	
	百分比			
I 组	35.8%	50.7%	8.0%	5.5%
II 组	26.6	59.3	2.4	11.7
III 组	22.4	66.0	1.2	10.4

资料来源: 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 88.

\* 对于各组的细分,参阅表 6。

从政治方面来说,纯粹的数字在这里是重要的。更多的处于全国政治中心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极大地提高了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组织化力量以及被置于一个现代通信网络之中的可能性,这使有效需求的形成成为可能。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的革命暴力冲突<sup>①</sup>,也不意味着相对于组织更为完善的诸群体的平衡的权力位置,而只是意味着处于现代地区的重要比例的人口,在政

<sup>①</sup> 参见: Step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以及 W. Corneliu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Cityward Mi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Rabinovitz and Trueblood. 然而,重要的是记住,这些作者讨论的证据所谈的是贫民区居民——这是与产业和(或)联合起来的工人有限重合的一类人。在第二章中,我将分析对组织更为完善的阿根廷和巴西诸部门的影响,特别是在它们 1966 年和 1964 年政变前、革命暴力冲突在大的城市中心大规模出现的时期。

治上“消极迟钝”并丧失组织化资源之前，可能变得在政治上被激活。<sup>①</sup>

表 9 南美国家产业工人和工会成员数量：1960 年左右

国 家	工会成员(千人)	产业工人(千人)
阿根廷	2,576	1,855
巴西	2,500	2,055
智利	493	428
哥伦比亚	330	655(1964)
秘鲁	550	410(1961)
乌拉圭	197	211(1963)
委内瑞拉	1,500	287(1961)
玻利维亚	200	109(1950)
厄瓜多尔	85	210(1962)
巴拉圭	20	34

资料来源：工会成员：Needler, *Political*, p. 96；产业工人：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tistics* (Geneva, 1967)，其中不包括巴拉圭的数据，巴拉圭的数据来自 Pan-American Union, *América en cifras* (Washington, D. C., 1967)。

南美诸国并不例外于一般规则——在其雇佣的受过高度培训的经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以及技术工人的比例方面，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完全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数。<sup>②</sup>对“大的”产业来说通常也是如此。这些种类的产业——资本密集的和“大的”——部分重合，I 组里的国家比其他两组国家拥有更多的这两类产业(而且，II 组比 III 组拥有的更多)。工业组织中的结构差异与其他重要差异相关——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职业层次上，要求更加专业化技术的角色在每个现代地区内部数量越来越大，比例越来越高。

教育机构是工业化的不同层次所要求的技术投入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可以假设教育数据能反映这样的差异，表 10 说明了这一点。

① 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从一个更广阔和更动态的角度予以讨论。

② 参见：Slawinski;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Argentina), *Educación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la Argentina* (2 vols.; 1969); Instituto Tarorcuato di Tella, *Los recursos humanos de nivel técnico y universitario en la Argentina* (1964); OECD,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1967); A. Petreli Gastaldi, *A economia brasileira e os problemas do desenvolvimento* (Edicao Saraiva, 1968)。

表 10 南美国家的入学人数(千人): 1968 年左右

国 家	技术学校 (中学层次)	大学入学 总人数	工程学 总人数	自然科学 总人数	授予大学 学位总人数
阿根廷(1965)	425	243	16.6	31.2	15.9
巴西(1964)	380	155	6.9	22.1	20.1
智利(1964)	125	43	N. A.	2.0	3.4
哥伦比亚(1965)	96	37	3.1	7.7	3.2
秘鲁(1962)	64	46	4.1	4.1	4.0
乌拉圭(1965)	26	16	N. A.	0.5	0.7
委内瑞拉(1963)	93	46	1.6	5.7	2.9
玻利维亚(1965)	8	13	1.2	1.5	N. A.
厄瓜多尔(1965)	40	15	1.7	2.3	0.6
巴拉圭(1959)	3	3.7	0.5	N. A.	0.2

资料来源: 摘自 UNESCO, *Yearbook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68 (Paris, 1969)。

进一步探究, 我们可以大体上测定在每个国家有多少本书正在被阅读, 特别是有多少本译著(外向关注的一个标志, 外向关注是这里所界定的现代化概念的一个假设后果)在被阅读。此外, 在这一假设——技术著作与非初级的生产过程及其相关的角色的关系比其与初级的过程和角色的关系更直接——的基础上, 大体上了解在每个南美国家这些书有多少被阅读, 是有意义的。表 11 中的数据表明了一种与已观察到的跨现代地区的差异明显一致的模式。

表 11 南美国家每年出版的书籍和译著数量: 1965 年左右

国 家	出版书籍	出版译著	技术书籍翻译
阿根廷	3,620(1966)	488	212
巴西	4,975(1964)	629	226
智利	1,478(1966)	170	52
哥伦比亚	709(1965)	N. A.	N. A.
秘鲁	985(1966)	21	12
乌拉圭	266(1966)	26	16
委内瑞拉	N. A.	16	8
玻利维亚	N. A.	N. A.	N. A.
厄瓜多尔	N. A.	N. A.	N. A.
巴拉圭	N. A.	N. A.	N. A.

资料来源: UNESCO(参阅上面表 10), 表 9。

**命题 4：**在当代南美，工业组织越发达，产业工人和联合起来的工人就越多。

**假设 1：**联合起来的工人和产业工人越多，假如他们聚集在大城市中心，那么他们政治激活的可能性就越大。

**命题 5：**工业组织越发达，所要求的具有与生产过程直接相联的专门技能的角色就越多，并且有越多的继发社会化模式来提供这些角色。

## 创新

教育数据在这里被解释为显示跨现代地区的结构性差异。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争辩：关于拉美文化的某些解释表明，教育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相隔遥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面对本章前面表格中的数据，这样的争辩将难以支撑，但它值得进一步的检验。如果说在有关“发展”的不同方面的文献中有一个得到普遍赞同的观点的话，那么它就是：越复杂的社会倾向于具有越高的创新速度。<sup>①</sup>因此，对南美国家不同排序之适当性的一个关键检验，是看一下有关每个国家产生的创新的数据。如果这些国家间的差异被我在本章开头批评过的那些研究更好地解释，那么这理应被反映在创新数据的模式中。相反，如果它们被我在这儿提出的分类更好地解释，那么创新数据的模式应当与后者相符。如果没有哪一种分类是适当的，那么这些数据可能表明一种不同的替代分类方法，或者显示一种每个国家的与纯粹偶然性所产生的没有重大不同的创新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为了有一个真正重要的检验，必须高度确保所显示的创新在一个普适的基础上是“真实的”。为此，我使用南美国家在美国专利局的发明注册——而不是在其每个国家的发明注册。表 12 显示的所得到数据的模式，与这儿提出的南美国家的排序极为相似。

---

<sup>①</sup> 关于就这个主题的阐述，参见：Apter,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以及 Lasswell, “The Policy Sciences of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XVII, No. 2 (1965)。

表 12 南美国家作为登记国在美国专利局注册的发明总数：1951—1961 年

阿根廷	425
巴西	123
智利	37
哥伦比亚	35
秘鲁	28
乌拉圭	46
委内瑞拉	89
玻利维亚	N. A.*
厄瓜多尔	N. A.
巴拉圭	N. A.

资料来源：Journal of the Patent Office Society, XLVI, No. 2 (February 1964), pp. 168—169.

\* 资料来源没有说明未报告数据的国家是由于没有注册,还是因为注册量太小而被认为不值得报告。

### 通信

继续“有多少?”的策略,考察一下有关那些通信媒体——比如电话和报纸,它们要求使用者不只是被动承受——的数据是有用的(参见表 13)。这些数据对以下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有多少人不只是被动地卷入现代通信网络?(表 13 不包括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数据,尽管它们的模式与其他媒体模式相一致。)

表 13 南美国家的电话装机数(1967 年)与日报发行量(1960 年)

国 家	电话装机：1967(千部)	日报发行总量：1960(千份)
阿根廷	1,553	3,186
巴西	1,472	3,837
智利	289	998
哥伦比亚	734	787
秘鲁	152	350(1952)
乌拉圭	195	540(1962)
委内瑞拉	327	646
玻利维亚	29	92
厄瓜多尔	45	226
巴拉圭	16	N. A.

资料来源：UNESCO(参阅上面表 10), Table 9.



交通是与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心理及地理广泛流动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交通的重要性不仅来自使用者的数量,而且甚至或许更多来自于:(1)从事于车辆制造——一种技术复杂的、生产线、“工人联合的”活动——的工人的数量;(2)广阔的辅助产业网络——修理店和加油站,以及汽车工业产生的广告业,它使广大范围的人接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更“富有魅力”的方面。表 14 仅包括与汽车有关的数据。火车数据被排除在外,因为其是否十分直接地与现代化相联系似乎是不能肯定的。

表 14 南美国家的交通数据(汽车): 1965 年左右

国 家	年汽油消费 (百万公升)	登记的汽车总数 (千辆)	年汽车产量 (千辆)	年轮胎产量 (千个)
阿根廷	4,455	1,653(621)*	137(42)	2,936
巴西	6,839	2,396(1,050)	135(89)	5,241
智利	1,233	215(107)	N. A.	555
哥伦比亚	2,219	251(115)	1.8(0.9)	N. A.
秘鲁	1,492	285(107)	无	N. A.
乌拉圭	390	198(80)	无	无
委内瑞拉	3,182	550(165)	44(12)	N. A.
玻利维亚	191	23(N. A.)	无	无
厄瓜多尔	358	41(N. A.)	无	无
巴拉圭	62	11(N. A.)	无	无

资料来源: Pan American Union, America en cifras, 1967。

\* 括号内的数字指商业车辆。

在表 12—14 中的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6:** 在当代南美,工业组织越发达,产生科技创新的速度就越高。

**命题 7:** 创新数据可被用作对反映结构(社会-经济)差异的排序之充分性的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检验。

**命题 8:** 工业组织越发达,现代通信和交通网络直接联系的个人的数量就越大。

### 初步概述

我们已经说明了(国内市场及城市单位)规模方面的差异与现代地区生产结构的重要差异紧密相关,更明确地说,与当代南美诸国工业化类型的差

异紧密相关。<sup>①</sup>接下来,这些(差异)又涉及社会结构的重要差异——除了上面提到的现象以外,还包括对于更多的城市工人和更多的要求特殊技术才能的角色来说,一个更大的组织基础。沿着前面的表格中所概括的所有维度,我把南美国家划为的三个组之间的差异巨大而一致,足以支持这一主张——它们的全国“中心”的现代化程度存在重大的差别。<sup>②</sup>该主张的“政治方面”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解释,但就目前而言,说一种与近期那些研究的优势地位所产生的模式极为不同的模式已经出现,就足够了。“新”的分解如下:

组	国家	“中心”的现代化程度	政治体制的类型
I	阿根廷	高	非民主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II	秘鲁	中	民主(除秘鲁外)
	乌拉圭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III	厄瓜多尔	低	非民主
	巴拉圭		

<sup>①</sup> 在讨论的这一阶段,可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使用全国平均值,除了已分析过的其他后果外,通过隐藏规模变量对数据的影响而产生误导。规模对社会单位的结构特征的影响经常被认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对该因素的研究却散见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尚待系统研究。特别是参见: H. Simon,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0 (1965); M. Haire, “Biolog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Histories of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s” in M. Haire, ed., *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Wiley, 1959); Kenneth Boulding,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 (1953); D’Arcy Thompson, *On Growth and 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K. Deutsch and M. Kochen, “Tow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Decentr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1969); S. R. Klatzky,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Size to Complexity and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XV, No. 4; R.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以及达尔(R. Dahl)和塔夫蒂(R. Tufte)正在做的关于规模和民主的研究。感谢布伦纳(R. Brunner)给我介绍这些令人着迷的文献。

<sup>②</sup> 这儿所遵循的总策略与多伊奇(K. Deutsch)所开创的多维度、多指标的方法相一致,参见: “Toward an Inventory of Basic Trends and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 (1960)。只要与引导研究的概念有似乎合理关系的各种指标显示出明显一致的模式,人们就能对一般理论(它总结了所发现的东西)与它所指的经验事实相符感到有把握。

更好的数据将允许引入对“社会-经济方面”更为精炼的区分，但对这里使用的高度总和的数据和针对具体国家的信息的密切考察，表明秘鲁和厄瓜多尔可能更好被看作是边界性个例，前者处于 II 组的下界，而后者处于 III 组的上界。

这个初步的分类导致了以下的命题：

**命题 9：**在当代南美，较高及较低程度的现代化与非民主政治体制相联系，而政治民主出现在中等程度的现代化中。

本章的归宿是另一张“快照”——沿社会-经济维度的分析性类别与迈向政治维度类型学的预备步骤之间的静态配对。<sup>①</sup>在下一章，该方法移向一种动态视角，它将能使我们探究一些导致了已观察到的政治结果的过程。焦点的改变也将使一种对政治维度的精炼得多的分类方法成为可能，它将取代这里的十分粗糙的分类方法。

---

<sup>①</sup> 除了本章已讨论过的其他困难，在从仅仅某一时点的数据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分析产生了不可靠的结果。使用来自某些时期——在这些时期内阿根廷有了选举和政治党派（也就是说，根据大多数这些研究使用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标准，它是一个“民主体”）——的数据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个国家是一个“异常的个例”。但是在相同的时期，巴西和秘鲁也有选举和政党（也就是说，它们也是“民主体”），并且它们倾向于变成“异常的”：比根据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预测的更加“民主”。这样的趋向或背离（隐含的或明确的）回归线的运动，不会极大地影响对得自拉美国家样本的联系的总体测量，但要弄清“正常的”和“异常的”个案的这种奇怪构成，是如何与那些研究的基本范式相一致的，是困难的。例如，参见：J. Coleman, “Conclusio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Developing Areas” in G. Almond and J.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以及 C. Wolf,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Economic Programs: Some Indications from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IV, No. 1 (1965)。

## 第二章

# 南美政治的替代性概念化

政治维度和社会-经济维度之间的诸关系是一种具有时限性的相互影响，并且只有纵向视角才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必须摒弃第一章中所使用的那种静态、“横向”的研究方法，并转而对当代南美各政治体制的某些基本特征提供一种起源性的解释。对于这一目的，实地工作的积累（特别是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背景。但不幸的是，在把这些数据用于比较的目的时，牵扯到许多难题。因此，出于对所要得出的诸结论之状况的谨慎，我将把“命题”这一术语用于那些被可得到的数据相当好地支持的陈述，而对于那些尽管根据手头信息似乎合理，但却必须等待进一步严格检验的陈述，我将预留“假设”这一术语。

在本章中，我将利用这样一种区分，该区分将在稍后帮助改善第一章中提出的那些初步的政治分类。这一区分与当代南美各政治体制相关，它指的是政府行为是否被用来从全国性政治舞台上排除那个已经被激活的城市平民群体（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下层的各部分）。这种排除意味着政府一贯拒绝满足该群体领导者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它还意味着不许该群体及其领导者们取得那些他们可以凭借来对全国性政策决定产生直接影响的政治权力职位。这种政治排除可以通过直接强制以及（或者）通过关闭政治进入的选举渠道来实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所提议使用的“排除”这一概念假定以前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一个被排除的群体是一个在政治上已被激活的群体。政治上“不活跃”的各群体不属于政治行动者集合的一部分[见前章中的诸定义]；它们继续保留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之外）。排除政治行

动者涉及一项蓄意的决定，来减少那些可以发出显著声音来决定在全国性政治层次上发生什么的人数。当然，进行排除的诸多企图在成功程度上存在差异。在一个极端，一个被排除群体的政治钝化(deactivation)可能得以实现：它由于资源(尤其是它的诸多组织基础)被摧毁而在政治上变得不活跃，并且无法再提出真正的政治要求。在另一个极端，试图排除一个群体可能并不能实现它的政治钝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保有继续推促其政治要求的能力，并且政治行动者集合将趋向于重组到试图排除之前的数目。一个试图排除已经被激活的城市平民群体的体制，将被称作是一个“排除性政治体制”。<sup>①</sup>

与之相反，“包容性政治体制”被定义为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或者是有目的地去激活平民群体并允许它在全国性政治中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不存在进行排除或包容的有意努力，而使自身适应现存的政治活跃程度以及给定的政治行动者集合。这一“包容性”分类给变异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但是足以实现我们的分析——该分析将聚焦于那些排除性体制以及那些导致它们的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

---

<sup>①</sup> 这种类型的诸多定义，目的在于用作分析工具，来简化复杂的经验现象。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使用该概念引起了一些如果不引入诸多差别就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我已经选择在“排除性政治体制”这一类型之中包含这样一些个案：在正文中确认的其他条件之外，无论是出于全面压制还是因为仅仅政府赞助的政党可以参与，选举舞台在这些个案中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一种未被纳入“排除性”类型的情况是：选举舞台依然存在，但却受到如下限制，即，它不能成为一种使代表平民群体的领导者和政党获取重要政府职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平民群体产生政治影响的可能性受到严重局限，但只要它在政治上是活跃的，并且代表着选票总数中重要的一部分，就很可能会有其他群体的政治候选人试图通过选战许诺来获取它的选票。尽管这些许诺很少被兑现，它们却是平民群体通过选举过程来发挥某种间接但并非微不足道的政治影响的手段。(我在第四章中论证指出，这正是南美高度现代化的诸体制中，大多数其他群体经常把关闭选举舞台作为一个根本目标的原因所在。)一些其他著述者在这一点上做出了类似的评论，比如，参见：Furtado, *Subdesarrollo*, pp. 110—117。在选举舞台遭受压制的情况下，平民群体的选举力量显然不再有价值。压制并不影响其他选举力量较弱却拥有更好非正式政治进入渠道的群体；相反，它提高了它们的相对效力。它剥夺了平民群体的一项主要政治资产，但是，只要政府强制不是足够严厉，这个群体就在选举舞台之外保留了表达要求的其他手段：直接行动、罢工、示威。

当代秘鲁的状况可以强化以下二者之间的分析性联系：平民群体以前的政治激活要求和为制造“排除性政治体制”而对选举舞台的压制。基于秘鲁平民群体政治激活的水平低下，压制选举舞台并不是为了排除基本上不活跃的平民群体。在我所提议的类型中，秘鲁的状况是一个“包容性政治体制”，它没有打算拒斥平民群体的偏好，甚至还试图使之在政治上激活。当然，在这种类型内部，压制选举也有不同，正如秘鲁体制的诸多严密垂直控制所显示的那样，政治激活是在这些垂直控制限度之内才得到鼓励的。



在所界定的意义上,当代南美仅有的两个“排除性”体制是阿根廷和巴西。如我在第一章中表明的那样,它们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进得最远的国家。在此,我们将研究在这两个国家中先导致包容再导致排除的诸多过程。然后,我们将简要考察其他当代南美政治体制。最后,将提出一个在高度现代化的当代南美政治体制中“政治博弈”的纲要,以及一个从现代化方面所做的政治体制新分类,用以取代第一章中提出的初步分类。

### 阿根廷与巴西:从包容到排除<sup>①</sup>

平民主义和横向工业化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阿根廷和巴西在经济上更有活力、在政治上更有力量的部门,都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全民所有的(nationally owned)农业领域以及大体上被外资拥有的金融和外贸中介网络。在这两个国家中,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都极大地加速了国内工业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产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增强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布,并且提供了建立广泛“平民主义”联盟的基础。<sup>②</sup>该联盟由相对新的群体

<sup>①</sup> 本节和下节仅是简短概述。从许多方面讲,我的分析类似于卡多佐(Cardoso)和法尔多(Faleto)合著中的分析,但肯定不是该项出色研究的替代品。我的主要资料来源是:O. Ianni, *O colapso do populismo no Brazil* (Editorial Civilizacao Brasileira, 1968); L. Martins, *Industrializacao, burguesia nacional e desenvolvimento* (Editora Saga, 1968); Philippe C.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lfred Stepan,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s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Thomas Skidmore, *Politics in Brazil, 1930—196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H. Jaguaribe, *Desarrollo politico y desarrollo economico* (Eudeba, 1964); J. B. Lopes, *Sociedade industrial no Brazil* (Difusao Europeia do Livro, 1964); Germani, *Sociologia*; J. L. de Imaz, *Los que Mandan* (Eudeba, 1964); M. Kaplan, *La formacion del estado nacional en America Latin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69); UN-ECLA, *El cambio*; UN-ECLA, *El desarrollo social de Ame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Solar-Hachette, 1963); J. F. Marsal, *Cambio social en America Latina* (Solar-Hachette, 1967); Graciarena, “Estructura”; Furtado, *Subdesarrollo, Dialéctica, and Teoria*; C. Mendes, *Nacionalismo e desenvolvimento*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Estudos Afro-Asiaticos, 1963); 以及 Torcuato di Tella, *Hacia una politica latinoamericana* (Arca, 1969)。

<sup>②</sup> 对该平民主义最好的研究是: Torcuato di Tella,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 Veliz, ed.,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还可见: F. Weffort, *Estado y masas en el Brasil* (ILPES, 1967), 以及“Le Populisme,” *Les Temps Modernes*, 257 (October 1967); Ianni, *O colapso*, 以及 Martins, *Industrializacao*。

组成。<sup>①</sup>它所反对的东西相当明显：旧的寡头统治集团、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之间进行中介的显而易见的外资企业以及那些在传统上与旧统治者相联系自由贸易政策。就它所支持的东西来说，这个新联盟在两个基本点上达成了一致：(1) 工业化，以及(2) 拓展国内市场。<sup>②</sup>尽管它产生于世界危机带来的出口收入急剧下降时期，但工业增长很快获得了自身的动力。对于支持者们来说，工业化不仅是消除开始被人们所广泛憎恨的经济和政治依附的手段，而且是保护国家免遭国际危机之害的途径。这些希望追加到外资企业和传统统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之上，使得工业化(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该新联盟的“意识形态粘合剂”。

为了节省国际货币，阿根廷和巴西建立了进口和交换方面的限制措施。这导致了广泛的未被满足的消费者需求，该需求给国内工业的扩张提供了现成的市场。平民主义领袖们(阿根廷的庇隆[Peron]和巴西的瓦加斯[Vargas])使需要节省国际货币成为替国内扩张与民族主义辩护的论据，并且他们所建立的高关税保护措施在更严峻的国际贸易岁月逝去之后，为国内生产者保全了全国市场。

如前所述，平民主义联盟以高速扩张的国内工业作为充满活力的核心而建立。基于对自由贸易及放任政策的抛弃，国家职能的扩展为许多中产阶级职员(*empleados*)和技术人员(*técnicos*)提供了工作机会；民族主义及工业化这个观点对军方有着直接吸引力；工业与政府的扩张以及经济的增长，惠及了城市工人、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促进了人们迁居城市—工业中心、拓展了市场经济、提高了消费水平、并且增进了团结；在农业部门，非出口商品的生产者们从国内市场的扩张中极大地获益。

巨大的“但是……”在于，那个“敌人”——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是国际货币的提供者。平民主义的回应是，减少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并将之重新分配来帮助国内工业扩张和消费。但是，尽管该出口部门已经失去了它的传统霸权，并且政府已经成功地抽取了其收入的重要部分，出口者们作为国际

---

① “相对”新是因为旧的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将他们的某些活动转移到了国内市场导向的工业生产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参与了新的经济政策并从中获益，但是他们中间相当部分的人(包括他们的社团)保持了之前的活动并公开反对新政策。

② 关于该联盟的一项颇有价值的研究，参见：Cardoso and Faletto, pp102—122。

货币唯一收入来源的地位,使得他们保有了一种在程度上和他们在阿根廷和巴西国民生产总值中正在下降的所占份额不相称的政治影响。那些民族主义的平民主义政策,从来没有远远超出这样的范围:反复诅咒“寡头统治”以及没收那些更显眼的外国势力存在的标志物。在这些主要是象征性行动的掩盖下,瓦加斯政府和庇隆政府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包容模式,并和出口部门建立起了暧昧的关系,该部门作为外汇收入来源的角色,对于贯彻平民主义的国内扩张政策至关重要。

具有深远影响的工业化的一个方面的驱动力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工业扩张是“横向的”或“扩展式的”——为了满足对成型消费品的需求(主要是轻工产品以及非耐用品)。是否可能在既有的技术、金融以及管理资源下另行他途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但是这种横向工业扩张意味着很少侵入中间品与资本品的生产。结果是存在许多消费品生产者的分裂局面以及非常高昂的生产成本。另一个后果是对于进口的中间品、资本品以及技术的严重依赖,工业机构离开它们就无法继续运作。<sup>①</sup>

平民群体的许多部分作为消费者而进入诸多城市经济体,受到了国内工业扩张的促进(也是该扩张所需要的)。他们进入一个扩张中的政府和劳动力市场当然也是同一现象的一部分。只要出口部门还能提供必要的国际货币,并且国内工业企业还能继续横向扩张,平民主义联盟的成员之间在利益上似乎就不存在不相容。瓦加斯和庇隆鼓励工人组织工会,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为他们提供了忠诚,部分原因在于它帮助政府控制平民群体新近吸收的成分。两个领导人都利用他们对政府资源的控制,来获取对现存工会的领导权,并创建新的工会。这一政策剥夺了平民群体发展更自主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机会,并且给庇隆和瓦加斯提供了利用劳工的更大能力。但即使考虑到它所有的缺点,它也具有为城市工人提供组织基础的作用,该组织基础无可匹敌地强过他们以前有过的任何东西。工会大体上支持庇隆和瓦加斯,并且

---

<sup>①</sup> 这些特点引起了研究拉美国家经济的学者们的许多关注。近期一个很好的概述是: UN-ECL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XIV, No. 2 (1969)。还可参见: Furtado, *Teoria*, and Raul Prebisc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ILPES and IDP, 1970, mimeo)。卡多佐(Cardoso)和法尔多(Faleto)的合著以及上面引用过的森克尔(O. Sunkel)的文章,提供了探索这种工业化模式之社会—政治后果的有益指导。

在他们执政期间，工会领导人依赖于他们的批准来保持其职位。然而哪怕是在这种附属地位上，城市平民群体也是第一次得到机会在全国性政治上产生一些影响，并且它的领导人也可以在平民联盟内部参与讨价还价。当平民主义时期失去其推动力，而且平民主义政府已经被推翻的时候，阿根廷和巴西都继续存在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水平的城市平民群体，存在敌视那些权势群体的政治忠诚，存在比庇隆或瓦加斯在其执政时代提出的任何表达都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倾向。

平民主义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值得在此进行强调。横向经济增长时期始于一个与外资企业少有联系的国内工业部门，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在此之前都专注于出口导向的活动。该扩张使所有工业都受益。它似乎只是个保持高关税保护以及从国家获得更多资源的问题，工业将有能力满足现有消费者需求以及平民群体中进入市场的新成分带来的扩增需求。公共政策反映了诸多工业利益的一致性，并在此种意义上非常简单明了。被取代的统治者当然可以抱怨，但是对于平民主义联盟的成员们来说，不加区别的工业扩张和关税保护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政策。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包容、在经济上扩张的阿根廷和巴西平民主义体制所处的时期，是相当普遍欢欣的时代。广泛的“发展主义同盟”发现了“起飞进入持续发展”的道路，旧统治者已经被取代，对外依附的纽带已经被切断，平民主义联盟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取得与其期望大体相配的报酬，并且他们之间并不明显存在产生根本冲突的缘由。

但是这一形势包含着在短期内会导致其崩溃的因素。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追溯平民主义政策之危机的主要特点，以及新同盟的产生，这些新同盟将在此后主导阿根廷和巴西政治体制的“排除性”阶段。

**阿根廷和巴西扩张的终止。**阿根廷和巴西经济中所发生的情形终究被认为是工业化“容易”阶段的“耗竭”——在替代成型消费品进口的基础上的

粗放式横向工业增长时期的终结。<sup>①</sup> 进口替代被证明是一种进口密集(import-intensive)的行动。<sup>②</sup>在横向工业化时期,国际出口价格飘忽不定,助长了经济形势衰落,那些为平民主义政策“买单”的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低下使该形势进一步恶化。再加上为了支撑既存的国内工业而对中间品和资本品越来越多的进口需求,这些因素导致了严重的外汇短缺。<sup>③</sup>如表 15 所示,阿根廷和巴西进口替代的增加根本就没有减轻这个问题。<sup>④</sup>

外汇短缺问题一直处于这两个国家许多经济问题的核心位置。<sup>⑤</sup>它变成了一个到底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材料还是进口资本品的问题,前者有利于维持现有工业活动水平却阻碍增长,后者有利于增长却由于短期产出急剧下降而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国内工业结构已经显然无法带来“集约式”(intensive)工业化——国内工业的垂直整合以生产大范围的原材料、中间以及资本商品。“横向”工业化时期留下一份供给清单,包

① 对于这个课题,存在一个庞大的参考文献目录。尤其参见: UN-ECLA,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New York, 1963); M. C. Tavares,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Brazil,”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IX, No. 1 (1964); 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l cambio*; Furtado, *Subdesarrollo and Teoría*; S. Macario, “Protection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IX, No. 1 (1964); W. Ba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 (Homewood; R. Irwin, 1965); N. Leff, “Import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Causes of the Recent Decline of Brazilian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67; D. Felix, “The Dilemma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Argentina” in G. Papanek, 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以下文献批评了一些对“耗竭”这个概念所作出的更为刻板的阐释: A.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69), and C. Diaz 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该说法来自于: C. Diaz Alejandro, “On the Import Intensiveness of Import Substitution,” *Kyklos*, 3 (1965)。

③ 尤其参见: UN-ECLA, *External Financing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CNRS, *Les Problemes des capitales en 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65); and Prebisch。

④ 此外,尽管在更近期的年份中,阿根廷和巴西(尤其是后者)显著增加了对资本商品的国内生产,可是对重型以及高科技设备的进口需求仍然不断增长。关于巴西的情况请见: Nathaniel Leff, *The Brazilian Capital Goods Industry, 1929—19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关于阿根廷的情况请见: Alejandro, *Essays*, 以及本书第三章中的数据。

⑤ 我将在后面第三章中集中于阿根廷个案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些问题。



表 15 南美国家用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补偿性国际融资  
以及净货币储备的减少：1946—1961 年（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阿根廷	1,129.0
巴西	1,471.6
智利	232.7
哥伦比亚	339.0
秘鲁	-49.1
乌拉圭	207.1
委内瑞拉	-161.4
玻利维亚	37.6
厄瓜多尔	17.7
巴拉圭	4.4

资料来源：计算自 UN-ECLA, *The External Financing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括消费品和奢侈品(在数量和品种上)不成比例的份额,同时也留下无数小生产者与少数大企业并存的局面,它们全都处在最低限度竞争与最大限度国家保护的庇护伞之下。工业部门的这种构成助长了远远高出国际水平的成本,倍增了无效率配置,并对收入分配施加了日益负面的影响。<sup>①</sup>当阿根廷和巴西经济已经明显耗竭“容易的”横向工业增长可能性时(1960 年左右),该增长带来的问题对许多部门来说已显而易见了:需要出现重要的、相当痛苦的政策创新——尽管他们对那些政策应当是什么还远远没有共识。

垂直整合所需要的那种工业企业(为了“基本”商品和资本品工业的发展,以及为了所需要的巨大基础设施投资),显著区别于那种在横向扩张阶段往往足以进入工业领域的小工场。新型投资项目的规模、它们发育成熟的时段以及它们的技术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和巴西企业的力量,并严重损耗了可利用的公共资源。<sup>②</sup>关于降低对外依附的平民主义期盼已经成为一个不明智的笑柄。将群众纳入城市生活的同化过程已经巩固了那些被高度发展的经济所规范了的消费预期,“垂直”工业项目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及海外技术

<sup>①</sup> 关于对此种模式及其若干社会-经济后果的出色概观,参见: UN-ECLA, *Estudio económico*; O. Sunkel, “Política” and “La universidad”。

<sup>②</sup> Cardoso and Faletto, 特别是第 143 页及之后,精心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南美较少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在更为工业化[以及更现代化——笔者]的国家所产生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区别。

转让<sup>①</sup>，并且技术官僚角色的日益渗透巩固了对于产生这些“移植的”角色的“始发”社会的依附纽带(见下文第 78 页以后)。甚至更重要的是，外国企业已经被鼓励去“跳过”关税壁垒。国内市场越大，“阿根廷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和“巴西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直接进入这些市场的动机就越强烈。表 16 表明，在 1960 年左右，美国直接投资的模式是如何随着各国国内市场规模而变化的(从而随着每个南美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差异而变化)。

表 16 美国在南美国家的直接私人投资和直接私人工业投资：1960 年左右  
(百万美元为单位)

国 家	总计直接私人投资(1)	小计直接私人工业投资(2)	(2)÷(1)=百分比
阿根廷	828	454	55%
巴西	1,128	663	59
智利	768	27	4
哥伦比亚	465	120	26
秘鲁	448	60	14
乌拉圭	51	20	39
委内瑞拉	2807	202	7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以及巴拉圭	635	29	5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August, 1964。

在更为现代化的南美国家中，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外资工业企业不再是那种标志着较低现代化水平的孤立的、非常明显的、出口导向的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一个宽广的由外围的、全民所有的生产和营销企业构成的网络，并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支付高出平均水平的工资。<sup>②</sup>那些在过去时代显示着外

① 尤其参见：Sunkel, “Politica” and “La universidad”。

② 这一情形与其他南美国家仍然相当盛行的模式形成对比，在那些地方，外国投资的最大部分集中在出口导向的企业中(主要是在采矿—萃取飞地、出口农业特产种植园以及与外贸有关的金融—商业中介)。大多数这些企业与国内市场以及国内企业家之间建立的联系，远远少于那些营销与消费同时还出现在同一个国内市场的地方。此外，尽管那些飞地和种植园往往支付高出全国水平的工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远离这些国家中大的城市中心。参见：Furtado, *Teoría*, and Cardoso and Faletto, 第 48 页以后。

国势力存在的高耸、孤立的标志，如今已经扩散到南美最大的市场中，与国内企业家们和工人们建立起了多种联系，这些工人们依赖着这些外资企业来维持他们相对优越的地位。<sup>①</sup>在阿根廷和巴西，这一新形势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变（我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论证），这些转变已经对两国政治问题带来深刻影响，并且改变了两国政治行动者的组合及政策考量。

外汇短缺加上各部门越来越难以满足的消费需求，已经处于折磨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核心地位。最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是那些最早驶向工业化的国家（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以及那些因为其更广大的国内市场而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得最远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sup>②</sup>，这一点可从表 17 中看到。<sup>③</sup>

表 17 年度平均通货膨胀率：1960—1965 年（百分比）

阿根廷	23.2%
巴西	60.0
智利	27.0
哥伦比亚	12.4
秘鲁	9.4
乌拉圭	29.7
委内瑞拉	0.0
厄瓜多尔	3.8
玻利维亚	5.1
巴拉圭	5.3

资料来源：UN-ECLA, *Estudio economico de America Latina*, 1969 (New York, 1970)。

<sup>①</sup> 此外，在（至少在名义上）保持了国民所有权的工业企业中，那些规模较大以及从事更有活力或技术上更复杂活动的企业，远远超出其他企业，在特许权、少数持股以及融资方面，与外国公司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参阅此文关于巴西个案所作的非常有说明意义的数据和分析：V. Faria, “Dependencia e ideología empresaria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 Política*, No. 1 [April 1971]）。如果我们记着第一章中的观点——更为现代化的正是那些拥有更“大”以及更为“技术复杂并且资本密集”之工业企业的国家，那么这些发现就格外地重要。

<sup>②</sup> 因为市场规模的原因，智利和乌拉圭停滞在较低的工业化水平上。关于这一点，参阅第一章中的数据以及：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及其统计附录[油印本]。

<sup>③</sup> 依照本书序言中宣布的目标，选择了 1964 年和 1966 年巴西与阿根廷试图创设“排除性”政治体制之前紧连着的通货膨胀数据，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数据反映了直接影响这些事件的形势。但是，就像与许多其他数据情况类似，表 21 显示出南美更近期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了该模式（尽管巴西通货膨胀率近期减轻）。

和阿根廷及巴西一样,智利和乌拉圭也经历了一段实施“稳定计划”的历史,这些计划以以下诊断为基础,即,认为遏制过度需求、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以及消除“边缘”(无效率)生产者,是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条件,并且制止通货膨胀反过来是进一步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些政策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sup>①</sup>无论具有哪些优点,它们都由于所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安而在政治上不可行。通货膨胀和增长遵循着一个疯狂的模式,在“稳定计划”带来的衰退效应与回归更加缓和的政策之间交替。<sup>②</sup>此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阿根廷和巴西的许多部门过了不久就得出结论,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前提,诸多稳定规划(以及下文将讨论的其他经济政策)要求搁置有关民众消费以及权力参与的需求。

作为这些政策的一项后果,阿根廷和巴西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非常高,但是伴有相当大的年度波动。衰退性与通胀性公共政策的交替,造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局面,许多公共和私人决策者发现很难适应这个局面。<sup>③</sup>横向工业扩张耗竭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反映在总体经济增长数据上,在1964年军事政

① 关于大量的“结构主义对货币主义”(structuralists vs. monetarists)争论的综述,参见:W. Baer and I. Kerstentzky, eds., *Inflation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Homewood: R. Irwin, 1965), and W. Baer, “The Inflation Controversy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 (1967)。

② 在评论巴西的经验时,塞缪尔·莫利(Samuel Morley)写道:“一个想要制止通货膨胀的自然愿望迅速地导致这样一些规划:它们对产出和就业的政治上灾难性的首期效应使它们被部分地摒弃。如果它们在后来重新出现的话,经济就会在真正的停滞时期以及通胀性的增长时期之间徘徊。这样一项政策实在是与没有通胀规划一样糟糕。它削弱了私人部门,使得提前计划和投资更为困难,并且在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延长了衰退性调整的时段。”(“Inflation and Stagnation in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IX, No. 2 [1971])。对于有关阿根廷案例的类似结论,参见:G. Maynard and W. van Rijckeghem,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n Inflationary Economy: An Analysis of the Argentine Case” in Papanek, ed., 以及本书第三章中的分析和引用的资料。

③ 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UN-ECLA)的一项研究(“工业发展”)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即,一个国家在工业上越发达,这些困难也就越大。根据这项研究,对于进一步垂直整合的更大技术要求,加上更大的投资规模和更长的成熟周期,要求更稳定的环境以供公共和私人决策来施展。相反地,资本和技术较不密集的企业和项目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业机构更容易适应突然的环境变动。这显示出了如下假设(下文将作进一步探究),即,关于在社会环境中取得高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被认识到的需要,将会随着每个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水平而增加。我之所以强调这看起来是个被认识到的需要,是因为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把它表述成了一个为更先进的工业化条件所强加的客观需要。

变之前紧挨着的年份里，阿根廷几乎没有经济增长而巴西的增长则急剧下降。<sup>①</sup>

就业趋向也应该被指出来。<sup>②</sup>向生产要素组合非常不同的地方借鉴技术，意味着那些更现代化、更有活力的工业企业通常劳动力吸纳能力微小。<sup>③</sup>因此而发生的就业趋向导致了一个著名的现象，即服务业不成比例的规模。但是在此，现代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再次产生影响：阿根廷和巴西工业就业占非农业就业的比例，在大约二十年前达到了顶峰。对于大多数其他南美国家来说，这样的就业后来达到最高点，或者增长率扁平，但从来没有达到阿根廷和巴西的水平（参见表 18），这支持了第一章中关于南美国家现代部门中可观察到的重要结构性差异的主张。

表 18 南美国家工业(工厂)就业在整个非农业就业中的比例：1945—1960 年\*

	1945	1950	1955	1960
阿根廷	20.6%	18.5%	16.9%	15.3%
巴西	16.9	17.3	15.8	15.0
智利	12.7	13.1	13.3	12.4
哥伦比亚	9.1	9.8	9.1	9.6
秘鲁	8.5	11.0	11.9	13.0
乌拉圭	N. A.	N. A.	N. A.	N. A.
委内瑞拉	9.2	8.1	9.7	10.8
其他 (包括中美洲国家)	11.6	10.7	11.1	11.4

资料来源：UN-ECL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6), Statistical Index [mimeo].

\* 斜体数据是各国在这 15 年期间的最大比例数。

① 关于阿根廷，参阅本书第三章。关于巴西，参见：Ba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l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1 (1963), and Skidmore.

② 关于数据以及分析，参见：Slawinski, and F. Cardoso and L. Reyna, "Industrializa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C. Blasier, ed., *Constructive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8).

③ 这个方面已经得到相当关注；关于一个优秀的分析，参见：Furtado, *Dialéctica*.

此处的要点在于,横向工业增长在阿根廷和巴西比其他南美国家要推进的远得多。但该增长有严重局限并且为期甚短。当它结束时,留下了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遗产:平民联盟的崩溃、新的政策事项、一个被深刻改变的社会结构,以及许多破碎的幻想。<sup>①</sup>在一种根本意义上,阿根廷和巴西以这种方式达到其“中心区”现代化程度的高端之后,不得不面对那些“问题空间”(problematic spaces)<sup>②</sup>,它们在有些关键方面显著区别于那些在扩张之前时期的问题空间,也显著区别于其他较不现代化的南美国家里当前的那些问题空间。这一点将在本章剩余部分加以强调与详细阐述,即,在“现代化”这个概念所要求的所有维度中,现代化的不同水平导致了确定每个国家问题空间之事项的不同组合。之后,政治行动者集合以及他们的政治反应(行动者们的目标与联盟、公共政策,以及政治体制类型)被这些不同组合及其赖以产生的不同结构所塑造。我相信这些是对当代南美社会-经济及政治互动进行比较探索的有益分析工具。

在阿根廷和巴西,在工业部门中一度存在的利益同质性已经明显消失。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专家”一致认为,如果增长要再次开始,就必须通过取消那些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密集并且财政更强大的企业身上的一切束缚,清理掉市场中的“边缘性”生产者。当然,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工业部门。除了其明显的经济重要性,它也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大多数更先进的企业是外国(尤其是美国)所有的。<sup>③</sup>除了是国内所有之外,更为边缘的工业企业还趋向于采用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意味着消除它们将加重失业危机。因此,看起来“经济上理性的”东西(暂且不考虑次于垄断性集中的最优效应的情况),引起了更为依附和更多失业的前景。就像阿利彦多(C. Diaz Alejandro)表述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不亚于没有民族

① 关于平民联盟的崩溃(或者——如许多作者更愿意给它贴上的标签——“发展主义者同盟”),尤其参见:Cardoso and Faletto; Ianni, *O colapso*; Torcuato di Tella, *El sistema político argentino y la clase obrera* (Eudeba, 1964)。

② 我将用这个术语来结合两个部分重合的概念:“突出社会问题”(在政治行动者们所关注事项的议程上处于重要位置的社会问题)以及“发展瓶颈”(从观察者角度看,严重妨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性的问题)。

③ 表16中的数据与此处相关。正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存在着更多(以及更大比例)国内市场导向的美国直接工业投资。



资本家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问题。<sup>①</sup>民族主义及维护社会安定可能被国内工业家们——专家意见、“稳定”计划和更强有力生产者的利益使他们面临消失的危险——用作有效的论据。正如下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问题也对军方以及那些被任命在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决策来说关键性岗位上的技术专家具有深远的意义。

横向工业增长的终结也带来其他密切相关的影响。不复存在孤立的、高度可见的“敌人”，或者设计将给所有旧平民联盟参与者提供满意报酬之政策的希望。一段时间遗留下来的，是造成更高通货膨胀与更低增长的反复无常的政策模式。在这种情形下，阿根廷和巴西突出的社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事项被一个不同的政治行动者集合所讨论，二者都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两国“中心”的高度现代化给这两个国家带来的新裂隙。无可置疑，在所有南美国家中，进一步增长要求除了别的东西之外，尤其要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发生相当剧烈的变化。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当今的阿根廷和巴西，冲突和争论不再围绕着那些通过没收原料生产企业或者出口导向、外国所有企业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在两国横向工业增长之前，这些曾经是中心问题，就像它们现在是大多数其他较不现代化的南美国家当前舞台上的中心问题那样。<sup>②</sup>

阿根廷和巴西国内市场的较大规模使得两国在实现其“中心”现代化上比其他南美国家前进得更远，特别是在由工业导致的广阔生产基地及其众多直接相关的活动（营销、广告、通讯、运输、融资）方面，以及在实施这些活动所需要角色的渗透和通过这些角色所开辟的“外部”联结方面。同一国家内部的变化，以及在现代化水平上的跨国差异，牵涉到在结构方面以及对许多影响越来越大的生产过程进行控制方面至关重要的差异。这一切反过来导致那些“中心”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联盟模式和政治行动者目标的变化，这些政治行动者开始围绕新问题和新裂隙——它们表示着被改变了的问题空间——而聚集。所有这些变化都造成就以下方面来说的新问题：政治行动者们被改变了的权力基础、他们觉得可供他们利用的政策选项，以及他们有希

<sup>①</sup> *Essays*, p. 272.

<sup>②</sup> 更高水平的拉美现代化所要面对的问题之本质的这一关键性变化，在较少强调的情况下，也被卡多佐和法尔多的合著所指出。

望加以选择的制度性政治安排的类型。<sup>①</sup>

平民主义之后阿根廷和巴西的政治行动者。基于横向工业增长“耗竭”所产生的疲软经济条件,平民群体的消费和权力需求在其他群体看来是非常难以满足的。但当时那些需求来自在平民主义时期所成就的更坚固和更广阔的组织基础,并且传达给了在民间争斗面前承受力非常脆弱的文官政府。此外,平民主义时期产生了政治领导人可以——基本上用分配主义、平民主义式经济政策的许诺——加以吸引的一个庞大的城市选民群体。在1964年(巴西)和1966年(阿根廷)军事政变之前,所有政治行动者都越来越在压力和威胁基础上进行运作。平民群体的主要资本是它的选举分量以及它进行罢工、示威和干扰的能力。结果是,其政治活动的广度和强度在两国政变之前的年份里显著增长。<sup>②</sup>平民群体在重大城市中心的积极存在,被大多数其他群体视为具有深远的威胁性。在经济扩张终止之后,工人们的要求被他们原来的联盟伙伴认定是要导致对社会的改造,达到比后者所愿意接受的更激进的程度。<sup>③</sup>尽管存在引起工业行业之间新裂隙的“复杂因素”,但大多数

① 尽管有其严重的数据局限,我在此提出的比较策略使得有可能得出这些关键性变化和差异的近似值,如果使用静态方法以及全国平均数据,这些变化和差异很可能仍然隐而未知。

② 关于阿根廷和巴西平民群体政治活动(以罢工数以及罢工者数量来标示)增加的数据,参见: Samuel Baily, *Labor,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R. Rotondaro, *Realidad y cambio en el sindicalismo argentino* (Pleamer, 1971); and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关于赞同不断增长的平民激活程度是1964年和1966年政变中一个主要因素的解释,尤其请见: Cardoso and Faletto; F. Weffort, *Estado and "Le Populisme"*; N. Aguiar Walker, "Moviliz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 en el Brasi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I, No. 3 (1965); Ianni, *O colapso*; L. Martins, "Aspectos políticos de la revolución brasile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III, No. 3 (1967); J. B. Lopes, "Étude de quelques changements fondamentaux dans la politique et la société brésilienne," *Sociologie du Travail*, No. 3 (1965); and José Nun, "The Middle Class Military Coup" in C. Veliz, ed., *The Politics of conformit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③ 关于阿根廷和巴西平民群体日益增长的激活程度引起的企业家及其组织的恐慌,有关资料和分析参见: F. Cardoso, *Empresario industrial 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Difusao Europeia do Livro, 1964); J. M. Freels, *El sector industrial en la política nacional* (Eudeba, 1970), and "Industrialists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An Opinion Survey of Trade Association Leader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XII, No. 3 (1970); UN-ECLA 在 *El empresario industrial en América Latina* 中的阿根廷和巴西研究,以及在上一脚注中引用的材料。还可参阅两位经济学家对政变前的阿根廷所作的生动见证——Alejandro, *Essays*, 以及 Everett Hage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Homewood: R. Irwin, 1968), pp. 339—340.

阿根廷和巴西的有产群体一致认为平民群体的要求过火了(既在消费方面也在权力参与方面),并且认为如果不严格控制这些要求,资本积累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直小心避免把高度现代化等同于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的含义。“现代化”这个概念已经被用来研究在一国内部多方面的社会僵化症、高度倾斜的资源分布以及对外依附的情境下所发生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境下,经济扩张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就像平民主义经历如此清楚展示的那样。但是高度现代化产生了持续增长的平民政治参与率。这导致大多数有产群体将平民政治要求视作对于诸多现存社会安排之存亡的严重威胁,对于阶级结构、权力分布以及这些国家的国际阵营归属尤其如此。由此产生的两极对立促使大多数有产群体在接受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据推测将通过政治上排除平民群体而消除那些威胁——问题上团结一致,使得该情况下强烈的阶级成分甚至更为明显。由于下文将要讨论的原因(工业行业间的裂隙是其中之一),这种团结一致没有超出这个地步太远,并且决定新政策之内容的主要角色是由有产群体的极小部分来扮演的。出于阿根廷和巴西现代化的水平,这一部分由控制着更复杂组织和更先进技术以及拥有最密切海外联系的个人所组成。但是这个有限的团结一致已经足以保证各有产群体一致支持政变,并一致支持阿根廷和巴西新的“排除性”政治体制最初所做出的决策(我们将在下文回到这一点)。

古巴革命使许多群体惊恐,看来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对平民政治活跃之意味的估量。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怖景象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采取的众多活动所唤起并大力增强,这些活动目的在于在南美洲防止以及镇压“颠覆”。古巴革命的影响以及日益增强的社会动荡在军队角色界定的膨胀问题上处于核心位置。美国着手提供反颠覆斗争的训练,法国和美国的“反颠覆”以及“公民行动”(civic action)原则得以讲授,军队的政治领导能力也作为军队进化的部分而得到强调。“国家安全”被重新定义,以包含“社会-经济发展”

的实现以及镇压“内部敌人”——那些“极端的颠覆分子”<sup>①</sup>。社会危机、政府无效率以及社会动荡被视为构成了“内部颠覆”，消除它则落在了特定军队职责的范围内。

在1964年和1966年政变之前的年份里，阿根廷和巴西庞大工薪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稳步恶化。这个群体显示出对这一状况不满的明确迹象，剥夺、政治无序和正式的民主体制在该状况中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反抗，以对“法律与秩序”的诉求来回应。<sup>②</sup>（中产阶级中一个关键性亚群体——担任政府职位的技术专家们——发现“政客们”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只是公共机关中不安稳的职位，并且通常不愿意也总是无法去遵循他们的建议。但是技术专家属于技术官僚角色的类别，将在下文中相应标题之下予以考虑。）大多数农业出口商重申了他们对群众政治的厌恶，以及他们对在屈从城市平民群体压力的当选政府之下无法取得多少长久收益的信念。

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平民群体的政治孤立。<sup>③</sup>缺少了从前的平民主义盟友和直接政治渠道，并且经受着不利的收入再分配之苦，他们需要不断增强的政治激活来对他们的要求取得不断递减的回报。在其他各群体中，对颠覆的日益增长的恐惧，加上不断减少的收益，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进一步销蚀了他们曾经给予阿根廷和巴西政变前政治体制的微弱支持。

① 关于军队演化的总体考察，参见：Liisa Nort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Argentina, Chile, and Per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6); W. Barber and N. Ronning, *Inter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Power*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tepan, *The Military*; L. Einaudi and A. Stepan, "Lat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hanging Military Perspectives in Peru and Brazil"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1); and P. V. Beltran, ed., *El papel político y social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América Latina* (Monte Avila Editores, 1970)。关于阿根廷军官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参阅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所引用的资料。关于巴西，参见：Gen. Couto e Silva, *Geopolítica do Brasil* (Livraria Jose Olimpo Editora, 1967) and the comments by O. S. Ferreira in "La geopolítica y el ejército brasileño" in Beltran, ed.。还可参阅阿根廷季刊杂志 *Estrategia*，以及 *Revista Brasileira de Estudos Políticos*, special issue on "Seguranca Nacional" (1967)。

② 尤其请见：Furtado, *Dialéctica and Subdesarrollo*; Weffort, *Estado*; Martins, *Industrializacáo*; 以及 Ianni, *O colapso*。还可参阅前面三条脚注中引用的资料以及本书第三章中包含的数据。

③ 除在本小节引用的资料之外，还可参见：di Tella, *El sistema*，以及 D. Cantón, "Revolución argentina de 1966 y proyecto naciona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 No. 3 (1969)。

政府日益恶化的表现反映在 1964 年和 1966 年政变之前政府可利用资源净额的递减上。更少的赋税收入以及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更小比例、公务员实际工资的减少、较低级别上冗员过多以及较高层次上人员成批流失、一再发生的内阁危机——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国政府在处理能力上的衰退。<sup>①</sup>

政治发展文献中的多种思潮已经强调过，政治体制的绩效与政治要求之间的一定对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sup>②</sup>正如阿根廷和巴西的平民主义所显示的那样，社会-经济扩张时期趋向于促进更多政治行动者的激活。但是许多发展的瓶颈导致这样一些情况，即，在总体社会表现缓慢改善的同时，进一步的政治要求正在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并且被进一步的政治活动所支持。绩效与要求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缩小它的政治行动。会有哪些政治行动者采取什么行动呢？这似乎取决于社会分化的模式，而社会分化则产生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变革。

现在可以把第一章中的数据和本章中所描述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已经被提出的是，南美国内市场的规模及其现代领域的生产结构——特别是其工业化类型——是决定每个现代领域中社会分化模式的主要因素（这些是在此处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更一般的方面）。此外，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复杂性——更多的社会单位（部门、阶级、机构以及角色）以更复杂的方式互相联系。政治多元化是社会分化的政治表达：它意味着政治互动的更大复杂性——更多的政治行动者以更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sup>③</sup>在所有这

① 关于阿根廷，尤其请见本书第三章。关于巴西，尤其请见：Instituto Brasileiro de Estatística, *Series estatísticas retrospectivas* (IBGE, 1970)。

② 除了其他文献以外，尤其请见：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LaPalombar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enetration: A Crisis of Governmental Capability” in L.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thcoming；Lasswell, “The Policy Sciences”；and K.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另请参见 the useful survey by A. Diamant,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 Montgomery and W. Siffin, eds.,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③ 肯沃西(E. Kenworthy)如是表达这个观点：“[社会分化必然伴有]这样的假设，即存在与政治过程相关的多元集团。以发展的观点来说，这提醒人们注意政治舞台上新兴行动者的出现，以及新兴权力资源的时常出现(有组织的劳工和总罢工分别是二者的例子)。归根结底，这是分化的政治含义。不幸的是，发展文献经常把分化视为群众政治化，好像政治舞台上只浮现出一个集团似的……分化不仅引起多元的集团，还带来各种政治资源”(“Coalition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S. Groennings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oalition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些维度中,可供利用的信息暗示三组南美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此,这些差别和它们必然带来的不同问题空间被看作是决定政治现象不同模式(特别是政治体制的不同类型)的主要因素,这些政治现象模式使得在每一组中的国家显著区别于在其他组中的国家。

社会分化在与诸多社会整合问题的“对位互动”(contrapuntal interplay)<sup>①</sup>中进行。“社会整合”几乎不可能被精确地加以定义和测度。该概念经常被应用于以均衡假设为前提的社会理论中,而这里并不采用这些均衡假设。但是尽管存在种种局限,它仍然指出了社会现实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新兴社会单位(阶级、部门、机构以及角色)的出现时常与社会早先阶段巩固起来的模式相冲突——特别是在如下时刻: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单位(特别是机构和角色)不是出现在或多或少自发的内部力量冲突与调整过程中,而是产生于对较先进和较工业化社会的“移植”。<sup>②</sup>现代化必然带来社会分化,而后者导致竞争中的利益、冲突中的规范性主张以及分歧的行为预期。只要在这些方面之间以及在社会单位之间没有实现某种“适应”,社会整合就会落后于社会分化。新近分化的社会单位的加入使得它们之间可能的排列和组合呈现指数增长,同时冲突的结构化来源增加,并且行为预期的共同之处衰减。通常的结果是社会凝聚程度低下以及普遍的不确定性。政治行动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短期收益,社会上和政治上可以容忍之行为的边界被弄得模糊不清,并且政治体制把部门目标融合进更广泛视角的能力减弱了。<sup>③</sup>

在阿根廷和巴西,这一“分化—整合差距”助长了先前提到的“要求—绩效差距”。二者都是现代化在全国“中心”达到高水平时的后果,并且导致被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恰当地描述为“群众普力夺主义”(mass

① 这一说法来自: Neil Smelser,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0), p. 110.

② 也许新兴社会单位从内部过程出现的最佳范例应当在西欧和美国找到。在另一方面,“移植”一直是“后现代化国家”中的普遍规则,当然也包括南美国家。现代化模式和后果方面的这些差别,加上它对于先前存在模式的“适应”程度,成为反对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关于各因果过程等价性假设的进一步证据。

③ 关于这些方面的出色讨论,参阅所引用的阿普特(D. Apter)的著述,特别是 *Choice*。



praetorianism)的政治情形。<sup>①</sup>一方面，“政治博弈”因为更多政治行动者提出更多聚焦于政府决策的要求而变得更广泛。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政治行动者之间还是面对政府之时，该“博弈”由于正式规定的政治行为和赤裸裸的权力策略相比较越来越不重要而变得更不受约束。两国中的政治机构(政党、议会)——它们从来没有特别强大过——甚至被进一步削弱，行政部门成为泛滥的政治要求的首要着眼点。在这种形势下，阿根廷和巴西政变前的政府成了普力夺主义的牺牲品，但也勾结于普力夺主义之中。一些著述者把这种情形描绘成一个“僵局”，其中存在着高度的无约束冲突、要求上的尖锐差异以及阻碍实施任何政策的政府软弱无力。<sup>②</sup>这种政府无能加重了社会形势的恶化，哺育了进一步的普力夺主义。在政府内部，由于几乎没有有效决策的可能性，关于如何保住职位的考虑变得压倒一切。这导致了采用多种系列的政策来抚慰更具威胁的政治行动者，而几乎不考虑更一般性地解决问题。<sup>③</sup>

这些活动威胁着现存政治体制的存活。突出的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竞争越来越具有零和性质，收益很不可靠，而且普力夺主义破坏着现存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多数政治行动者聚焦于完全改变“政治博弈”的规则而不是力图在现存规则之内获益的时候，政治体制就达到了一个决定性危机的门槛。诸多联盟被建立起来，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植入一个使得有效决策符合联盟成员偏好的政治体制来终止那个“僵局”。如亨廷顿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在一段普力夺主义时期之后，趋势将会是对形势进行如下界定，

① *Political Order*。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普力夺主义”出现在政治参与和动员水平显著超出一个社会中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时候(第80页)。“群众普力夺主义”存在于在高度现代化与受到高度动员的社会出现制度化滞后的时候，在这些社会中，大规模社会运动和复杂组织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第88页及之后)。亨廷顿在几个段落中讨论了“[群众]普力夺主义”的主要方面及其后果；例如第196页，“在所有国家中，专门化的社会集团都参与政治。使这种集团在一个普力夺社会中看起来更‘政治化’(politicized)的，是缺乏有能力调停、优化以及缓和集团政治行动的有效政治制度。在一个普力夺体制中，社会力量赤裸裸地彼此对抗：没有政治制度或者职业政治领导人团队被认可或者被接受为合法的中介来缓和集团冲突。同样重要的是，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和权威的方法，集团之间不存在共识……但是，在一个普力夺社会中，不但行动者多种多样，而且用来决定职责与政策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每个集团使用反映其特殊本质与能力的手段。有钱人行贿；学生骚乱；工人罢工；军队则政变”。

② 关于这个概念的最初表述，参见：di Tella, *El sistema*。其他作者曾经探讨了它的含义。例如，参见：Kenworthy, “Coalitions,” and Irving L. Horowitz, “La norma de ilegitimidad: Hacia una teoría general del desarrollo político latinoamericano,”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XXX, No. 2 (1968)。

③ 这个方面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更详细讨论。

即,该形势要求对那些不属于获胜联盟的群体的政治活动加以严厉约束。因此,该趋势就是朝向一个高度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但是此种威权主义的具体特点以及获胜联盟的主要目标,则深深地被[高度]现代化的程度和[群众]普力夺主义的类型所影响。

也许在此简要概括本章到目前为止所讲的东西是有用的……阿根廷和巴西平民主义的终结意味着曾经支持它的广泛联盟的解体,该终结也和“容易的”横向工业增长可能性的耗竭紧密相连。繁多的未被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不稳定的经济增长、社会分配不当、社会结构中持续的僵化症、得到缓和但却在许多方面增加了的对外依附)向许多政治行动者表明,社会结构需要进行重大改造:一个平民体制无法作出所需要的变动。对于来自意识形态谱系上任何一点的观察者来说,很显然,诸多金融和技术要求以及经济增长强加的社会变动已经急剧地改变了阿根廷和巴西的状况。现代化的效果在以下领域中显而易见:在政治多元化中得以体现的增大了的社会分化、工业行业之间深重裂隙的出现、技术官僚角色(在广度和强度上)的进一步渗透以及平民群体增强了的政治活跃程度。结果两国都出现了一个群众普力夺主义时期,这恶化了社会状况并且导致了广泛共识,认为现存政治体制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sup>①</sup>。

以下命题可以作为小结提出:

**命题 10:** 处于南美现代化最高水平的国家,其“问题空间”(problematic spaces)显著地区别于这些国家横向工业扩张之前的问题空间,而且也区别于其他正处于现代化较低水平的南美国家的问题空间。更高的工业化程度、进一步的社会分化、技术官僚角色的进一步渗透、新的政治行动者集合与新的政治联盟、不断增强的政治激活程度、新的政策事项以及新的依附模式,造成了新的突出社会问题和新的发展瓶颈。

**命题 11:** 高度现代化的情形倾向于制造出严重的要求—绩效“差距”和分化—整合“差距”。这些追加到突出社会问题的议程表上并加强了政治要求,引起了群众普力夺主义。这些“差距”和普力夺主义是现存政治体制解决问题能力减弱的结果(并且反过来也是原因)。

<sup>①</sup> 这个概念出自: Apter, *Choice*。

命题 12：一方面，社会环境恶化导致大多数群体报酬下降。另一方面，经常伴随高水平现代化的群众普力夺主义引起城市平民群体的高度政治激活。给定这些条件，通过排除平民群体而收缩政治体制，就可能成为大多数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一致意见的基本点。

对于阿根廷和巴西的许多群体来说，命题 12 中提到的一致意见的要点是模糊的和初步的。如后来的事件表明的那样，排除平民群体之后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其内容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要点和我们现在要转而考虑的现象紧密相连，该现象就是高度现代化时技术官僚角色的渗透。

技术官僚角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两个层次作了分析。在两个层次上，重大变化都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在阿根廷和巴西。第一个层次是有关突出社会问题和发展瓶颈的清单；第二个层次是社会结构、生产—工业基础以及新的社会群体和政治行动者的分化、显露和政治激活。结构分析可以在较低的概括性水平上展开，聚焦于角色——那些在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更小的单元——以及角色担任者的行为倾向。在此使用的“现代化”概念，要求把角色（特别是对被我称之为的“技术官僚角色”）作为现代化过程中整体状况的关键成分加以分析。在我所提出的框架中，政治变量可被容易地看作在这三个分析层次上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sup>①</sup>

现代化的进展，在一个分析层次上被进一步的社会分化所见证，在一个较低层次上则被技术官僚角色的进一步渗透所见证。如第一章中的数据所示，高度现代化（及其关键组成部分——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复杂性，

---

<sup>①</sup> 在一个概括性甚至更低的层次上，这里将要阐明的假设需要通过访谈和内容分析研究来加以检验。在此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本书的任务没有丧失其价值——在几个层次上的结构分析，对于说明和决定在“微观”层次上的发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脱离了当前的简化方法，关于这一点，参阅下列近期的方法论讨论：E. Verón, *Conducta estructura y comunicación* (Jorge Alvarez Editorial, 1969); Apter, *Change*; A. Przeworski and H.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69); R. Holt and M. Richardson, “Competing Paradig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R. Holt and J. Turner, eds.,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Sidney Verba, “The Uses of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ssues and Strategies” in S. Rokkan et al., *Comparative Survey Analysis* (The Hague: Mouton, 1969); P. Bourdieu et al., *Le Métier de sociologue* (The Hague: Mouton and Bordas, 1969); 还有见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著作中的对“背景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的不懈提倡。

产生出公共与私人管理的需要,而技术在这些需要中占据着不断增加的分量。这似乎对无论哪个政治体制都是如此。从事更复杂生产的更大组织,工业化对通讯、营销、宣传和信息处理服务的影响,以及协调更多样化的社会单元与活动的需要——这一切都要求来自那些在生产、计划和控制技术上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士的不断增多的“输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中将找到更多的技术官僚角色。这些角色在角色担任者总数中永远占据一个微小的比例,但是他们渗透的广度和强度随着现代化而显著地增加。<sup>①</sup>

是否存在这样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感到有能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们对于认识、评估和处理社会问题有什么盛行的偏见?这些都属于本节要探讨的问题之列。<sup>②</sup>

群众层面上“预期上涨的革命”受到了许多关注,但是几乎没有学术努力被付出到一个与此密切联系并且可能更重要的现象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中,担任技术官僚角色所产生的预期移植。<sup>③</sup>经理人员就读于照搬享誉甚高的美国模式的商学院,军官们留学海外并就读于采用外国顾问团所建议课程与方法的军校,技术专家们则从海外取得学位——所有人都学习特定角色(role-specific)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习角色模范(role-models)。在

① 见第一章中的诸定义。

② 如我在本章开头所陈述的那样,由于所依据的证据是粗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被表达成要求进一步检验的假设。有几位著述南美政治的作者曾经涉及这个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所组成的精英亚群体。参见:A. Costa Pinto, *Nacionalismo y militarismo* (Siglo XXI, 1969); M. Kaplan, “Aspectos políticos de la planific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Aportes*, XX (April 1971); R. de las Casas, “L’Etat autoritaire: Essai sur les formes actuelles de domination impérialist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8 (1970); C. Mendes, “Sistema político e modelos de poder no Brasil,” *Dados*, 3 (1967), and “Elite de poder: Democracia e desenvolvimento,” *Dados*, 5 (1969); F. Cardoso, *Cuestiones de sociología del desarroll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68), pp. 106ff. 还可参阅卡多佐和法尔多合著第156页中关于“技术官僚制(technobureaucracy)”之出现的讨论。但据我所知,由“技术官僚角色”这个概念所细化出的这个精英亚群体,以及它在当代南美的政治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它应当得到的系统研究。

③ 关于角色预期,参见:T. R. Sarbin and V. L. Allen, “Role Theory”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8). 在写到更发达国家对拉美精英的“诱惑效应”(fascination effects)时,特纳(Torcuato di Tella)指出了在此处讨论的这类问题(参阅“Populism,” p. 48)。

“源发”社会中角色担任者如何表现、他们拥有怎样的支持以及他们可以预期什么酬劳、什么是成就的标准——这一切都和每个职业更为专业的技术专长一起得到传播。

这是一个关键点。从“源发”社会传播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其中技术专长只是一个因素。在后者之外（毋宁说，包括它在内），一个人学习一个角色模范；他对自己角色的观念——该观念得自那个学习过程——必然与社会背景产生互动，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背景极大地区别于他的角色（以及他对自己角色的观念）所发源的社会。鉴于不同社会背景不可避免的影响，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情况下，角色模范的哪些方面将被调整（并且在什么方向上）。

甚至那些特殊的技术专长，也比通常所认识到的更依赖于社会背景。技术仅仅在一定背景下是“充分的”。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角色担任者的社会背景和他学到的技术所预先假定的社会背景相比，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那么他的专业技术知识就可能几乎没有用处。就像可以从在这里讲到的东西当中预料到的那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背景下，对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们最不经意的了解，也会揭示出严重的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产生于该背景“无法”迎合他们的预期。这一状况可能威胁到他们取得回报，而根据他们的角色模范，这些回报是他们“正常情况下应得的”。

他们的挫折可被很容易地引导成改造社会背景的驱动力，希望把社会背景的形式改造得更适合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这些个人所渴望的回报——这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做法。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对其专业知识的意识，使他们确信，通过塑造社会背景来服务他们自己的渴望，他们可以同时改善社会形势。在这一点上，诸角色与其他结构层次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我假设，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挫折可能被引导成旨在改造社会背景的政治行动的程度，是现代化进程情形中这些角色渗透程度（强度与广度）的一个倍增函数（multiplicative function）。

高度现代化（包括其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全国中心的高度工业化）牵涉到在更多社会部门和活动中更多技术官僚角色的出现。手工工场被复杂的、高度官僚化的组织所代替；得到技术训练的军官取代了从前行伍出身的将领们；现代营销、信息、宣传以及通讯服务得到扩展；更多潜在的“计划者”



与公务员期盼那些会遵循他们建议并给予他们有效决策权力的政府。<sup>①</sup>基于第一章的数据,可以相当确定地说,在生产性工业过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活动的层面上,南美现代化的高水平必然带来技术官僚角色在那些现代中心的高度渗透。在此要加以强调的要点是,那些在不同部门工作的角色担任者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作为这些角色总体渗透的多元函数而增加。在巴西和阿根廷 1964 年以及 1966 年政变之前,商学院和军事学院成为大型工商业组织和军方“高层”任职者们惯常聚会场所。<sup>②</sup>出现了几种相当于《时代周刊》(*Time*)和《财富》(*Fortune*)的杂志,它们给这些角色担任者们提供了进一步的交流,并给予他们超出其他各社会群体的社会声誉。无数评论家散播着那个开始被称为“现代的”或者“技术官僚正当性”(technocratic right)的前景。<sup>③</sup>

技术官僚角色的渗透效应是倍增性的:更大的广度和强度导致出现了一

① 除了在上一条脚注中引用的资料,还可参见:J. L. de Imaz, "El 'técnico' y algunos sistemas políticos latinoamericanos," 未发表论文(1970)。

② 关于政变前在巴西通过 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 以及大型工商业的 IPES 而建立的联结,参见:Stepan, *The Military, and Skidmore*。关于阿根廷政变之前的时期,参阅本书第三章以及该章中所引用的著述。值得指出的是,军事机构(包括技术官僚角色渗透的程度)的演化似乎比其他各社会部门更加独立于社会背景(并且更直接依附于美国的政策)。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秘鲁军队在技术训练和技术官僚角色渗透方面,达到了不亚于巴西和阿根廷军队的地步。关于这一方面以及 CAEM(秘鲁的高级军事训练机构)的政治影响,参见:Einaudi and Stepan, North, and Einaudi, "The Peruvian Military: A Summary Political Analysis" (Rand Corporation, 1969)。但是,如同我将在下面论述的那样,秘鲁社会背景在现代化问题上的低水平(这意味着技术官僚角色在其他各社会部门的渗透程度较低),决定了与巴西和阿根廷相比,秘鲁军队的政治干预发生在不同的联盟领导之下,并且是为了非常不同的目标。

③ 这些陈述(以及本节中随后的那些陈述)是用与它们赖以产生的那类信息(主要是印象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本人的“参与者—观察者”经历)相应的概括性术语来表述的。只有通过明确设计来检验它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回答许多我的阐释提出来却回答不了的问题。例如,有必要知道,在高度现代化的背景下,在拥有技术专长的人中间,百分之多少的人倾向于所提及的方向,特别是倾向于积极支持植入一个“排除性”政治体制的企图。(我的印象是,在高层任职者中间,工商业组织和军队中的百分比显著地高于政府技术官僚中的百分比,但是这些数据在每个领域都是很高的。)其次,通过“光环效应”(halo effect),会有缺乏个人背景的人们被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们的社会声誉和高效形象所吸引,并且在此基础上情愿支持后者的政治立场。那么在什么程度上,该效应发生作用?(正是在这里,《时代周刊》和《财富》的同侪和更初级的训练机构,看来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在何种程度上,该“光环效应”表现在采用技术官僚行话中的术语(其中大多数是英语)上?而这些术语连大多数使用者都不得甚解。(这是阿根廷幽默家“Landru”曾经大加利用的一个题目。)第四,一方面,在技术官僚角色已经最密集渗透的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另一方面,这里假设存在源于他们职责的偏向,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相互关系?(我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个重要论点。)



个广泛的跨社会部门——军队、庞大且技术上复杂的工商业组织以及政府的经济决策和计划领域(技术官僚角色最深入地渗透进了这些部门)——的制度和沟通渠道网络。<sup>①</sup>在现代化的较低层次上,即使单个在职者拥有和那些工作在更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同样的训练,技术官僚角色较弱的渗透也阻碍了这些重要联系的产生。

联系促进相互承认。无论他们在哪个社会部门工作,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们都具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特点。他们的角色模范,以及他们通过这些角色模范对社会背景“正当”状态的基本期待,起源于相同的社会。他们的训练强调“技术性的”问题解决方法。情绪性的问题毫无意义;讨价还价与政治所带有的模糊性是“合理”解决办法的拖累;并且冲突本质上是“功能紊乱的”。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基本“描绘”是相似的。有“效率”的东西是好的,并且有效率的结果是那些可以直接衡量的结果;其他的则是噪音,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应当努力从他的决策前提中消除该噪音。社会现实的构造被极端地(在有些情况下,有人禁不住会说是“粗暴地”)简化了。这种简化不会被否认,只是被看作是为了有能力把现实操纵到“效率”方向上去而不可缺少的前提。那么多问题无法仅仅通过效率考量而得到解决,这往往被解释为是一个标志,表明在严格合理性方面还有多少“进步”有待实现。(对于很少以其纯粹状态存在的思想状态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描述,但对我来说,它相当契合许多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在评价阿根廷和巴西政变前社会背景时所采取的立场。它甚至更契合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招致了紧随1964年与1966年政变的社会-经济政策。)

大多数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职业模式也有重要相似之处。他们在组织内取得成功的职业之后,达到社会上显赫的地位,并成为官僚精英中

---

<sup>①</sup> 也许在这里值得重新提起,根据第一章中给出的定义,“技术官僚角色”这个概念适用于这样一些人:应用现代技术是其每天工作的重要部分。这要求还算长期的训练以及对本专业技术领域进展的持续关注,但是不应当和那些可以称为“科研角色”(scientific roles)的人相混淆,后者首先关注在特定领域中扩展知识——而不是对一个专业中或多或少已被接受的学识的应用。

的成员。<sup>①</sup>也许再加上更为“核心的”<sup>②</sup>癖性(predisposition),情况就将会是:这些职业模式将增强对一个有秩序世界的渴求,在该世界中,权威的层级被明确界定并且政策由那些被认为获得了特殊专长的人所决定。

相互承认通过一种共同“语言”的发展而得到促进。过去相互之间对没文化的军人、无知的生意人以及文人知识分子的蔑视,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来自每个类别的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共同的技术官僚背景,并且发现他们共享同一种技术语言(或者“行话”)。这促进了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但却使与缺乏这个共同背景的其他社会群体交流起来更为困难。技术官僚角色之间对信息编码与解码的共同方法,越来越加强他们的凝聚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使他们进一步疏离其他社会群体及其规范、偏好及需求。<sup>③</sup>

相互承认以及共同“语言”提高了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对他们联合起来的能力的估价。他们越是渗透进社会部门,就越倾向于相信他们联合起来的专长对于贯穿广阔领域的社会问题,可以保证有效地予以解决。在不太现

① 一个可供思索的有趣题目是:在何种程度上,现代组织理论家的发现可被用来阐明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政治行为。(尤其请见:J. March and H. Simon,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J. Cyert and J. March,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J. Thompson,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and M. Crozier,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3])。关于一项初步的推测性努力,参见:G. O'Donnell, "High Modernization and Military Coups: Theory, Comparisons, and the Argentine Case" in D. Apter ed., *Embourgeoisement and Radic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forthcoming); Spanish version in *Desarrollo Económico*, October-December 1972.

② Milton Rokeach, *The Open and the Close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③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成熟理论来说,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仍然盛行的强烈的实证主义偏见,使这些学科孤立于哲学和语言学的近期著述——这些著述研究了社会生活机理中符号和象征的含义。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几乎没有表露出多少兴趣,去追溯他们的发现有什么社会结构性的关联因素。对于学科之间这些令人遗憾的断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社会人类学以及阿普特(David Apter)、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工作是主要的例外。近期的重要贡献是:Veron, and D. Bennet, "Ideology as Language: A Strategy for Research," unpublished paper, Yale University (1970)。贴给旧现象的新标签的出现(例如,“社会动荡”变成了“颠覆”)、技术官僚“用语”的出现(“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语言能力”——D. Bennet),加上它对社会现实版图改变的反映、它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以及作用)、它所促进的和消灭的联结、特别是这些维度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模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研究不能忽略的考察领域。关于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和我本人所作的研究相似的思考,可见于: M. Landau, "Linkage, Coding and Intermediacy: A Strategy for Institution Build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 II, No. 4 (1971)。

代化的背景中,那些必然更为孤立的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可能从政治卷入中撤出,或者可能寻求与其他集团结盟以引导他们的政治行动(因为以这些角色为核心的联盟太软弱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但是在已经导致群众普力夺主义的高度现代化形势下,一个政变联盟<sup>①</sup>就有可能在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主导下产生。这些人在关键性社会部门中已经实现了密集渗透(并因此取得了高度控制)。因为这一点,比起在较不现代化的背景下,他们极有可能对他们有效治理的能力高度自信。这些角色担任者的基本目标将是相当急剧地改造社会背景,旨在创造条件以允许远为深远地应用他们的专长,并且扩张他们渗透最密集的社会部门的影响。<sup>②</sup>

在高度现代化情形下,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工作,他们的行动可能和他们那些通常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角色模范形成对比,并且构成如下联盟的核心,该联盟试图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的、“排除性的”政治体制。常见的对于政治民主的口头效忠,显然是他们的角色模范中最薄弱的组成部分。它被轻松抛弃以促成一个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该体制将(被认为)有助于这些角色担任者完成更有效的业绩。<sup>③</sup>

现在可以列出以下假设和命题:

**假设 2:** 技术专长从发达社会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传播,仅仅是一个更为复杂现象的一个方面——角色模范的传播,它包括从源发社会中得出的职业预期与社会预期。

**假设 3:** 角色—绩效(包括对所学专长的应用)不可能像在源发社会中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实现,它高度依赖于社会背景的状况。技术官僚角色

---

① 在这里,“政变联盟”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直接参与制造出助长军事政变的政治条件,对军事政变进行组织、设定主要目标并实施的军官和文职人员。

② 几乎没有疑问,阿根廷和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是,那些技术官僚角色渗透最密集的社会部门(武装力量、大型现代企业以及全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比重上的显著增加。这是社会结构层面和角色层面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结。人们可能忍不住通过如下假定来阐释这个联结,即,假定角色层面上的因素仅仅“表达”社会群体(特别是阶级)与组织的客观利益。这是一个还算常见的阐释出发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变种中更是如此,但我的印象是,那些因果过程远比这个复杂,两组因素(在角色层面以及社会结构层面)都有独立的和重要的贡献。

③ 当然,这一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心理不谐和。不谐和在阿根廷和巴西政变之后的反复保证中得以证实,这些保证指出政变产生的政治体制是将来实现“真正民主”的必由之路。在第三章中,我指出这种减轻不谐和的方法实在是并不新鲜。

的任职者随之而来的挫折感,非常有可能被引导成为政治行动。

**命题 13:** 高度现代化必然在每个国家单位的现代中心引起技术官僚角色渗透在强度和广度上的实质性增加。<sup>①</sup>

**假设 4:** 技术官僚角色渗透广度和强度的增加,成倍地推动这些角色担任者之间的交流和跨机构联系。

**假设 5:** 渗透和联系数量越大,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对他们联合起来的社会问题处理能力的评价就越满意,并且他们对关键社会群体及活动的控制程度就越高。

**假设 6:** 如果高度现代化造成群众普力夺主义,那么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对他们联合起来的能力的评估,就可能产生出一个政变联盟,这些任职者在该联盟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个联盟将旨在以如下方式改造社会环境: 这些方式被想象为更有利于技术专长的应用,更有利于该角色担任者渗透最密集的社会部门扩张影响力——一个“排除性的”、威权主义的体制。<sup>②</sup>

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巴西和阿根廷普力夺主义时期,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之间建立了大量联系,并且他们在 1964 年及 1966 年政变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他们的政变联盟在首“轮”决策中能指望许多群体的默许,这些决策包括对平民群体的排除、对民众要求的搁置以及关闭政治参与的选举渠道。一旦大权在握,这些联盟就做出第二“轮”决策,这些政变的政策内涵就被清楚地表达出来。接着,政变的许多起初的支持者(或者默许者)发现,选择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延续群众普力夺主义,并不是一个欣愉之举。与首轮决策相联系的,是巴西和阿根廷 1964 年及 1966 年之后政治体制的创立,而和第二轮决策相联系的,则是它们的运作以及随后的演化。严格地讲,本书涵盖的范围仅仅是第一个阶段;它将是后面紧接着的一节的主题。但是在本节中,我禁不住诱惑去简要思索第二个阶段。

① 参阅前面的第一章。

② 在下一节中,将分析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政治体制的特点。

## 当代南美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排除一个已被激活的平民群体,有时候可以通过心理或者经济报酬来实现;否则,该排除将要求使用有力的和系统的强制手段。这是那些产生在高度现代化背景下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经历,这些体制曾经试图去排除平民群体,并试图最终使该群体钝化。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曾经提出一个具有启发作用的模型,把“多头政体”(即此处所用的“政治民主制”)的出现作为宽容成本递减以及压制(即此处所用的“排除”)成本递增的函数。<sup>①</sup>随着社会分化继续进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集团,并且政府更难压制它们——它们之间也更难彼此压制。在本阶段,很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政治体制,该体制接受分歧性利益及行动者的合法性,并且和平地对其进行规制。达尔的模型在此止步,但是为了我的论证,我进一步扩展了它——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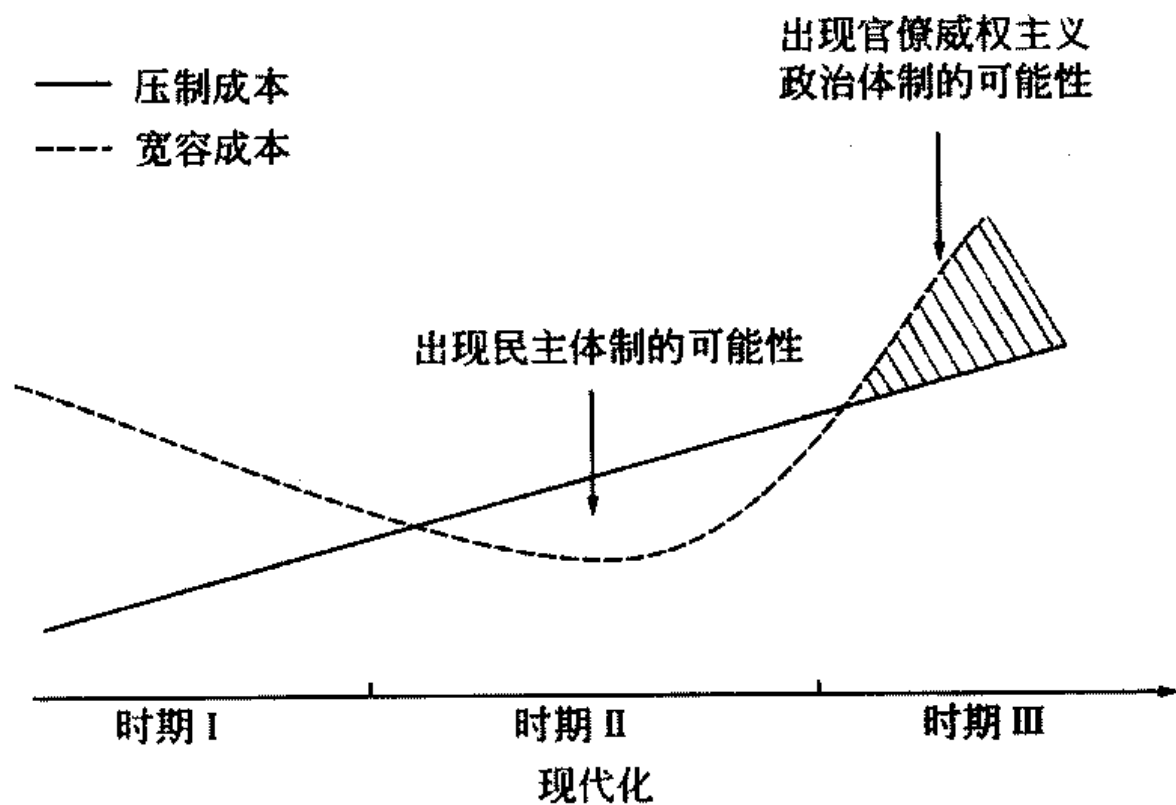


图3 对达尔关于政治体制产生模型的修改

<sup>①</sup>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16.



在图3所描绘模型的右侧三分之一中,社会分化随着进一步现代化而增加,并且随着它的增加,压制(排除)成本稳步增长。但是社会整合滞后了,普力夺主义因而产生了,以至于宽容成本甚至更迅速地提高了。在这种形势下,压制就很有可能再次被尝试,但此时,成本会比先前任何阶段都高得多。

**命题 14:** 政治多元化是社会分化的政治表达。(尤其是平民群体的)政治激活程度倾向于随着分化与多元化而增加。假如在一个高度现代化了的情况下存在这种政治激活,就很有可能造成群众普力夺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对平民群体的排除,甚至最终使之在政治上钝化,就会通过使用高度压制(以及创立一个实行高压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来实现。<sup>①</sup>

关于先前讨论过的“要求—绩效差距”(见第67页及之后),原则上讲,可以采用政府行动来满足任何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但是,由于哪怕是在最乐观估计的基础上,绩效也只可能有缓慢的改善,故而在给定的社会背景状况下,直接的政治行动将会被用来阻止那些被认为过分的要求。首先,政党和选举将被取消,和它们同命运的还有那些对平民群体要求特别敏感的政治人士。其次,将会试图通过拉拢工会领导人以及通过强制,来“驯服”工会,而工会是表达平民要求的最重要的组织渠道。第三,将会试图以官僚化的方式来“封装”(encapsulate)大多数社会群体,以最大程度地控制他们。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手段实现,即确保这些群体在政治上由这样一些组织来代表,这些组织的合法存在依赖于政府授权。讨价还价及利益代表将会被局限在这些组织的上层领导人之间,并且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异议及要求表达的自发方式将不再有合法空间。

这些政策的提出者们设想,对平民群体及其要求的排除,将会使那个刺激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恢复成为可能,它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是通过普

<sup>①</sup> 拿这个命题和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乐观方程式”做一个比较是有一定意义的。在此处分析的形势中,社会-经济变化产生于增加了的政治多元化(更多政治行动者以更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但是趋势不是向着政治民主、对现存政治行动者集合的总体接受以及对冲突的和平调节。毋宁说,它是朝着威权主义体制的植入、对现存政治鼓动者集合的弃绝以及对高度压制的运用。是否有可能把这种模式考虑成一个偶然的或者过渡性的“不正常”?在接下来的书页中,我将揭示一些因素,来强化以下信念,即,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必然是否定性的。



遍提高效率以及通过允许“更有活力”部门中的政治霸权和资本积累。之后，政治民主以及财富和权力更广泛的分布才有可能。<sup>①</sup>当然，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经济资源早期积累的主要受益者，将是那些技术官僚角色所组成政治联盟渗透最密集的部门——那些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更大和更现代的企业、武装力量以及在较低程度上还有政府）。如同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样，这些目标中有一些没有实现，但是它们和高度强制一起，在决定巴西 1964 年之后以及阿根廷 1966 年之后政治体制的特点时，起了重要作用。而如果那些威权主义努力要成功的话，高度强制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政治体制具有超出巴西和阿根廷具体个案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他那视野广阔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摩尔(Barrington Moore)发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之外，存在一条通往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sup>②</sup>这条道路涉及公共官僚机构和有产者群体（包括附属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联盟——它对抗的是农民及新兴城市无产阶级。它是对“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的紧张关系”、“对议会民主制的微弱推动”以及对“群众”进入政治舞台的一种保守反应。这个“第三条道路”正像是阿根廷和巴西所发生的那样。

摩尔所研究的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达到扮演重要角色地步的国家，但是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雅诺什(Andrew Janos)研究了更弱小、更有依附性的国家，这些国家和此处分析的南美案例带有显著的相似之处。<sup>③</sup>雅诺什研究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欧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变成了他所说的“官僚制政权”。与当代阿根廷和巴西相似，这些国家已经发达得远远超出了常规的“传统”社会，它们拥有相对庞大的现代中心，存在着城市平民群体的高度政治激活，已经出现了发展瓶颈，社会结构性的僵化症存续的时间比早先现代化的国家还

---

① 这可能被认为是那个“乐观方程式”的一个极端幼稚(或者愤世嫉俗?)的版本。

②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另一项重要研究提出了许多类似于摩尔和此处所提的考虑的观点，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还可参见：A. Organski,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Knopf, 1965)。有关被有产者群体的防御性政治反应打上显著烙印的历史形势，第一份详细分析是由马克思做出的；参见：*El 18 Brumario de Luis Bonaparte* (Barcelona: Ediciones Ariel, 1968)，该书至今仍然是宝贵洞见的一个源泉。

③ “The One-Party Stat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East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in S. Huntington and C.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长,并且社会整合远远落后于社会分化。东欧“官僚制政权”建立在这样一个联盟的基础上,该联盟由军队、高级文官、大企业家以及传统地主阶层的各部分所组成,并且起初得到了庞大的依附性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这个联盟试图在农村地区巩固传统的控制方式,并且试图钝化城市平民群体。这些“官僚制政权”力图以这种方法来加速工业化以及把社会革命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

雅诺什指出,这些政权显著地区别于同时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权,它们缺少后者的动员力量以及意识形态吸引力。他把这一区别归结于以下事实,即,这些“官僚制政权”(如同此处研究的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形一样)的精英们属于其社会中的已经很有权势的群体。

几乎毫无疑问,西班牙当前的政治体制可以归类为“官僚制政权”——尽管发生于它创立之前的事件和东欧国家发生的事件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sup>①</sup>在本处所讨论的所有方面,希腊现今的体制都与这样一个政权惊人地相似。<sup>②</sup>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创立于1964年和1966年的政治体制也属于这个类型。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是出现在高度现代化条件下的威权主义体制。如果没有系统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说当其他国家实现或者接近高度现代化时,这些威权主义可能是比政治民主制更有可能的结果,但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可能性。

有两位作者——阿普特(David Apter)和林茨(Juan Linz)——曾经对研究这类政治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阿普特的分析是在一个相对较为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而林茨的分析主要是从他对西班牙具体案例的详细考察中得出的,但阿普特的“官僚体制”<sup>③</sup>和林茨的“威权主义政权”<sup>④</sup>之间的比较揭示出,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经验现象。阿普特的官僚体制强调控制以及垂直权威安排,通过主要是工具性规范(没有完满性的、动员性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运作。林茨的威权主义政权的特点在于,有限的多元主义和低度的意识形

① 尤其参见: Juan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S. Rokkan, ed., *Mass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② 参见: Keith Legg, *Politics in Modern Gree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Apter, *Politics, Conceptual, and Choice*。

④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态内容以及旨在政治钝化的企图和政府对于社会集团相对自主程度的提高。林茨指出，这些政权开始执政，是“在经历了相当程度有组织政治冲突、在民主政府下缺少共识以及革命流产的时期之后”<sup>①</sup>。

如果这些体制显然不是政治民主制的话，它们也拥有可以使它们明确区别于极权主义的一些特点。它们缺乏可靠的合法化和一种全面的意识形态；它们不对人们进行什么思想灌输；它们偏好政治冷漠并接受“有限的多元主义”<sup>②</sup>。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基本范式，以及“民主—极权主义”二分法，都假定各种威权主义只不过是通向更确定或更稳定类型的政治体制的过渡；这使得认识各种具体威权主义的理论意义变得困难起来。就像林茨所说的那样：

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宁愿抛弃那个认为从民主到极权主义存在一个连续区间的想法，并且宁愿强调威权主义政权的独特性质。除非我们细究了威权主义政权的独特性质、它们所赖以产生的条件、塑造它们的那些人所持有的权力观念，否则那些并不明确是民主或极权主义的政权，就会被仅仅看作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不正常形态，并且将不会被系统地、比较性地加以研究。<sup>③</sup>

我将把巴西在 1964 年以及阿根廷在 1966 年植入的政治体制称为是“官僚威权主义的”。使用这个笨拙术语的部分原因，在于表明它派生于阿普特和林茨的贡献<sup>④</sup>，同时也是因为它有助于把“威权主义”这个术语作为一个与低水平现代化相联系的其他种类的南美非民主政治体制属类(*genus*)。<sup>⑤</sup>“官僚性的”这个术语表明高度现代化的威权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关键特征：许多社会群体组织力量的增长、政府通过“封装”(encapsulation)进行控制的企图、大多数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职业模式和权力基础以及大型(公共和私

---

①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着重号是后加的。

② Ibid.

③ Ibid.

④ 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在他关于巴西政治的研究(*Interest Conflict*)中，采用了林茨的“威权主义”类型概括当前政治体制的特点。

⑤ 南美其他种类的威权主义，将被归类为“平民主义的”和“传统型的”，下文将对它们进行简要讨论。

人)官僚机构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sup>①</sup>

## 阿根廷和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运作

由于是首次接近这个主题,也许花片刻时间做以下事情是有益的,即,关注在1964年和1966年政变之后大约两年时间内,巴西和阿根廷的体制所面

① 决定从本研究的焦点中排除中美洲国家,意味着排除了墨西哥,而就第一章中所使用的所有指标来说,墨西哥显然与阿根廷和巴西(与后者相似,存在一定国内差异)属于同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集团。在我看来,墨西哥个案突出了一个现象的重要性,而该现象在阿根廷和巴西不存在:进入高度现代化时,有政治体制的高度合法性以及整个国民的普遍忠诚(有关这一点的调查资料,参见:G. Almond and S.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以及下述出色论述:Robert Scott, "Mexico: The Established Revolution" in L. Pye and S.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这种合法性与忠诚——得自阿根廷和巴西没有出现过的一个革命过程——容许了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的高度制度化,通过革命制度党就能够实现对墨西哥平民群体的高度“封装”。(关于这种封装对其他社会群体所实现的程度,专家们之间存在争议,但是看来明确的是,它对平民群体是有效的;参见:R. Scott, *Mexican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9], and the survey of the state of this question in M. Croan, "Is Mexico the Future of East Europe?: 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 Huntington and C. Moore, eds. .)

在墨西哥的情况中,这些因素为政府及公共机关中职务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这和阿根廷及巴西在高度现代化时期的极端不稳定形成对比,并且可以被看作是极大地有助于更有效的公共决策以及决定公共政策时更长远的视野。按照我的分析,墨西哥的革命遗产使得有可能在进入高度现代化时,平民政治激活及要求程度低下,并且大多数这些要求通过已经确立的大体上“封装性的”政治机构而得以引导。出于同样原因,和在阿根廷及巴西相比,那些要求——绩效以及分化——整合“差距”一直还远没有那么显著,并且没有导致群众普力夺主义。

但是应当指出,就政治体制类型和公共政策来说的话,这些因素带来的后果还没有什么显著差别。毋宁说,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低度的平民政治激活,使得那些威权主义政策有可能在高度现代化中,以相对(与阿根廷及巴西相比)低成本和高效率来取得。需要有几条评注来澄清这个陈述。

首先,只有通过“定义扩展”,才可能把墨西哥体制归类成政治民主体。尽管广泛的忠诚使得选举失利不大可能,但仍然有大量迹象表明真正的政治反对没有任何机会。

其次,很清楚,和在阿根廷及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之下相比,在墨西哥的情况中,“封装”要推进得深入的多。一项重要后果是,墨西哥诸多工会的几乎彻底“驯服”——对于威权主义政策的“成功”以及实现(在墨西哥的情况中是维持)平民群体低度政治激活来说,是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就资源配置来说,墨西哥不比巴西更平均主义,并且肯定比不上阿根廷。此外,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潮流一直是(如同其他拉美高度现代化形势下那样),收入再分配的方向违背平民群体的利益而有利于更“有活力的”企业家群体。(除了其他文献之外,参见:UN-ECLA, *The Process*, "Income," and Estudio; M. Singer, *Growth, Equality and the Mexican Experi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and P. Gonzalez Casanova, *La democracia en México* [Mexico DF, 1965].)

对的形势——特别是关注那些与巴西的经济部长坎波斯(Minister Campos)和阿根廷的经济部长克里格尔·巴塞纳(Minister Krieger Vasena)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

通过各种组合主义(corporatist)意识形态(它们本来可能有助于“封装”社会群体的企图)来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合法化,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是可行的,但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了。发展瓶颈以及偏好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部门进行资本积累的政策,在两个国家中都造成了真实工薪的减少,以及工薪在两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下降。<sup>①</sup>在这些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心理的或者经济的报酬,来“舒缓”对平民群体的排除以及对它所试图进行的政治钝化。因此,强制<sup>②</sup>变得普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加入到坚决反对新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排除和钝化平民群体的企图的行列之后。

有限的心理和经济报酬反映在民众不安、恐怖主义以及众多标示日益增长的普遍不满的迹象上。甚至在那些起初支持政变的群体中间,许多城市职员(*empleados*)发现他们一点也不比从前过得更好。但是就这些体制的动力来说,甚至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对与民族主义和维持就业率相对的效率的考量而出现的工业行业之间的裂隙。这个裂隙在军队里产生了重要回响,军方大体上偏爱“效率”,但也不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偏离(在阿根廷比在巴西显著得多)。如前所述,效率与民族主义之间此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内工业在实现更多垂直整合时面对的巨大困难,以及外资对那些拥有必要技术和资金后盾的私有企业的绝对所有权。<sup>③</sup>“效率主义”和“去国有化”政策的实行,必

---

① 关于巴西(有关圣保罗[Sao Paulo]工人购买力的数据),参阅: the Departamento Intersindical de Estadística e Estudos Socio-Económicos (DIEESE)的出版物。关于阿根廷,参见: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Informe Económico*, 从1967年开始的几期。

② 心理的、功利主义的以及强制性的权力资产之间的区别,已经为以下著作提出: Amitai Etzion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and W. Gamson,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Dorsey Press, 1968)。

③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只有在这两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进得最远的国家中才变得真正突出——迅速研读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阿根廷和巴西的出版物会揭示出这一点。参阅卡多佐和法尔多书中关于“*estatismo gran empresa*”问题的讨论, pp. 116ff.。关于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很不明确)的官方出版物以及计划委员会报告,例如参见: “Introducción,”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1970—1974* (1970, mimeo); J. Villanueva, “El problema del desarrollo industrial dependiente,” CIAS, December 1969; and A. Canitrot, “Nuestro desarrollo económico: Conflictos e interrogantes,” *Criterio*, No. 1606 (1970)。



然恰好是在这两个国内工业覆盖面最广的最现代化的拉美国家遭遇最大抵抗——只要这些政策威胁要把国内企业家从更诱人的工业和金融活动中清除出去。有些军官和文职政府技术专家企图增强公共部门——部分原因是增加对其他政治行动者的控制,部分原因是作为一种摆脱工业化两难困境的出路。由于许多不需要在这里加以考虑的原因,这项尝试作为工业化两难困境的解决方法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是在决策进一步集中化以及进一步官僚化方面,其结果使统治联盟进一步孤立于大多数其他社会群体。扩大公共部门规模和作用的诸种努力,一直是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集合内部严重紧张关系的一个来源:它们和大企业代表对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要求相冲突,而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将使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对经济更彻底的支配成为可能。

其后果是,边远地区、平民群体以及中产阶级诸多部分的处境恶化了。此外,国内资本家群体减少了在许多活动中的参与。对1964年及1966年政变之后政府的起初还算广泛的支持,以相同速度逐渐销蚀。在排除平民群体之后的时期,大体上通过有限的私有部门的过度扩张促进增长——这些私有部门试图去供给一个越来越偏态分布的消费者需求。

一项最多是好坏掺杂的绩效记录、资源不适当分配情况的加重、意识形态上和国际上合法化的缺失、经济集中的远期后果以及建立可行政治制度的失败——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这些政治体制的演进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指出阿根廷和巴西政治体制的绩效和演进存在着相当的差别,也许是个不错的观点。虽然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上(包括从统治联盟的观点看),阿根廷政变后的政治实验都是个失败,但近些年在巴西,伴随着高比率的年度总体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以及所创造的集中起来的庞大财富的一部分已经溢出到城市中产阶级某些部分手中的迹象,活跃的对抗已经出现了下降。两个国家中都有过一些军官试图通过使用民族主义呼吁、保护主义承诺以及更多分配主义政策,在他们沿着平民主义路线重建政治体制的努力中,吸引国内企业家和有组织的劳工。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且,如果本研究的论点正确的话,它们成功的机会很渺茫。

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焦点,一直都是那些在阿根廷和巴西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因素,这些政变试图(并且至少在短期内实现了)植入官僚威权主义政



治体制。对于这样一个分析焦点来说，使用一组反映阿根廷和巴西的中心区域的重要相似之处的还算高度概括的概念和变量，似乎就足够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或者用行话来说，一个不同的“因变量”）是，解释这两个政治体制之间在绩效及巩固程度上的差异。这里无法承担这个任务，但是我无法抵制简要思考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的诱惑。就分析策略来说，这样一个解释所要求的，是对更具体因素的考察，这些因素比那些用来建立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类型学上的相似性的因素更具体。更具体的分析将使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总类内部的单位之间作出区分。这里着手的初步类型学任务，在双重意义上对如下目标是有用的——首先，对于描绘不同类型之间（例如，阿根廷和巴西相对于其他两组南美国家）的显著区别；其次，对于强调随后确定同一类国家之间的具体差异（这种确定有助于在同一类型之内进行比较分析）。<sup>①</sup>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强制在以下方面对官僚威权主义的“成功”的至关重要性：排除和钝化平民群体、执行那些旨在帮助经济集中于更“有活力”或者更有“效率”部门的政策以及镇压来自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的反抗。出于下文将要清楚说明的原因，使用强制手段的关键时期，看来是官

---

<sup>①</sup> 关于这个方法论问题，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做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评述。他的研究策略类似于这里所使用的策略：首先，讨论作者认为错误的观念——该观念认为实现工业化只有一种基本途径（在当前的研究中，那个认为等同的因果过程导致政治民主的假设）；其次，在一个高度概括的水平上，指出从几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中得出的各种不同类型或者模式。格申克龙评论说，“一旦抛弃了那个关于工业化过程具有不可避免相似性的武断信条，发现一定数量的变异就毫不费力了。事实上，问题就在于阻止自己去发现太多的变异”（*Continuity i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由笔者译自西班牙语版[Ediciones Ariel, 1970]，p. 173）。这一点把握得很好。一旦抛弃了关于只有一个根本模式的简化假设，那么决定在什么概括性层次上可以确立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就变成了一个进行分析的关键问题，该层次将允许在一般类型中对它们进行归类。否则，趋势就会是形成一个把每个国家都作为特例列出的清单，而没有任何进行比较的标准来指导将来的分析。其结果是，每个个案都是一个类型，界定每一个个案的标准在所有分析单位之间将不是相同的，并且单位（或者在这个情况下的国家）之间作为(*qua*)单位来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特定概括层次上的标准，使得在同一个一般类型之内可以包括几个案例，使用这些标准容许在与所确立的类型同样的概括层次上进行比较研究（至此遵循着该策略），并且，使用这些标准对于强调和控制更具体的因素来说是一项有益的预备性工作，在一个较低的概括层次上，这些更具体的因素有助于研究那些使被归入同一个一般类型的单位区别开来的差异。

僚威权主义体制创立之后紧接着的时期。<sup>①</sup>在那个时候,强制手段的使用(特别是设计用来有效排除和钝化平民群体的强制手段)对于实现财富和权力的极端集中是必需的,这特别体现在巴西经济部长坎波斯和阿根廷的经济部长克里格尔·巴塞纳的社会-经济政策中。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有能力(并且愿意)使用必需程度的强制,对它的平民群体实现完全的政治排除和钝化。在另一方面,阿根廷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则是在平民群体保持一个高水平政治活跃程度(尽管该群体主要的政治通道受到压制)的背景下实施其政策的。

为了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有必要重提一个因素,该因素在讨论阿根廷和巴西都属于“南美高度现代化”类型——不同程度的国家内部异质性——这个事实的时候曾被提起。巴西广大的“边远”地区一直在提供庞大的劳动力供给,该供给对它的工会具有很强的削弱效应。另一方面,阿根廷经济很长时期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运行。<sup>②</sup>这样,尽管两国都具有工会工人和产业工人在大型城市中心的相似集中,但是仔细考察显示出,在政变前的时期,它们的平民群体在政治激活的力量和自主性上,已经存在着重要差异。其后果是,可以假定,要在对平民群体进行政治钝化上取得相似结果,比起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所采取的高度强制,阿根廷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将不得不使用明显更高的强制程度。<sup>③</sup>

另外一个因素似乎推进了阿根廷和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起初在运用强制手段程度上的差异。巴西城市平民群体在1964年政变之前的年份中,政治激活以非常高的速度增加。在阿根廷案例中,尽管在1966年政变之前紧挨着的年份里,城市政治激活增加的速度没有在巴西那么快,但是这种激活的程度显然更高。两个国家都有如下高度现代化的特点,即,在大城市存在着

① 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西班牙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创立之前发生的事件与这里所考虑的案例中的事件不一样,但是该体制完全利用了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反对派被摧毁以及普遍的政治冷漠。在这个方面,希腊的情况无须评论。

② 在1959—1960年之前都是这样;在此之后,阿根廷一直存在一个永久性城市失业群体。这已经对工会造成了削弱效应,但是它似乎没有造成此处所评论的两国间差异的消除。

③ 对于要在政治上成功钝化一个相对强大且相对自主的平民群体所必需的极端镇压程度,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应当注意到(我在下面将进一步对此进行论证),巴西的“成功”必然带来一直巨大的由高度压制产生的社会成本,该成本会随着阿根廷形势所“要求的”明显更高的强制程度而同步增加。这些增加了的成本不久会达到一个临界门槛,在那里,它们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会使巴西类型的“成功”非常不可能实现。

城市平民群体，该群体由庞大数量的在政治上被激活的个人所组成。但是在阿根廷，似乎是城市政治激活的程度，而在巴西则是城市政治激活增长的速度，最主要地助长了那些导致政变的防御性政治反应。这似乎反映了在阿根廷和巴西政变前，导致主要的平民政治激活的缘由不同。在巴西，（特别是古拉特[Goulart]政府）“自上而下”诱发的平民政治激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阿根廷，动力主要“来自下面（工会和庇隆主义）”，执政的激进党无疑并不鼓励它。在这一方面，与在阿根廷案例中相比，巴西政治体制变化的性质，一定对平民群体施加了更显著的钝化效果。

最后，更有权势的群体感觉到，与1964年政变前巴西一些执政人士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倾向相比，大部分阿根廷平民群体对庇隆主义的忠诚相对来说威胁性较小。在巴西的情形中，感觉到对现存社会体制更紧迫的威胁，可能助长了统治联盟起初较紧密的凝聚程度，并提高了联盟中更为“反颠覆”和更为“效率主义”的成员的影响。对于两次政变中起初采用的强制程度的差异，另外一个可能的决定因素是，巴西城市平民群体大体上支持古拉特，而工会和庇隆派强烈反对阿根廷政变前的激进党政府。在新政治体制清楚表明其政策实质所需要的短暂时期内，工会和庇隆派欢迎1966年政变；这推迟了强制手段的采用并且减轻了它的程度。和巴西的情况相反，阿根廷官僚威权主义开始时，平民群体中并不存在更有影响力的、处于明显对抗立场的领导层。<sup>①</sup>

显然，这些仅仅是对一些因素的假设，这些因素对解释在阿根廷和巴西案例中起初所采取的强制程度之差异似乎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假设在这里无法检验；要加以强调的是，所采取强制的程度差异（以及每个个案明显“要求的”不同强制程度），在巴西平民群体的钝化以及阿根廷平民群体保持的相对高水平的政治激活中，似乎一直是有影响的因素。当这些“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社会-经济含义完全显露出来时，它们在阿根廷的现代地区触发了“社会爆炸”，但是在巴西则没有引起什么显著的对抗。对于两个体制在现今（1971年7月）巩固程度的差异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基本原因。

我已假设，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关于社会现实的“图谱”，倾向于强调

---

① 阿根廷的情况中这一独特性的原因，将在后面第三章与第四章中变得显而易见。

这样一些方面,即次级社会化已最好地教会他们测度和应对的方面。现实可能被混淆于容易得到的“硬”数据所显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绩效(包括一个政治体制的绩效)将往往由这些类型的指标和它们所显示的东西来度量,而忽略了那些难以解读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民众偏好表达的更“嘈杂的”渠道。<sup>①</sup>这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及罢工数减少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以下方面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即,镇压、收入再分配、国民企业家精神的消除、政治制度的破产、城市和乡村平民群体贫困的加重以及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疏离。但是,前一集合的指标才是技术官僚见解更愿意强调的。如果这个集合的指标显示出“令人满意的”表现,那么建立在技术官僚见解上的政治统治就很容易被合理化,技术官僚角色的联盟就将得到巩固,并且技术官僚们对他们“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评价就将得到增强。

我猜想,对于理解为什么在阿根廷,起初的统治联盟中有影响力的成员似乎愿意试图“重返民主制”,而巴西体制却变得更为僵硬,并且其统治者打算很长时间内继续掌权,这是唯一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阿根廷,政治体制的“失败”令人扎眼,哪怕是使用我假设将会被选择性地加以监测的指标集合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削弱了起初统治联盟的凝聚力以及它对其能力的信心——就像废黜了翁加尼亚(Onganía)将军的政变以及更近期的废黜了莱文斯顿(Levingston)将军的政变所证实的那样。<sup>②</sup>

其后果是,与巴西相比,阿根廷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实现长期巩固的可能性较小。<sup>③</sup>但是,如果在阿根廷认真地尝试民主化,那么高度的公众不满将提出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它将使创建一个围绕“友好”政党——这些政党能在选举舞台上成功进行竞争——而建立的政府异常困难。相反,候选人很可能在诉诸不满情绪——它们是国民中的许多群体累积的对解体中的官僚体制的不满——的基础上获胜。在军方中间,促进“重返民主制”的企图带有很强的自利因素。阿根廷的诸事件清楚表明,直接统治以及“不得人心的”政府

① 关于这一点,见阿普特对不同“政治信息”类型的讨论(尤其是 *Choice* 一书)。阿普特论证道,“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对于民众偏好表达所提供的那类“政治信息”闭门不纳。

② 这一情形的动态过程将在下文“附录”(第 102—105 页)中更详细地加以清楚说明。

③ 按照我自己的评价,阿根廷的情形比巴西的情形更可取,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都不能担保有令人轻松的乐观前景。——笔者

绩效,使武装力量分裂并且使之成了民众敌意的直接目标。但是对于共同利益([不只是军方利益])来说,一个获胜的“反体制”政府的可能性,可能甚至是个更严重的威胁。<sup>①</sup>今天(1971年7月),还远不清楚结果将会是什么。如果“重返民主制”成功的话,一种可能性是受到严密控制的选举,这些选举获得许可的代价是:在选举中,政党将同意军方所“提议”的当前候选人,并且同意在掌权时接受对其社会-经济政策的严格限制。但是一旦“选举”选项占了上风,军方相对于政党(特别是对主要政党)的讨价还价地位似乎就弱得不足以开出这样的价码。但更重要的是,这将造成一个类似于第四章中将加以研究的情形,在该情形下存在一个庞大的“无主的”(vacant)选民群体,他们愿意投票给独立候选人并且支持新的社会-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选民群体,将对诸政党构成如此强烈的诱惑去求助于它的偏好,以至于任何协议的有效性都似乎很不可能。<sup>②</sup>另一方面,如果连续性(*continuista*)选项占了上风,那么几乎无疑的是,将会有沿着巴西模式“深化革命”的企图。此种情形下的问题将会是,钝化平民群体的官僚威权主义企图,将要求甚至比1966年更高的强制程度,而当时这样的企图就“失败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阿根廷1966年所“要求的”强制程度显著地高于巴西1964年所采取的程度,那么显然,政治上钝化阿根廷平民群体的新企图将必然带来可怕的社会代价,而且成功的机会渺茫。

这个前景,加之1966年联盟的瓦解以及对其能力的信心丧失,可能阻碍在连续性方向上运作的众多倾向。假设受控选举的希望几无可能,那么该选项似乎介于连续性主义(*continuismo*)与真正开放的选举之间。连续性选项的巨大风险在于它将必然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但是真正引起当前掌权部门最严重顾虑以及最深重分裂的,却是开放式选举选项。<sup>③</sup>

阿根廷个案突显了在民主化一个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时所要面对的诸多巨大困难。由于没有能力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发展瓶颈,并使自身制度

① 在对本书进行最后修改时(1971年10月),我决定不做更改地保留本分析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我觉得,它强调了与六个月前拉努塞(Lagusse)将军刚刚取代莱文斯顿总统时相比,今天的窘境甚至更为明显。同样,许多工商业领袖明显深深顾虑被他们视为“蛊惑人心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随着选举过程的再次制度化而产生。并且在武装力量内部,显然赞成“民主制”的决定受到了强烈抵抗。

② 关于此类情形的分析,见后面第四章。

③ 考虑一下将来庇隆派选举获胜的可能性所引起的、(再一次)来自权势群体的众多顾虑。



化,阿根廷的政治体制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道路来穿越它那已经退化的政治制度的毁灭遗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在1966年至1969年“休战”之后,群众普力夺主义在阿根廷重新出现。如果政治民主化的许多遗留障碍可以被克服的话,那么新的政治体制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也仍然将被创立。群众普力夺主义的复兴只可能阻碍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诱使许多权势群体去考虑新的威权主义试验。重大的问题将是:在什么程度上,官僚威权主义时期提供的社会学习促进了那些关键性政治行动者们态度的变化,并且说服他们放弃普力夺主义而寻求更好的方式去在一个民主框架之内处理那些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空间”。

### 附录: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概略

我将在第四章中提出一个更精细的“政治博弈”,并且在那里,对这项分析工作更充分的讨论将成为可能。在这里,通过比拟一个博弈形势,说明以下情况就足够了,即,政治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一定情形(政策事项、政治体制类型和竞争规则以及博弈者集合)之下的行动,“参与者”在努力实现目标时必须把该情形纳入考虑范围。

在对当代南美官僚威权主义情形的一个高度简化的描述中,要素如下:

- (1) 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从一个有偏差的指标集合的视角出发,来度量政府的绩效。
- (2) 这些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体中“有效率”部门的增长(那些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大多数处于这些部门之中);低水平的社会不安(罢工、示威、骚乱);低通货膨胀率;有利的对外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
- (3) 无论其他指标显示的如何,与之前政治体制相比,如果有偏差的指标集合显示出显著改善,并且如果这些指标还表现出进一步改善的倾向,那么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下政府的绩效将会被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改善无法被观察到,绩效就将被认为是“令人不满意的”,并且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将推动把政府赶下台。



- (4) 除了那些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密集渗透的部门,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政府无法指望国民中其他部分的支持。因此,为了保有职权,政府必须根据被这些任职者所监控的指标而“令人满意地”运作。
- (5) “令人满意的”绩效的实现,至少要求逆向的收入再分配、对民众消费需求忽略以及从经济体中排除没有效率的生产者。这些政策遭到被剥夺群体的强烈抵抗;政府必须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来对付这种抵抗。

注意:在这一点上,取决于政府在使用所“要求的”强制时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分析出现两种不同方向。

- (6) 如果政府在使用强制时是“成功的”,那么它将得到来自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支持,但是它的政策将深深地疏离那些被剥夺群体——平民群体,以及起初曾支持过该政治体制的中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和某些国内企业家。因此,使用强制的“成功”以及按照有偏差的指标集合的“令人满意的”绩效,用进一步疏离许多其他社会群体而换取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支持。
- (7) 由于政府因此而变得更依赖于以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为基础的狭小联盟,所以仅有的政策选项也同样狭小。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增长以及政府的进一步孤立。统治联盟中某些成员可能开始意识到不均衡增长及政治孤立的巨大社会代价,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会试图改变政策,但是这要求来自统治联盟“之外”的有力支持,而这一点无法实现,因为强制已经摧毁了大多数或者所有的政治权力的自主基础。此外,外部支持不会轻易给予从前曾经公然参与强制性政策的人士。因此,该联盟内部出现异议的机会微乎其微。
- (8) 依照有偏差的指标集合而“令人满意”的绩效的持续增大了社会代价。这些指标对统治联盟来说显著而重要,而社会代价对那些被剥夺群体显著而重要。故而,这两个群体对社会现实大相径庭的“图谱”被强化,它导致统治者进一步镇压并轻松地对这种镇压进行合理化。当且仅当资源日益加重的偏态分配甚至从有偏差的指标集合来看,也阻止了进一步改善时,这个过程才会停止,但此时,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已经彻底改变了它创立时的社会背景。因此,一个新的问题

空间产生了(在其中,累积的社会代价可能将极有分量),一个全新的“政治博弈”开始了。

- (9) 与以上情形相反,如果政府在实行强制时一直“不成功”,那么随之将有非常不同的后果。政府必须尽量去达到(5)中所列的目标,但是平民群体和国内企业家能够有效地抵抗。
- (10) 更具体来说,平民群体保持了它进行罢工、示威及骚乱的能力。这是一个对付这种政治体制非常有效的武器,该政治体制是作为对群众普力夺主义的一种“法律与秩序”反应而出现的。
- (11) 故而,政府必须进行谈判,并且做出让步来安抚那些更具威胁性的政治行动者。但是,这不利于根据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政府依赖于这些人的支持——所操纵的那些指标来判断的政府绩效。为了“生存”,政府必须继续力图贯彻那些将带来“令人满意的”绩效的政策。这重新招致来自被剥夺群体的抵抗与威胁,而且现在规模更大,因为有先例说明政府没有能力去实行“必需”的强制。换言之,群众普力夺主义和政治不稳定已经在该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之下完全重现。
- (12) 后果之一是,统治联盟开始深重分裂。一个子联盟将声称,它的偏好没有得到适当考虑(政府一直过于优柔寡断和“软弱”),并且所必需的是认真贯彻(5)中所列的那些政策。但是,当需要多得多的强制来实现相同目标(哪怕是在较低程度上)的时候,这个连续性的(*continuista*)子联盟却比起初的联盟要弱小。
- (13) 另外一个子联盟将作出结论,认为官僚威权主义的努力已无可救药地失败了。基于以下假设——认为公然参与一个已经失败的政治体制将损害他们的利益,该子联盟的成员将选择迅速把他们自己解脱出来,把应付该问题空间的责任转交给其他群体。在他们努力摆脱向其他政治行动者们“重启这个博弈”的程度内,该努力能够比连续性的选项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 (14) 但是,对于寻求解脱的子联盟的外部支持是有限的,这既因为其动机可疑,也因为官僚威权主义政策已经在一些群体——统治联盟正在寻求他们的支持——中间产生了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由于成

功的解脱要求来自曾经被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试图加以排除的政治行动者(平民群体与党派人士)的合作与克制,所以该子联盟讨价还价的地位非常虚弱。因而,官僚威权主义联盟中仍然没有投身一端的那些成员,就无法确信他们将从解脱选项中获得比从连续性选项中更大的益处。

- (15) 这样,“令人不满意的”绩效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创立之前所存在的社会背景与“问题空间”基本不变地保留了下来,但是它使初始联盟分化成了主张更多强制的人和主张迅速解脱的人。如果连续主义者占了上风,那么从(6)到(8)的序列就将再次被尝试,但是在这个新近阶段,社会代价将高得多,并且产生“令人满意的”绩效的机会要小得多。否则,结果将是重返政治民主体制,该体制(又一次)将不得不在令人不快的群众普力夺主义遗产之下运转。它能够在其中避免普力夺主义并取得更大的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减小威权主义再次崩溃的可能性)的那种环境,是无法通过考察官僚威权主义“博弈”来确定的。

## 当代南美其他政治体制概览

至此,我已经在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南美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相关性:(1) 社会结构(聚焦于社会分化和“现代”地区的生产性工业基础)以及它与政治多元化和激活的相关性;(2) 由突出社会问题和发展瓶颈所构成的议事日程,它界定了每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空间;(3) 技术官僚角色的渗透。这些都是现代化这一中心概念的维度,并且在现代化的每个层次上,都可以在它们当中看到显著的区别。

第四个重要维度只是曾被顺便提起——南美国家当前在国际背景中的地位。所有南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影响;它们最多只能期望稀释国际事件和强权决策带来的国内影响。它们全都缺乏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力量;它们全都屈从于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事实上无可辩驳的霸权;它们全都依赖稀缺的外国资本;它们全都依赖外来技术,这些技术发源于那些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并且它们的许多角色模范、消费预期

以及意识形态影响都曾经源自这些国家。

这些因素冲击每个南美国家的特定方式,取决于这些国家不同的现代化水平。例如,经济依附问题是各国共有的,但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它表现在工业行业之间的裂隙上,而在大多数其他南美国家,它仍然围绕着原料生产飞地的没收以及/或者出口导向外资企业而展开。在研究每个国家内的问题空间以及细究不同政治联盟处理该空间的方法时,必须考虑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

阿根廷和巴西是南美最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加上那些来自它们在国际背景中之地位的因素,这个现代化造成了它们政变前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不得不应付的问题空间。当现代化在其他南美国家推进的时候,我们能否推断说,将会有朝向官僚威权主义方向的类似“拉力”?

对本书论点来说有基础意义的是,这是一个要被提出的重大问题(而且是一个完全不能从第一章所讨论的基本“范式”的乐观假设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研究,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以至于无法在任何确信程度上回答该问题。首先,尽管总体背景相同,但关于因果过程(在此处,阿根廷和巴西的因果过程相对于其他南美国家的因果过程)等价的假设,可能和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假设同样谬误。其次,即使趋势是朝着官僚威权主义的,有特定目的的政治行动也可能有能力造成方向变化——特别是有阿根廷和巴西经验来警示领导人并产生有效措施来避免这种可能性。第三,其他因素可能使任何试图进行推论的单纯努力无效——比如,在智利稳固的政治机构的存在,特别是组织良好的非个人化政党、一个起作用的国会以及有效的民主式社会化;许多智利的政治行动者和(显然)仍存在的一些乌拉圭的政治行动者的“体制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被比它们庞大的邻国的“政治原始性”所加深;智利和乌拉圭的军队不干涉传统;以南美标准衡量的委内瑞拉优异的来自石油开采的硬通货收入;哥伦比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终结——既有导致威权主义严重崩溃的危险,也带来了实现和制度化公开政治竞争的机遇;<sup>①</sup>在比阿根廷和巴西更低的水平上“横向”工业化的耗竭,以及在

---

<sup>①</sup> 关于哥伦比亚形势的一个近期良好分析,参见: C. Rama, “El sistema político colombiano: Frente Nacional y ANAPO,” *Centro Paraguayo de Estudios Sociológicos*, 1970。

试图进行垂直整合时面临的更大困难——此种困难可能在其他南美国家中诱发出阿根廷和巴西所没有的制度创新。

所有这些因素都潜在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当记住，它们不得不在极为紧张背景下运作。低水平的绩效<sup>①</sup>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提高了的政治激活及技术官僚角色的渗透、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只能被看作是把社会推离政治民主而推向威权主义种类，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威权主义的种类极有可能属于本章所分析的“官僚政治”类型。

如果缺乏足够证据来权衡所有这些因素，就必须暂缓作出判断。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暂缓判断就必须同样适用于我的推测和推自基本范式的更乐观期望。回到第一章中的讨论，在此可以重申，在民主化的线性假设之下，几乎无法澄清现实中运行的主要历史趋势。

瓦加斯时代和庇隆时代已经被认为属于平民威权主义之列；另外一个属于该类型的个案是当代秘鲁的政治体制。它被相同类型的联盟所统治；它拥有相同的“敌人”；它的政策是以下内容的相同组合，即，建立在仍然同质性工业部门基础上的国内市场扩张、传统统治部门的削弱以及没收那些最醒目的外国势力存在的标志。它有同样的混合：不可逆转地改变社会的激进政策、持有保守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以及在某些重要领域实行的复辟政策。此外，就像在阿根廷和巴西平民主义经历中那样，秘鲁体制正试图“自上而下”——由政府——进行政治激活并结合平民群体的各个部分，同时力图保持对该过程的紧密控制。根据我的分析，它在社会分化、政治激活以及技术官僚渗透方面的较低水平，阻止了官僚威权主义及其支持联盟在秘鲁的出现。<sup>②</sup>这些情况，加上与此相伴的进一步“横向”工业扩张和外资企业在出口导向部门盛行的可能性，使平民主义特色的大联盟成为可能。在秘鲁的平民威权主义和巴西在1964年以及阿根廷在1966年所创立的官僚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之处。军方看来在

---

<sup>①</sup> 甚至在其他方面特别有利的委内瑞拉的情况中，增长纪录也一直非常差。参见：James Petras, “Una década de democracia capitalista en Venezuela,”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IV, No. 12 (1970)。

<sup>②</sup> 关于秘鲁个案出色的近期分析，参见：J. Cotler, “Crisis política y populismo military en el Peru,”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IV, No. 12 (1970), and F. Bourricaud, “Los militares: ¿ Por qué y para qué?,” *Aportes*, No. 18 (1970)。



所有三个案例中都掌握着政府权力这个事实,在类型学方面并不重要。<sup>①</sup>最有影响的是每个体制的政策和它所回应的社会问题、它所依靠的联盟以及它是否试图排除并且钝化平民群体。也许,秘鲁平民主义和先前的平民主义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于美国政策已经引起了军事组织中实质性变革的时期,但是仍然有待观察,看这一点是否最终将导致更好的记录。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在经历它们政治体制的威权主义扩展时期。然而,这些平民主义却遵循着非常飘忽不定的路径。它们国内市场规模极度狭小<sup>②</sup>所产生的限制条件,使它们的“横向”工业扩张被局限在比秘鲁更低的水平上。因此,平民主义政策的驱动力一直微弱,并且和那些起步于更有力基础的国家相比,联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开拓国内市场的工业家们)一直扮演着较次要的角色。

最后,南美唯一存活下来的传统威权主义是在巴拉圭。一小撮相当同质性的精英统治着在政治上基本不活跃并且几乎没有分化的国民。出口导向的外资部门占有支配地位,并且还未曾有想过让它从属于国内工业及市场扩张的严肃努力。

## 提议的分类

现在可以完成第一章中的初步分类了。在表 19 中,南美国家按照现代化水平分组,并按照本章及上一章设置的标准和定义,匹配以相应政治体制类型。无须重复此处提议的分类法和第一章中所分析的各研究之间的区别;但是,指出此处提议的分类法与那些研究之间的共同之处也许是有益的。它们都涉及沿着两个维度(社会—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尽管界定不同)对个案进行排序,并且接着提出问题“什么伴随着什么?”它们全都强调单向的影响——那些由社会-经济因素对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sup>③</sup>它们全都是在真正重要

① 在秘鲁,与军事机构(尤其是 CAEM)之间的联结,倾向于是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而建立的,而不是像在阿根廷和巴西那样,是和右翼技术官僚文职人员建立的。

② 参阅第一章中的数据。

③ 这是表明这些努力的不完全性的最好标志。我相信,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行动可以对社会-经济因素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提供关于社会现实的更好“图谱”来说,这些初步努力可能是有益的,有目的的政治行动将不得不对社会现实。

的理论任务——确定决定着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诸关系——之前的初步工作。如果这些关系可以被确定的话,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性理论,并且有可能对未来趋势作出可靠预测。

这一切都被用来强调那些研究以及本研究共同缺陷。但是,由于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只有考虑到动态的、有时限的过程,才可能近似地作出解释——我比这类研究中的惯常做法采用了更多的步骤。<sup>①</sup>第一步,和所有研究相同,是建立匹配联系——对本研究来说是在现代化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之间。第二步集中考察阿根廷和巴西,试图提出一些要素,以给当代南美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植入提供一个起源性的解释。我们仔细考察了阿根廷和巴西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并且努力把它们放入一个比较的视角中,和欧洲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以及南美的其他威权主义加以比较。简短的第三步是高度推测性的,即致力于评估某些趋势。

表 19 依照现代化水平对当代南美政治体制的分类

现代化水平	政治民主?	排除性体制?	政治类型结果
<b>高</b>			
阿根廷	否	是	官僚威权主义
巴西	否	是	(最常见类型)
<b>中等</b>			
智利	是	否	政治民主 (最常见类型)
哥伦比亚	是	否	
乌拉圭	是	否	
委内瑞拉	是	否	
秘鲁	否	否	平民威权主义
<b>低</b>			
玻利维亚	否	否	平民威权主义
厄瓜多尔	否	否	(最常见类型)
巴拉圭	否	否	传统威权主义

<sup>①</sup> 这些“步骤”包括成为我分析基础的那三个阶段(静态—相关性、解释性以及预测性阶段,不幸的是,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具有试探性和推测性)。在前面几页里,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似乎不可避免地转到枝节问题上,并且有几次,不可避免地部分改变了这个次序。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有一定信心提出几点。首先,当代南美现代化的更高水平不是和政治民主制相联系的。其次,阿根廷和巴西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几乎不能被看作是在这些国家里增加了建立和巩固政治民主制的可能性。第三,在提出可靠性和集中性都好得多的证据之前,没有理由相信,现存南美政治民主体生存下去的几率,会显著地高于它们落入威权主义方向的几率。第四,随着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不确定但相当大的可能性——这些威权主义种类归入这里分析的“官僚政治”类型。第五,那个基本范式及其关于因果过程等价性的基本假设,没有得到南美案例的支持。

在本书接下来的两章中,主题将转到对阿根廷政治经历具体方面的研究。它们将更详细地阐明那些导致试图创设和巩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过程,并且展示关于这些过程的更详细资料。

### 第三章

## 1966 年的阿根廷： 一个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发端

1966 年 6 月 28 日，“作为武装部队代表”的一些军官驱逐了依照宪法当选的阿根廷总统阿图罗·伊利亚(Arturo Illia)。他们并不操心采取“通常的”步骤来阻止公众混乱——这并没有发生。外国记者报道了全体公众未作反对的不寻常情形。<sup>①</sup>他们的印象被调查数据所确认——调查数据显示，66%的受访者赞同这场政变，而只有 6%不赞同。<sup>②</sup>所有的主要群体(除了被驱逐的政党和一些小党以及大学生)都表示支持政变和新的军政府。由陆、海、空各军参谋长组成的革命军人集团(Junta Revolucionaria)驱逐了总统和各省省长，解散了议会，解除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制定了《革命法令》(Estatuto Revolucionario)——其管理权超过了国家宪法。所有“政治活动”被禁，政党被解散，选举被无限期地推迟。该集团任命退休将军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为总统。该集团和新总统的公报阐明了政变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1) 在主要社会群体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缺乏和谐与

---

① 例如，参见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1966。

② *Primera Plana* 所做的调查(样本和方法未知)，载于 C. Astiz, “The Argentine Armed Forces: Their Rol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XXII, No. 4 (1969)。这篇论文提供了对本章进行补充的有用信息和分析。在另一个调查(样本是 1000 名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受访者)中，对“你认为[1966 年]6 月 28 日革命是必要的吗？”这个问题，77% 的回答为“是”(Correio de la Tarde, June 6—12, 1967; 1966 年 7 月所做的调查，方法未知)。

团结,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颠覆,以及忽视公共利益;(2)以前的文官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全国性问题: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缺乏权威、普遍的社会动乱、国际威望丧失;(3)政治党派领导层和大多数有组织的集团没有代表性;(4)政治党派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导致了公共舆论的两极化和无能的政府政绩;(5)在长期的国家危机之后仍保持的唯一坚固可靠的机构——武装部队凝聚力崩溃的危险。<sup>①</sup>

这当然不是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变。<sup>②</sup>但它与所有其他的政变不同,因为这是第一次武装部队内部高度一致地决定无限期地直接控制政治权力,并且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举行选举或将政府归还政治党派的计划。此前1955—1966年的阶段被多次武装政变的努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所打断,但这些政变没有任何一次改变了存在于那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的类型。毋宁说,那个阶段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是虚假的政治民主——它断绝了第一大简单多数选民群体(多党体制中最大的单个政治党派或集团)的选举途径——之运作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sup>③</sup>1966年6月政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通过初创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来改变既存政治体制的一次有意识的尝试。这个达到顶点的(就本章关心的焦点而言)事件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1955—1966年期间反复发生的政治不稳定。

重要的是,在这儿要记住某些重要的区别。本章旨在通过对导致了1966年阿根廷政治体制变化的关键步骤进行分析,为解释这一变化作出贡献。因此,它并不集中于考察1955—1966年的政治不稳定,除非其似已对最终的1966年崩溃有所促进。

在考察那些似对正在分析的作为“因变量”的事件或现象产生影响的因

---

① 参阅除了其他资料外的以下官方出版物:“Mensaje de la Junta Revolucionaria al Pueblo Argentino”(1966);“Mensaje al País del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Teniente General Juan Carlos Onganía”(1966);“Mensaje del Teniente General Juan Carlos Onganía con motivo de asumir la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1966);以及“Mensaje del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en la reunión de camaradería de las Fuerzas Armadas”(1967)——均由阿根廷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 出版。

② 关于阿根廷军民关系的最好分析(尽管它们没有覆盖所有主要的历史事件),是以下著作:Darío Cantón, *La política de los militares argentinos: 1900—1971* (Siglo XXI, 1971), 以及 Robert Postas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这个问题将在下面得到更详细的考虑。它也将第四章从不同观点出发得到讨论。



素时，总是难于决定应当“回溯”多远。在目前情况下，把考察限于那些和1966年政变最直接相关的因素——比如军队的干涉决定、政变领导人之间的高度凝聚力以及创立一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的目标，显然过于局限了。对这些因素的考虑迅即提出了有关军队决定的理由和公众对这场政变没有反对的问题。

这样，分析的焦点得到了扩展；但是，这样一个扩展了的视角有一些问题。首先，仅以最直接的因素为中心所做的解释的概念简洁性就被牺牲了。其次，它不可避免地简化了广阔的历史和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被认为对那些与政变的联系更直接的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什么军队在1966年改变了他们干涉的目标？为什么这场政变是由此前还持十分明确的尊重法律（也就是反政变的）立场的军官决定的？为什么1966年政变的进行在武装部队中间有不同寻常程度的凝聚力？为什么阿根廷社会中大多数有组织的群体争先恐后地表达对政变和军政府的支持？并且，这些情况以什么方式与在阿根廷创立并巩固一种新型政治体制的努力相联系？

然而，即使有其缺陷，一种宽广的分析角度也是合意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允许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在这里遵循的策略是由以下部分构成的：首先是对阿根廷历史的某些方面的一个简短考察；其次，我将研究1955—1966年间总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第一阶段将提供一种“纵向”视角的主要轮廓，第二阶段将给出1966年政变之前的阿根廷背景的详细图景。这两部分将构建一个坐标，与这次政变联系最直接的那些因素将在这一坐标内得到研究——在本章的最后部分。

## 阿根廷历史遗产的某些方面

这里对1966年政变之前（它们有些在此之前许多年）历史方面的分析将有必要是十分具有选择性的。这里并不自命要书写历史。这里的目的是确认一些出现于某些历史阶段、并已作为阿根廷社会中的“常量”保持下来的社会问题。有关历史的讨论将严格限于那些对该目的来说似乎必不可少的发

展进程。<sup>①</sup>

这里所使用的“常量”是作为持久性的问题或约束——它们限制了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保持下来的阿根廷社会的特征。某些历史常量的持续存在以及新的常量的出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集的主要部分。每个这样的问题集都是由“常量”和各个特殊时期的政治行动者所面临的一组更特殊的问题构成的。这些常量本应已被“消除”，但它们并没有被消除的事实——借用韦伯的类比——已越来越不利于在阿根廷出现一个有效运作的政治体制。这一失败反过来又助长了数量不断增加的常量的持续和积累。

**国家统一和大地产寡头制。**有两个常量从很早时期持续至今。一个是实际的政治行为与正式机构和主导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政治行为之间高度的不一致。<sup>②</sup>第二个是基于在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问题上的显著分裂以及十分不平等的政治资源分配，很大部分人口对既存政治体制和执掌政治权力者的强烈不满。<sup>③</sup>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有两种十分不同的殖民模式在后来成为阿根廷的地区占主导地位。中部和北部地区在经济上是秘鲁总督区(Vice-royalty)的一部分，西班牙征服者对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社会建立了家长制的统治，他们发现这些社会极好地适合于他们从西班牙带来的等级制世界观。相较之下，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十分次要的殖民区；它周围的土地上零散地居住着游牧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经济价值。这个村庄虽然是一个港口，但太遥远而不能受益于比较富裕的秘鲁人地区，而且，西班牙禁止它从事国际贸易。但英国商业的扩张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带进了和西班牙的冲突，很

<sup>①</sup> 关于更全面的细节，读者可查阅后面引用的各种资料来源。一本精彩的通论性的阿根廷政治史是：C. A. Floria and C. García Belsunce, *Historia de los Argentinos* (2 vols.; Editorial Kapelusz, 1972)。

<sup>②</sup> 几乎不需要说明，这种不一致已为拉美历史学者所再三评论；例如，可参见：Stanley Stein and Barbara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关于更近期证据的一项评价，参见：Federico Gil, *Instituciones y desarrollo político en América Latina* (INTAL, 1966)。

<sup>③</sup> 关于“政治资源”，参见：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快它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走私中心。西班牙人制定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禁止商业和走私的法律完全无效了(就像保护“秘鲁”地区印第安人的法律一样)。著名格言“国王的意志被服从而没有被执行”准确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运动,引发了60年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独立战争差不多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内战。斗争的一方是中央统一派(*unitarios*),他们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基地,并且深度地卷入了国际贸易。他们渴望吸收所有的欧洲意识形态潮流,他们为一个尚未存在的、且成功抵制了他们的统治要求的国家起草了法律和宪法。他们的反对者联邦派(*federales*),以中部和北部地区为基地,寻求保存他们的家长式的、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利害攸关的问题是两种十分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经济利益: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晚近的西班牙经院哲学的对立,西班牙融入世界市场和内陆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继续之间的对立。如理查德·摩尔斯(Richard Morse)所指出的,独立后的西班牙殖民地是一个寻求合法性准则的“被斩首的传承国家”<sup>①</sup>。对中央统一派来说,在外向和失去传统合法化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是某种形式上模仿西欧或美国模式的宪政政府。显而易见的困难是,新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在其中运作的根本就不是那些模式所设想的那类社会。实际的社会环境和这些模式所设想的那些环境之间的差异太大而不能被忽视。一种可能性原本是努力构建更好地适应实际环境的制度,但许多中央统一派相信,为了“进步”,不管成本有多大,从外部强加某些形式的宪政政府将必然推动社会现实趋向于作为典范的社会。“移植的”制度将形成一种和它们匹配的社会现实。经过多次失败之后,1852年制定了一部宪法,它存在(至少在名义上)至今。正式向制宪会议提出该宪法文本的代表说:

构建一个国家只有两种方式:接受她现在的行为、性格和习惯,或者,如果这个国家不具备这些的话,就给予她那种必然能产生正确的行为、性格和习惯的行为规范。因为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国家处于混乱之

<sup>①</sup> “The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in L. Hartz ed.,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1966).

中，所以这个宪政计划就是拯救她的唯一方法。<sup>①</sup>

在内战期间，“宪法”、“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民主”等词汇都属于中央统一派；但是，制度的和正式的行为规定与实际的政府表现之间的不一致与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一样大。此外，这些术语变成了少数派的象征，他们否定传统文化并摧毁大部分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形式。<sup>②</sup>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港口的优势地理位置意味着其居民能够充当引入欧洲（主要是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中间人。因为内陆的手工业无法与这些进口商品竞争，所以布宜诺斯艾利斯霸权的领土扩张导致了許多国内经济活动的消失。这有助于解释内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中央统一派的坚决抵制。

当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加速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获得经济资源和战争技术——这牢固地建立了它对于内陆地区的霸权。然而，甚至在1870年后，当这个国家相对太平的时候，“民主”政治机构的移植仍继续产生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要求在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经常是少数的情况下举行选举。因为不存在允许“野蛮人”统治的可能性，所以选举欺诈以及暴力和中央政府权限公开地专断运用，就经常发生。

在这一点上，阿根廷的第三个“常量”就极为显而易见了。统治集团只是有限地和有条件地坚持民主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的运用受制于产生“正确的”政府的限制条款。<sup>③</sup>如果该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些规则就被延迟直至足以确保“正确的”政府掌权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时期将要发生的是，因为“民主地行事”危害“民主”（按照统治集团的定义），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以赤裸裸的非民主方式行事的同时，宣称“为了民主”这是必要的。在大众对统治者和机构一贯的高度不满的情况下，不难理解这一常量是如何培养

---

① 古铁雷斯(José M. Gutiérrez)向制宪会议的演讲。

② 国家统一的这个时间顺序十分不同于较早的欧洲现代化者。在那些国家，国家统一的艰难任务在宪政主义和民主成为一个议题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描述的这个时间顺序在南美唯一明确的例外是智利。

③ 其他作者已观察到了阿根廷社会中的这个“常量”；参见：C. A. Floria, “Una explicación política de la Argentina,” CIAS (1967); Dahl, *Polyarchy*, pp. 132—140; E. Kenworthy,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onist Coalitio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0.

出了犬儒主义，而不是帮助建立了体制及其机构的合法性。<sup>①</sup>

19世纪末，统治集团热切地采用了源于欧洲的将实证主义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概念相混合的新观念。以前界定为“文明反对野蛮”的斗争现在不能被“科学地”解释。有人主张，只有西班牙文化的残迹和这个“堕落的种族”被欧洲移民所取代时，才有希望。<sup>②</sup>在因出口扩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全国政府在世纪之交主动鼓励欧洲人移入。<sup>③</sup>

另一个“常量”，在最初产生了有利结果的情况下，在这一阶段展现了出来——阿根廷经济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显著依赖，对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它只有有限的国内控制能力。自18世纪末以来，中央统一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贸易，据此，阿根廷出口农产品而进口大多数所需的工业产品。在1870年前后英国工业快速扩张的时候，它对农产品进口的需求也迅猛扩张，而阿根廷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来供给这种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辽阔的潘帕斯草原(pampas)——它能提供出口的谷物(后来还有牛肉)——在新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变得必不可少，阿根廷的经济中心就决定性地从中部和北部地区转移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对潘帕斯草原开展资本主义开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建设开发所要求的金融和运输结构。向潘帕斯草原土地的扩张程度和速度可从表20提供的数据中看出。

① 关于合法性的一个精彩理论分析是 N. Botana 的 *La Légitimité: Problème politique* (Louvain, 1969)。也可参阅他的“La crisis de legitimidad en la Argentina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riterio*, No. 1604 (1970)。

② 这已被赫希曼(A. Hirschman)称为“自责时期”(“Introduction” in Hirschman, ed., *Latin American Issue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0])。但这种责备是片面的：统治群体把矛头对准了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地，反应是痛苦的。统治群体对人口中的其余部分的理解部分地是一个选择性借用的过程；在对阿根廷访问之后，内阁大臣布赖斯(Lord Bryce)写道：“在那些极少数的考虑抽象主题的人中最为流行的书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书。[阿根廷人]不愿意相信他在自己的国家不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转引自 A. Whitaker, *Argentina*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4], p. 61)。

③ 关于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巨大浪潮，参见：G. Germani, *Politica*, pp. 179—216；O. Cornblit, “European Migrants in Argentine 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C. Veliz, ed., *The Politics of Conform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以及 C.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Argentina and Chile, 1890—191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0)。

表 20 几项主要经济指标：阿根廷，1870—1914 年

	1865—1869	1890—1894	1910—1914
铁路总长度(公里)	503	N. A.	31,104
商品出口总量(百万金比索)	38	N. A.	410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百万公顷)	0.58	N. A.	20.62
小麦出口总量 (1910—1914 年平均值, 百万金比索)	0.2	28.1	78.1
玉米出口总量(与小麦的度量相同)	0.3	6.0	72.4
冷冻牛肉出口总量(与小麦的度量相同)	0.0	0.1	49.7

资料来源：Alejandro, essays, pp. 2—5, and Ernesto Tornquist and C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Buenos Aires, 1919), pp. 26, 116—117, 139—140.

在这种外部刺激之下，阿根廷经济在 1870—1914 年间增长迅速。这个国家以其繁荣赢得了国际声望。由于阿根廷从谷物和牛肉出口的国际市场上获得的利益，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生活水准是高的。但是其余地区远远落后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而且，数百万公顷最好的潘帕斯草原土地被一小部分人所强占：阿根廷从来没有一个开放的未开拓领域。<sup>①</sup>阿根廷的繁荣赖以发生的资源被很少的人垄断，受益者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进步之路。正如这个时期的一位总统塞尔门(Juarez Celman)所说，“因为有大农场，我们获得了当前的进步以及我们对经济和生产能力的理解。这个大财产的体制使我们富有”<sup>②</sup>。或许更重要的是，特权阶层基本上是由缺乏效率的企业家<sup>③</sup>——他们

① 关于这种形势的描述及对导致它的因素的分析，参见：H. Giberti, *El desarrollo agrario argentino* (Eudeba, 1964); James Scobie, *Revolution on the Pampa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R. Cortés Conde and E. Gallo, *La formación de la Argentina moderna* (Paidós, 1967); 以及 R. Cortés Conde, “Algunos aspectos de la expansión territorial en Argentina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 *Desarrollo Económico*, 29 (1968)。

② 引自 O. Cornblit, E. Gallo, and A. O’Connell, “La generación del 80 y su proyecto: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in T. di Tella et al., eds, *Argentina: Sociedad de masas* (Eudeba, 1965), p. 54. 这是一项优秀的关于这里考虑的时期的专题论文研究。

③ 参见：Scobie。



几乎对工业活动没有兴趣——构成的。<sup>①</sup>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制约了否则会有的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和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不同寻常机会。

**中产阶级。**到19世纪末(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断扩张的经济已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中间部门——由商人、专业人员、公务员和典型地存在于农业出口经济的大输出点的初级产业的所有者构成。最近的研究表明，纯粹的远距离以及对特定产品的某种关税保护刺激了一些产业的增长，但是这些产业主要是由外国人所拥有的。这连同政府和统治集团对开放贸易政策的偏好，阻止了一个在数量上重要的、政治上活跃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相反，在中产阶级内部，工薪收入的、非企业家的部分占绝对多数。这个中产阶级完全接受既存的社会-经济政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比寡头政治更加反对工业而更加支持自由贸易。他们的政治要求局限在公正选举和公开获得高层的全国性政府职位。<sup>②</sup>然而，他们通向政治权力的道路并不轻松。只是在三次不成功的军民起义之后，才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诚实的选民登记、秘密投票以及由军队保管存票箱。

长期延迟接纳中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反映了另一个“常量”：势力壮大的政治行动者强烈抵制把政治参与扩大至纳入新的行动者，即使在有利的经济环境和差不多整个的政策一致将这种扩大的“风险”最小化了的时候。当后来这些有利的环境变化的时候，新的政治行动者尖锐地不满于政策问题，完全反对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就成了定则。

如彼得·史密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无论是寡头统治对公正选举要求的承认，还是1916年激进党(Partido Radical)领导人伊里戈延(Hipolito Irigoyen)的当选，都并不意味着寡头统治对民主游戏规则的真诚信誓。<sup>③</sup>新政

① 只有一小部分实业家是阿根廷人。很少一部分欧洲移民选择了阿根廷公民身份，他们大多数在政治上是不活跃的。参见：Cornblit; Germani, *Política*; 以及 Alejandro, *Essays* 第一章有价值的数据和出色的分析。

② 关于这个中间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政策偏好，以及它主要的政策表达——激进党，参见：Cornblit; E. Gallo and S. Sigal, “La formación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ontemporáneos: 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1880—1916)” in T. di Tella et al., eds.; 以及 Peter Smith, *Politics and Beef in Argent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in Argentina, 1916—1930,” 递交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论文，瓦尔纳，1970。

府在“不确定的合法性”<sup>①</sup>条件下运作，受制于对国家事务“令人满意的”（根据旧统治者的定义）处理。寡头统治保持着对关键的政治资源——社会声望、经济权力、军队的影响、对新闻和大学的控制——的控制。在整个激进党人统治时期，旧统治者表现出他们对暴发户的蔑视，他们视其为无能的和不可靠的人——毕竟，这些人只不过是遵循着统治集团的旧社会-经济政策。<sup>②</sup>

激进党人政府并没有完全杜绝欺诈和中央政府对各省事务的任意干预，但整体上看，他们在选举操作和扩大法治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对阿根廷特别不幸的是，英国经济 1914 年后开始衰退。由于英国经济的衰退和不太灵巧的政府政策，与 1914 年前的增长率相比，经济增长放缓了。最终，在始于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寡头集团在这种情势下强化了他们仍未放弃的信念——只有他们才能统治。1930 年，一场由寡头集团支持的军事政变驱逐了激进党政府。

后来一般被称为保守党(Conservadores)的旧寡头集团，在经济危机中极力进行统治。他们推行了一项旨在节省极其匮乏的国际货币、靠国内市场供养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计划。<sup>③</sup>这场危机在国家内陆的严重影响，连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工业化的努力，将大量人口抛入了城市生活。<sup>④</sup>这些新移民即将形成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基础，他们保留着与他们的农业根源的密切联系，并且带着对中央政府的极大不满。保守党面临着一个旧有的困境：因为他们是“民主的”，他们迟早得举行选举。他们首先于 1931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尝试进行了省长选举，其结果是激进党胜选。因为“正确的”候选人没有取胜，所以这次选举结果被取消，获得任命的是一位联邦委派的代表而不是当选的省长。后来，当前激进党总统阿尔维亚尔(Marcelo de Alvear)试图参

① 这种表述来自弗洛里亚(Floria)。

② 关于这种蔑视的表达，参见：D. Cantón, *EL parlamento argentino en épocas de cambio: 1880, 1910 y 1946* (Editorial del Instituto, 1966)。

③ 关于这些经济政策的一项精彩分析，参见：Alejandro, *Essays*。相关文献综述以及对这些政策的社会-政治含义的分析可见：M. Murmis and C. Portantiero, “Crecimiento industrial y alianza de clases en Argentina, 1930—1940,”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Documento de Trabajo*, 1968。

④ 运用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概念，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主张，阿根廷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Rise of Juan Per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XXXIV, No. 1 [1969])。

加总统选举时，他的候选资格被一纸法令所否决。其结果是，在“不妥协”的信条之下，激进党人放弃了参加选举，并组织了几次不成功的军民暴动。即使在激进党人退出的情况下，保守党也不敢冒险进行诚实的选举。体系化的“爱国欺诈”<sup>①</sup>被实行，因为它是唯一可避免如果多数主义政府当选会引起的灾难的方法。惠特克(A. Whitaker)说：

当 1937 年总统选举临近时，日益高涨的激进潮流使胡斯托(Justo, 总统, 1932 年靠欺诈当选)本人对通过对人民进行选举控制的可能性感到担忧。于是，他及其追随者就通过欺诈和暴力轻而易举地窃取了选举……其影响对国家的政治健康是灾难性的。影响最大的是，它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不顺从者们在过去多年一直在说的话：在阿根廷，民主只不过是便于极少数特权人物对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的一个圈套。<sup>②</sup>

对激进党人，以及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仍然无法清晰表达的群体来说，这是“无耻的十年”。这个标签尤其反映了保守党为保住部分原有的出口市场而对英国利益作出巨大让步所引起的义愤。反对保守党和英国影响的民族主义情绪增长了。

20 世纪 30 年代经历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新的从事进口替代的实业家寻求提高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军队视工业化为获得国际权力的途径，并视英国影响为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表面上成功的政权正在尝试对民主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此外，教会——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之后——准备赋予反民主运动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从所有这些因素中，一种含有强烈的威权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发展。它有广泛的吸引力，对此，旧统治集团能够反对的只是对民主的嘲讽和与英国的依附性联系。<sup>③</sup>

---

① 这一表述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通过欺诈方式当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保守党总督弗雷斯科(M. Fresco)所杜撰的。

② A. Whitaker, *Argentina*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63).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1963 年期间阿根廷的有价值的信息，参见：T. Halperin Donghi, *Argentina en el callejon* (Editorial Arca, 1964)。

③ 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人对他们看到的实际运行的“民主”的理解，只可能强化他们对政治体制和统治集团估价。

城市平民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城市平民群体（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级的某些部分）经历了一个快速政治激活的过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政治党派愿意吸纳主要由新农村移民形成的群体——甚至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党派（它们的基本支持者是熟练工人和欧洲移民）也不愿意。<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使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化了。对独裁统治和工业化的需求，以及支持轴心国的意识形态的扩散，与英国的利益相冲突，也与大多数势力壮大的群体所赞成的支持同盟国的国际政策相冲突。像农村移民一样，新实业家以及许多军官找不到可以传输他们偏好的政治党派。这些新问题和意识形态对军队产生了深远影响，寡头统治第一次不能指望他们的坚定效忠。在1943年，当1944年的选举显然将由“爱国欺诈”来决定时，军队驱逐了保守党政府。在随后产生的军政府中，陆军上校庇隆脱颖而出，成为最能将所有的保守党时期产生的异议人士团结起来的领袖。<sup>②</sup>与这个联盟相对，激进党、保守党、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组成了“民主联盟”，但他们在1946年被庇隆（在诚实的选举中）击败。<sup>③</sup>

这里不是研究庇隆主义的地方。<sup>④</sup>它包括一些威权主义的成分——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意识形态与（对阿根廷来说）传统的领导方式的混合。<sup>⑤</sup>庇隆的有利于工业和平民群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开展全面的劳动和福利立法以及

---

① 比较有权势的群体用“无衫汉”（the shirtless）、“黑头面疱”（the blackheads）、“动物洪流”（the zoological landslide）以及其他有意贬损的词语来指称新移民。庇隆睿智地予以回应，他将大多数这些词语移用来强调其追随者的平民特征。这最初是保守党和激进党支持者的用语，但社会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对新的日益活跃的移民的反应好不了多少；除了其他对“传统的”阿根廷左派的反应所作的讨论之外，参见：J. A. Ramos, *Revolución y contraevolución en la Argentina* (La Reja, 1961)，以及 A. Hernandez Arregui, *La formación de la conciencia nacional* (Hachon, 1964)。关于这一时期的通论性分析，参见：A. Ciria, *Partidos y poder en la Argentina moderna (1930—1946)* (Jorge Alvarez Editor, 1964)。

② Kenworthy, “The Formation,”关于平民主义的庇隆主义联盟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

③（退一步说）关于“民主联盟”对国民情绪错误理解程度的一个表现是，该联盟允许美国大使布雷登(S. Braden)公开为他们竞选。庇隆利用这一事实，把这场选举称为是在“布雷登或庇隆”之间进行的选择。

④ 有关庇隆主义解释的一项有用的综述是：C. Fayt, *La naturaleza del Peronismo* (Editorial Viracocha, 1967)。

⑤ 关于庇隆主义运动掌权时期的庇隆主义意识形态，参见：A. Ciria, *Perón y el justicialismo* (Siglo XXI, 1971)。

引入众多的经济控制，获得了来自平民群体的热烈反应，但与刚被取代的统治群体的偏好十分不一致。其结果，以及为了“保卫民主”，在庇隆政府中一些老党很早就进行“不忠诚的反对”<sup>①</sup>，这强化了庇隆主义的威权主义倾向。庇隆及其妻子人格的巨大吸引力为庇隆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工人当中。此外，在庇隆政府期间，这些群体的生活标准显著增长，许多劳工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工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获得了某种影响力。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庇隆不失时机地强调了他的反对者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支持他的观点，即，他们主张的“回到民主”，是一个建立镇压人民的独裁统治的诡计。退一步说，当庇隆看到反对他的人从未实行过他们正在给出的自由主义建议时，他的观点就很有力度。

这些发展的影响是增加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框架能运作的可能性。双“方”都推动了创造这样一种形势——弗洛里亚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

庇隆执政时期不仅是庇隆主义时期，而且也是反庇隆主义时期。就像它后来被称作的那样，这种两极分化是根据不同的规则表达权力和反对的结果。并不是有两个派别，而是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的居民只能想象有庇隆的阿根廷，而另一个只能接受没有庇隆——从权力角度来说即没有庇隆主义——的阿根廷。<sup>②</sup>

到1950年，庇隆曾经组成的广泛联盟开始解体。农作物歉收、资源分配不当、国际贸易的不利趋势以及为了维持正在推进的工业化而对国外货币日益增加的需求，导致了经济危机。尽管不愿意通过实行土地改革计划触犯农业利益，也不愿意强迫工业吸收经济危机的成本，但庇隆政府还是不得不保护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城市工人——已获得的利益。在这种困境下，“容易的”解决方法是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开始折磨阿根廷经济。1949年后，实业家们开始收回他们的支持，并与反对力量结盟，1954年庇隆陷入了与天

---

<sup>①</sup> 这个概念来自：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递交世界社会学大会(瓦尔纳, 1970)的论文。从一开始反对派就企图以不合法的手段驱逐庇隆, 并采取了极具阻碍性的议会策略。

<sup>②</sup> Floria; 笔者译自西班牙文。



主教会的严重冲突。武装部队的支持也开始动摇，在1951年和1955年6月两次流产的政变图谋之后，当他们发现对庇隆唯一仍然牢固的支持是来自于平民群体时，他们最终于1955年9月驱逐了他。

在阿兰布鲁(Eugenio Aramburu)将军的临时政府时期(1955—1958)，在现在激烈反庇隆主义的武装部队的支持下，那些过去政党的旧领导人重掌权力。这里要强调的是，截止1955年，两种基本的、绝对明显的分裂同时产生：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政治分歧，以及平民群体(主要由工人阶级构成)和劳工联合会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社会经济分歧。其结果是强烈的和累积性的两极分化。<sup>①</sup>

1955年后推行了一项“民主化”计划，它导致了GNP中工资收入份额的急剧下降，削弱劳工联合会的无数努力，以及剥夺庇隆主义党的选举权。如果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影响<sup>②</sup>，那么，庇隆派保持了他们对庇隆主义的效忠就并不令人吃惊。取得政治权力的合法途径对他们关闭这一事实，对刚过去的他们状况大为改善的时代的回忆，坚持不懈地为他们的收入份额而斗争的必要性，以及临时政府政策的报复性——所有这些都坚定了庇隆派的反对活动。普遍的社会动荡随之产生。<sup>③</sup>

对反庇隆派来说，任何回到1955年前的政治状况的做法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武装部队的赞同，武装部队中所有军官都怀疑庇隆主义倾向是否已被清洗。军队领导人并没有忘记，就在其被驱逐之前，庇隆似乎

---

① 关于两极分化概念的讨论，参见：R. Dahl, "Some Explanations" in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380ff.; 在下面第四章它将得到进一步分析。关于对这种分裂的显著性的理解，(除了其他许多文献以外)参见：D. Cúneo, *El desencuentro argentino* (Pleamar, 1965); Floria; M. Grondona, *Argentina en el tiempo y en el mundo* (Editorial Primera Plana, 1967); A. Morello and A. Troccoli, *Argentina ahora y después* (Editorial Platense, 1967); G. Merx,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rgentina from 1870 to 1966," 未发表博士论文，耶鲁大学，1968。关于得自调查数据的证据，J. L. de Imaz, *Motivación electoral* (IDES, 1962), 以及 P. Snow, "Argentin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1966 Revolution," 爱荷华大学政治研究图书馆，1968。

② 关于经济方面的相关数据，参见后面的表21—26。

③ 有关这一时期的数据所显示的阿根廷高度的国内政治暴力的信息，参见：B. Russett et al.,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也可参见：Baily and Rotondaro。



曾决定组织工人武装。当庇隆派 1956 年的一次起义失败时，反庇隆主义的军官打破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则，命令将起义的领导人枪毙，这提高了既存的两极分化程度。

以上所述的所有这些“常量”很多仍存在于阿根廷的生活中。以“民主”的名义，庇隆派被驱逐出了政府。这意味着选举将是必要的，但“错误的”政党——庇隆主义党——控制着最大比例的有选举权的人。在这些条件下，政治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它不能成为庇隆派返回政府的方式，也不能成为实施庇隆派和劳工联合会所喜好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途径。<sup>①</sup>统治群体表面上表达的民主信仰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之间的差异，几乎是无可度量的。此外，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下面将做进一步分析）使社会结构多方面的僵化症更加显著，并产生出新型的停滞和依附。最后，不管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有多大，权势集团都决心关闭政治上激活了的城市平民群体的任何重要的政治通道。

我在这里只是努力强调从历史序列“抽出”的政治和社会常量，而并不致力于（在这里）不可能的解释它们之出现的任务。尽管在高度浓缩的描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缺陷，但讨论这些“常量”是必要的。它们指这样一些历史因素，其更直接的影响难以度量——无论是对下一节将要研究的社会过程的影响，还是对那些与 1966 年政变联系的因素（它们是本章最后一节的主题）的影响。但是，在它们决定一种持久稳固、普遍深入的“政治气候”的程度上，这些“常量”构成了广泛的参考基础，离开了它们，似乎就不可能取得对更具体的因素的理解。

本章的焦点现在转向一种更“横向”的角度：对 1955—1966 年期间社会背景的分析。该分析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这期间的社会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常量”的影响，它对 1966 年 6 月军事干涉产生了直接影响。

## 1966 年政变的社会背景

1966 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 818 美元（以 1966 年美元计）。<sup>②</sup> 1960 年参

<sup>①</sup> 这一主题在后面的第四章将得到详细得多的考察。

<sup>②</s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Latin America*, 1966.

加工会的工人数量大约是 2,600,000。<sup>①</sup>农业和工业对 GNP 的贡献分别是 16.6% 和 34.0%，而工作年龄的人口中从事农业的比例是 21.4%，从事工业的是 28.0%。<sup>②</sup>显然，阿根廷比与“欠发达的”农业“传统”社会相联系的情形要先进得多。但这些数据必须从长期缓慢增长的角度来看。<sup>③</sup>1929 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约是 700 美元（以 1960 年美元计）。<sup>④</sup>当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稍低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就生产及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而言与阿根廷极其相似的国家。而如今，澳大利亚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阿根廷的两倍。

从 1925—1929 年到 1961—1965 年，阿根廷人均增长率平均是每年 0.8%。阿莱霍德罗 (Alejandro) 对这种情形做了这样的描述：

自从 1930 年……增长率如此之小，周期性波动如此之剧烈，收入分配的摇摆如此显著，以至于极易相信，在某些年份，有几个群体的状况比他们或其父母在 1925—1929 年时的处境恶化了。而且，在一些公共服务（比如，电话、铁路、邮局、统计核算）和进口替代的工业产品方面，质量恶化以至于经过质量修正的增长率甚至更低。……尽管按时间序列的阿根廷贸易条件的可靠性令人怀疑，但它们很可能在 1925—1929 年到最近几年中间衰退了；因为这种衰退而修正增长率将进一步削减它。<sup>⑤</sup>

把庇隆时期（1946—1955 年）作为基准线，1947 年达到的人均收入直到 1965 年都没有被超越，1947 年后的年份中，人均真实工资都低于 1947 年的

① Needl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96.

②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1967.

③ 在我对经济方面的考察中，我极大地依赖于阿莱霍德罗 (Alejandro) 的杰出著作 *Essays*。其他重要的资料来源是：C. Díaz Alejandro, *Exchange Rate Devaluation in a Semi-Industrialized Country: The Experience of Argentina 1955—1961*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A. Ferrer, *La economía argentina: las etapas de su desarrollo y problemas actual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63)；G. di Tella and M. Zymmelman, *Las etapas del desarrollo argentina* (Eudeba, 1967)；J. Villanueva, *La inflación argentina*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1964; mimeo)；UN-ECLA,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la Argentina*, 5 vols. (New York, 1959; mimeo)；UN-ECLA and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CONADE),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la Argentina* (New York, 1968).

④ Alejandro, *Essays*, p. 55.

⑤ Ibid., pp. 69—70.

水准——只有 1958 年和 1965 年超过了 1947 年的水准。<sup>①</sup>这种发展停滞 (arrested development) 的特征需要更严密的考察：

(1) 当考虑 1946 年以来 GNP 时序时,可以发现,在平均的低增长率之内,剧烈的波动一年又一年地发生。如表 21 第(1)栏所示,在 1948、1949、1950、1952、1956、1959、1962、1963 以及 1966 年,人均收入标明是净损失的——有些年份数目相当大。

(2) 1946—1966 年间平均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 26.5%,但在 1955—1966 年间以及负增长的年份,更是高得出奇(见表 21 第(2)栏)。

(3) 即使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在 1961 年比 1953 年高 23%,工资占 GNP 的份额在 1952 年达到 46.9%的最高值后,下降到了 1965 年的 39.8%(见表 21 第(3)栏)。②

(4) 在 1949—1966 年间,阿根廷遭受了长期的外汇短缺(见表 21 第(4)栏),这在经济复苏的年份进一步加重。

许多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点：在阿根廷,外汇短缺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外汇短缺与其他因素紧密相关。首先,如表 22 所示,从 1925—1929 年到 1960—1964 年间,阿根廷出口的数量指数不仅在人均方面,而且在绝对量方面,都下降了,这反映了落后的农业生产率(见表 22 第(2)栏)。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国内贸易条件歧视农产品(见表 22 第(3)栏)。此外,1929 到 1955 年间全国资本净增量仅有 1.0%流到了农村部门。③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差不多庇隆政府末期,通过大力强调消费品的进口替代,阿根廷的工业“横向”扩张。但是,这些“容易”阶段的进口替代的“耗竭”,严重制约了阿根廷衰退中的出口能力。④国内的工业扩张既受到高成本和供给扭曲问题的阻碍,也受到严重的金融、技术和管理缺陷的阻碍。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以及资本品的关键性投入的需求,在出口滞缓的时候就增加了。对来自国外的资本和技术转移的需求不断增长,表明需要在建立更成熟的工业化方面——更深入的垂直整合,有更好的成本与

① 根据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Boletín Estadístico*(若干期)计算。

② UN-ECLA and CONADE, p. 193.

③ Alejandro, *Essays*, p. 75.

④ 这一主题在上面第二章中已得到详细考察(包括引用的资料来源)。

表 21 几种关键经济指标的年度测量：阿根廷，1946—1966 年

年 份	人均 GDP 年变化 (与上年百分比； 以不变比索计)		净外汇储备变化 工资占 GNP 百分比(百万现值美元)	
	(1)	(2)	(3)	(4)
庇隆政府				
1946	6.4%	17.7%	38.7%	
1947	11.9	13.5	37.3	
1948	-0.7	13.1	40.6	
1949	-6.5	31.1	45.7	-269
1950	-0.3	25.5	45.9	166
1951	2.1	36.7	43.0	-333
1952	-8.2	38.7	46.9	-173
1953	5.1	4.0	44.8	279
1954	1.9	3.8	45.6	-33
1955	5.0	12.3	43.0	-175
1955—1966 时期				
1956	-0.2	13.4	42.6	-19
1957	3.6	24.7	41.4	-60
1958	5.3	31.6	43.3	-217
1959	-7.7	113.7	37.8	113
1960	6.1	27.3	38.4	161
1961	5.1	13.5	39.9	-57
1962	-3.7	28.1	39.1	-234
1963	-5.5	24.1	39.1	202
1964	6.2	22.1	38.2	-11
1965	6.7	28.6	39.1	139
1966	-2.4	32.3	39.8	53

资料来源：第(1)栏：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Origen del producto y composición del gasto nacional*; *Suplemento del Boletín Estadístico*, n. 6 (Buenos Aires, 1966), p. 18, 以及 Alejandro, *Essays*, p. 352; 第(2)栏：Alejandro, *Essays*, p. 528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成本); 第(3)栏：UN-ECLA and CONADE,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la Argentina* (New York, 1968), p. 164; 第(4)栏：Alejandro, *Essays*, p. 353。

表 22 阿根廷经济指数：1925—1964 年

年 份	阿根廷商品出口 的数量指数		国内贸易条件
	(1951—1954: 100)	农业生产指数 (1960: 100)	(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比) (1935—1939: 100)
	(1)	(2)	(3)
1925—1929	179	—	100(1935—1939)
1930—1939	167	—	72(1940—1945)
1940—1944	135	86	77(1945—1949)
1945—1949	133	85	83(1950—1955)
1950—1954	106	87	93(1956—1958)
1955—1959	124	99	96(1959—1961)
1960—1964	160	102	103(1962—1964)

资料来源：第(1)栏：Alejandro, *Essays*, p. 76; 第(2)栏：Banco Central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p. 36; 第(3)栏：Alejandro, *Essays*, p. 89。

供给结构——有重大进展(同时也表明面临的巨大困难)。此外,国内资本品制造的增加几乎完全处于相对简单装备的层次上,而阿根廷的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较复杂装备的需求。每年平均的机器设备进口在 1951—1955 年间是 1 亿 9800 万美元,在 1956—1960 年间是 3 亿 5200 万美元,在 1961—1965 年间是 4 亿 9800 万美元。<sup>①</sup>阿莱霍德罗所做的一个评论巧妙地概括了这种情形:阿根廷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是 2.6,这意味着,如果国民收入增长 1 个单位,它就创造出 2.6 单位进口商品的需求;因此,国家的外汇处境就因正增长率而恶化。<sup>②</sup>

所引用的这些因素的效应——特别是增长的年份对阿根廷外汇状况的压力——导致了比索巨大贬值,这通常与旨在限制国内需求和淘汰“边缘性”工业厂商的计划联系在一起。通过使进口货和可出口的农产品更昂贵,贬值助长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国内政策效应极大地减少了产出和需求。从表 21 可以看出,负增长的年份通常也是较高通货膨胀和逆向收入再分配的年份。比索贬值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国内需求和收入转移,提高短期可

<sup>①</sup> 根据 Dirección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s y Censos, *Boletín Estadístico* (若干期)以及 Alejandro, *Essays* 的统计附录计算。

<sup>②</sup> 同上, p. 356。

实现的出口,并在长期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些效应被认为可通过改善国内的农业贸易条件以及农村可出口商品的美元价值而产生。但是这些政策意味着城市—工业部门严重的收入损失,这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它是1955—1966年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sup>①</sup>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收入分配的强烈波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和 CONADE 的一项研究说:

这些贬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生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相对价格向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变化——它由城市部门向农业部门(或更确切地说,农业生产者)的部门间收入变化构成——时,横向分配就发生了。但因为贬值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与限制工资或增加失业的政策相联系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横向再分配被转化成了纵向再分配。这意味着,归根结底,(由贬值所产生的)主要的收入变化对城市工人有害,而对农业生产者有利,同时,只是在贬值的效应比工资(限制)政策的效应更强的时候,城市企业家的相对位置才受到损害。<sup>②</sup>

简而言之,贬值使农业部门受益,但当通货膨胀持续而没有新的贬值发生时,城市部门(然而“它的”那部分是在工人和企业家之间分配的)就收回了它的损失。在某一点上,贬值的效应被取消了,甚至被倒转过来了,国内的经济活动又增加了,新的外汇危机产生了,并且新的贬值被制造出来。1958—1965年间阿根廷几个部门收入转移的数量可见表 23。

这种动荡的经济形势的政治后果怎么说都不夸张,特别是在一个低水平的政治合法性和高度的大众不满的环境中。要记住,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在负增长年份进一步加重)与巨大的货币贬值和缓慢或无增长的结合,意味着保持相同水平的货币收入,就是承受了巨大的真实收入损失。因此,所有群体的收益都是极其不稳定的,经济停滞产生的零和局势提高了冲突的危险。

---

<sup>①</sup> 对经济政策的这些及相关方面的分析,可见于: A. Ferrer et al., *Los planes de estabilización en la Argentina* (Paidós, 1969)。

<sup>②</sup> UN-ECLA and CONADE, p. 264; 笔者译自西班牙文。



表 23 以每个部门的收入分享百分比表示的部门间收入变化：1958—1965 年

部 门	各部门绝对变化 的平均值	各部门每年 正变差最大值	各部门每年 负变差最大值
农村			
农业	12.1%	34.8%	-20.8%
城市			
工业	4.8	10.1	-8.5
建筑	7.8	37.5	-11.1
商业	6.2	7.8	-22.0
运输和交通	4.4	12.7	-6.7
一般行政	8.1	14.3	-17.0
电、气、水	10.1	37.5	-20.0

资料来源：UN-ECLA and CONADE, p. 217.

在做任何进一步的分析之前，让我们看一下一些比较离散的数据。前已指出，1965 年的真实工资收入与 1945 年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如表 21 所示，工薪在 GNP 中的份额在 1955—1966 年期间下降了。这一明显的不一致在比较离散的数据的层次上消失了。首先，周期性的取消“边缘性”工业厂商的努力，与对更加资本密集的技术的引入相结合<sup>①</sup>，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sup>②</sup>，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因为真实工资数据反映的只是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的收入，所以它们仅给出了平民群体收入位置的局部图景。其次，在那些有工作的人中，得到良好组织的工人与那些属于不太有活力的经济部门的、缺乏为了得到对其经济需求的满足而必要的组织程度的工人的真实收入位置有巨大差异。

表 24 的数据来源对工薪收入者并不做区分，但人口调查数据表明，“工业和采矿业”及“建筑业”类有一大部分是由蓝领工人构成的。“商业和金融”类主要是由白领工人构成的，而“服务业”（它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是一个极为混

① J. M. Katz, “Características estructurales del crecimiento industrial argentino,” *Desarrollo Economico*, VII, No. 26 (1967). 关于这些变化的社会—政治后果的一项杰出探索可见于：Cardoso and Faletto, pp. 130ff.

② 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参见：UN-ECLA and CONADE, pp. 123, 193ff., 以及 1965—1969 年和 1970—1974 年的“Planes de Desarrollo”的“导言”（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1965 and 1970）。

合的种类。重要的是要注意，在产业工人过得相对好的时候，其他蓝领工人和显然大多数白领职工却不然。这种境况无疑解释了1955—1966年期间那些较后来的群体所表现出的不满、他们最初支持军政府的积极意愿以及他们对“法律和秩序”诉求的积极响应的原因。然而，不管他们生活过得多么恶劣，非工业工人都比那些甚至不太有能力对全国性政府施加有效压力的群体做得更好。如表24所示，领取年金的人与靠股息生活的人尤其是严重受损者。<sup>①</sup>

表24 若干年份阿根廷家庭平均的真实收入\* (以1953年数据为100)

	1946	1949	1953	1959	1961	1965
工薪收入者						
工业和采矿	88	119	100	90	115	146
建筑业	106	137	100	98	108	118
运输和交通	106	128	100	95	106	110
商业和金融	85	111	100	94	111	112
服务业	84	113	100	91	103	109
企业家						
农业	111	82	100	143	89	117
工业、采矿和建筑业	115	148	100	124	135	143
商业	162	175	100	161	169	155
运输	86	104	100	150	143	170
服务业	109	132	100	98	105	109
领取社会保障年金者	105	130	100	79	96	97
靠股息生活的人	150	122	100	56	49	39
合计	103	116	100	108	112	124

资料来源：UN-ECLA and CONADE, p. 130。

\*最大真实收入的年份用斜体字。

换句话说，在全国层次上的这个经济“博弈”无疑是零和的，较好地组织起来的（以及或许在短期内经济上更必需的）城市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等群体能够以其他组织涣散、政治上比较软弱的群体和地区为代价提高

<sup>①</sup> 与这个一般的观点所一致，许多内陆地区也没有能力对全国性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它们也是严重受损者（参见：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Introduccion”[1970]）。

他们的真实收入份额。

作为一个机构的政府是另一个受损者。就政府资源(决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人力和经济手段总和)而言,在1955—1966年期间持续恶化了。用拉斯韦尔的术语来说,低劣的政府绩效和减少了的资源导致了严重的“权力耗散”(dis-accumulation),这妨碍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sup>①</sup>这种削弱的能力反映了总的社会形势,也对社会形势的恶化和最终1966年的崩溃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55年全国性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到了GNP的13.2%,而在1960年降至11.9%,1965年降至10.9%。社会保障系统的收入在同一年份分别占GNP的5.0%、3.5%和4.8%。<sup>②</sup>(政府收入的恶化可在表25中清楚看出,表中包括了其他国家的可比较数据。)个人收入税的大幅下降(见表26)部分由间接税征收的增加所补偿了,但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递减的。政府收入的下降产生了巨大的(以及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这与货币供给的高通货膨胀性增加相叠加。<sup>③</sup>分配给公共建设工程的政府支出比例由1955—1959年期间占全国财政20.9%降至1960年的14.5%。<sup>④</sup>一个部分重合的种类——公共资本投资——在1960—1965年期间比在1955—1960年期间少了8.6%。<sup>⑤</sup>尽管数据不完全,但政府雇员的真实工资极可能在这一时期下降了,1964—1966年期间局部回升,但从没有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持续的政治危机导致了内阁成员和高级公务员的连续轮换<sup>⑥</sup>,在极个别可用生产率衡量的政治活动中,下降

① 参见: Lasswell, "The Policy Sciences".

② 根据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1965) 计算。关于就这一主题的有用数据和分析,参见: O. Ozlak, "Inflación y política fiscal en la Argentina: El impuesto a los réditos en el período 1956—1965,"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n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Documento de Trabajo* (1970)。

③ 有关这一观点的数据,参见: Oficina de Estudios para la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Internacional, *Argentina económica y financiera* (FIAT, 1966), p. 366。

④ 同上, p. 351。

⑤ UN-ECLA and CONADE.

⑥ 参见: E. Kenworthy, "Coalition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S. Groennings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oalition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是明显的。<sup>①</sup>

表 25 阿根廷和若干其他国家税收数据

	工作年龄的人口提出 收入税申报的百分比	申报进行税收估价的收入 占个人总收入的百分比
阿根廷		
1953	10%	18%
1959	9	10
1961	5	9
其他国家		
美国(1950)	89	77
英国(1952—1953)	90	80
澳大利亚(1958—1959)	80	68

资料来源：UN-ECL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IX, 1(April 1966)。

总的过程可概述如下：货币贬值使农业生产者受益，其成本由城市部门“支付”。这种形势被通货膨胀和发生于两次货币贬值之间的经济再激活所逆转。在城市部门内部发生了另一个有关收益和损失在不同的企业家和工人类别之间分配的“博弈”：一些得到良好组织的类别所强占的收益是由其他组织程度不高的群体和地区所“支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任何人平均每年损失其真实收入的四分之一。<sup>②</sup>从这种形势发展出了“抓住时机的(catching-up)博弈”，其中只有少数群体能够影响公共政策以使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收入份额分配中处于前列。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强大的群体”是能够通过确保实施有利的政府政策来维护或提高(没有严重的滞后)其真实收入位置的群体，比如城市和农村企业家或产业工人。(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政府都不能被认为是“强大的”。)

<sup>①</sup> 参见：Oficina de Estudios, pp. 351ff.

<sup>②</sup> 这种情形可被描述为一种“流动的稀缺性”。它无疑不同于比较“传统”或比较“发达”社会中的稀缺性——在这些社会中收入份额(虽然是由于不同的机制)在短期内更加稳定。流动稀缺性的政治相关性不可能类似于经济物品较稳定分配的政治相关性。(关于阿根廷政治的这一方面的一项饶有趣味的考察，可见于 Merx, “Politics”。)

表 26 阿根廷直接税占政府总收入的百分比：1946—1964 年

庇隆政府	
1946	38.5%
1947	46.3
1948	49.8
1949	46.9
1950	47.3
1951	43.0
1952	47.3
1953	45.0
1954	41.7
1955	41.8
1956—1964 年期间	
1956	34.1
1957	37.9
1958	39.3
1959	29.1
1960	32.8
1961	33.0
1962	30.6
1963	30.6
1964	28.3

资料来源：Panorama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No. 3, 1967.

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定能使群体获得权力的策略。首先，因为通货膨胀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发展，所以一个试图抓住时机的群体必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其次，对于使“抓住时机”成为可能的政策的需求，其焦点不在于诸如议会、政治党派、省政府之类的机构，它们至多在重新分配经济资源中发挥边缘性的作用。这些需求集中于总统职位，这使得其他政治机构越来越不可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第三，对总统职位的集中关注提高了接近渠道的重要性——它们使行动者能够对总统行使“权力”<sup>①</sup>。这样，军队

<sup>①</sup> 这儿在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所界定的意义上(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使用这一术语——施加严重剥夺的能力。

就成了满足部门需求的最有效的渠道；文官集团寻求影响能对总统职位行使权力的军队帮派。这使军队分裂，并且自然地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大量且变化中的需求通过军队帮派传递。

通过军队传递需求包含一种对被驱逐的政府的十分真实的威胁。<sup>①</sup>这种危险在无数的 *planteos* (军队以如果他们受到政府拒绝就将使用武力的威胁为支持提出的要求) 中，以及在 1955—1966 年期间的许多政变和未遂政变中，都显而易见。那些能够诱致军队的政变威胁的群体在玩“抓住时机的博弈”中具有明确的优势。这些诱致因素能通过直接的进入获得，就像城市和农村企业家的情况那样。对于较好地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来说，间接的策略能够产生相同的结果。通过煽动社会动乱，以及通过罢工和占据工厂使生产瘫痪，他们能使政府显得没有能力保持最低程度的法律和秩序，并因此将其置于被驱逐的直接危险之下。就是说，这种情形有利于那些较好组织起来的工人和较富有的联盟，他们能以持续不断的破坏威胁政府。（这反映在上面的表 24 的收入数字中。）

应当记住，这一时期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而且存在着一般性的政治不满。在这些条件下，威胁是十分真实的，任何重视执政延续的政府都不能忽视它们。因此，政府倾向于采纳最能取悦于在某个时期最具威胁性的群体的无论什么样的政策。但是零和的状况意味着每一个这样的政策决定都增加了来自其他强有力群体的新威胁。频繁的政策变动源自每一项安抚一个群体的政府决定及每一项这样的决定所产生的新威胁。（前面数表中的波动反映了这种模式。）

由此而导致的情形被亨廷顿的群众普力夺主义很好地描述。<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政治目的是控制能有效威胁政府生存的方式，被设计出来尽可能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政治机构很难生存。而且，在这种情况

---

① 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认为在拉美政治中威胁能力是一种重要资产(*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7], 第二章)。同样，可参阅肯沃西(Kenworthy)在“Coalition”和“The Formation”中对阿根廷政治中“双重货币”(选票和对暴力手段的控制)饶有趣味的讨论。

② 参见：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特别是第 192—237 页。关于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讨论，参阅前面的第二章。



下，“威胁”策略盛行，对一个群体来说实现其需求的最有效方式是比其他群体更具威胁性。因此，存在着增强威胁程度的倾向。对每个群体来说唯一有效的策略是根据实际的而不是制度上规定的规则来“玩游戏”。否则，一个“理想主义的”群体会在斗争中输得很惨，由于滞胀，斗争中的风险非常高。一个动态的过程开始了，它很难停止：普力夺主义引起更多的普力夺主义，直至达到制度崩溃的条件。

与这一趋势相似的是，社会分化的变迁路径引致了进一步的复杂化。特别是，新出现的产业之间的分裂（第二章作了分析）破坏了工业企业家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裂对城市工人有相似的影响：他们分化成了显性失业者和工作于具有变化着的活力和金融力量的工业部门的各种类别的就业者。这种社会分化赋予阿根廷政治以典型的高现代化程度上群众普力夺主义的特征。有产群体赞同关闭平民群体的政治进入渠道以及拒绝平民政策需求的必要性。这主要通过对选举舞台的严厉限制来实现。<sup>①</sup>城市群体联合起来促进他们与农业群体相对立的共同利益，同时，城市社会结构内部的分化创造了同一城市亚部门中企业家与工人变动不居的联盟，他们对其他城市亚部门充满敌对。<sup>②</sup>

高现代化程度上的普力夺政治在两个方面变得十分复杂。首先，社会分化导致了更多高度激活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同时在几个层面上以对政府的威胁为基础进行“抓住时机的博弈”。其次，高风险收益与弱约束的结合意味着正式规定的类型成了实际政治行为的十分微不足道的指示器。本章前面界定的“常量”的影响造成了令人怀疑的合法性的初始条件、高度的大众不满以及权势群体强烈的僵化性。庇隆主义时期加速了社会分化和完全超出社会整合与社会成就的政治需求。发展瓶颈减少了可能的报酬，使得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竞争成为零和博弈。在这些条件下，除了更具威胁的政治行动者所要求的以外，政府人员几乎没有机会做出有效的决策并实施政策。政府的持续恶化加剧了社会局势的恶化。在“抓住时机的博弈”中，大多数政治行动者和

① 这一方面在后面第四章中将得到详细分析。

② 参见：M. Mamalakis, “The Theory of Sectoral Clashes”, *Th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IV, No. 3 (1969), 以及 G. Merx, “Sectoral Clashe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Argentine Experience”, 同一期杂志。

群体不择手段地使用任何最有效的策略来追求极其重要的目标——至少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不幸的是，对个体行动者来说最有效的策略也是对整个社会绩效最有破坏性的策略。每个行动者都陷入了一种局势，他不能试图通过他自己的行动改变它而不承受严重的损失，他被迫按照导致社会环境甚至更进一步恶化的方式行事，而他的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环境的恶化。给定特定的历史遗产、零和的状态以及社会冲突的剧烈性，那么这就是十分不可能的：这些行动者能在他们自己中间取得可将他们的竞争引向破坏性较小的类型的一致意见。这本可通过政府行动来实现，但政府低水平的合法性和有限的资源，阻止了政府朝这个方向的任何严肃的努力。在他们以其可支配的最有效的方式追求重要目标的意义上，政治行动者是理性的。但是在建立有效政治机构的努力已经失败且群众普力夺主义已经产生的环境中，甚至对个人来说理性的行为也能导致重大的体制危机。这是政治理论自始就在考虑的经典问题，但只是在高度现代化的情形下，它作为一个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似乎才是最大的。

这种情形产生的持续危机使大多数个人和部门的收益消失了，但因为个人或部门没有办法改变制度参数（特定的“博弈规则”），所以唯一的做法就是继续沿着相同的路线，在每种情况下都希望社会恶化能被最小化。慢慢地另一种做法的可能性出现了。在他们玩了一段时间的“输家的博弈”之后，这对大多数行动者变得显而易见：他们大多数人持续受损而少数人获益——但只不过他们收益的绝大部分随后很快被取消。一旦这一点被认识到，这种局势的规定性因素就受到广泛的质疑。最终的结论是：“博弈规则”应当被改变，而且，不能按照有利于参与者的方式来引导博弈的政治机构也应当被改变。当这一估计变得普遍时，就达到了可称之为“最高共识”的程度，大多数群体赞同政治体制应当被改变而且新的竞争规则应当被建立。当然，这样的“一致”在以下这一点上受到严格的局限：对于新规则应当是什么，行动者们的分歧与以往一样多。鉴于以前的群众普力夺主义的历史，这就是可能的：在政治体制变化时，将会出现在获取政府权力中取胜的联盟对新“规则”威权主义式的强加。

“最高共识”消除了仍然存在的对既存政治体制微不足道的支持——它未能以一种本应产生政治忠诚并提高社会绩效的方式克服普力夺主义。从

那一刻起,就只是一个获胜联盟从最高共识所代表的政治行动者集合中出现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sup>①</sup>关于这就是阿根廷的实际情况的一个强有力的标志是,大多数有组织的群体对 1966 年政变广泛的初始支持。

政治意见和态度。观察者发现阿根廷政治中有许多“悖论”。例如,卡尔曼·西尔弗特(Kalman Silvert)发现了以下的“矛盾”态度:(1)“零和心理”和“缺乏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2)“如下几乎普遍的观点:不存在能对几乎所有人有利的公共措施”;(3)“忠诚范围的狭隘性……[与]未能接受国家为世俗纷争的最终仲裁者。”<sup>②</sup>我将论证指出,虽然西尔弗特对这些态度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这些态度是“矛盾的”,却并不正确。从阿根廷相对高的发展程度(用没有考虑到前面分析过的环境和过程的静态标准来衡量)的观点来看,它们可能是“矛盾的”,但是给定它们从中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些态度就几乎不值得奇怪。

调查数据(不幸有所欠缺)对西尔弗特的理解提供了支持。在 1966 年政变前历时三个月的一次全国性的代表性抽样(除了人口稀少的巴塔哥尼亚各州)调查中<sup>③</sup>,受访者被问及阿尔蒙德和维巴(Verba)在《公民文化》中使用过的几个问题。<sup>④</sup>表 27 显示,政治激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意识(它反映了阿根廷受访者所感觉到的政府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测量值非常高。只有 20%的受访者宣称他们自己是某一政治党派的支持者;54%的人甚至不“偏向”任何政党。<sup>⑤</sup>另一项在 1966 年政变之前很短时间所做的调查中,对于问题“你认为阿根廷政治需要新人吗?”,83%回答“是”,只有 4%回答“不”。<sup>⑥</sup>在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的调查中,42%的人赞同以下说法:“少

① 当然,联盟形成的类型决不是随机的。在第二章中我们考察了产生共识——它建立在从政治上将平民群体排除在外的基础上——的因素。

② “Liderazgo político y debilidad institucional en la Argen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1, No. 3 (1963). (此外载于 Silvert, *The Conflict Society: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66].)

③ Kirkpatrick.

④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⑤ 关于其他类似的数据,参见: Snow, “Argentine Political Parties”。

⑥ 盖洛普(Gallup)调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样本( $n=1,000$ );载 *Polls* (1967), pp. 21—31.

数领袖为国家所做的应不只限于所有的法律和讲话。”<sup>①</sup>相同比例的人表达了这一信念：政府是由根本不关心人民需要的有权势的人们和集团控制的——这是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见表 28 所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被认为最有权势的群体是最少“可被接受的”群体——71.6%的受访者不愿支持一个军队支持的政党,58.4%的受访者不愿支持一个教会支持的政党,89.7%的受访者不愿支持一个地产所有者支持的政党。<sup>②</sup>

表 27 若干国家的认为全国性政府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受访者百分比

美国	41%
德国	38
英国	33
意大利	23
墨西哥	7
阿根廷	41
上层阶级( $n=157$ )	52.2
中产阶级( $n=960$ )	40.3
低层阶级( $n=721$ )	39.9

资料来源：阿根廷：Kirkpatrick；全国样本： $n=2000$ ；其他国家，Almond and Verba。

表 28 对问题“谁对政府有最大影响力？”的回答的百分比

军队	33.8%
教会	14.6
地主	10.0
庇隆派	8.3
工会	8.3
企业家	4.5
其他及不知道	20.5

资料来源：Kirkpatrick；全国样本： $n=2,000$ 。

<sup>①</sup> 斯诺(Snow)介绍了 1966 年政变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做的一次调查,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对“我们有太多的宣言和政治计划;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领导我们的强人!”这一说法完全同意,另有 23%的受访者或多或少表示同意,只有 17%的人完全不同意(“Argentine,” p. 42)。

<sup>②</sup> Kirkpatrick.

正如这些数据所显示的,经济考虑显然是最显著的。表 29 中所介绍的对“你认为什么是这个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显著性。

表 29 对关于阿根廷最重要的问题的提问之回答的百分比

问 题	收 入 群 体			
	全部	低	中	高
<b>社会-经济考虑</b>				
高生活成本	35%	32%	38%	10%
通货膨胀、总的经济形势	27	22	27	60
住房短缺	7	6	7	10
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	7	8	7	4
工资(低、不足)	3	5	2	—
养老金	3	5	2	—
失业	7	12	4	—
<b>政治考虑</b>				
坏政府、政治中的腐败	7	8	7	4
工会、公司问题	2	1	2	6
<b>其 他</b>				
其他回答	3	3	2	17
没有问题	2	2	2	—
不知道;没有回答	8	9	8	2

资料来源:盖洛普调查,《民意调查》(Polls);允许可扩展问题、多项答案;n=1000,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样本。

表 29 所介绍的各种考虑与政治民意之间的关联性被对一个问题(问受访者是否愿意支持一个“许诺将腐败和无效率清除出政府”的政党)96%的肯定回答,以及对“你认为哪个阶级从伊利亚总统的政府中获益最大——劳工、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这个问题的回答(见表 30 所示)所证实。如果把表 30 中那些显示受访者自己的群体加上“所有人”受益于伊利亚政府的回答看作是“赞成的”,那么,只有不到 15%的中低收入的受访者表达了赞成的观点。甚至高收入的受访者也远不及所预期的那样满意。(请注意,在高收入的受访者中回答“没有人”的急剧上升。)

表 30 对问题“谁从伊利亚政府获益最多?”的回答的百分比

	所有受访者(n=1000)	收 入 群 体		
		低	中	高
劳工	3%	4%	2%	4%
中产阶级	6	4	8	4
上层阶级	53	63	50	27
全部、每个人	7	5	7	15
没有人	17	9	19	35
不知道	14	16	13	14

资料来源：盖洛普调查，《民意调查》(Polls); n=1000,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样本。

在经济形势方面，存在着对零和状况的广泛认知。显而易见的是，关于阿根廷经济“维持原样”的预测是一种悲观的看法。表 32 中介绍的回答正确地显示了对政府处理重要问题的效率的认知状况。

表 28—32 中的数据反映了政治上有见识的人群对政府无效率的意识，对政治党派的怀疑，在他们群体间认知中充满敌意，对国家“蛋糕”的“零和”特征的认识。一大部分赞同“让无赖滚蛋”以及需要一个“强人”的诉求的人，即使在受到不受欢迎的群体威胁的时候，也表示了十分弱的对既存政治体制存续的信誓。即使军队是不受欢迎的，在 1966 年军事接管的道路也铺平了，它不会遇到平民群体的抵抗。

表 31 对问题“你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在接下来数月将改善、维持原样或恶化?”的回答的百分比

改善	24%
维持原样	19
恶化	48
不知道	9

资料来源：Kirkpatrick; n=2,000, 全国样本。

不幸的是，针对其他社会阶层的访谈资料几乎完全缺乏。除了企业家以外，没有关于精英的政治意见和态度的访谈资料。<sup>①</sup>毫不奇怪，企业家表现出对劳工及其领袖的敌视，对劳工最终可能获得政治权力的恐惧，以及对“法律

① 关于阿根廷精英的最佳研究(de Imaz, *Los que mandan*)没有任何访谈资料。



和秩序”诉求的接受性。<sup>①</sup>政府被他们看作是官样文章和无效率的典型,而且主要的商业组织都公开欢迎驱逐庇隆(1955)、弗朗迪西(Fronzizi)(1962)和伊利亚(1966)总统。

表 32 对关于政府绩效的问题的回答的百分比

对问题“你认为政府将能控制通货膨胀吗?”	
是	20%
否	67
没有看法	13
对问题“据政府所说,最近批准的价格上涨将提高生活成本仅仅大约 2%。你认为这是正确的还是将提高更多?”	
正确	4%
更多	86
没有看法	10

资料来源:盖洛普调查,《民意调查》(Polls);n=1000,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样本。

本章前已指出,对工会政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庇隆主义。1955—1966年期间的诸事件几乎不能激发工会对政府的忠诚,工会和庇隆派领袖第一次与更有权势的群体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且怀着不同的期望),对1966年政变表示欢迎。<sup>②</sup>

关于收入微薄、人事臃肿的政府官僚体系,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低工资、对恩惠的普遍滥用以及民政服务的欠缺,阻止了公共服务的出现,而公共服务本可在危机之中维持一个相当高程度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性散布的因素应当被提及,它为各个群体的不同态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与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形成对比,当代阿根廷缺乏一种“上升”的信念,即这样一种认识:现在不管有什么不足,都比往昔的东西更好、更有希望。阿根廷的历史和文学,以及更一般的知识氛围都弥漫着对失去的机会以及对那些当时国家被认为好于现在时期的回忆(或

<sup>①</sup> 参见: S. Cúneo, *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 (Editorial Pleamar, 1967); Freels, *El sector industrial*; 以及 Cardoso, *Ideologías*.

<sup>②</sup> 例如,参阅工会和庇隆派领袖关于政变的热情评论,见: *La Prensa*, 1966年6月29日和30日。很快,对这些领袖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评论只不过表达了一种“最高共识”和某种相当不现实的希望——希望他们在军政府下有更大的参与渠道。

想象)。也存在着普遍的寻求历史谴责的现象——谴责那些行动者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对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场失败的历史的责任应归之于他们。甚至今天,19世纪中央统一派和联邦派之间的斗争也被痛苦地回忆。未能实现一个更加适意的社会环境,导致了愤世嫉俗的信念——政治和群体竞争发生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中。对阿根廷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来说,这一观点都为前面部分所描述的问题所进一步确认,而且,他们关于政治和社会形势不得不说的话,使得1966年前政治体制的最终崩溃甚至更为可能。

部分由于语言的线性特征,我所能提供的仅是对1966年前阿根廷政治史、社会-经济背景和态度维度之间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十分有限的解释,但所提出的应当足以显示总的框架,在该框架内,那些与1966年政变直接相关的因素应当得到考察。

## 1966年政变

正如一位阿根廷社会学家曾经评论的,时不时地“阿根廷的政客们都跑去‘敲军营的大门’”<sup>①</sup>。在推翻庇隆(1955)至1962年期间,武装部队是由“大猩猩派”(gorila)<sup>②</sup>军官控制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由不同的大猩猩帮派轮流进行控制,这反映了阿根廷政治的高度分裂状态。这种环境产生了武装部队内部变动性的结盟和剧烈的内部冲突。在军队内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研究内部结盟及它们的起源、它们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联系、它们的政治后果,就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把军队当作一个受制于各种诱惑的“政治行动者”来考察,但是,要以一些特殊方式来“处理”它们,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军队组织相联系的诸多因素。这意味着要看公共声明的“背后”,并洞察经验研究实际上无法达到的组织细节。我不能声称在该主题上比其他研究者有任何重要的优势,但是在我1955—1966年期间与主要军官进行的非

① De Imaz, *Los que Mandan*, p. 84.

② 浑号大猩猩派是对这些军官强烈的反庇隆主义观点的一种贬损性暗示。

正式访谈和公开出版的证据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初步分析。<sup>①</sup>

在驱逐庇隆这个无疑是多数派独裁者的过程中,军队诉诸恢复和保存政治民主的必要性。随后,他们反庇隆主义的立场被严重的社会动乱的环境、冷战和古巴革命的影响极大地加强。庇隆主义的工会和军队成了剧烈社会冲突中的对立力量。文官政府的不良绩效在大猩猩派军官中产生了很大不满。陆军参谋长蒙特罗(Toranzo Montero)将军说,军队是“使共和主义生活方式免受任何激进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害的保护者”,而且,由于“文官政府的失败”,军队最终对解决由庇隆主义和“颠覆”所“引起”的问题,以及对“恢复国家统一和公共秩序的价值”负责。<sup>②</sup>这个关于“基本价值”之监护人角色的假设,为一长串依靠武力的威胁性要求(planteos)和政变敞开了大门,特别是在弗朗迪西总统1958年通过与庇隆的一项选举“盟约”而上台之后。军队对它自己作用的界定,使它成为其有权保护的“基本价值”内容的解释者,以及关

① 在对“发展中”国家军民关系的研究中,压倒性的趋势是赋予军队诸组态度和高决策能力集合——这些引起了从表面价值来制定军队的组织计划和有关其精神特质的公共声明。军队于是被赋予一种重要的发展作用,并且,那些认为军队是“发展中”社会里唯一能够行使有效政府权力的集团的主张得到了“解释”。这一方法应用于拉美国家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在下书中: John Johnson,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但是,正如罗伯特·普赖斯(Robert Price)在对该文献的一篇极佳批评中所说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些分析(“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Military Rule in New States,” *World Politics*, XXIII, No. 3[1971])。与这种方法相反,有几位作者已指出(我认为是正确的),军队的政治行为只能从其所处的社会的特征来理解。他们进一步指出(我也认为是正确的),现代化背景中的中产阶级有极为不同的目标——扩张或收缩它对政治体制的参与,这取决于它是仍在为其自身的政治融入而奋斗,还是已经实现了政治融入。这些中产阶级态度与军队行为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存在的,因为军官绝大多数来源于中产阶级。对这种解释最重要的陈述是: José Nun, “The Middle Class”;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Needl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以及 E. Nordlinger, “Soldiers in Mufti: The Impact of Military Rule upo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Non-Wester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IV, No. 4 (1970)。然而……根据这种解释套路,军队的政治行为(特别是他们的干预目标)完全取决于社会性层面的变量。我希望表明,尽管这些变量十分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消除考虑军队层面组织中经验性(与表面价值的归因相反)变化的必要性。这些后一方面的“干预”变量作为社会性层面变量的影响中介,由于它们的差异而可能导致军队中相当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按照这些术语讨论该问题,但我正在提出的这个两层面焦点在史迪潘(Stepan)的 *The Military* 一书中已被富有成效地应用于巴西的情形。关于在阿根廷的情形中,军队行为所提出的理论和经验问题的详细研究,参见: G. O’Donnell, “Modernización y golpes militares: Teoría, comparaciones y el caso argentino,” *Desarrollo Económico*, 1972年11—12月。(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将发表于: D. Apter and M. Barrera, eds., *Embourgeoisement and Radic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即出。)

② *La Prensa*, 1959年4月7日。

于“基本价值”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威胁的解释者——这为禁止庇隆主义党和被怀疑是其外围的政治党派敞开了道路。因为可能争辩认为这些“基本价值”在实践中包含在所有政府决策之中，所以军队就成了最有影响的渠道，不同的群体可通过它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政府的满足。这样，军队变成了阿根廷社会所有反庇隆主义群体的一种反映。直接卷入党派和部门性问题，摧毁了垂直的军队权威类型，导致了无数的内部叛乱，并缩短了许多军官的职业生涯。

在口头上保持效忠于“民主”的同时支持传统政治党派，大猩猩派军官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以往的困境之中：“正确的”政党和候选人不能赢得公正的选举。<sup>①</sup>在他们1962年驱逐弗朗迪西总统时，大猩猩派军官使这一点昭然若揭：他们意图建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他们认为这是在阿根廷恢复“秩序和真正的民主”所必需的。但是在陆军和空军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许多军官对直接政治卷入所导致的高度分裂对职业生涯和军事组织的有害影响，表示抗议。他们提出，军人应当撤出政治“回到他们的特殊职责”。回顾过去，这很清楚是一个主张组织生存的观点。<sup>②</sup>中止直接的政治卷入将必然意味着否决大猩猩派的取缔政治党派和选举的计划。主张组织生存和职业保全的观点在军队内部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此外，它的“回到军营中去”的含义激起了许多为大猩猩派专制统治的前景所恐慌的文官群体的迅速支持。军队内部的冲突被认为是专制的大猩猩派军官与较民主的职业化军官之间的冲突。<sup>③</sup>这些帮派交锋了两次（1962年9月和1963年4月），以立法派（legalista）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在短暂的冲突时期，立法派发表了有影响的公报，声明他们是在为民主、为一个职业化的非政治化的军队、为人民“一视同仁”的投票权利（这必然意味着取消对庇隆主义党的选举限制）而战斗。但是在他们胜利之后，立法派发现，即使他们在职业化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关于是否

① 关于这个主题的进一步分析请参阅后面的第四章。

② 有几位作者已强调了这个问题；参见：M. Needler, *Generals vs. Presidents: Neomilitar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 107ff. 一位阿根廷作者萨拉维亚(J. M. Saravia)也论证说，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考虑——而不是民主忠诚——是决定立法派军官行动的主要因素。这种解释出现于在这些事件期间（直至今日）最有影响力的军官之一为萨拉维亚的书所写的序言中（*Hacia la salida* [Emecé, 1968]；A. López Aufranc 将军所写的序言）。

③ 后者被授以显然是正面含义的立法派的命名。

允许庇隆主义党参加(且极有可能取胜)下次选举的问题上,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分裂。在经过一些内部争论之后,认为“极权主义政党不能被授予民主的益处”的观点占了上风——就是说,选举舞台仍旧对庇隆主义党关闭。立法派主持了1963年混乱的总统选举,旧激进党候选人伊利亚以不到总投票数四分之一的票数当选。<sup>①</sup>

在立法派1963年赢得对军队的控制之后,发生了重要的组织变化。大猩猩派的大本营——海军——被彻底击败,陆军建立了对海军和弱小的空军的完全霸权。在陆军参谋长翁加尼亚强硬领导及许多美国顾问团的帮助之下,军队得以重建垂直权威并大张旗鼓地培养职业化。这造就了较常规性的权威和职业模式的恢复,造就了组织能力的提高,造就了新的既强调学习现代技术又强调研究“当代问题”的军事训练模式,造就了美国和法国“反颠覆”及“公民行动”学说的稳固传播,造就了与政治党派人员私人联系的明显下降,造就了与那些我称之为“技术官僚角色的任职者”的人之间私人联系的相应增加。<sup>②</sup>由此产生的军队内部的成就感与本章前面描述过的总的社会形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军队内部对分裂状态的高组织成本记忆犹新,这使其决心避免可能有重新引致分裂风险的局势。其结果是,新的军事领导层公开拒绝依靠武力提出威胁性要求以及进行一般而言的群体需求传递(1963—1966年期间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些情况)。<sup>③</sup>职业化需要把军队的作用重新界定为“超越政治之上”。如翁加尼亚将军反复所说,除过“在极端条件下”以外,军队应当杜绝干预政治。(什么是“极端条件”当然留给军队去决定。)首先,军队脱离直接的政治干预将不仅有助于其职业化,而且会使对文官当局普遍和严厉得多的指责成为可能:他们的失败再也不能归罪于军队的干预了。其次,“超越政治之上”的角色意味着拒绝在纯粹的“文官”冲突中支持某一方,但并不意味着对军队认为值得其关注的任何国家事务不关心。这清楚地反映在翁加尼亚将军的

① 关于这次选举,参阅后面的第四章。

② 我在这儿描述的结果得到了文献相当好的支持。一个例外是关于私人联系模式变化的证明;就这个问题我主要依赖于我自己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个参与者—观察者的印象。

③ 关于“正统的”立法派立场(及其多种未解决的模糊性)的一个饶有趣味的阐述,参阅 B. Rattenbach 将军所著, *El sector militar de la sociedad* (Circulo Militar Argentino, 1966)。



一篇讲话中，在这篇讲话中，他阐述了他关于“军队作用”的概念：

[军队存在]是为了保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西方文明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确保公共秩序和内部和平，促进普遍的福利，维持宪法、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保障以及它所建立的共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两条基本的前提必须坚持：[军队]保持监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能力倾向和实际能力的必要性，以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sup>①</sup>

根据这个概念，军队的职能甚至比大猩猩派领导人所设想的更加广泛。相当清楚，两个帮派间主要的实际差异在于，立法派拒绝依靠武力提出威胁性要求和直接卷入派争。

但是，或许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翁加尼亚将军所提到的“基本前提”的要求。如果军队要正常履行职责，那么他们的组织力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必要条件。因此，任何威胁或妨碍任一条件实现的事情都可能被解释为阻碍军队职责的履行。因为这些职责的履行是如此重要，所以任何威胁它们的必要条件的事情都是一种对国家的最基本利益的威胁。因为政府可能以行动或疏忽危及这些必要条件，所以，给定关于“军队作用”的这个概念，这一点就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人员不可能接受军队的效忠。在同一个讲话中，翁加尼亚将军继续说道：

归根到底，服从是对于宪法及其法律的，而不是对可能最终掌权的人和政治党派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军队的根本使命就会被推翻。他们不再是非政治的了；他们将变成为某些人或集团服务的执政官的禁卫队。

激进党曾支持被击败的大猩猩派这一事实，倾向于提高体制崩溃的可能性。此外，本章前述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持久性可被解释为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尚未满足。这一因素与持续高度的社会动乱相结合，加剧了对“颠覆”的蔓延和最终胜利的恐惧——它将植入“极权的极端主义”并取消军队。政府的无能和社会-经济低速发展相互作用，产生了“颠覆”。消除颠

<sup>①</sup> *La Prensa*, 1964年8月6日；笔者译自西班牙文。



覆是军队的“特殊职责”（“国家安全”的监护人）的一部分，而且，根据这种解释，正是在社会-经济和政府层次上，颠覆的根本“原因”才能受到最佳的攻击，并且才能实现消除它。因此，军队把整个范围的社会问题（所有能被包括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确保政府效率”的广泛定义中的东西）都看作是处于它的“国家安全”职责的范围之内。<sup>①</sup>该范围的这些社会问题暗示，它们的解决只能通过直接控制政府来实现<sup>②</sup>，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被解释为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所以随之得出的便是：这些问题不“解决”，军队就不能完成他们的职责。因此，在实现这些“解决”所要求的无限期时期里，军队直接控制政府将是必然的。<sup>③</sup>

这些结论必然基于军队对他们处理社会-经济低速发展和政府无能问题的高超能力的信心。这种信心部分源自政府当局乏善可陈的绩效和立法派赢得对军队的控制之后持续的群众普力夺主义之下恶化的社会环境，但它可能主要是成功的职业化运动的结果。通过职业化，军队建立起了明确界定的权威模式，而且军事训练得到了极大提高。在文官部门持续处于危机之中时，军队已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这除了极大地强化了军队对其自身处理问题的高超能力的感觉以外，无所助益。<sup>④</sup>军队对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根本信心来自于所期望的对其高超的统治能力（相比于以前的文官政府）进行历史证明。<sup>⑤</sup>

当然，军队对社会状况的关切包含着更直接的组织考量。在群众普力夺

① 这一分析明显是军队对它的作用、它对社会形势的评价以及它对干预合理性的解释之认识的基础，这在这一时期的非正式访谈和军队出版物中很明显。比如，参见：Colonel M. Orsolini, *Ejército argentino y crecimiento nacional* (Editorial Arayu, 1965)，以及 O. Villegas 将军, *Guerra revolucionaria comunista* (Pleamar, 1963)。关于这一时期的一项有用的综述，参见：C. Fayt, *El político armado: Dinámica del proceso político argentino 1960—1971* (Ediciones Pannedille, 1971)。

② 关于这一立场的一个综合性阐述，参见：O. Villegas 将军, *Políticas y estrategias para el desarrollo y la seguridad nacional* (Pleamar, 1969)。维莱加斯(Villegas)在 1966—1968 年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③ 关于这一立场诸多阐述中的一些观点，参阅本章第二页脚注①中所引的官方出版物。

④ 考虑到军队拥有解决其“内部”问题的手段（比如，清洗和公开斗争）——文官群体很少能利用这些手段，这个感觉中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应该已十分明显。

⑤ 军队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这一“发现”以及社会问题对军队风格的决策的抵制，是对 1966 年创立的政治体制之演变进行研究的一部分，但这儿并不去研究它。

主义下无法阻止的社会环境恶化(或纯粹的持续),可能重新引致军队内部的分裂而不管它的职业化努力有什么影响。因为在立法派的概念中,军队分裂会妨碍其根本职能的实现,所以这方面的任何风险也被解释为国家最高利益的一种威胁。这样,军队介入来消除对其内部团结的威胁,其合理性将被解释为在无论什么程度上似乎对军队自身都是必要的。<sup>①</sup>

1965年举行的地方选举显示,庇隆派保持着第一多数的选民。除了以前被推翻的庇隆派和弗朗迪西派以外,占统治地位的激进党是唯一能够吸引超过总票数10%的政党。至此,有充分证据表明大多数文官群体已达到了“最高共识”,其结果是诱致一场新的军事干预的因素变得十分强烈。社会动乱高涨,出现了无数的罢工、占领工厂以及多种形式的不太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伊利亚总统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迟缓和无能的决策者的名声,而议会似已被降为一个不事立法的私人争吵的论坛。与此同时,军队已极大地加强了它自己的实际能力(甚至更大地加强了它对这些能力的估价)。

简言之,在1965—1966年间,当军队的组织演化给了它内部团结和能力感——这使得干预在似乎没有失败和分裂化风险的情况下是可能的——时,最终体制崩溃的条件已达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这种形势强烈地指向一场政变——它将试图植入一种全然不同的体制,而不是致力于修复既存的政治体制。这一趋势被这一事实所强化:阿根廷所有的主要政党都已被给予了“一个机会”且“已经失败”,因而“不得不”被军方驱逐。

大选被安排在1967年,这是显而易见的:立法派军人(像阿根廷社会中的许多其他群体一样)与曾经在考虑是否让庇隆派参加选举时一样地意见分歧。鉴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军队的组织演化以及所有得票数超过最小份额的政党已被给予一个“机会”这一事实,说在1965年底谋划的主要问题就已成了选择政变的适当时机(而不是政变的发动或其目标)<sup>②</sup>,并不是一种夸张。时

---

<sup>①</sup> 在这里对军队的认识和动机进行的考察中,我将自己限于那些在非正式访谈和出版资料中反映的似乎更加重要的方面。使用这一类信息,我不能确定在什么程度上对这些观念的持有是真诚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们是不太明显的动机的“外罩”。(我总的印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真诚的。)至于这些认识和动机的起源,除了这儿分析的历史背景因素以外,似乎极有可能的是,其他常被提到的因素(“反颠覆学说”、美国培训团、继发社会化)也施加了重要影响。但是只有手头上这类信息,要估价这些因素中每一个的实际相对贡献是不可能的。

<sup>②</sup> 关于政变前几个月对这些因素的公开讨论,参见: Astiz。

机的选择,基本上是由围绕以往的庇隆主义议题军队分裂的风险决定的:政变必须足够迟地发生,以使许多军官清楚地认识到组织分裂的风险,但不能迟至选举运动已经开始之后。这样,军队领导层将在针对他们的干预决定,只有最低限度的民间反对(特别是庇隆派——如果他们被允许参加1967年选举的话)的情况下,提高军队高度团结的可能性以支持政变。<sup>①</sup>在1966年6月28日,陆军参谋长皮斯塔里尼(Pistarini)将军宣称:

[军队]获得效率、团结以及高度的专业能力等[成就],付出了时间和巨大的牺牲……任何试图使军队听凭次要利益指使,或把它与政治、经济或社会群体视为一体的图谋,都是一个反对[军队]机构的图谋,因为它寻求制造内部分裂和冲突。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也是一个反对国家的图谋。<sup>②</sup>

此后很快政变就平静地发生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创立了。

就在1966年6月之前,许多民间群体已经达成了一种“最高共识”,已经在为一场将极大改变既存政治体制的军事干预辩护。然而,为了使其发生,这些也是必要的:社会形势对受到高度评价的军队组织成就造成新的威胁,以及军队的职业化进程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大猩猩派军官虽曾多次干预,但目的却是为了就相对有限的需求进行压制,并且宣布了将权力归还文官的意图。当1962年这些军官试图进行长期控制时,他们被自己对一个深度分裂和缺乏职业化的军队机构的不稳定掌控所阻止。新的职业化军队领袖——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地被标榜为立法派军官——只有在他们准备为了实现十分有野心的目标而长期将政府控制在他们自己手中时,才进行干预。要使这成为可能,1962年缺乏的两个条件在1966年必须出现:其一,对于一个“最高共识”来说社会层面变量的必要状态;其二,产生于一支“非政治化”军队的职业化和宪政化过程的组织层面的变量(内部团结的程度和

---

① 在政变前和政变后的访谈中(我的这些印象正是基于这些访谈),这一观点被重复表达:激进党政府的命运在政变前早就被决定了,但是该决定能便利地推迟至对大多数文官群体和军官来说一场新政变不可避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时候。然而与此同时,出于本文中所指出的原因,明显存在着不要太靠近1967年选举的重要顾虑。

② *La Prensa*, June 19, 1966; 由笔者译自西班牙文。

增强的能力的感觉)。

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职业化和反干预主义立场之化身的军队领导人就是那些领导了摧毁既存政治体制的政变的那些人。<sup>①</sup>但是，这个明显的不一致必须根据前述的环境来看。群众普力夺主义和高度现代化招致军队的分裂，他们在极端的政治不稳定——它是普力夺主义跨越的一大部分时期的特征——中进行合作。这种形势反过来影响军队，导致在一段时期内军队撤出直接的政治卷入并集中注意力于努力增强军队组织。群众普力夺主义的持续致使许多民间群体达到了一种最高共识，但最终的制度崩溃不得不“等”到军队感到它能再一次干预了。<sup>②</sup>民间和军队做出决定的时机的这种不一致使得刚处于最终崩溃之前的时期本质上成为一个政治真空，在其中，除了军队干预的时刻之外，每一件事情都已被确定。

在从直接的政治卷入撤出的那段时期，军队增强了它的能力——并且甚至更多地增强了它对这些能力的估价。此外，军队人员提高了他们与技术性角色的任职者——他们将会参加政变联盟并在政变后的政权中占据大多数高级文官政府职位——的私人联系。

群众普力夺主义的持续，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军队关于其增强了的能力的感觉形成巨大反差。同样，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来将军队从社会形势中隔离开来，它们迟早会制造出可能使军队分裂重新出现的问题。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了军队干预的目标，该目标比军队在其干涉主义时期所想象的那些军队干预猛烈得多。该目标是社会形势沿着上面第二章所分析的路线所做的激进转化。

因此，在高度现代化基础上的群众普力夺主义时期，军队的“非政治化”和“职业化”极大地抬高了军队干预的门槛；政变和依靠武力提出威胁性要求的狂热模式终结了。然而一旦达到了这个门槛，军队干预就再次发生——更

---

① 这个评论及随之产生的其他评论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在高度现代化国家创立的另外两个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巴西和希腊。关于军队的演变，它们也适用于另外一个高度“职业化的”政变——秘鲁的政变。但是，产生于相似的军队职业化（除了较低程度的社会现代化以外）的不同因素群，在秘鲁的例子中产生了在军官所形成的联盟的构成方面以及在作为结果的威权体制的政治上结合、经济上扩张的目标方面的重要差异。

② 应当回想一下，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创立几乎带不来经济和心理回报，因而，对于这类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征的创立和实施，强制的运用就是不可缺少的了。

加团结,带着比以前野心勃勃得多的目标,意在比以前任何统治都远为全面的政治统治。与许多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期望的相反,“非政治主义”和“职业化”并没有解决这一地区普遍的军国主义问题。它们只不过换来了远为复杂的军队干预的更高的门槛。

## 第四章

# 一个不可能的“博弈”： 1955—1966年阿根廷的党派竞争

对于研究 1955 年至 1966 年期间阿根廷政党之间的党派竞争和联盟行为，我将按照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的传统，使用一个“博弈”模型。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该方法的实践者

将假定一定数量具有某些目的（比如最大化他们的收入）的个体行动者的存在，然后将基于他们将理性地追求其目标的假设，努力演绎出在给他们提供某些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行动……该“经济学”方法的力量在于，在适当种类的情况下，它使我们采用有关理性行为的简单前提，有能力通过逻辑和数学来推导出关于将发生什么的有趣结论。<sup>①</sup>

来自模型的推论将通过对比实际过程而加以检验。如果在几次试验中，模型预测的行为和实际行为之间吻合良好，那么可以设想该模型包含了基本因素与关系，并且它们的因果模式符合真实过程。这是公理性-演绎性经济模

---

<sup>①</sup> B. Barry,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Ltd., 1970). 巴里 (Barry) 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项研究之上: M.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and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7)。唐斯 (Downs) 著作的影响将明显地体现在我的讨论中。



型、计算机模拟<sup>①</sup>、博弈论<sup>②</sup>以及建立联盟理论的某些努力的逻辑。<sup>③</sup>

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其结构接近于博弈论所处理的情况。它聚焦于“参与者”（政党），这些参与者在某些规则之下竞争以建立联盟并使选票数最大化，其目的在于赢得“战利品”（选举）。参与者在他们努力使收益最大化并使损失最小化的意义上是理性的，并且规则是那些参与者在竞争中必须遵守的约束。这里提出的模型明确了参与者在博弈开始时拥有的资产以及决定博弈结束的标准。最后，它界定了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既有关于规则的，也有关于其他参与者行动的。不幸的是，本章所研究的真实情况在几个重要方面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直接应用博弈论的严格工具。<sup>④</sup>因此，和一个更简单情况下可能的程度相比，结论将不太严格。

在所有属于被巴里称之为“经济学”方法属类的各种理论中，自变量是模型确定的情形之结构和关于参与者动机的简单假设。这些加上某些被确定的初始条件（比如说，参与者在博弈开始之前所拥有资产以及偏好的分布），使得有可能对参与者的行为作出毫不含糊的推论。

在本章提出的模型中，两个背景变量（起始条件以及由“规则”所确定的情形之结构）和一个微观层次的变量（关于动机的假设）相互作用。该模型不涉及那些初始条件和“规则”是怎么出现的。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这个模型的自变量将会是中介变量，一般性社会条件通过这些中介变量而反映在这里所考虑的政治行为（党派竞争）及联盟之中。

---

① 参见：G. Brewer and R. Brunner, *Organized Complexity: Empiric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② 关于近期的概述，参见：Anatol Rapoport, *Two-Person Game Theor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and *N-Person Game Theor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

③ 关于近期的概述，参见：B. Collins and B. Raven, “Group Structure: Attraction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V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and J. Chertkoff,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Coalition Formation” in S. Groennings et al.

④ 如果要想实现其数学工具的威力，博弈论要求处理就资产、支付值以及效用单向度来说的简单情况。

## 背 景

大多数基本的背景信息已经在第三章中给出了，但是这里应当加上一些细节。

在庇隆政府之前，阿根廷的主要党派是激进党、保守党（有多种名称并不断变换）、社会党和共产党（两者都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为基地）以及一个地区性政党——进步民主党（Demócrata Progresista）。在1946年，它们全部参加组成反庇隆的民主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总统候选人资格被奖给了它最大的成员——激进党。在1946年，庇隆以1,478,372票对1,211,666票击败了民主联盟。另一场总统选举在1951年举行；显然，庇隆的大众声望以及他对政府资源的控制可以保障他轻松获胜。令人瞩目的是，激进党没有兴趣重新结成民主联盟——这是第一次策略尝试，下文将进行更详细考察。作为替代，激进党进行了一场强劲有力的独立选战，面对所有反庇隆的选民，他们在选战中争辩说，既然他们是唯一有机会战胜庇隆的政党，所以投给任何其他政党的一票都将是“浪费”。激进党被庇隆轻松地以4,745,168票对2,415,795票击败<sup>①</sup>，但是尽管输了选举，他们却成功地在事实上淘汰了其他反庇隆主义政党。

庇隆派和反庇隆派之间的裂隙（基本上平行于（1）劳动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与（2）社会其余部分之间的裂隙）在阿根廷政治中变得至为重要。自1946年以来，特别是1955年之后，在阿根廷，政治偏好的分布可以被描述成双峰模式，它反映出由于该裂隙极端突出而造成的两极分化（见图4）。<sup>②</sup>

依次对图4提出几点评论：（1）两个阵营不是代表“左—右”政策立场，而是代表庇隆主义对反庇隆主义相对强度的位置——强度随着位置远离该分布的中心而增加。（2）各个阵营所覆盖的区域，代表各个群体相应的投票

<sup>①</sup> 与1946年选举相比，选票数的实质性增加是由于在1951年选举中引入了妇女投票权。

<sup>②</sup> 这是唐斯首先应用在政治学中的空间类比（spatial analogy），并被达尔（Dahl）在《政治反对》（*Political Opposition*）一书中采用。本章中使用的模型涉及一个政治舞台（选举竞争），并且专门研究一种结果（政府人员的选举），在其中有充足证据表明该裂隙极其突出的程度。尽管他提出的一些要求过分拘束（参见：Barry, pp. 99—146），这个情形在以下意义上符合斯托克斯（D. Stokes）所指定的标准（“Spatial Model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1963]），即空间类比看起来没有严重歪曲投票者的实际分布以及他们对其分布的感知。

力量——在一种情况下(庇隆主义),被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层所掌握,在另一种情况下,由多个反庇隆主义党派掌握。(3)各阵营覆盖的区域是个直觉上的近似值,而不是对每个阵营投票力量的精确测量;缺乏调查数据、庇隆主义遭禁选以及下文将要讨论的党派之间的对策,妨碍了对支持每个党派的选票数作出准确的(并且对我的目的来说也是不必要的)评估。<sup>①</sup>(4)如果两个阵营区域是打算用来代表其他政治资源而不是投票力量<sup>②</sup>,那么庇隆派阵营就会小得多——它唯一显著的非选举资源就是它对工会的控制;所有其他政治资源都在反庇隆派阵营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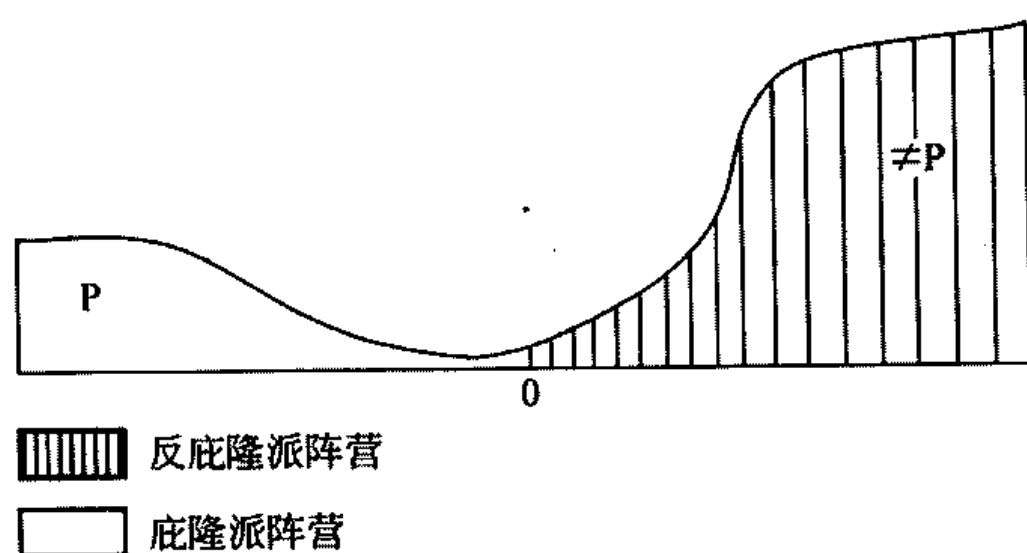


图4 阿根廷政治意见(庇隆派对反庇隆派)分布图示:1955—1966年

注:本图对两个政治阵营的相对投票力量提供了一个粗略近似。点0代表对两个阵营没有偏好。

在1955年,除了工会,阿根廷所有主要社会群体都立志于防止庇隆主义重新掌权,并且逆转了庇隆派支持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政策。在庇隆被驱逐之后,以“国家需要民主化”为依据,实行了以下管制政策:(1)庇隆主义党被宣布非法;(2)在庇隆主义时期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宣布效忠的人,被禁止竞选公职或者组织新政党;(3)禁止组建宣称坚持或忠诚于庇隆主义、或者与它

<sup>①</sup> 那个时期,在仅有的一次庇隆派被允许推出行政机构候选人(省长)的选举中(1962年),他们取得了总投票数的31.9%。在这个百分比之上,还应当加上总投票数的大约3%——它们被声称效忠庇隆主义的省内次要党派所得。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庇隆主义当时被允许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以及在连续性基础上进行选战,并且获得公平机会接触大众媒体——加上如果当时不存在取消庇隆派取胜的选举的极大可能性——的话,庇隆派在总投票数中的比例甚至还会更高。然而,对于此处将要讨论的党派策略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党派在选举之前对它们投票力量的评估(参阅下文中的“参与者资产”)。

<sup>②</sup> 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分享“意识形态”的政党。

还有一条背景信息是必要的：阿根廷选举体制规定，取得简单多数的政党赢得行政机构和议会多数。在庇隆被驱逐之后的临时政府时期，那些次要党派赞成比例代表制，但是激进党（还没有分裂，并且在1951年选举之后显然是最大的反庇隆主义政党）成功地抵制了这项要求。政治“博弈”就在旧的选举体制下开始了。

## 模 型

### I. 初始条件

A. 参与者：为了简化，每个政党是一个参与者。除非这些冲突导致从政党中分裂出了超出最低限度投票力量的势力，否则，内部冲突将被忽略。在内部冲突的情况下，参与者集合将在下一轮博弈中相应地重组。

B. 参与者的立场：博弈开始时，它们按照双峰分布而定位——庇隆派在一个阵营中，所有反庇隆主义政党在另一个阵营中。

C. 参与者的资产：

1. 可接受性：被规则批准来参与选举，并且如果获胜的话，还可以占有职位。庇隆派和共产党人缺乏这一资产；所有其他政党都在它们没有违反规则的限度内拥有这一资产。

2. 投票力量：每个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被估计出在总投票数中所占的份额。对于不同参与者，投票力量如下：

党 派	份额百分比
庇隆派(P)	35—40%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RP)	20—25
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RI)	15—25
保守党	每党派 3—8
进步民主党	
共产党	
社会党	
基督教民主党 <sup>①</sup>	

① 组建于庇隆政府结束前夕。

定义 A：“获胜党派”指一个没有组建联盟，并且在一次选举中相对于任何其他党派或者联盟，取得简单多数的党派。

定义 B：“获胜联盟”指由两个或者更多党派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就如何分配支付值以及它们的追随者将如何投票形成了一致，它在选举中取得简单多数。

定义 C：“预期获胜联盟”指由两个或者更多党派在选举前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按照它们的投票力量，赢得选举的概率较大。

因此，(1) 如果没有联盟得以组建，那么庇隆主义将获胜，因为  $P > RP, RI, \dots, n$ ;

(2) 如果反庇隆派阵营建立一个联盟，那么庇隆主义将失败，因为  $P < (RP + RI + \dots + n)$ ;

(3) 庇隆主义和一个或者更多其他党派之间的联盟是一个预期获胜联盟。如果是  $(P + RP)$  或者  $(P + RI)$ ，那么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个预期获胜联盟；如果和其他党派结盟，它只有在其余反庇隆主义党派没有组建大联盟的情况下，才是一个预期获胜联盟。

D. 博弈的标的：各党派通过赢得“重要选举”来竞争占据“重要职位”。“重要职位”包括总统职位以及大州的州长位子；“重要选举”指那些决定由谁来担任这些角色的选举。

各支付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巨大战利品（总统职位）以及几个较小的战利品（大州的州长位子）。

在联盟建立之处，总统提名的获胜者向它的联盟伙伴提供（或者至少许诺）额外报酬。额外报酬是有形的（州长位子）或者无形的（要在掌权后兑现的许诺，比如颁布联盟伙伴偏好的政策）。<sup>①</sup>

---

<sup>①</sup> 这反映出阿根廷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制度性现状：国会议席不是任何显著权力的焦点。此外，总统拥有权威（无须议会同意）去“干涉”各州（把州长赶下台并任命代替者）。贯穿整个阿根廷历史，总统对该权威的使用，超出了不加克制的程度。其他因素也起了助长作用，使得州长位子决不是个可靠的额外报酬，并且相对总统职位来说，无可比拟地处于权力更小的位置——特别是诸多问题在全国层次上强烈的政治化（见第三章）以及州对联邦政府沉重的财政依附。主要州和次要州之间的区别使得这些因素甚至更加重要。由于难以建立“对等规范”（parity norm）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分配性”正义原则，支付值的不可分割性妨碍了联盟的组建，这些原则要求在分配支付值的时候，大约与联盟成员的资产相称（见 W. Gamson,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Social Psychology*, Vol. I [Academic Press, 1964], and P.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 II. 规则

1. 不允许庇隆派赢得重要选举。
2.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庇隆派赢得重要选举,就禁止他们取得职位。
3. 任何执政党派必须确保庇隆派不会在下次重要选举中获胜;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将被赶下台。
4. 除非明确得到仲裁者授权,与庇隆派组建联盟的任何次要党派(minor party)都会被认为是庇隆主义的“代表”(facade)。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庇隆派的所有禁令都适用于该次要党派。(定义:次要党派是指,在上次选举中,取得少于总投票数3%的党派。仲裁者是军方;它也许没有制定规则,但是却执行规则。)
5. 任何执政党派必须实行那些由仲裁者界定的、使反庇隆派阵营满意的政策,并且拒绝庇隆派的要求;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赶下台。
6. 庇隆派被允许投空白票或者投票给可以接受的党派。
7. 不允许党派改变规则。如果它们在执政的时候试图这么做,就会被赶下台;如果在野,它们就开始变成不可接受的了。
8. 由于违反某些规则而被赶下台的党派,在下次重要选举中变得不可接受。
9. 在第一轮中,关于规则的知识是不完美的(imperfect);参与者们不知道仲裁者是否将完全执行规则。知识在这之后是完美的;规则如所陈述的那样存在,并被严格执行。
10. 有关组建联盟的讨价还价可能是秘密的,但是当联盟结成的时候,将会立即变成公共知识。

## III. 关于动机的公理<sup>①</sup>

党派是理性的,并且假定选民也是理性的。

### A. 选民是理性的:

---

<sup>①</sup> 这些公理来自于唐斯。唯一的创新是公理6,但是这一条似乎是其他公理的直接延伸。很自然,唐斯心中想着美国以及西欧政治,他不觉得有必要去陈述或者考虑这个显而易见的含义。



1. 当面对(给党派)投票的几个选项,他们选择自己最偏好的那一个的时候;

2. 当以下时候,即,如果存在他们强烈厌恶的几个投票选择对象和另外几个适度厌恶的投票选择对象,倘若根据他们对概率的估计,他们选择后者之中的一个,将增加他们强烈厌恶的选择对象失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会这么做;

3. 当如果他们强烈厌恶所有的选择对象,那么他们放弃投票或者投出空白选票的时候。

B. 党派是理性的:

4. 当它们力图最大化选票数及他们赢得未来选举的机会的时候;

5. 当它们在执政时力图实行满足其选区中足够大的部分,以赢得下次选举的时候;

6. 当它们在执政时力图在整个被选上的任期内保住职位的时候。

### “进行博弈”

可以证明,无法赢得这个博弈。并且由于无法赢得这个博弈,所以进行它就没有意义。这导致了以下形势,即,在其中“赢家”和“输家”都必须输掉。当参与者(党派)、仲裁者(军方)以及观众(选民)意识到这个博弈是徒劳的时候,就没有人想让它继续下去,并且一个全新的“博弈”就开始了。

如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所评论的那样,联盟伙伴选择对达到目标来说至为根本。<sup>①</sup>在当前的模型中,一个庞大“被禁止阵营”的存在(最大的个体参与者被禁止获胜)造成了这种情形:如果任何其他参与者能够取得被禁止参与者支持的话,它获胜的概率就很大(公理4)。<sup>②</sup>可以“提供”给庇隆派的

<sup>①</sup>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5.

<sup>②</sup> 这和以下预测相抵触,即认为联盟将是规模最小的(Riker)或者“权力最小的”(W. Gamson,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 Theory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and “A Theory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see also T. Caplow, “A Theory of Coalitions in the Tria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1956], and Collins and Raven)。但是,应当注意到,这些预测所基于的实验发现,来源于其结构方式和这里所研究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情形。当他通过给参与者不仅指派资产(选票)而且指派不同“当选”概率,来操纵实验形势的时候,Chertkoff(发表于 Chertkoff, and Collins and Raven)获得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与当前的模型相一致。在这个情况下,没有组建最小规模或者最小权力联盟的趋势,相反,参与者们力图和那些具有最高注定当选概率的参与者结盟。

唯一额外报酬是以下许诺，即，他们的联盟伙伴在执政时将颁布庇隆派所偏好的政策，并且/或者他们的伙伴将改变那些禁止他们赢得未来选举的规则（公理4）。在该基础上，庇隆派领导人可以说服那些支持他们的选民在选举中给他们的联盟伙伴投票（公理1和2）。

但是，只要规则有效，这些额外报酬就无法得到交付。对政策的许诺违背了第5条规则，并且对改变规则的许诺违背了第7条规则。因此，庇隆派的联盟伙伴会被赶下台，这违背了第6条公理。这牵涉到一个两难困境，原因在于按照第6条公理行动违背了第4条和第5条公理——不交付额外报酬将造成庇隆派的强烈敌视，他们将感到被其伙伴出卖，因此那个伙伴在下次选举中将不可能再次“借用”来自最大的单个参与者的选票。现在敌意十足的庇隆派赢得下次选举的可能性很高（见下文），而当前执政党只剩下它自己原来的选民以及它将来在反庇隆派阵营可能聚敛的选民。就第4条和第5条公理来说，这是很糟糕的，但是由于效果不是即刻出现的（下次重要选举将在几年之后举行，并且这期间通过该党派对政府资源的控制，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失去庇隆派支持比被驱逐下台的更直接损失更可取。因此，第6条公理占了上风，并且给庇隆派的额外报酬不会得到交付。

这是该情形的症结所在。如果一个党派想要最大化赢得选举的机会，它必须和庇隆派进行交易。实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许诺在执政时交付给庇隆派无形的额外报酬。交付这些额外报酬将意味着被驱逐下台；因此它们无法得到交付。

至此，我们可以引入时间维度：

第一期——博弈尚未开始：反庇隆派阵营的X党还算庞大，掌握着总票数的15%。

第二期——博弈开始，参与者之间进行磋商：X党有以下不同选择：（1）“移动”到庇隆派阵营——表达取悦庇隆派的意见并许诺取悦庇隆派的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获取他们的选票——或者（2）“保留”在反庇隆派阵营。由于X党不是在其阵营中最大的党派，它得到重要支付（总统职位）的希望微小，但是通过参加其阵营中的一个联盟，它可以取得一些州长位子作为额外报酬。

鉴于支付的不可分割性，反庇隆派阵营中只有最大的党派有明确利益留

在阵营内。如果整个阵营在规模上比庇隆派阵营大，那么这个党派看起来有很大可能性赢得总统职位。而对于反庇隆派阵营中其他较小的党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们在自己阵营中赢得总统职位的机会微弱，但是如果它们可以和庇隆派拍板成交的话，就可能有很好的机会。

如同在所有的博弈情形中那样，一个理性的参与者必须把其竞争对手可能的策略考虑在内。由于第4条公理对所有党派都成立，X党不能忽视以下可能性，即，其他党派将移动到底隆派阵营并结成一个预期获胜联盟。在此种情况下，X党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额外报酬，并且肯定得不到总统职位。在另一方面，如果X党移动到底隆派阵营，它无法确定还有谁、以什么条件，可能在和庇隆派谈判，因为谈判可以是秘密的，并且有几家对其选票竞相出价明显符合庇隆派的利益。X党将不得不出价高过任何竞争者。

党派之间对庇隆派选票的任何竞争都是零和的。可以在庇隆派中间造成足够利益来诱使他们“出借”其选票的额外报酬，只能由将在下次选举之后取得总统职位的党派来交付（如果还会发生的话）。因此，如果比方说Z党和庇隆派建立了联盟，X党对该联盟而言就变得不必要了，并且它所能得到的唯一额外报酬将会是一些次要的州长位子——并且这也比其在初始阵营中获得这些位子的概率更低，因为它的移动将使其反庇隆派选民支持者感到不满，并且比起如果一直留在反庇隆派阵营之中，它的投票力量也将因此而更弱。对庇隆派选票最强有力的出价将是模仿——采用庇隆主义的所有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但是根据规则，这将是自拆台脚。在另外一方面，X和Z之间的零和竞争将迫使它们越来越逼近模仿。越是这样，在它们的反庇隆派选民方面，对X和Z就代价越“昂贵”。进一步而言，那个在这样昂贵竞价基础上与庇隆派结成联盟的党派，当它无法兑现诺言时，将表现出是个越发卑鄙的“叛徒”。

**第三期——谈判结束，联盟宣布：**鉴于其起初的规模，即使X党失去它自己选票的一大部分，但是，如果它达成了联盟交易的话，它会从庇隆派选票中得到更多的补偿。如果X党在竞价中获胜，竞价失败的竞争者将得不到显著的额外报酬。因此，为了保住它们可以从其选民支持者中得到的东西（公理4），它们必须“重返它们的阵营”。为此目的，每个党派都必须以满足其选民支持者的方式来竞选——采取反庇隆主义立场。但是，它们的信誉在裂隙两

端都遭受了严重影响，并且它们在反庇隆派阵营内部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也将是虚弱的。这个“重返阵营”的高昂代价解释了对庇隆派选票的疯狂竞价——并且，竞价越多，代价越高。

现在，庇隆派已经挑选出了一个联盟伙伴，我们可以考虑反庇隆派阵营中发生了什么，该阵营由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党派和其他“重返的”党派组成。如果X党与庇隆派结盟了，那么反庇隆派阵营就面临一个预期获胜联盟的挑战：很显然，如果各个反庇隆主义党派各自为战，那它们就将被击败。避免失败的一条可能出路是去说服仲裁者相信那个联盟违反了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举动都将被宣告无效，并且该博弈将重返初始阶段（但现在X党也不可被接受了）。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反庇隆派阵营中建立一个联盟，寄希望于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不能取得总票数中足以获胜的比例。但是在那些可被接受的党派中间，唯一可能的额外报酬类型是有形的（州长位子），并且这些额外报酬应当与每个预期伙伴的资产大致上相称——也就是说，与它们的可被接受程度和它们不同的投票力量大体相称。由于它们可被接受的程度是“相等的”，并且它们的投票力量没有根本差异，支付的不可分割性造成了严重问题。

反庇隆派阵营中最大的Y党强烈觉得自己应当得到总统提名，但是它没有什么具有相对价值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它的预期伙伴。由于没有“公平”标准来分配额外报酬，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但是，根据第1条和第2条公理，Y党仍然拥有一条潜在的成功策略。通过诉诸选民的理性，它可以利用对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的强烈不满情绪。反庇隆主义的选民可以被说服，认为阻止庇隆派胜利的唯一出路是投票给Y党，哪怕该反庇隆主义的党派原本不是他们喜爱的党派。

这样，支付的不可分割性导致了一个新的零和情形——现在是在反庇隆派阵营内部。显然是该阵营中最大党派的Y党，希望通过第1条公理（对于它自己的选民）以及第2条公理（对于其他反庇隆主义党派的选民）来取得选举胜利。基于全体选民中存在的政治偏好两极分化，Y党寻求在反庇隆派阵营中“吸纳”选票。（Y党被称为是一个吸纳党，并且它的策略是一个吸纳策略。在其阵营中，Y党力图吸纳所有选票；除了其他反庇隆主义党派中非常牢固确定的选票，它获得了成功。）这个策略成功的概率，是政治意见双峰分

布的一个函数：对于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可能的胜利，反庇隆派选民忧虑越深，Y党吸纳反庇隆派选票的机会就越大。因此，为了满足第4条公理，Y党不得不试图去使得这种忧虑尽可能深重。在图4中的空间示意中，Y党不得不“拉伸”该分布，把更多选民推离中立或者低强度区域。这样做显而易见的办法是，以最糟糕的色彩来描绘如果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获胜，将会发生什么。这样，根据第4条公理来行动，Y党加重了现存的两极分化。在Y党采用这个策略可以被已经移向庇隆派阵营的党派所预测的限度内，可以引起对庇隆派选票甚至更疯狂的竞价，因为对于那些由于移向庇隆主义而已经动摇了其选民忠诚的党派，吸纳增加了它们重返反庇隆派阵营的成本。

**第四期——选举时刻：**胜利者只能是Y党这个反庇隆派吸纳党或者以庇隆派为基础的一个联盟。如果Y党获胜，鉴于现存两极分化以及那些规则，同样的移动将在下次选举中被使用。但是，如果X党在庇隆派支持下获胜，它就落入已经讨论过的那个困境中：兑现它对庇隆派的许诺意味着被赶下台；不去兑现它们意味着下次选举中最小的获胜机会。

**第五期——选举后的时期：**如果X党在庇隆派支持下获胜，并且宁愿为了不被赶下台，而没有交付它所许诺的额外报酬，那么它必须重返反庇隆派阵营。另一个阵营“属于”庇隆派，并且他们强烈地被X党的“背叛”所激怒。在重新采纳反庇隆派立场时，X党必须继续那些它许诺过掌权时要改变的政策。作为一个被所有人都认为是“靠不住的”参与者，X党被庇隆派深切痛恨并被反庇隆派所不信任。

在X党获胜的选举中，Y党吸纳了其阵营中的选票，并且它进行两极分化的竞选给自己获得信用，成为了一个“可靠的”反庇隆主义党派。X党拥有控制政府资源的重要优势，但是因为它“不可靠”，其投票力量削减到它起初的支持者的地步。Y党缺乏政府资源，但是它明确地作为最大的反庇隆主义党派而出现。以前讨论过的建立一个反庇隆派阵营联盟过程中的困难，现在被一个新问题弄得更复杂。在X党和Y党之间敌意增加，对于在下次选举中获取选票而言，不可能在事先决定到底是控制政府资源还是成为上次选举中最大的反庇隆主义党派更有利。因此，对于下次选举中包括两党在内的反庇隆派联盟，没有根据去决定，究竟是X党还是Y党应当得到总统提名。反庇隆派阵营现在有两个潜在的吸纳性党派，它们无法参加一个联盟。其后果



是，由于反庇隆派选民事先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党派中的哪一个将会在他们的阵营中占据支配地位，对个人来说的理性选择就将在 X 党和 Y 党之间随机选择。但是，如果所有反庇隆派选民都遵循这个原则，那么他们的选票就将在 X 党和 Y 党之间随机分布，这导致确保了庇隆派的胜利，而这是他们想要防止的。

随着反庇隆派阵营中组建一个大联盟的可能性被排除，庇隆派可以和任何一个其他党派结成一个预期获胜联盟。但是，博弈的进行已经树立起了一个基本点：规则如所陈述的那样存在并得到推行。在下次选举中，因为另一个阵营中存在两个吸纳性党派，庇隆派将几乎肯定是胜利者，但是他们自己无法获胜（取得职位），而且没有党派在执政时可以交付那个能够使庇隆派感兴趣的许诺（政策、规则的改变）。

其他党派知道，它们将在反庇隆派阵营中失利，但是它们也知道，如果它们移向庇隆派阵营的话，将面对前述的那个两难困境——一个更难对付的参与者。也就是说，和第一个联盟形成对比，只有当在他们看来新联盟有助于一劳永逸地终结该博弈时，庇隆派才可能去结成一个新联盟——对他们的那些力图通过结盟而获取博弈成果的伙伴来说，这是个自拆台脚的行动进程。最后，应当指出，如果说反庇隆派无法理性地投票的话，庇隆派也是如此。投票给他们自己的党派没有意义，该党派是被禁止参选的，投票给一个留在反庇隆派阵营的党没有道理，投票给一个在许诺基础上移向庇隆派阵营的党派也没有意义，因为受那些规则所限，它将不得不在执政时背弃诺言。弃权或者投空白票也不会是个解决办法，因为这样做会使庇隆派不再成为意见分布中的一个阵营，并因此保证了反庇隆派中吸纳性党派之一取得选举胜利（或者是那个未能兑现自己诺言的，或者是那个加重现存两极分化以有利自己的）。

一旦这个博弈进行过一轮，并且关于规则的知识是完美的，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取胜的徒劳博弈。因此，一个理性参与者将变得“不忠实”（他弃绝该博弈，或者至少对它的继续不感兴趣）和“不负责任”（由于每个人都终将失败，无论什么可能的短期收益都将被追求）。不仅该博弈是徒劳的，它的进程还增加了起初的政治两极分化。由于没有参与者寻求它继续进行，它可以被轻松地终止掉。



### 集体理性？

可能会有这样的主张：那 6 条理性公理（见原书第 175 页）全部是个人性的，它们应当包含一个“集体理性”的维度<sup>①</sup>，根据集体理性，所有党派（或者至少所有反庇隆主义党派）将有压倒性利益来保全该博弈，并避免会导致它毁灭的行动。这个论点值得严格检验。

一旦一个党派已经移向庇隆派阵营，先前分析过的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因此，为了有效果，“集体理性”要求所有党派同意留在反庇隆派阵营中。此外：（1）所有党派必须把维持该博弈置于它们偏好序列的顶端；（2）所有党派必须是完美的预测者（甚至是在第一轮博弈之前，它们必须知道如果一个党派移向庇隆派阵营，会有什么后果）；以及（3）所有党派必须在彼此之间拥有完全信心。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第一轮中，关于博弈规则的知识是不完美的，那么有效集体理性的可能性就极其遥远。还存在另外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假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错误预测、对该博弈不满）W 党已经决定移向庇隆派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参与者隐瞒自己的意图，就符合它的利益（目的在于防止其他党派竞价追求庇隆派的选票）。这样，W 党将假装接受那个“留在阵营内”的协议，直至它可以宣布它与庇隆派结成联盟的时刻。鉴于这种境况，就没有任何理性参与者可以确信，所有其他参与者打算遵守那个“留在阵营内”的协议。每个参与者将在什么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为呢？鉴于这种形势，它的选择是盲目的，但是集体理性要求一致同意，并且一个单个“背叛行为”就将引发上面所分析的过程。对于一个背叛行为可能出现的概率，每个参与者不得不做出一个主观估计。哪怕所有参与者都真诚地同意留在该阵营内，它们中间也很可能会至少有一个做出主观估计，认为出现一个背叛行为的概率很大。得出这个主观估计的党派，将根据集体理性会崩溃的假设来行动。<sup>②</sup>其后果是，预测有很大概率违反协议，就将导致该预测者破坏

<sup>①</sup> Rapoport, *N-Person Games*, pp. 87—89.

<sup>②</sup> 如果关于背叛行为之后果的预测是正确的，该举动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该博弈，并且去接受集体理性的约束就不再有意义。如果关于背叛行为之后果的预测是不正确的，就没有理由去力图达成那个“留在阵营内”的协议。

它，并且由于有可能至少会有一个这样的预测被做出，所以该协议无法达成，或者如果达成了也无法兑现，甚至在所有参与者都以诚意行动时也是如此。

假如那些党派对规则的不完美知识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缺乏信心，那么一个反庇隆主义党派越小，它在自己阵营中获胜的机会就越小，而且它去“借人”庇隆派选票的诱惑就越大。反之，对于次要党派的诱惑越大，反庇隆派中较大的党派选举失利的危险就越大，而如若不然，那些较大党派有很好的机会赢得该选举；而选举失利的危险越大，较大党派将同样改换阵营的概率就越大。

## 历史事件

激进党在1951年对反庇隆派选票的吸纳，使得他们在一旦庇隆派被禁止之后，成为1953年总统选举中最有可能的胜利者。接着，“阵营牵引力”开始发挥作用，几个次要党派以及新党派力图获得庇隆派的选票，因此威胁到激进党的机会。激进党得到1955—1958年临时军政府的公开支持，并且胜利前景造成党内对总统提名的格外激烈角逐。当局势变得明朗——激进党领导人之一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将失去总统提名——之时，出现了一系列复杂事件，以政党分裂告终，分成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Radicales del Pueblo)以及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Radicales Intransigentes)，前者被大多数原来的领导人控制，后者由弗朗迪西领导。

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已经决定去竞争庇隆派的选票。在1957年7月，临时政府召集了一次选举，表面上看是去修订宪法，但实际上是去决定不同党派的实力。决定将使用迪杭特(D'Hondt)比例代表制。庇隆派被禁止。弗朗迪西向他们发出和解言论，并许诺为他们所珍视的一些宪法条款辩护。有证据表明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取得了庇隆派的一些选票，但是由于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庇隆派大体上遵从了庇隆的“命令”，投出了空白票。(选举结果由表33给出。)

表 33 选举结果——宪政会议：1957 年  
(迪杭特比例代表制)

空白票	2,115,861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RP)	2,106,524
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RI)	1,847,603
社会党	525,721
保守党派别	423,920
基督教民主党	420,606
进步民主党	263,806
共产党	228,821

总统选举将在 7 个月之后于 1958 年举行,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现在,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可以给庇隆派提出一个诱人的交易。弗朗迪西的总统选战建立在以下许诺的基础上:(1)在执政之时,他将实行庇隆派所偏好的社会-经济政策(和 1955—1958 年政府的政策高度相悖),并且(2)他将取消对庇隆派的选举禁令。这些提议受到庇隆派领导人以及工会的热烈欢迎。在选举之前不久,庇隆和弗朗迪西达成一项“契约”的事开始广为人知,根据该契约,庇隆将向弗朗迪西提供“他的”选票,来交换将来实行那些许诺下的政策。

面对一个预期获胜联盟,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的选战是一项针对“新蛊惑性政客”的“民主圣战”,并把国家从梦魇般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如果庇隆派支持的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赢得选举,就会经受这些厄运。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坚持,如果想要避免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获胜的灾难性结局的话,所有反庇隆派选民都应当支持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选举结果由表 34 给出。)

表 34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58 年

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RI)	3,761,519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RP)	2,303,180
社会党派别	523,545
基督教民主党	339,495
保守党派别	249,160
进步民主党	172,842

尽管弗朗迪西在庇隆政府时期有着充当反对派的记录，但他和庇隆的“契约”、对庇隆派作出的许诺以及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选战中的两极分化效果，仍然在反庇隆派群体中引起了疑问：是否应当允许弗朗迪西就职。最后，在政府与军方关系极为紧张的形势下，弗朗迪西就任总统。

工薪立刻大幅增加，加上颁布有利于工会的法规，这说明弗朗迪西愿意向庇隆派至少交付一部分许诺过的额外报酬。但是到1958年底，很明显，如果弗朗迪西不想被赶下台的话，他就不得不满足反庇隆派的需求。不久，弗朗迪西发现自己在做着和他在选战期间所许诺的正好相反的事情。1955—1958年的政策被重新实行，造成失业和严重衰退，而收入的急剧逆向再分配使情况更为恶化。这一形势，追加到他们被“背叛”的感觉上，导致庇隆派工会广泛的骚动，而骚动只能强化反庇隆派的压制立场。

唐斯曾经作出过一个重要论点，认为如果要让去投票具有合理性、要让民主得以存续的话，政党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可靠性以及责任心是必不可少的。<sup>①</sup>阿根廷1958年之前政党体制的威望并不高，而且，由于在最突出的全国性问题上如此急剧地改变立场，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加深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与怀疑。庇隆派看到弗朗迪西所从事的，正是他们希望通过选举他来加以改变的那些政策，而反庇隆派发现，他们有许多理由加以不信任的一个党，现在却在竞取他们的支持。对于弗朗迪西政策将是什么的最好预测是，它们将正好与他的选战诺言相反。

庇隆派不满的增加，使得弗朗迪西更加依赖反庇隆派诸群体。在三年执政期间，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重返”反庇隆主义，并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选民基础。当1961年举行联邦参议员(Federal Capital Senator)选举时，后果变得很明朗。社会党候选人在庇隆派支持下获胜，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第二，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取得微弱的第三名。到1962年，一场重要选举——重选州长以及联邦和州的议会——即将举行，并且1964年也在临近。次要党派准备重演1958年向庇隆派的靠近，并且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党强烈主张它在反庇隆派阵营中称霸的“权利”。面对着或者被老对手或者被坚决的“新”对手击败的前景，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缺乏一个有效的策略。只有一个风险非常

<sup>①</sup> Downs, pp. 105—109.

高昂的策略似乎对他们敞开。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之间关于在反庇隆派阵营中霸主地位的争执，几乎确保了一个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的胜利——哪怕联盟伙伴是一个次要党派。但是，庇隆派已经知道了，没有任何党派会兑现他们（庇隆派）真正感兴趣的那些诺言。其后果是，他们对于一个新联盟的兴趣极其微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和庇隆派两家来说，让庇隆派自己去竞选似乎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庇隆派来说，他们的胜利可能会导致一场军事政变，而它也许将造成一个全新的形势。对于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来说，庇隆派候选人竞选重要职位这个事实将进一步加剧政治两极分化，并且增加许多选民对于庇隆派胜利前景的忧虑。这样，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可以实现更完全的吸纳，并且通过它（反庇隆派选民比庇隆派人数更多）取得选举胜利。

通过允许庇隆派进行竞选，弗朗迪西确保了没有任何其他党派可以和它们结成联盟，同时因此而加剧的两极分化给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提供了某些获胜的机会。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党是这个策略得以成功的一个根本障碍，因为它可能向反庇隆派选民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它应当是那个吸纳性政党。允许庇隆派进行竞选意味着，面对反庇隆派诸群体，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在承担责任，认为这是防止以庇隆派为基础的联盟获胜的唯一办法——通过阻止那个把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推上台的相同策略！

尽管这个策略有效地增进了两极分化<sup>①</sup>，并且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的选战减少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的选票，但它没有实现其基本目标。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建立在他们“无瑕的”反庇隆派信誉以及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不可靠性基础上的选战，确保了那个策略的失败。在这些情境下，如表 35 所示，庇隆派取得了总票数中最大的份额。

接着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选举被宣告无效，并且弗朗迪西被赶下了总统宝座。在 1962 年至 1963 年期间，军方通过任命的文官来统治，并且（如第

<sup>①</sup> 在一个关于该选举的评论中，斯诺(P. Snow)展示了该政治逻辑如何运作：“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们告诉听众，投给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基督教民主党或者保守党的一票，实际上就是投给庇隆派的一票，就是让庇隆重归的一票”（“Parties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The Elections of 1962 and 1963,”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IX, No. 1 [1965]）。

三章所述)武装力量开始分裂成一个大猩猩派和一个立法派。立法派“返回军营”的立场意味着,一旦他们击败了大猩猩派,将不得不再次召集选举。尽管有些暂时幻想,不久就变得明白了,庇隆派再一次被禁止参加选举——选举不得不在原有规则之内举行。庇隆派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现在,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也已经变得不被接受,并且也无法获胜。这两个党加起来至少包括了总票数的55%至60%。

表 35 选举结果——州长与议会：1962 年

庇隆派(P)	2,845,833
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RI)	2,423,145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RP)	1,753,466
保守党派别	447,084
社会党派别	405,310
基督教民主党	205,555
进步民主党	156,114

使问题更复杂化的是,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已经在弗朗迪西政府期间开始确信,鉴于当时盛行的形势,他们将永远没有能力赢得选举。他们热情地支持大猩猩军事帮派,他们将可能在大猩猩派政府中派员出任高层文职。很难诱使立法派军官去支持这个和近期被击败的大猩猩派最密切联系的党派。除了这个因素,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党得票少于总票数的三分之一,看起来不足以赢得诸多选举,并且他们和庇隆派以及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之间的尖锐对抗,也使得他们不是一个大联盟的可行伙伴。

然而,立法派军官们“不得不”召集选举。这是撤出直接政治卷入并开始向职业化和组织强化挺进的唯一出路,在经历了和大猩猩派的冲突之后,他们把职业化和组织强化看作是制度存续以及职业保全的前提条件。此外,他们在和大猩猩派的近期对抗中所持的赞成选举并反对军事独裁的立场,一直是他们寻求民间支持的首要基础。如果他们在不久之后就把选举排除在外,他们的政府(以及他们在武装力量中的领导地位)就将建立在摇摆不稳的基石上。

同时,分裂的社会党各部分以及基督教民主党显示出他们移向庇隆派的意愿,但是如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发现在当权时兑现诺言这样的基础上,非常



难以说服庇隆派去结成联盟。一个新党派出现了，它由先前的临时政府总统阿兰布鲁(Aramburu)将军(1955—1958年)所领导，它采取一个坚定的法律与秩序立场，并且把它的反庇隆主义诉求建立在阿兰布鲁过去执政时的表现上。

大猩猩派和立法派军官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63年4月，而总统选举预定于1963年7月举行。一个“解决办法”沿着以下条款被得出：(1)选举体制得到改革，并且所有选举都在迪杭特比例代表制之下进行；(2)庇隆派被禁止参加主要选举，但是他们可以竞选议会席位以及某些次要州的州长职位；(3)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不能竞选总统，但是被允许赢得大州的州长职位；(4)由于这些额外报酬，庇隆派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被希望将会同意作为选票提供者而加入一个新联盟——“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而总统候选人将出自某个次要党派，该党派可以被近期获胜的职业军官们所接受。

一大群没有任何选票支持的次要党派(其中许多是新的、特地为此成立的)，竞争国民阵线的总统提名。在国民阵线之外的人民激进公民联盟赶紧对它进行谴责。基督教民主党在和国民阵线进行过一番调情之后，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那里获得重要提名，并重新试图和庇隆派直接达成交易。同时，四分五裂的诸多社会党集团力图 and 庇隆派作出相似的交易。当然，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社会党都以竭尽所能的音量，努力指出隐藏在国民阵线联盟背后的“陷阱”。

国民阵线内部的谈判被证明是特别艰难的。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的新任党主席奥斯卡·阿伦达(Oscar Alende)有做总统的强烈野心，他争辩说，如果他被国民阵线选出的话，尽管有军方警告，他的候选资格也不会被否决。但是，庇隆派在他们参与谈判期间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在经历近期和弗朗迪西所打的交道之后，他们不可能接受另外一个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的候选人。同时，拥有由“不关心政治的”文官以及“独立的”退休军官所组成团队的小党领袖们，试图在总统提名中出价高过别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丢掉了在反庇隆派中的可接受性，而反庇隆派构成他们首要的资产。

庇隆派知道，从国民阵线中那些竞相寻求他们选票的政党那里，他们将不会得到任何许诺的额外报酬。在那之前，庇隆派选民一直纪律严明地追随他们领导人的命令，但是经历了1958—1962年弗朗迪西政府引起的所有苦难之后，

为了使他们在1963年再次投票支持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显然要求多得多的东西。至于那些次要党派的“独立候选人”，由于他们唯一的资产是他们可以被反庇隆派所接受，所以他们也不能引起多少热情。当庇隆和弗朗迪西（两人对各自的党派都没有正式权威）宣告他们达成了新“契约”，并且宣告索拉诺·利马（Solano Lima）将会是国民阵线的总统提名人时，国民阵线内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索拉诺·利马是保守党一个小支派的领导人，并且和发生于庇隆政府之前的猖獗舞弊有密切关系——该舞弊主要针对激进党，而庇隆在他1946年总统选举中曾把它弄成了一个主要问题。对于庇隆派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来说，索拉诺·利马都是一个很难予以支持的候选人；人们只能猜测这项提名的原因。对于弗朗迪西来说，该决定也许基于如下假设，即，认为一个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总统提名人会被军方否决，并且/或者基于防止巩固一个强有力领导人地位的愿望，该领导人可能就其党派的方向和他发生争执。对于庇隆来说，不去支持一个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为了眼前目的临时成立的政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吸引力，并且（也许）提名索拉诺·利马被视为是摧毁阵线并加速总体形势终结的最有效途径。

选举之前二十天，紧接着新“契约”的宣告，阿伦达召集了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党的官方会议，拒绝撤回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并且取得了全党多数支持，支持他拒绝服从庇隆—弗朗迪西决定。由于没有时间进行法庭裁决，结果是出现两个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党——一个由阿伦达领导，控制着大多数政党机构，另一个由弗朗迪西领导，参加了国民阵线。

庇隆派对索拉诺·利马的候选人资格的广泛不安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几乎没有疑问，庇隆派许多人将拒绝投票支持他。这时，基督教民主党作出了一个大胆举动。阵线正在土崩瓦解，但是为了取得庇隆派的支持并且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得到一线机会，基督教民主党不得不向庇隆派提供某种比许诺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向阿根廷国内最令人瞩目的庇隆派领导人——保罗·马泰诺（Raúl Mittera）——提供了他们自己名单上的总统提名。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被给予了副总统提名，而州长职位将在两个党派之间进行分配。这发生在选举前一个星期，并且马泰诺立即接受。毫无疑问，庇隆派大多数人将欣然投票支持他。

这样，阿伦达和马泰诺已经从国民阵线那里夺走了他们党派中的多数选票。不久之前还似乎很可能造成轻松多数的阵线“解决方案”，现在被削减为

庇隆派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选票中不确定但规模肯定不大的残余部分，外加一小撮毫无投票力量的党派。

但是，基督教民主党和庇隆派之间的新组合已经违反了“规则”，一道政令被发出以否决马泰诺的候选人资格。他立即催促他的追随者投出空白票。他接受基督教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决定没有得到庇隆的同意，而且阵线领导人散布着庇隆谴责马泰诺的信件。同时（同样在选举前一周期间），庇隆赞扬马泰诺而怒斥阵线的其他声明也在流传。无法判定哪些声明是真实可靠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声明都是真实的，并且“那个无法获胜的最大玩家”以这种方式遵循着一个进一步破坏该博弈的策略。

阵线解体了。选举前两天，它的领导人们也呼吁投空白票。在 1963 年 7 月 7 日，随着庇隆派退出竞争以及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严重分裂，一个三十天之前似乎无法想象会获胜的党派人民激进公民联盟，以比总投票数四分之一还少的票数，赢得了选举胜利（见表 36）。

表 36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63 年  
(迪杭特体制)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 (RP)	2,441,064
空白票	1,884,435
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 (PI)	1,593,002
Udelpas	726,861
进步民主党	619,481
保守党派别	600,440
社会党	537,643
基督教民主党	434,823

注：进步民主党和 Udelpas 都支持阿兰布鲁作为总统候选人。

当人民激进公民联盟做出他们的提名时，他们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并且他们的领导层由老迈的政客组成，这些人自从 1930 年之后一直没有掌过权。此外，如前所述，他们与军方的关系远远称不上好。他们的政府没有能力解决阿根廷社会积累下来的众多问题。当 1965 年举行局部选举时，庇隆派显示出他们仍然保持了简单多数。在 1967 年，一场重要选举日益临近，而对于政府来说，窘境依旧：是禁止庇隆派并引发“被禁止阵营”的周而复始，还是允许他们去参选、获胜并被赶下台。一种似曾相识的绝望情绪开始在阿根廷

社会中弥漫。当军方在1967年预定的选举之前把人民激进公民联盟赶下台，并且创立一个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时，没有人认真地反对该举动。

在1955年至1966年时代的末期，所有声称可以得到超过总票数10%的党派（庇隆派、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都曾经被军事政变推翻过。在该“博弈”的第一轮（1958年）之后，它的徒劳性质变得很明显；然而在1963年，新一轮博弈在前述条件下发生，并产生前述后果。<sup>①</sup>那组拥有显著投票力量的党派筋疲力尽，那个“博弈”被最终证明不可行，加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分析的一般过程，这些导致了那个新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创立。

### 一些实质性含义

本章中的素材现在可以结合到前面各章提出的总体框架之内。

在高度现代化阶段，严重的社会僵化以及发展瓶颈倾向于造成一系列几乎无法应付的政治需求。特别是，平民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权力参与偏好程度很高，并得以持续表达，而且有重要的组织支持。鉴于继承而来的僵化性和发展瓶颈，这些需求往往被社会中更有权势的群体看作是“过分的”。

阿根廷的情况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平民群体的政治偏好，并不简单地因为一个重要比例的选民群体共享这些偏好，就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考量。庇隆主义随着时间流逝展现出的非凡持久力、它对无数试图摧毁它的企图的成功抵抗以及它动员强大的受到支持的证据——不仅在选举中，而且在许多非选举性的对其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存在的显示——的能力，如果离开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工会中的牢固基础，就无法得到解释。各工会一直给庇隆主义提供资源来为选战和公共舆论宣传战提供经费、提供受过训练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基层组织网络，并且保护了一个中央核心，使它免遭那些旨在把庇隆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而加以消灭的企图之害。

仅当有关政策偏好的差别被已经激活的诸群体当作政治要求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些差别才对全国性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变成重要问题，这正是平民

---

<sup>①</sup> 关于这次选举的进一步细节，参见：D. Rowe, “The Argentine 1963 Election” in D. Tomasek, e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Studies of the Contemporary Scen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6)。

群体在高度现代化形势下高度激活的特征。在经济增长受阻的地方，谁控制政府的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全国性“馅饼”将如何分配以及谁将为资本积累付出代价的问题。这种所有分配主张的强烈政治化，导致更有权势的群体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政治介入的正式开放的渠道是什么，他们都不应当让“无法处理的”平民要求有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然而，高度现代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政治激活）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而——或者阵营——的选民，他们在任何选举计算中都不能被忽视。

这里提出的模型可以被看作更一般情况的特例。在高度现代化的当代条件下，很可能随之出现高度的平民政治激活，它具有支持政治要求持续性的重要组织基础。鉴于这样的形势，以及产生于一般性零和条件下飘忽不定的经济增长历史，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都很可能服从一个基本约束，即，政府不应当许可一个政治上激活的平民群体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此处所提出的模型的“规则”是一种施加一般性约束——同样的约束显然曾经在政变前的巴西和希腊得以实行——的方式（被改造得适应国家的特殊性）。在这个更一般的层次上，民主制度面对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得到理解。可以预期，诸党派试图最大化它们的选票以赢得选举，并且取得当执政时将使它们有能力存续的其他形式的支持。当大多数非选举性政治资源出现在这样一些群体，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尖锐地对立于那个选举力量最大的单个集合体之时，该形势的逻辑将导致多数党派采取一个序列性策略：在选举时最大化选票数，然后在选举之间最大化其他的支持来源。

当然，这导致飘忽不定的、看起来不可预测的党派行为与政府行为。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党派和“政客”群体的威望都降低了，并且政治怀疑与疏离感增加。在这些条件下，党派吸收新成员以及长期计划和有效的政府运作，都受到严重阻碍。结果是产生了拙劣的政府绩效，并进一步破坏了对于党派和“政客”的公共评价。

除了政客们领导能力的一般贬损，这个“序列性”策略的一个重要效果是，那些更有权势的群体提出的“煽动性”或者“不负责任的拉选票”问题。在党派对选票的竞争中，使被激活的平民群体满意的许诺被作出、立场被采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政策被采纳，但却疏远了其他群体。然而，如果政府要存续，这些政策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得被逆转。这样，在加重了更有权



势的群体的利益刚性的同时,该序列最终几乎没有给平民群体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是增加了不满并进一步激活了这个大众群体。

该体制的绩效,将通过未得到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的持续程度,来加以度量。各党派对序列性策略的采用,被许多权势群体看作是在加深进一步激活平民的危险,这些权势群体认为,即使付出高昂代价,平民激活也必须被终止。另一方面,这些策略破坏着平民群体对原有体制存续的信誓,而该体制将被另外一个直接打算排除平民要求的体制所取代。

本章中所探讨的情形,对一个广泛流行的假设形成了挑战。在习惯上,对南美政治体系崩溃的决定性影响,被归因于政党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阿根廷 1966 年政变所产生的军政府以及大量写出来“解释”该政变的著作,都给出了这个解释。更普遍地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通过把“错误的”心理倾向归结给党派领导人以及其他政治精英,来“解释”阿根廷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拉美的)政治形势。我无法在此提供对这些看法的详细批评,但是也许值得指出它们共同的推理路线。第一,政治行为被鉴定为“不理性的”、“不负责任的”或者“功能失调的”。第二,因为政治行为已经被以这种方式所鉴定,那么“一定是”由于政治行动者遭受心理失调(无论是在价值、认知、动机还是个性层次上),才引起这样的行为。第三,被假定是产生于这些“失调”的倾向,被用来解释所关心的宏观层次上的因变量(比如说,缺乏有效的决策、政治不稳定或者威权主义)。第四,关于变动的“理论”以及有关政策的倾向是推导出来的,并且由于心理因素被认为是所观察到的政治形势的第一推动力,所以旨在变动的努力被认为应当聚焦于以下过程,即那些主要通过教育方式而可能改变这些倾向的过程。<sup>①</sup>同时,有理由假定,某种监护性的威权主义是最适

<sup>①</sup> 当然,这是当前丧失了信誉的“国民性格”学派的方法;一项有关的出色批评,见:A. Inkeles and D. Levinso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V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但是,在更时髦的“经验研究”的旗下(尽管他们没有能够恰好针对那些用以“解释”的变量以及在那些进行“解释”的层次上作出研究),可以在许多当代著作中发现这样的研究步骤。尤其见:T. Fillol, *So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1); K. Johnson, *Argentina's Mosaic of Discord* (Institut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s, 1969); Kirkpatrick; and James Payne,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后一著作在许多方面与我此处的论点互补,欲知对该著作的一项出色批评,见:A. Hirschman,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XXII, No. 3 (1970)。



合应对这些“错误”倾向的政治体制。

然而，社会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以及观察者作出的解读和解释，有赖于该社会行动所发生的情境。<sup>①</sup>如果行动者和观察者可以一致认为，一种形势提供了在 A、B 和 C 决定之间而不是在 D、E、……*n* 决定之间作出选择的机会，那么以下做法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定 E 是“正确”决定，因为一个行动者没有选择它而把“不理性”归咎于他，并且去根据这种“不理性”来“解释”整个的模式。换句话说，不可能无视情境变量地一味声称，对行动者行为的解释和解读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系统性后果进行描绘是可行的。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拥有悠久传统，它包括试图以诸多途径来详述特定情境，这些途径在学术上可以操作，并且对于研究目的来说，仍然与实际形势足够吻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就行动者对特定形势的认知和评估，以及观察者对该形势独立绘制出的“情境性图谱”之间的一致之处和不同之处，作出描述和解释。<sup>②</sup>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同在本章中那样），焦点相反：情境性图谱事先得到界定，并且给出了模型中“行动者们”简单的动机假设，从而演绎出他们的“决定”并对照实际过程加以检验。在演绎和观察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的限度内，观察者—分析者可能确信，模型中假定的情境和动机与它们在真实世界中相对应的东西相当接近。<sup>③</sup>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鉴于本章所研究的政治竞争的情境以及该情形下的联盟，正是党派领导人和选民的“理性”，导致了现存政治体系的腐蚀以及最终毁灭。这个结局和唐斯模型情境下同样的“理性行动者”所造成对体系加以支持的结果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在两种情形下，关于动机的假设是一样的，所以不同结局是不同情境造成的后果，在两个模型中，政治行

---

① 想要一个本方向上出色的近期观点，包含对诸多还原主义方法（reductionist approaches）的详细批评，见：Cardoso, *Ideologías*。

② 就像可能很显然的那样，这个策略要求取得数据（主要是采访数据），这些数据包含着所研究人群中个人对其社会情境的认知和评估的有关信息，这些信息被拿来和观察者描绘出的“情境性图谱”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该理论性—解释性的任务就展开了。一项在方法上自觉使用这一策略的近期研究是：Cardoso, *Ideologías*。

③ 这是经济学中常用的公理—演绎模型下的情况；见巴里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讨论。当然，这种抉择就所用的数据和变量而言更为简约，但是它只能应用于那些足够简单的情形，或者那些已经存在足够好的有关理论的情形，以使模型得到精确界定。否则，不可能对模型中“行动者们”的“行为”作出明确演绎，并且该策略将变得毫无用处。

动者们不得不在不同情境下行事。在这里提出的模型中，“理性行动者们”不是去维护政治体系，而是协助对其进行摧毁——正是因为他们的“理性”，而并非置之不顾。

除了它在理论性—方法论上的趣味之外，这个洞见可以带来重要的实践后果。可以理解，对于大多数全国性灾难来说，终极责任可能归因于党派人士，但仅仅是作为对促使政变的因素进行合理化，以及不愿意接受一个真正的政党体制所提供的开放政治权力所带来的“风险”。作为社会科学，这种对责任的归因表明，存在着一个朝向心理还原主义的极端倾向、辨别不同概念化层次的失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有关社会—政治现象知识的掌握明显不足，而这些现象正是想象中正在被加以解释的对象。无论如何，如果本章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的推论就极大地区别于那些从我刚才批评过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推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缓慢的社会化过程或者指导性的威权主义，而似乎在于党派竞争与选举变成了一个竞技场，来自所有被激活群体的政治要求在其中毫无约束地得到表达。对诸如本章所讨论的那类约束条件进行设置，本来有可能通过坚持它是拯救“民主制”为数不多的遗产的唯一途径来加以辩护，但是，鉴于高水平的平民激活程度，这些约束条件已被表明极大地扭曲了诸多政党被设想要进行的那场“博弈”。它很清楚地是一场“输家的博弈”。在这些或者类似的约束条件之下，党派竞争和联盟遭到了严重扭曲，朝一个威权主义方向崩溃成了最有可能的结局。

这样，鉴于具有高度现代化特征的高水平平民激活程度，公开的党派竞争和获得政治权力的渠道，是政治民主制存活的必要条件。悖论在于，如此水平的激活程度，以及它与飘忽不定的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联，可能在关键时刻把更有权势的群体引向勾结，让他们觉得无法承受公开政治竞争带来的“风险”。在这些群体控制着大多数非选举性资源的限度内，结果很可能是在那些受到严重局限的“民主制”之后出现各种威权主义。

在本章中，我们无法深入到关于诸多条件的复杂问题中，在那些条件下，这样一个悖论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它肯定不会通过以下途径而得到解决，即通过希望某种净化性经历将把党派领导人转变成典型的理性政治人。

\* \* \* \* \*

## 一些总结性评论

出于那些在这里对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序言中，本书被描述成一项“初步的”尝试。首要关注点一直是一项对当代南美政治的一些特定模式和倾向所作的分析（伴有一些重要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多方面的主题，我们已经就它设计出了新的问题和先进的新假设。在一场沉闷但必不可少的概念性和方法论讨论之后，我们致力于展示，在已经实现了带有高度现代化特点之社会分化的特定国家里，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如果有人愿意去假定（至少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假设）在高度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选择性亲和关系的话，那么整个一系列价值考量以及经验问题就会崭露头角——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在那个“乐观方程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一般来说，在各种概念表述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概念表述所假定的前提是，朝向“更好”或者“更成熟”形式的政治组织的线性进步。这些价值考量以及经验问题对研究造成了诸多问题。这里曾经指出了许多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数据不充分，只有几个得到了回答。然而，尽管缺乏数据，这类努力也有助于实现一个有益的目的。什么像是基本模式和倾向？关于这一问题的假设的认知和设计，是分析研究极端复杂的现实情况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的努力是迈向将会产生新数据的研究的一些初步步骤——这些数据将不会是不相关或者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的收集，发生在和非常不同的概念化相联系的情况下。

“现代化”这个概念，被分解成几个分析性与经验性的成分——特别是强调这些成分在南美最现代化国家中的相互联系。在共同的南美背景下，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出现在不同的问题空间中，按照这些问题空间来说，每个政治体系都依照各有特色的特别程序、联盟以及基本的公共政策偏好而运行。这些政治体系中与高水平现代化密切联系的一个，是官僚威权主义，它在南美的产生提出了那些引导本项研究的价值考量。正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层次上，社会和政治发展文献的基本范式及其“乐观方程式”的缺陷，尤其明显，这就

是为什么本著作一直如此强调当代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在南美大陆上最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

本研究中前两章的主题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发生的植入以及试图巩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接下来的两章里，详细考察了阿根廷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的过程和事件。我们设法强调，在当代南美，高度现代化倾向于巩固新的依附模式并且导致群众普力夺主义，而群众普力夺主义在正规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引入了严重扭曲。此外，它加重了平民群体的政治激活，那些更有权势的群体通过变得越来越顽固而对此作出反应，因此造成新的并且更大的障碍来有效地对付高度现代化的问题空间。不受规制的冲突、制度扭曲以及处理问题空间的有限能力，这些因素的联合效果是其他政治制度的削弱，而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制度，很难想象可以出现一个民主政治体并且得到巩固。这招致这样一个联盟的结成，在该联盟中，高度现代化使得更有力量的各种群体一致认为，政治上排除平民群体，是克服停滞和持续冲突的前提条件。从这一视点出发，消除选举舞台并随之消除政党，对于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来说，似乎必不可少。该联盟的胜利导致了一种新型威权主义的确立，它试图（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甚至进一步扩大高度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正是这种不平等分配使得它的出现成为可能。

官僚威权主义之前的准民主体制的基本缺陷之一，在于它们没有能力去规划并实施公共政策。但是，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几次指出的那样，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在这方面无论可能有什么优势，它们自己的内在缺陷都不仅仅是盖过了这些优势。阿根廷和巴西个案的演化中，存在着重要差异，我们已经简要地思考过这些差异。以技术官僚心态来看，巴西政治体制的表现可能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并且在其中，官僚威权主义的逻辑后果已经在大体上实现了——从笔者的观点来看，是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糕的。阿根廷个案即使就技术官僚心态来说也是个失败，并且不久之后，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在群众普力夺主义之下受难，而官僚威权主义所要加以消灭的正是这个群众普力夺主义。

一个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产生，是针对高度现代化众多紧张关系而很可能出现的反应。在这样一种体制和高度现代化之间假设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导致有人如是提问（带着某种担心）：处于现代化中间水平上的南美国家

是否正在越来越被“推向”官僚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我们的印象是它们的确如此，但是数据以及本书的分析都无法使我们有能力在探索这个问题上前进得更远。

在使用那个基本范式所进行的研究中，阿根廷是一个“悖论性的”或者“异常的”个案。在有关阿根廷的各章中，阿根廷政治上的不幸及其与高度现代化水平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明显的。显然，这个异常个案仅当作为那些错误预期的后果时是“异常的”，而那些错误预期是从那个范式衍生出来的。

在另外一个分析层次上，从本书中可以显而易见地得出，南美社会正在增加的复杂性，将造成对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的需要。然而，有关技术官僚角色担任者政治行为的可利用数据并不是非常令人振奋。似乎是产生于担任这些角色的心理倾向，和他们渗透最密集的大型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利益相互作用，使得这些任职者成为官僚威权主义实验的支持者。鉴于当代南美社会背景的严重紧张关系，在什么条件下这些任职者中决定性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支持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这是一个本研究只能加以系统阐述但很不幸无法加以回答的重要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某些是非常个人性的原因，笔者选择挑明自己的偏好。我相信，如果目标在于一个带来更多资源并且资源分配更优的更平等社会，那么在我们当前环境下，可以取得的最好东西，就是对所有政治行动者的要求都开放的政治民主制。显然，断言高度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意味着，至少对该水平的现代化程度而言，出现这种民主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出发点——首先，是未来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它更集中地针对问题并且建立在比本研究可以得到的更充分的数据基础上；其次并且最重要的，是作为有目的集体行动的出发点，该行动可以使得可能的变成现实的，并且使不可能的变得更有可能。



## 后记：1979年

在1979年，我是怀着一种悲哀的心情重新回到1971年所写的文本的。自那以后，南美国家发生了许多事情，如果从激发了这些书页的那些价值观念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中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可以被认为是正面的。

在1971年，阿根廷创建于1966年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正在解体；乌拉圭民主政体看起来受到威胁但仍然能维持；智利的人民团结(Popular Unity)政府许诺扩大其民主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而将在1973年9月突然发难的反对力量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形；尽管不是在民主框架内，但秘鲁政权保持着1968—1969年主要改革的势头，并且有力地确保了其军事平民主义的包容性和反寡头特征；同时，尽管条件非常不稳定，但玻利维亚的托雷斯(Torres)实验已经取得了其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建立了一个基于广泛平民支持的政权。而对于各有特色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来说，尽管它们在实现资源更公平分配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都没有引起关于有可能转向威权主义的担忧。保持不变的只有：政权反复波动的厄瓜多尔，世袭统治显然平静的巴拉圭，以及最重要的、其官僚威权主义由倾斜的经济“奇迹”所支持的巴西，它作为多数南美国家——这些国家不论好坏都能够保住它们的民主政权，或者似乎在经历了威权主义插曲之后正要重返民主——的首要例外而存在。此外，世界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尤其是产生了充足的资本——这些资本准备转移到那些提供吉利的“投资气候”的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出了这些书页。我确实感到惊讶，它们吸引



了比我曾经允许自己所期待的大得多的关注。<sup>①</sup>我也震惊于一些人的回应，他们感到该文本的思考基调（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说是悲观主义基调）没有适当反映出能评价南美未来的真实前景——就好像我在反驳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乐观方程式”时，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一样。然而，在我看来，在事件全景的背后，特定趋势似乎继续在进行——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分析的变化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些趋势正在把南美国家推向严格的威权主义统治。

得益于1979年的事后之明，重读此书给我带来一种距离感和矛盾心理。一方面，第一章现在是个考古遗迹——见证了一场在1971年刚刚开始而今天已经终结的争论：已经不再有必要引导读者穿过冗长的系列数据，来展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培育“民主以及/或者政治稳定”。在另一方面，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刻画了一些主要过程，它们导致我对可能降临在南美国家身上的命运感到一种深切关怀。当然，如果在今天，有一些地方我是不会以同样方式去写的，然而它留给我一丝苦涩的滋味，使我认识到尽管在几个方面不完整且不确切，但这项分析确定出了促成那些悲剧性事件——几个南美国家曾遭受这些事件之苦——的诸趋势。<sup>②</sup>

---

① 试比较：David Collier, "Introduction" and chs. 1 and 9 in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30, No. 4 (July 1978);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Item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31/32, No. 4/1 (March 1978)。在这些分析中，科利尔(Collier)不但做了一项令人钦佩的关于本书和我以后文章的综述，而且作出了尖锐批评，指出了分析我所提问题的新的重要视角。

② 在那之后，在研究这些主题方面，已经有显著进展。除了前面所引用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的文章之外，提到以下贡献就够了，比如：Albert Hirschman, "The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and Robert Kaufman, "Industrial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Latin America: A Concrete Re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both in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Estado y sociedad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2)。对我来说，我情愿相信，这里提出的一些论点在我之后所写的各篇文章中得到改进。在存在英文版本的文献中，尤其请见我的："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3, No. 1 (1978), pp. 3—38; "Corporat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in James Malloy, ed.,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该书包含其他关于研究拉美威权主义“新”形式的宝贵贡献；以及："State and Alliances in Argentina, 1956—1976," 它将在一本尚未命名的合集中出版，该书由罗纳德·赫尔曼(Ronald Hellman)和胡安·托雷(Juan C. Torre)编辑(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随后，第四章更详尽地聚焦于阿根廷：在1955年至1966年之间发生的特殊政党“博弈”的基础上，我讨论在具有平民群体高度政治激活的特征的环境下，植入和坚持政治民主制的一些必要条件。本章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带有阿根廷个案的特殊性质，但它仍然可能是今天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与其说（像本书中那样）是调查那些曾经并且可能继续向威权主义推进的过程，不如说是研究那些能使政治民主的实现成为可能<sup>①</sup>的条件，而这里所理解的政治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政权类型，还是作为一种更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

我希望这一点足够清楚：当前的文本建立在弃绝威权主义价值的基础上——特别是弃绝官僚威权主义的排除性的、社会倒退性的以及明显强迫性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对确定可导致民主制引入和巩固的条件的考虑，我相信民主制一定要包含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民主化方面的实质性进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及我之后的工作是持续探讨民主和威权主义两个主题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然，这个宏大主题允许有多种阐释。对我来说，我仍然相信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只能建立在人道主义价值的基础上，特别是对于平民群体来说更是这样，因为正是在那里，这些价值曾经并且继续受到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最系统性的拒绝。由于这个原因，就这些价值的改进而言，在我看来最有前途的前景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确切特点今天既无法闭门造车地辨别出来，也无法从挫败的局面中加以洞悉。如同我在本书中提出的那样，对于克服在1979年甚至比在1971年显得更是难以抵挡的可能性的东西，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挑战。<sup>②</sup>

另一方面，当一些拉美国家沉沦于某些极端严酷的威权主义形式，并且当诸如乌拉圭和智利这样的民主体仅仅作为反对派关于颠覆的记忆而存在

---

① 对于强调也许(possible)和很可能(probable)之间的重要区别，我受惠于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在本文中，对于旨在减少政治威权主义可能性(probabilities)的政治行动来说，这一区别被视为是根本性的。

② 每当某个作者不顾书中可以找到的相反证据，而把某些与我的想法无关的东西归诸于我的时候，我都不得不感到沮丧，比如说断言高度现代化“产生”官僚威权主义——一种对我设法反驳过的“乐观方程式”的简单颠倒。相反，当我说高度现代化所启动的那些过程倾向于引起威权主义的时候——或者按照韦伯的术语，当说这些过程和威权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时——我正力图指出那些有助于避免这种结果的条件。

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巴西的一个政治民主化过程，尽管该过程步履蹒跚、模糊不清并且尚不确定，但是却非常真实。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相当近期出现的官僚威权主义——上校们的希腊——也已经朝着现代化取得了不完全但却显著的进步。甚至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历史更长并且更巩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之中。在这些案例中，就像近期在阿根廷发生的那样，还不清楚是否民主化之春将仅仅是一段插曲，随之而来的是甚至更严厉的官僚威权主义。当然，有许多理由将此视为很可能的结果。

然而，政治同时受到学习能力的决定性影响。也许，不相信只有目前的掌权者能从历史中有所得，并非由于过于乐观之故。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在巴西和西班牙，它们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仍然栩栩如生的经历、对于过去失误苛刻的自我检讨以及对南锥体地区近期政治倒退的阐释方式，是反对派策略中的重要因素。没有理由相信，同样的学习过程将不会发生在以下国家（比如那些南锥体地区国家）：这些国家处于威权主义统治之下，并且该统治似乎注定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这些情形中，民主反对派也面临一个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在穿越这条路径的过程中，需要避开一些严重的风险——比如，在一方面，机会主义地接受现政权提供的粉饰性改进，而在另一方面，着手一项鼓吹并且使用暴力的策略。<sup>①</sup>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尤其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政权——摒弃某些非常基本价值的程度，也许将通过造成一些使仍然广泛存在的反对派联合起来的问题而反击它们——（至少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平等得多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各方面显著扩大参与的问题。

这些反思是我曾在这些书页中提出并一直在其他地方继续发展的主题的一个方面：官僚威权主义尽管有令人难忘的强制力量以及有关于“效率”和“理性”的堂皇言辞，但仍然是一种脆弱的政治统治形式。<sup>②</sup>其部分原因在于，由于社会“秩序”政策以及经济“正常化”政策所引发的各种反对力量，部分原因在于其

---

① 详细说明这些观点的一个初步尝试，见我的文章：“Notas sobre los procesos de democratización a partir de situaciones burocrático-autoritarias,” presented a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1979.

② 尤其见我的文章：“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and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制度结构中两种基本成分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武装力量(他们具有突出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并且有以一个牢固整合的民族为前提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由掌控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所组成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t)的以及效率导向的部分。这些政权脆弱性的标志在于,尚未解决的总统换届问题、几乎无法合理引发公众兴趣的公共和私人官僚体系的政治问题以及官僚式讨价还价和政府高层发出的爱国主义与尚武主义花言巧语之间明显的鸿沟。这些标志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显示这类政治统治脆弱性的裂痕,也是反对派杠杆可以插入其中以复活那些重大问题(从民主开始)的空间,而这个威权主义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交接给反对派。

空间、机会、可能性、目标以及价值。这些术语所指的,是在通过探讨一个远为复杂与动态过程中的因果连接而设法清理道路之后(就像这些书页中所作的那样),在本文中作为所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而提出的东西——从社会-经济到政治的步骤。疑虑或者悲观主义并不同于宿命论。在考察了那个连接(它尽管必不可少,但却最终是最无趣味的)之后,首要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当实现最终只不过是更人道的社会生活的目标的可能性似乎很低的时候,人们应当从事何种政治行动、由什么价值指导、体现于哪些社会行动者身上呢?这不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机:它只有在考虑到每种情形的特定历史之后才能得到回答——而不是从一个以决定性的但并非最终的挫败为其起点的历史中寻求答案。这样一个回答,要求对那些承担或者行使平民领导权的人所犯的错误(而且有时候不仅仅是错误)进行严肃反思。然而,尽管答案必须像通过政治行动而创造的历史那样保持开放,但是,重要的是记住,对官僚威权主义——它的动力、紧张关系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揭示了它使自身合法化并因而变成稳定政权所面临的内在困难。对于理论分析以及该理论寻求使其可理解的社会现实来说,这一点都具有核心意义。它与这种类型的政治统治与生俱来——如同我在本文中所论证的那样,这种政治统治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剧烈排斥此前激活的平民群体,根据技术官僚的“效率”标准系统惩罚全国性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重要利益。当然,在短期内,正是政权的脆弱性导致对其强制成分的强调,进而销蚀其合法化的可能性,并且威胁要进一步扩大关于谁是敌人的界定——那些国家疾病的带菌者,为了国家自身健康,必须接受激进手术。

今天,看一下本文所详细考察的那些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官僚威权

主义政权,会惊讶地发现,在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中,这些以及其他特点甚至更为显著。当然,这并非和冲突与困境强度的明显增加毫无关联,这些冲突和困境集中出现在这些书页所分析的时期和过程中——这令人沮丧地证实了在 1971 年吸引我的那些担忧。特别是,20 世纪 70 年代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官僚威权主义特征加重了,因为各个社会群体相信,他们正在步入所有社会秩序破裂——包括但不限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各国国际联系的消失——的低谷。这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妄想型的夸张,不如对以下问题的理解来得重要:某些平民领袖在什么程度上通过言论与行为助长了他们的恐惧(包括中间阶层对“无序”的惊恐)——他们对于自己必然会激起的反应,没有任何可能的响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变所要驱除的幽灵的恐惧,以及这些政变所导致的暴烈反应,表明了灾难的广度——从十分基本的价值的角度看,该灾难包括乌拉圭和智利民主制的崩溃以及阿根廷官僚威权主义程度更深的重现。它也是理解对平民群体的排除在这些新实验中受影响的严重性的关键;它还强调了所尝试的急剧经济转变——包括那些起初欢迎这些利维坦出现的人中许多人的垮台。最后,这段仍然鲜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我想要强调的机会:反对派进行学习的机会。它不仅是一个避免“极端主义”——它将会使仍然遍及这些社会的原始恐惧复活——的问题,而且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要被一个如此根本性地基于强制的政权的宏伟形象所彻底淹没。为了防止后一种倾向——它或者导致玩世不恭的非政治化,或者导致机会主义地接受现政权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对官僚威权主义以及显示其脆弱基础的标志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不管是否使用了官僚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拉美“新威权主义”(它和其他时期以及其他地区威权主义的相似性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得到探讨)现在已经在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知识科目。然而,除此之外,它的出现在这么多方面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含义,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一项最终是政治性的任务(增加实现更人道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的一个方面——尽管可以完全从学术立场来进行研究。它 1971 年时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以 1979 年的视角来看,它看起来甚至更是这样。

吉列尔莫·奥唐奈

1979 年 8 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 参考文献

- Adams, R. *The Second Sowing*.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7.
- Adelman, Irma, and Morris, Cynthia Taft.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 Aguilar, M. Alonso. *Teoría y polít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UNAM, 1967.
- Alejandro, C. Díaz. See Díaz Alejandro, C.
- Alexander, Robert J.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Alker, Hayward. "A Typology of Ecological Fallacies" in S. Rokkan and M. Dogg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9.
- Almond, Gabriel, and Verba, Sidney.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Anderson, Charles W.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7.
- Apter, David A. *Choice and the Politics of Allo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_\_\_\_\_.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 \_\_\_\_\_.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Arriaga, Eduardo E. "A New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s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XVIII, No. 2 (1970).
- Astiz, C. "The Argentine Armed Forces: Their Rol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II, No. 4 (1969).
- Baer, Wern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1965.
- \_\_\_\_\_. "Infl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o. 11 (1963).
- \_\_\_\_\_. "The Inflation Controversy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No. 2 (1967).
- \_\_\_\_\_, and Kerstenetzky, Isaac, eds. *Inflation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Baily, Samuel L. *Labor,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Origen del producto y composición del gasto nacional. Suplemento del Boletín Estadístico N. 6.* Buenos Aires, 1966.
- Barber, Willard F., and Ronning, Neale. *Inter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Power: Counterinsurgency and Civic Action in Latin America.*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Barry, B.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Ltd., 1970.
- Beltran, P.V., ed. *El papel político y social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América Latina.* Monte Avila Editores, 1970.
- Bendix, Reinhard.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 Bennet, D. "Ideology as Language. A Strategy for Research." Unpublished paper, Yale University, 1970.
- Botana, N. *La Légitimité: Problème politique.* Louvain, 1968.
- \_\_\_\_\_. "La crisis de legitimidad en la Argentina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riterio*, No. 1604 (1970).
- Boulding, Kenneth.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No. 19 (1958).
- Bourdieu, P., et al. *Le Métier de sociologue.* The Hague: Mouton and Bordas, 1969.
- Bourricaud, F. "Los militares: ¿Por qué y para qué?" *Aportes*, No. 18 (1970).
- Braun, O. *El desarrollo del capital monopolista en la Argentina.* Editorial Tiempo Contemporáneo, 1970.
- Brewer, G., and Brunner, R. *Organized Complexity: Empiric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Brunner, R., and Liephelt, K. "Data Analysis, Process Analysis, and System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7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Canitrot, A. "Nuestro desarrollo económico: Conflictos y interrogantes," *Criterio*, No. 1606 (1970).
- Cantón, D. *El parlamento argentino en épocas de cambio: 1880, 1910 y 1946.* Editorial del Instituto, 1966.
- \_\_\_\_\_. "Las intervenciones militares en la Argentina: 1900-1966."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1967.
- \_\_\_\_\_. "Revolución argentina de 1966 y proyecto naciona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V, No. 3 (1969).
- Caplow, T. "A Theory of Coalitions in the Tria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1 (1961).
- Cárdenas, G. *Las luchas nacionales contra la dependencia.* Editorial Galerna, 1969.
- Cardoso, F. *Cuestiones de sociología del desarroll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68.

- \_\_\_\_\_. *Empresario industrial 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Difusão Europeia do Livro, 1964.
- \_\_\_\_\_. *Ideologías de la burguesía industrial en sociedades dependientes (Argentina y Brasil)*. Mexico and Argentina: Siglo XXI, 1971.
- \_\_\_\_\_, and Faletto, E.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69.
- \_\_\_\_\_, and Reyna, L. "Industrializa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C. Balsier, ed., *Constructive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8.
- Casanova, P. González. *La democracia en México*. Mexico D.F., 1965.
- Chalmers, Douglas. "Developing on the Periphery: External Factor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J. Rosenau, ed.,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 Chertkoff, J.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Coalition Formation" in S. Groennings, et al., eds. See Groennings.
- Ciria, A. *Partidos y poder en la Argentina moderna (1930-1946)*. Jorge Alvarez Editor, 1964.
- \_\_\_\_\_. *Perón y el justicialismo*. Siglo XXI, 1971.
- CNRS. *Les Problèmes des capitales en 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65.
- Coleman, James. "Conclusio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Developing Areas" in G. Almond and J.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_\_\_\_\_. "The Mathematical Study of Change" in H. Blalock and A. Blalock, eds.,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 Collins, B., and Raven, B. "Group Structure: Attraction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V.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 Conde, R. Cortés. "Algunos aspectos de la expansión territorial en Argentina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 *Desarrollo Económico*, No. 29 (1968).
- \_\_\_\_\_, and Gallo, E. *La formación de la Argentina moderna*. Paidós, 1967.
-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Planes de Desarrollo*, various years.
- Cornblit, O. "European Migrants in Argentine 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C. Véliz, ed., *The Politics of Conform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_\_\_\_\_, Gallo, E., and O'Connell, A. "La generación del 80 y su proyecto: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in Torcuato di Tella et al., eds., *Argentina: Sociedad de masas*. Eudeba, 1965.
- Cornelius, W.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City-ward Mi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in F. Rabinovitz and F. Trueblood, eds., *Latin American Urban Research*, Vol. I.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0.
- Cotler, J. "Crisis política y populismo militar en el Perú,"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IV, No. 12 (1970).

- Croan, M. "Is Mexico the Future of East Europe? 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untington and Moore, eds. *See under Huntington.*
- Crozier, M.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Editions du Seuil, 1963.
- Cúneo, D. *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 Editorial Pleamar, 1967.
- \_\_\_\_\_. *El desencuentro argentino.* Pleamar, 1965.
- Cyert, Richard M., and March, J.G.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 Dahl, Robert A.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_\_\_\_\_.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_\_\_\_\_.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 \_\_\_\_\_.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_\_\_\_\_. "Some Explanations" in R.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Davis, Kingsle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for Social Science Purposes." *Population Reprint Ser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De Imaz, J.L. *Los que mandan.* Eudeba, 1964.
- \_\_\_\_\_. *Motivación electoral.* IDES, 1962.
- \_\_\_\_\_. "El 'técnico' y algunos sistemas políticos latinoamericanos." Unpublished paper, 1970.
- De las Casas, R. "L'Etat autoritaire: Essai sur les formes actuelles de domination imperialist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8 (1970).
- Deutsch, Karl.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 \_\_\_\_\_.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5 (1961).
- \_\_\_\_\_. "Toward an Inventory of Basic Trends and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4 (1960).
- \_\_\_\_\_, and Kochen, M. "Tow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Decentr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3 (1969).
- Dhrymes, Phoebus. *Econometrics: Statistic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 Diamant, A.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 Montgomery and W. Wiffin, eds.,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 Díaz Alejandro, C.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_\_\_\_\_. *Exchange Rate Devaluation in a Semi-Industrialized Country: The Experience of Argentina 1955-1961*.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
- \_\_\_\_\_. "On the Import Intensiveness of Import Substitution," *Kyklos*, Vol. III (1965).
- Di Tella, Torcuato. *El sistema político argentino y la clase obrera*. Eudeba, 1964.
- \_\_\_\_\_. *Hacia una política latinoamericana*. Arca, 1969.
- \_\_\_\_\_.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 Véliz, ed.,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_\_\_\_\_, and Zymmelman, M. *Las etapas del desarrollo argentino*. Eudeba, 1967.
- \_\_\_\_\_, et al., eds. *Argentina: Sociedad de masas*. Eudeba, 1965.
- Dix, R. "Oppositions in Latin America" in R. Dahl et al., eds.,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Forthcoming.
- Donghi Halperin, T. *Argentina en el callejon*. Editorial Arca, 1964.
- Dos Santos, T. "La Crise de la théorie de développement et les relations de dependance en Amérique Latin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2 (1969).
- \_\_\_\_\_.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X, No. 2 (1970).
- \_\_\_\_\_, et al. *La crisis del desarrollismo y la nueva dependencia*. Moncloa Campodónico Editores, 1969.
-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 Educación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la Argentina* (2 vols.). Argentina: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1969.
- Einaudi, L. "The Peruvian Military: A Summary Political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9.
- \_\_\_\_\_, and Stepan, A. "Lat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hanging Military Perspectives in Peru and Brazil."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1.
- Eisenstadt, S.N.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5.
- Etzioni, Amita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Fayt, C. *El político armado: Dinámica del proceso político argentino 1960-1971*. Ediciones Pannedille, 1971.
- \_\_\_\_\_. *La naturaleza del Peronismo*. Editorial Viracocha, 1967.
- Faría, V. "Dependencia e ideología empresaria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II, No. 1 (April 1971).
- Felix, D. "The Dilemma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Argentina" in G. Papanek, 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Ferreira, O.S. "La geopolítica y el ejército brasileño" in P.V. Beltran, ed., *El papel político y social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América Latina*. Monte Avila Editores, 1970.
- Ferrer, A. *La economía argentina: Las etapas de su desarrollo y problemas actual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63.
- \_\_\_\_\_, et al. *Los planes de estabilización en la Argentina*. Paidós, 1969.
- Fillol, T. *So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1.
- Fisher, F.M.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 Floria, C.A. "Una explicación política de la Argentina," *CIAS*, 1967.
- \_\_\_\_\_, and Belsunce, C. García. *Historia de los argentinos* (2 vols.). Argentina: Editorial Kapelusz, 1970.
- Fogel, R. "The Spec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XVII, No. 3 (1967).
- Freels, J.M. *El sector industrial en la política nacional*. Eudeba, 1970.
- \_\_\_\_\_. "Industrialists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An Opinion Survey of Trade Association Leader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XII, No. 3 (1970).
- Furtado, Celso. *Dialéctica del desarrollo*. FCE, 1965.
- \_\_\_\_\_. *Subdesarrollo y estanca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Eudeba, 1966.
- \_\_\_\_\_. *Teoría y política del desarrollo*. Siglo XXI, 1968.
- Gallo, E., and Sigal, S. "La formación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ontemporáneos: 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1880-1916)" in Torcuato di Tella et al., eds., *Argentina: Sociedad de masas*. Eudeba, 1965.
- Gamson, William A.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8.
- \_\_\_\_\_.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 Theory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6 (1961).
- \_\_\_\_\_.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4.
- Gastaldi, A. Petreli. *A economia brasileira e os problemas do desenvolvimento*. Edicao Saraiva, 1968.
- Germani, Gino.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un época de transición*. Paidós, 1962.
- \_\_\_\_\_. *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Paidós, 1969.
- \_\_\_\_\_, and Silvert, Kalman. "Politics, Social Structure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No. 2 (1961).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panish edition: Ediciones Ariel, 1970.]
- \_\_\_\_\_.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Giberti, H. *El desarrollo agrario argentino*. Eudeba, 1964.
- Graciarena, J. *Poder y clases sociales en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Paidós, 1967.
- \_\_\_\_\_. "Estructura de poder y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II, No. 2 (1971).
- Groennings, S.,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oalition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 Grondona, M. *Argentina en el tiempo y en el mundo*. Editorial Primera Plana, 1967.
- Hagen, Everett.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1968.
- Haire, M. "Biolog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Histories of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s" in Haire, ed., *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John Wiley, 1959.
- Hardoy, J., and Tobar, C., eds. *La urba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Editorial del Instituto, 1969.
- Hernandez Arregui, A. *La formación de la conciencia nacional*. Hachón, 1964.
- Hirschman, Albert O. *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3.
- \_\_\_\_\_. "Introduction" in Hirschman, ed., *Latin American Issue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0.
- \_\_\_\_\_. "Introductio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Possibilism" in *Essays in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_\_\_\_\_.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69.
- \_\_\_\_\_.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Vol. XXII, No. 3 (1970).
- Hobsbawm, E. "Latin America as U.S. Empire Crack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5, 1971.
- Holt, R., and Richardson, M. "Competing Paradig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R. Holt and J. Turner, eds.,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 Homans, P.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 Hood, William C., and Koopmans, Tjalling C., eds. *Studies in Econometric Method*. New York: John Wiley, 1953.
- Hopkins, Raymond. "Aggregate Data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XXXI, No. 1 (1969).
- Horowitz, Irving L. "La norma de ilegitimidad: Hacia una teoría general del desarrollo político latinoamericano,"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XXX, No. 2 (1968).
- \_\_\_\_\_. "Politics,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No. 2 (March 1967).



- \_\_\_\_\_. *Three World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Huntington, Samuel.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_\_\_\_\_.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III (1971).
- \_\_\_\_\_, and Moore, Clement H.,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Ianni, O. *Imperialismo y cultura de la viol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70.
- \_\_\_\_\_. *O colapso do populismo no Brasil*. Editorial Civilizacao Brasileira, 1968.
- Inkeles, A., and Levinson, D.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V.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Estatística. *Series Estatísticas Retrospectivas*. IBGE, 1970.
-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Los recursos humanos de nivel técnico y universitario en la Argentina*, 196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tistics*. Geneva, 1967.
- \_\_\_\_\_.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1967.
- Jaguaribe, H. *Desarrollo político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Eudeba, 1964.
- \_\_\_\_\_,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1970.
- Janos, Andrew A. "The One-Party Stat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East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in Huntington and Moore, eds. *See under Huntington*.
- Johnson, John J.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_\_\_\_\_.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Sect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Johnson, K. *Argentina's Mosaic of Discord*. Institut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s, 1969.
- Journal of the Patent Office Society*, Vol. XL, No. 2 (February 1964).
- Kaplan, M. *La formación del estado nac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69.
- \_\_\_\_\_. "Aspectos políticos de la planific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Aportes*, No. 20 (April 1971).
- Katz, J.M. "Características estructurales del crecimiento industrial argentino,"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VII, No. 26 (1967).

- Kenworthy, E. "Coalition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S. Groennings et al., eds. *See Groennings*.
- \_\_\_\_\_.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onist Coalitio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0.
- Kirkpatrick, J. *Leader and Vanguard in Mass Society: A Study of Peronism in Argentin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forthcoming.
- Klatzky, S.R.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Size to Complexity and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XV, No. 4.
-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Lambert, D. "Repartición de los ingresos y las desigualdades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XXXI, No. 2 (1969).
- Lambert, J. *Os dois brasis*. Brazil: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57.
- Landau, Martin. "Linkage, Coding and Intermediacy: A Strategy for Institution Build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 Vol. II, No. 4 (1971).
- Lane, J. "Isol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 Northeast Brazi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pring 1969.
- LaPalombara, Joseph. "Macrotheories and Microapplica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Widening Gap,"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I, No. 1 (1968).
- \_\_\_\_\_. "Penetration: A Crisis of Governmental Capability" in L.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 \_\_\_\_\_.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J. Powelson, ed., *The Disciplin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 Lasswell, Harold.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 \_\_\_\_\_. "The Policy Sciences of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Vol. XVII, No. 2 (1965).
- \_\_\_\_\_, and Kaplan, Abraham.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Leff, Nathaniel H. *The Brazilian Capital Goods Industry, 1929-19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_\_\_\_\_. "Import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Causes of the Recent Decline of Brazilian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67.
- Legg, Keith R. *Politics in Modern Gree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Lieuwen, Edwi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0.
- Linz, Jua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S. Rokkan, ed., *Mass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 \_\_\_\_\_.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arna, 1970.

- 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 Lopes, J.B. *Sociedade industrial no Brasil*. Difusao Europeia do Livro, 1964.
- \_\_\_\_\_. "Etude de quelques changements fondamentaux dans la politique et la société brésilienne," *Sociologie du Travail*, No. 3 (1965).
- Macario, S. "Protection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IX, No. 1 (1964).
- Malinvaud, 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Econometrics*.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Publications, 1970.
- Mamalakis, M. "The Theory of Sectoral Clash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IV, No. 3 (1969).
- March, James, and Simon, Herbert A.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8.
- Marsal, J.F. *Cambi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Solar-Hachette, 1967.
- Martins, L. *Industrializacao, burguesia nacional e desenvolvimento*. Editora Saga, 1968.
- \_\_\_\_\_. "Aspectos políticos de la revolución brasile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III, No. 3 (1967).
- Marx, Karl. *El 18 Brumario de Luis Bonaparte*. Ediciones Ariel, 1968.
- Maynard, G., and van Rijckeghem, W.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n Inflationary Economy: An Analysis of the Argentine Case" in G. Papanek, 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endes, C. *Nacionalismo e desenvolvimento*.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Estudos Afro-Asiaticos, 1963.
- \_\_\_\_\_. "Elite de poder, democracia e desenvolvimento," *Dados*, No. 5 (1969).
- \_\_\_\_\_. "O governo castello branco: Paradigma e prognose," *Dados*, No. 3 (1967).
- \_\_\_\_\_. "Sistema politico e modelos de poder no Brasil," *Dados*, No. 2 (1966).
- Merkx, G.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rgentina from 1870 to 1966."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68.
- \_\_\_\_\_. "Sectoral Clashe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Argentine Experienc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IV, No. 3 (1969).
-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Morello, A., and Tróccoli, A. *Argentina ahora y después*. Editorial Platense, 1967.
- Morley, Samuel. "Inflation and Stagnation in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XIX, No. 2 (1971).
- Morse, Richard. "The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in L. Hartz, ed.,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 Murmis, M., and Portantiero, C. "Crecimiento industrial y alianza de clases en Argentina, 1930-1940."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Documento de Trabajo*, 1968.

- Needler, Martin. *Generals vs. Presidents: Neomilitar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4.
- \_\_\_\_\_.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7.
- \_\_\_\_\_.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nstability, Violence, and 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Nordlinger, E. "Soldiers in Mufti: The Impact of Military Rule upo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Non-Wester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XIV, No. 4 (1970).
- North, Lissa.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Argentina, Chile, and Peru*.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 Nun, José. "Marginalidad y participación social: Un planteo introductorio."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1969 [mimeo].
- \_\_\_\_\_. "The Middle Class Military Coup" in C. Véliz, ed., *The Politics of Conform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O'Donnell, Guillermo. "Modernización y golpes militares: Teoría, comparaciones y el caso argentino," *Desarrollo Económico*, October-December 1972. (English version to appear in D. Apter and M. Barrera, eds., *Embourgeoisement and Radic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forthcoming.)
- OECD.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1967.
- Oficina de Estudios para la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Internacional. *Argentina económica y financiera*. FIAT, 1966.
- Olson, Mancur,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Organski, A.F.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5.
- Orsolini, Cl.M. *Ejército argentino y crecimiento nacional*. Editorial Arayu, 1965.
- Ozlak, O. "Inflación y política fiscal en la Argentina: El impuesto a los renditos en el período 1956-1965," *Documento de Trabajo*.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n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 Pan American Union. *América en cifras*. Washington, D.C., 1967.
- Panorama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No. 3 (1967).
- Papanek, G., 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ayne, James L.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etras, James. "Una década de democracia capitalista en Venezuela,"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IV, No. 12 (1970).
- Pinto, A. Costa. *Nacionalismo y militarismo. Siglo XXI*, 1969.
- \_\_\_\_\_. *Tres ensayos sobre Chile y América Latina*. Argentina: Ediciones Solar, 1971.
- \_\_\_\_\_. "Naturaleza e implicaciones de l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 en América Latina,"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Vol. XXXI, No. 1 (1970).

- Potash, Robert.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1928-1945: Yrigoyen to P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Prebisch, Rau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ILPES and IDB, 1970 [mimeo].
-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Mensaje al País del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Teniente General Juan Carlos Onganía," 1966.
- \_\_\_\_\_. "Mensaje de la Junta Revolucionaria al Pueblo Argentino," 1966.
- \_\_\_\_\_. "Mensaje del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en la reunión de camaraderí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1967.
- \_\_\_\_\_. "Mensaje del Teniente General Juan Carlos Onganía con motivo de asumir la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 1966.
- Price, Robert.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Military Rule in New States," *World Politics*, Vol. XXIII, No. 3 (1971).
- Przeworski, A., and Teune, H.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1969.
- Putnam, Robert. "Toward Explain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XX, No. 1 (1967).
- Quijano, A. "Dependencia, cambio social y desenvolvimiento social" in F. Cardoso and F. Weffort, eds., *América Latina: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sociológico-política*. Chile: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70.
- Rabinovitz, Francine. "Data Resources for Cross-National Urban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A Proposal,"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IX, No. 3 (1970).
- \_\_\_\_\_. "Urba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R. Daland, ed.,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69.
- \_\_\_\_\_, and Trueblood, Felicity, eds. *Latin American Urban Research*, Vol. I.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1.
- Rama, C. "El sistema político colombiano: Frente nacional y ANAPO," *Centro Paraguayo de Estudios Sociológicos*, 1970.
- Ramos, J.A. *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la Argentina*. La Reja, 1961.
- Rapoport, Anatol. *Two-Person Game Theory: The Essential Idea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 \_\_\_\_\_. *N-Person Game Theor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 Rattenbach, B. *El sector militar de la sociedad*. Circulo Militar Argentino, 1966.
- Riker, William H.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Robinson, E.A., e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0.
- Rokeach, Milton. *The Open and the Close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 Rotondaro, R. *Realidad y cambio en el sindicalismo argentino*. Fleamar, 1971.
- Rowe, D. "The Argentine 1963 Election" in D. Tomasek, e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Studies of the Contemporary Scene*.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Russett, Bruce M.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_\_\_\_\_. "The Yale Political Data Program: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in S. Rokkan and R. Merritt, eds., *Comparing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_\_\_\_\_, et al.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Saravia, J.M. *Hacia la salida*. Emece, 1968.
- Sarbin, T.R., and Allen, V.L. "Role Theory"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8.
- Sartori, G.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XIV, No. 4 (1970).
- Schmitter, Philippe C.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_\_\_\_\_. "Nuevas estrategias para el análisis comparativo de la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V, No. 3 (1969).
- Scobie, James R. *Revolution on the Pampas: A Social History of Argentine Whea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 Scott, Robert E. *Mexican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9.
- \_\_\_\_\_. "Mexico: The Established Revolution" in Lucie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Silva, Couto. *Geopolítica do Brasil*. Livraria Jose Olimpo Editora, 1967.
- Silvert, Kalman H. *The Conflict Society: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66.
- \_\_\_\_\_. *Man's Power: A Biased Guide to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 \_\_\_\_\_. "Liderazgo político y debilidad institucional en la Argen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I, No. 3 (1963).
- \_\_\_\_\_.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34 (1961).
- Simon, H.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No. 10 (1965).
- Singer, Morris. *Growth, Equality and the Mexican Experi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 Solberg, Carl.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Argentina and Chile, 1890-191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0.



- Skidmore, Thomas E. *Politics in Brazil, 1930-1964: An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lawinski, Z.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Latin America's Development,"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X, No. 2 (1965).
- Smelser, Neil.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0.
- Smith, Peter H. *Politics and Beef in Argentina: Patterns of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_\_\_\_\_.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in Argentina, 1916-1930."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arna, 1970.
- \_\_\_\_\_.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Rise of Juan Peró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XIV, No. 1 (1969).
- Snow, P. "Argentin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1966 Revolution." Ames: Laboratory of Polit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owa, 1968.
- \_\_\_\_\_.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The Elections of 1962 and 1963,"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IX, No. 1 (1965).
-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Latin Americ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Latin America—1968*.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
- Stavenhagen, R. "Seven Fallacies about Latin America" in J. Petras and M. Zeitlin, eds.,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8.
- Stein, Stanley J., and Stein, Barbara H.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Essays on Economic Dependenc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tepan, Alfred.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s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_\_\_\_\_.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X, No. 2.
- Stokes, D. "Spatial Model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7 (1963).
- Sunkel, O. "La universidad latinoamericana ante el avance científico y técnico: Algunas reflexione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III, No. 4 (1970).
- \_\_\_\_\_. "Política nacional de desarrollo y dependencia externa,"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I, No. 1 (1968).
- Tavares, M.C.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Brazil,"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IX, No. 1 (1964).
- Thompson, D'Arcy. *On Growth and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Thompson, James D.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 Tornquist, Ernesto, and C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Buenos Aires, 1919.
- Tufte, R. "Improving Data Analysis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XXI, No. 4 (1969).
- Tukey, J.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0.
-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tandards of Living: An Interim Guide." E/CN.5/353.
- \_\_\_\_\_.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tandards and Levels of Living." E/CN3/3/179 and E/CN/5/299.
- UN-ECL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IX, No. 1 (April 1966).
- \_\_\_\_\_. *El cambio social y la política de desarroll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New York, 1969.
- \_\_\_\_\_.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la Argentina* (5 vols.; mimeo). New York, 1959.
- \_\_\_\_\_. *El desarrollo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Solar-Hachette, 1963.
- \_\_\_\_\_.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Solar-Hachette, 1963.
- \_\_\_\_\_. *El empresario industrial en América Latina*.
- \_\_\_\_\_.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1969*. New York, 1970.
- \_\_\_\_\_. "Estudios especiales: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in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New York, 1970.
- \_\_\_\_\_. *External Financing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 \_\_\_\_\_. "Income Distribution for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XII, No. 2 (1968).
- \_\_\_\_\_.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XIV, No. 2 (1969).
- \_\_\_\_\_.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6.
- \_\_\_\_\_. *Statistical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IV, No. 2 (1964).
- \_\_\_\_\_. and Consej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CONADE).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la Argentina*. New York, 1968.
- UNESCO. *Yearbook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68*. Paris, 1969.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August 1964.
- Vekemans, R., and Segundo, L. "Essay of a Socio-Economic Typology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J. de Vries and J. Medina Echavarría, eds., *So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Vol. I. 1963.
- Verba, Sidney. "The Uses of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ssues and Strategies" in S. Rokkan et al., *Comparative Survey Analysis*. The Hague: Mouton, 1969.
- Verón, E. *Conducta estructura y comunicación*. Jorge Alvarez Editor, 1969.

- Villanueva, J. *La inflación argentina*. Instituto Torcuato di Tella, 1964 [mimeo].  
\_\_\_\_\_. "El problema del desarrollo industrial dependiente," *CIAS*, December 1969.
- Villegas, O. *Guerra revolucionaria comunista*. Fleamar, 1963.  
\_\_\_\_\_. *Políticas y estrategias para el desarrollo y la seguridad nacional*. Fleamar, 1969.
- Walker, N. Aguiar. "Moviliz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 en el Brasi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I, No. 3 (1967).
- Weffort, F. *Estado y masas en el Brasil*. ILPES, 1967.  
\_\_\_\_\_. "Le Populisme," *Les Temps Modernes*, 257 (October 1967).
- Whitaker, Arthur P. *Argentina*.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1.  
\_\_\_\_\_. "The Argentine Paradox,"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334 (1961).
- Wolf, C.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Economic Programs: Some Indications from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XIV, No. 1 (1965).
- Wonnacott, Ronald J., and Wonnacott, Thomas H. *Econometr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70.

附：

## 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 与民主问题\*

献给我崇敬的卡尔曼·西尔弗特(Kalman Silvert)。

现实是不可抗拒的。197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集中关注那时存在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并且坚信这种类型的国家将很快在阿根廷重现。<sup>①</sup>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促使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出现的条件,但是我的兴趣已经转到了研究这类国家的内部紧张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所产生的动力。现如今,在1978年末,伴随着巴西朝政治民主谨慎而意义重大的推进,智利和乌拉圭受制于似乎没有遇到严重挑战的支配体制,阿根廷处于植入官僚威权主义的第一阶段,我乐意重新思考官僚威权主义的内部紧张关系与它对社会的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我早先的文章相比,这里我只考察官僚威权主义演化的第一阶段,以及在官僚威权主义内部我以前未予充分分析的那些因素的影响,即,严格的政治因素,特别是民主问题。在表面层次上,返回民主的可能性正被现存的拉美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提出,这可归因于他们的“虚伪意识”或外部压力。然而,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我将论证,意义深远和持久性的问题是有关这种国家的性质的。我认为,民主议题无论怎么说都已被提出(不管它是

---

\* 本文1979年初次发表于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编《拉美的新威权主义》(*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年收入奥唐奈论文集《另一种观点:威权主义和民主化论文选》(*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收入时有删节。本文根据1999年版译出,经原作者授权。

① Guillermo O'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winter 1978): 3-38, 最先在巴西 Campinas 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会议”上提交,并作为 CEDES 文件出版,GE-CLACSO, no. 1, 1975。

否可称为“有机民主”、“责任”民主或甚至“威权主义”民主),这一事实显示出官僚威权主义核心内部基本的紧张关系,以及与这种国家所排除的那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

这个主题是重要的,因为集中于官僚威权主义的表面特征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官僚威权主义的诸制度看来通常是一种巨大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其华丽的修辞对优越的理性表示赞许,它们把这种理性加到整个国家上以将它从其最深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这些制度也给人以在对他们宣称要实现的进步所做的“不偏不倚的”和“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变化和适应的表象。然而在这种外表之下,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经受着一些紧张状态——对立冲突、两难选择和危险境地<sup>①</sup>——这些紧张状态反映了巩固一种支配体制的异常困难,这种支配体制既不能隐藏它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事实,也不能隐藏其最关键的支持者代表范围比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宣称所服务的整个国民要狭窄得多的社会阶层的事实。它的统治是极其压制性的,因为根据它产生的性质,官僚威权主义必然引起其合法性意料中的丧失。官僚威权主义产生于平民群体及其同盟——他们终被看作是对社会基本因素的严重威胁——的巨大政治失败。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在官僚威权主义下可能像民主话题一样超现实的话题。

### 一、关于国家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主要调解因素是民族(nation)。我用“民族”意指界定了某一种“我们”的集体身份,这个“我们”一方面是由叠加在市民社会的多样性和对抗性之上的一致性网络构成的,另一方面是由对不同于某个构成其他民族的“他们”的集合体的认知构成的。该民族是通过密集的象征主义来表达的,这些象征主义既由旗帜和国歌来体现,也由一部官方历史来体现,该官方历史把共享的、有凝聚力的过去神话,并颂扬一个将战胜市民社会中诸裂隙的集体性的“我们”。

另外还有两个基本的政治调解因素。一个是公民身份,它是在双重意义

---

<sup>①</sup> 一个类似的论点由施米特提出: 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 1, November 1975): 5—53.

上而言的：(1) 抽象的平等，它——基本上通过普选权和相应的政治民主政体——是那种宣称政府角色担任者运用的权力是基于公民同意的观点的基础；(2) 面对国家机构的任意妄为时求助法律保护的权利。第二种调解因素是“人民”(pueblo)或“平民”(lo popular)\*，它在拉美异常重要。这个调解因素以一种“我们”为基础，该“我们”既不是来自于共同具有的公民身份的观念——它包含抽象的平等权利，也不是来自于民族观念——它包含平等地适用于所有那些属于该民族的人(不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的具体权利。毋宁说，“人民”或“平民”包含一种“我们”，该“我们”是实质性正义需求的承载者，这些实质性正义形成了国家对国民中不占优势的部分人的义务之基础。

这个民族观念的有效性使国家机构得以作为实现和保护一个普遍利益——超脱于市民社会的帮派主义和对立性的“我们”的普遍利益——的机构而出现。此外，公民身份和“平民”观念的有效性为国家机构运用权力以及最终运用高压强迫提供了另一个共识性基础。它们之所以起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国家只可能被外在于它自身的对象——而且国家机构被认为是服务于这些对象的普遍利益的——合法化。正如我已指出的，这些对象一般是民族、公民身份以及至少在拉美还包括的“人民”。从这些对象中，通常出现超越市民社会可能产生的阶级和其他裂隙的集体身份。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都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取得共识中以及相应地在合法化国家机构的权力运用中发挥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调解因素是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性主体超越了他(她)的私人生活。通过按民族符号认定自身、行使公民的权利以及最终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实质性正义的要求，社会性主体超越了日常生活并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我们”是国家机构所引致的同一东西。因而，这些机构并非通常作为社会支配的组织者和保证者出现，而毋宁说是作为通过民族、公民身份和(或)“人民”的调解表达出来的普遍利益的代理者出现。

## 二、官僚威权主义国家

官僚威权主义是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它的主要特征是：

---

\* 原文中，pueblo 和 lo popular 两个单词没有译为英文，因为英语中与此最接近的“people”和“popular”具有不同的意义。这里姑且将它们译为“人民”和“平民”。——译者



1. 首要地，它是某种支配关系的保证者和组织者，该支配关系通过一个从属于一小部分垄断性的、跨国经营的上层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来行使。换言之，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

2. 在制度方面，它由这样一些组织构成：在这些组织中，专长于高压政治的人以及那些目标是[通过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经济“正常化”<sup>①</sup>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分量。这两个群体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制度性地表达了其自身的行动者对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任职者致力于完成的两项重大任务的认定：一方面是依靠对平民群体的政治钝化在社会中重建“秩序”，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正常化。

3. 它是一个政治上排除以前被激活的平民群体的体制，在试图消除其以前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作用的情况下，平民群体受到严格的控制。通过摧毁或夺取支持这种激活的资源（特别是那些体现在阶级组织和政治运动中的资源），这种政治排除得以实现。此外，该排除受以下决意的引导：对社会施加一个压制型的“秩序”并保证它未来的有效性。对于巩固官僚威权主义所保证的社会支配，以及在实现了经济的正常化以后对于重启以资源不平衡分配为特征的高度跨国型的经济增长，该秩序被看作是一个必要条件。

4. 这个排除包括在上面所界定的双重意义上对公民进行压制。特别是，该压制包括中止政治民主机构。它也包含对“平民”的拒绝：它禁止（运用强制手段施行禁止措施）诉诸作为“人民”的群体（当然，还有作为阶级的群体）。对制度性角色和进入政治民主特征的政府的渠道进行压制，在很大程度上导向取消这样一些角色和组织（包括政治党派）：它们本来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渠道——在官僚威权主义下，实质正义被认为是与秩序的重建以及经济的正常化不相容的。此外，官僚威权主义似乎是在面对着一个不健全的民族，而该民族的普遍利益正是它所祈愿的；然而，由于在官僚威权主义出现之前的危机深重，官僚威权主义不可能宣称代表这个民族——它被认为是被无数的内部敌人所污染。因而，官僚威权主义是基于对两种根本性调解因素——公民身份和“平民”——的压制。更进一步地，它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引起了另

---

<sup>①</sup> 我用这个用语指掌控官僚威权主义的经济机关的文职技术官僚所承担的任务，他们的目标是以一种将获得主要资本主义利益群体——在官僚威权主义的第一阶段首先是跨国金融资本——信心的方式，稳定特定的关键变量（比如通货膨胀率和贸易支付差额）。

一种调解因素——民族，但只是将其作为一项它打算通过剧烈的外科手术措施来完成的“工程”（而不是作为目前的现实）。

5. 官僚威权主义也是一种经济上排除平民群体的体制，因为它推动的那种资本积累模式高度地向有利于大的垄断性私人资本单位和某些国家机构倾斜。原来就存在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因而极大地提高了。

6. 它相符于、并且促进生产结构的日益跨国化，就它在该国家所行使的权力的领土范围内被包含的程度而言，这导致了社会更进一步的去国有化。

7. 官僚威权主义凭借它的机构，按照假设的技术理性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标准来处理社会问题，以努力将这些社会问题“去政治化”。这个去政治化的做法对禁止提出与“平民”相关联的实质正义问题的做法构成补充，这些实质正义问题被指控引入了“非理性”和“不成熟的”需求，它们干扰秩序重建和经济正常化。

8. 在我们这里正在考虑的官僚威权主义的第一阶段，它的政治体制——该体制虽然通常不是形式化了的，但却是清晰可鉴的——需要关闭进入政府的民主渠道。更一般地，它需要关闭表达平民和阶级利益的渠道。这样的渠道被局限于那些居于大型组织（公共的和私人的）、特别是军队和大型垄断企业顶端的人。

### 三、支配体制中的模糊性

在官僚威权主义权力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什么？就什么方面而言，一个国家的机构的华丽修辞——它们所针对的是该国家即使违背其意愿也要决心挽救的一个病态的民族——是该国家固有的不确定性和软弱性的一种标示？官僚威权主义是一种包含强烈对立趋势的国家。一方面，官僚威权主义包含社会的强烈去国有化，去国有化首先是作为急迫寻求跨国资本——它是经济正常化的前提条件——的结果而发生的，随后则是出于为了使这样的资本流入持续而维持“有利的投资景气”的需要。同时，官僚威权主义需要民族的急剧收缩、对公民权利的压制以及禁止诉诸“人民”。这种收缩来源于平民群体及其同盟的挫败；来源于该群体的政治激活似已对社会基本的资本主义因素之存续造成的威胁所引发的反应；以及——一旦官僚威权主义已经植入——来源于施加一种以对平民群体的政治和经济排除为基础的

特殊社会“秩序”的目的。

这样的排除看来像是治愈民族机体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官僚威权主义看来，民族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部分机体染病，为了它自身的利益，有必要施行手术将平民群体及其“颠覆性的”盟友排除出去。该排除包含着重新界定民族的范围——无论是促进了这种疾病的部门，还是已经染病的部分机体都不能属于该民族。它们是该民族机体内部的敌人<sup>①</sup>，是官僚威权主义所要建设的新的健康民族的“异类”。当统治者说到民族的时候，其所指的对象被他们观点的逻辑限制为远不如过去那样具有综合性的“我们”；只有那些符合他们对未来民族设计——社会和谐的和以及技术性的设计——的人才能属于该民族。

像所有国家一样，官僚威权主义也声称是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没有包括整个人口在内的综合观念这样一个民族所指，所以官僚威权主义机构的华丽修辞必须将民族的意义“国家化”——与此同时，就经济正常化而言，同一修辞在为强劲的私有化辩护。如此将民族观念国家化，意味着它的普遍利益被等同于官僚威权主义的成功——寻求在社会中建立一种压制性秩序以及使经济正常化。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机构看似不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服务于一种高于且外在于它们自身的利益，它们通常通过该作用使其自身合法化。毋宁说，在官僚威权主义下，当这些国家机构按照排除和国民弱点重新定义该民族的时候，它们所行使的权力就不再有外部的合法化基础，而是不得不作为它自己的基础。换言之，支配变得赤裸裸的，并弱化了它的共识性的调解因素；它自身以公开的人身和经济强迫的形式出现。此外，对公民身份的压制，加之禁止政治上求助“平民”，从根本上取消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其他合法化调解因素。

这些官僚威权主义机构试图通过集中利用武装和爱国符号，来填充由此产生的真空。但是，这些符号如果不想成为仅仅是浮华辞藻的修辞的话，就必须固定为某种前述的调解因素。官僚威权主义的领袖们也试图通过邀请“参与”来重建与社会的调解因素；但是该国家对它自己作为民族代表的角色的否认，以及取消“人民”和公民权利，意味着这样的参与只可能包含被动地

<sup>①</sup> 当然，这个有机的想象被“国家安全”的学说所强化。

赞成对这些国家机构所从事的任务进行观察。

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威权主义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是它的任职者经常称作“默示共识”的东西，即去政治化、冷漠以及所有国民撤回到高度私人化的日常生存状态。还有恐惧。失利者和官僚威权主义的反对者的恐惧，它产生于官僚威权主义显著的强制能力。胜利者的恐惧，他们时刻担心倒退回植入官僚威权主义以前的形势。还有那些实施人身强制的人，对任何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倒退的“政治解决”的恐惧。这最后一种恐惧有时似乎将他们驱赶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除非强制与经济支配之间的联系得到揭示，否则不会有共识。然而在官僚威权主义中产生了相反的情形。此外，在官僚威权主义中，强制与经济支配的接近将两个社会行动者并列在了一起——军队和上层资产阶级，他们通常在政治层面上被前面提到的调解因素所分离，在该国家的制度层面上被文官制度和民主代表制的各种机构所分离。这就是说，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它在国家机关中的“桥头堡”——制定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给予官僚威权主义的决定性支持，直接与军队交叉。上层资产阶级与技术官僚有一种强烈的跨国倾向——既在他们的信仰方面也在他们的经济行为方面。对他们来说，民族的政治边界基本上是一种对生产要素移动、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跨国层面上的效率考量所施加的无益的约束。这些观点与这些相同的行动者所持的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狭隘性的观点相冲突。此外，这些行动者是这些社会的最完全和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成员：他们毫不掩饰地追求利润——利润是高度集中的资本积累后面的驱动力，他们宣称它同时促进总的福利。

然而，官僚威权主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它的另一个核心行动者——军队——倾向于是国家机构中最民族主义的和最不资本主义的。怀着他们的使命感、他们用以社会化其成员的尚武价值、他们关于国家安全的学说——该学说预设了一个由高度同质性所刻画民族，军队是这样一个国家机构：它最容易把恰当的政治行为界定为由一种闭关自守和排外主义的民族观念所激发的政治行为。此外，对军队的大多数成品来说，利润动机似乎至多是次要的，与源自他们自己取向的更大的考量和理想相比，它是肮脏卑鄙的。利润或许是必要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应“过分”或与同质化民族之

全体的使命相抵触。<sup>①</sup>

#### 四、对调解因素的渴望或民主问题<sup>②</sup>

官僚威权主义的存在，只有作为面对觉察到的取消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严重威胁——无论过去的还是未来潜在的——之深渊时的替代选择，才是可理解的。我已阐述了这一看法的一些理由，不过这儿概述一下主要的理由是适当的：(1) 官僚威权主义极大地削弱或压制共识通常基以建立的调解因素；(2) 它完全暴露了该国家的根本（然而通常并非唯一的）现实——强迫；(3) 它也暴露了以下事实：上层资产阶级是这个国家主要的——至少在经济正常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唯一的——社会基础；(4) 作为这些国家在其中演化的历史背景的一个结果，这一小部分资产阶级显然是这些国家的最缺少民族性的因素；(5) 专司强制的组织在该国家的制度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组织的价值和行为与该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上层资产阶级——的价值和行为并不一致。

这类政治支配的次优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合法化的民族对象收缩所产生的脆弱性，对公民身份和“平民”等调解因素的压制，对平民群体的政治和经济排除，它的任职者对可能在社会的沉默表面下酝酿着的反应——该反应是施加秩序和正常化所产生的高成本的一个结果——的恐惧。

然而，如何创造出调解因素，以使它们解决对该官僚威权主义来说的“源自权力孤单性的困难”？<sup>③</sup>一种解决方法当然是以一种新形式引入拥有主政党

---

① 在仔细考察已经出现了官僚威权主义的国家中的军队的倾向性之后，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概括。然而，这个主张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军队的上层可能被那些更偏向于上层资产阶级之倾向的集团所控制。这个更大的亲和关系无疑会弱化我下面分析的那些问题——但它并不消除这些问题，因为它似乎意味着该军队领袖集团对军队的控制将更危险。高层军队领袖、上层资产阶级和官僚威权主义的经济管理团队的官员态度之间的这种一致性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巴西 1964 年至 1967 年的卡斯特卢·布朗库(Castelo Branco)及其集团。另一个例子是阿根廷 1971 年至 1973 年的拉努塞(Lanusse)总统任期。然而，在这个例子中，并不是所企求的官僚威权主义的巩固，而是关于其破产的谈判。

② 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如果不提到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根本性贡献就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参阅他的 *Authoritarismo e Democratizacão*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75)。

③ 阿根廷总统、陆军将军魏地拉(Videla)的用语，引自：*Cronista Comercial*, April 27, 1977, p. 1。



(革命制度党)的墨西哥政治体制,它提供这些调解因素,同时有效地帮助防止平民挑战。然而,革命制度党可能只是一种怀旧性的渴望,因为它的起源正是我们这儿考虑的情形下所产生的东西的对立面:一场平民革命,而不是植入官僚威权主义的恐怖反应。另一种可能性将会是社会的组合性结构化。但是组合主义要真正取代消失了的调解因素,它就必须把整个社会融合到一种从属性的形式中去,而不是仅仅把它自身局限于作为国家控制工人的一种形式。而这正是上层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它没有理由拒绝重新施加对平民群体的严厉控制,但上层资产阶级作为官僚威权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者,为什么要接受被融合进一个从属于它的国家?出于这一原因,尽管它对官僚威权主义中的许多行动者有重要影响,组合主义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如它的不可实现性一样古老的乌托邦。组合主义可能适于——以对工会严格控制的形式——巩固一个阶级胜利,但不是作为一种取代官僚威权主义所压制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调解因素的方式。<sup>①</sup>

如果某种形式的革命制度党是不可能的,如果组合主义不能取代缺失的调解因素,以及如果该国家对“参与”的规劝得到的回应是社会的沉默,那么剩余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热烈渴望官僚威权主义激烈拒绝的那个东西:民主。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它反映了一个没有调解因素的国家的基本问题、因而一个赤裸裸的支配体制的根本问题,那么来自于官僚威权主义的这个术语的使用将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政治民主恢复,那么至少公民身份这一调解因素会重新出现。其结果是,许多社会成员将再次被当作、并视他们自己为以一种抽象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平等形式参与的参与者——除了恢复某些基本法律保证的含义之外。这样,国家权力的基础可能归之为这个外在于国家的源泉——一个对它的合法化来说并不充分、然而必要的条件。政治民主的恢复,也使调解因素缺失和该国家的军事化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总统轮续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从上层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将具有以下优势:降低军队的制度重要性,使它得以通过各种民间团体缓和与军队的联系,以及——最根本地——减轻官僚威权主义赖以支持其社会支配的

---

<sup>①</sup> 我在以下文章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Corporat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in James M. Malloy, ed.,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强制的显著程度。

然而，是何种民主？从官僚威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它将必须是这样的一种民主：该民主实现所有这样或那样的奇迹，同时维持对平民群体的排除。特别是，它将必须是那种维持对“人民”和阶级的诉求进行压制的民主。这样的压制预先假设：对组织和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的严格控制得以实现，以及对那些占据民主制将重新开放的制度性位置的人的可允许的言论进行控制。对这个哲学家之石的寻求，通过种种限定性的形容词表达了出来，这些形容词在官僚威权主义任职者的修辞中通常与“民主”这个术语相伴。

一种基于“默示共识”并且如此公开的——尤其是如此公然强迫性的——支配能持续多久？面对市民社会的沉默和不透明性，一个国家机关能存续多久？现如今还能有多少佛朗哥(Franco)的西班牙和萨拉查(Salazar)的葡萄牙？这种国家的领袖们除了寻求这样一些解决方法——该解决方法使官僚威权主义所体现的政治支配体制和它所支持与组织的社会支配成为可能，以使人相信它能延续到遥远的未来并成为支配性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这些问题指向了那种自我宣称是一个强势权力、并且一度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强势权力的国家的软弱性。这种国家的任职者和支持者在面对市民社会的沉默时的恐惧、他们引入组合主义之尝试的挫败以及他们对民主的怀旧，是对缺乏调解因素和合法性的那类权力所面临的困难的间接然而关键的表达。

然而，如何民主化？对统治者来说，这似乎是清楚的：朝这个方向的任何移动都可能打开平民政治再激活的潘多拉盒子，并伴随着“人民”以及最终地阶级的诉求，这可能导致官僚威权主义之前的危机复燃。对官僚威权主义联盟来说，这个结果比继续在没有调解因素和合法性的情况下统治更糟。此外，如果官僚威权主义作为对很有威胁的政治激活的反应而出现，如果它强加给社会的沉默并未掩盖经济正常化和施加“秩序”的沉重成本，那么，以下这种担心——一旦官僚威权主义已建立起来的排除大堤即使部分决口，该威胁就甚至会更剧烈地重现——难道不是有道理的吗？由于这个担心，民主制的某些调解因素的恢复，既是该支配体制的希望，也是它所惧怕的事情。

哲学家之石将会是这样一种民主：它受到仔细的限制，特别是在“人民”或阶级的诉求被禁止的意义上受到限制，但该民主同时并不是这样一个不能

提供调解因素以及最终地不能提供一种合法性——该合法性可能将它自身转变为霸权——的闹剧。这种民主如何实现的问题，严峻地检验那些“政治工程师”的智谋，他们以自己的专长来完成一项等于是将圆圈拉直的任务。然而，官僚威权主义中最开明的行动者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很清楚地是这种受限制的民主。在高度的预先威胁和危机的情况下，就如智利的情况那样，民主的替代方案不是由那些国家机关提出来，而是由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人引入的，他们是起初的官僚威权主义联盟的成员，但后来收回了他们的支持。在低度预先威胁的情况下，即1966年的阿根廷，差不多在官僚威权主义的初始，民主议题就被作为对支配地位的军事集团的组合主义倾向的一种替代提了出来。1976年在阿根廷，作为来自这个早先经历的“教训”以及本文讨论的根本紧张关系的一个结果，支持组合主义的人未曾出现，恢复民主的目标也从一开始就被提及——尽管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必须克服的障碍显得比1966年更为艰巨。在乌拉圭，伴随着奇特的曲解，民主话题持续被提及，这种曲解旨在保持一种有一个完全从属于军队的傀儡总统的文官政府的表象。在更低的预先威胁的情况下，即巴西，在卡斯特卢·布朗库(Castelo Branco)时期，甚至有一种保留某些政治民主机构的尝试。虽然该形势的威权主义动力朝不同方向引领着进程，但某些初始因素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议会、两个官方政党以及某些政府职位的定期选举。在这个国家，选举经历虽然受到严密控制，但也已使潜在分裂性的动力显而易见，当民主替代方案被提出来的时候，不管该替代方案在被一个官僚威权主义施行、并处于其庇护之下时可能显得是多么超现实主义的，这个潜在分裂性的动力都开始发挥作用。

官僚威权主义统治及支持它的联盟的赤裸性，以及它的消极社会后果的高度可见特征，产生了那些反对官僚威权主义的人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人权、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对实质正义的需求。一个同时是如此咄咄逼人而又如此不安全的支配体制所深为担忧的事情是，反对者们——他们尽管沉默，但仍极显著地存在——将围绕这些问题鼓动起一场巨大的爆发，这个爆发将不仅摧毁官僚威权主义，而且摧毁它曾帮助再度强加的社会支配。[1969年的]“科尔多瓦风暴”以及随之发生的那些事件，是这种可能性的象征，而且不只是在阿根廷。重建一个内聚性的、和谐整合的民族的不成功尝试，不祥的社会沉默的延长，以及官僚威权主义所支持的统治的声名狼藉，这些都是该支

配体制的不安全性的基础，这种不安全性经常倾向于使它更危险、更具强制性。该强制进一步使官僚威权主义的制度体系偏向军队的更大作用，并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沉默，而这正与如果官僚威权主义要获得某种合法性则应当发生的情况相反。尽管如此，民主仍继续被提及，时而黯然失色但接着便重新出现在官方修辞中，或者作为这个或那个在官僚威权主义中争夺权力的集团的提议而重新出现。

民主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显示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因为它包含一种在构建一个与特定的基本人类价值更近于相符的社会的长期努力中可能成为统一性因素的动力。官僚威权主义对一种有限形式的民主——它没有“人民”、最终没有民族——的提议，不是一个获胜权力的体面让步，而是它的内在软弱性的表现。官僚威权主义的制度顶点及其主要拥护者提及民主时的矛盾心理，以及对逾越限制的明显担心（超越这一限制之后，推进民主进程就因太具风险而难以为之），都没有像官僚威权主义的其他政策和影响那样，产生出它自己的对比性反驳。官僚威权主义的任职者和支持者所提出的歪曲和有限的民主的对立面，并不一定是政治和社会威权主义——它正是该国家的真实和明显事实。其结果是，即使只是提到民主这个术语，民主问题在政治话语中都仍是有待确定的，它因此极易被用作他义——通过赋予该术语以取代从官僚威权主义传出的声音试图强加的那些限制和条件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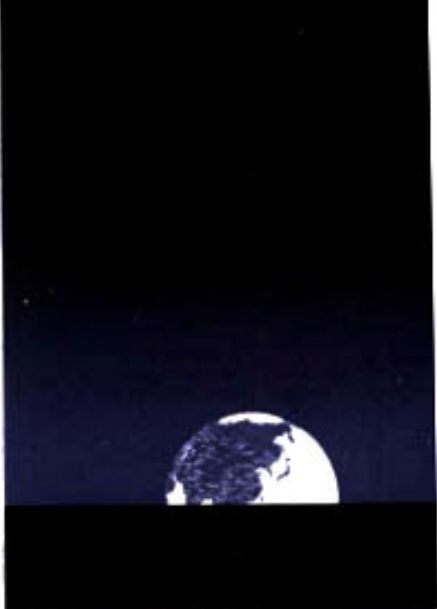
对那些希望只是利用它进入一场博弈——该博弈将按官僚威权主义的任职者预先确定的规则来进行——的人来说，民主的可能性只是代表对机会主义的鼓励。这个可能性也可能鼓励抛弃民主的愚笨做法，因为它自上发动，以及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认真的尝试来对它施加限制。然而，如果那些作为强权的政权确实不是仅有的从南锥体地区的悲剧中吸取教训的政权，那么，关于民主也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就是发现一种政治目标和模式，它将不局限于对那些它在每一时刻都能触及的限制的斤斤计较。更根本地，适应于将它自身注入由那些被官僚威权主义排除的人所持有的含义并与它们一起构成一种替代类型的国家之基础，它将是一场占有和重新界定民主含义的斗争。

在一些环境中对特定话题的讨论可能像是无用的怀旧。但是特定词汇——比如民主——现今被使用这一事实，完全不能仅仅归因于习惯性言

行、适应国际形势的策略或错误的意识。在上述官僚威权主义下，单纯提到民主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之间的明显矛盾比这要严重得多。该矛盾是理解当前的支配体制的软弱性和深刻紧张关系的关键。它也是这些社会的表面现象后面的极大重要性的一种反映——那些被排除并被迫沉默的人的重要性，那些一方面是官僚威权主义获得合法性所有希望的焦点，另一方面从这同一个官僚威权主义看来是千万不能触及的潘多拉盒子的人的重要性。那些被排除并且沉默的人的这种隐性存在，是官僚威权主义的动力和紧张关系的一个源泉，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这个国家的重大规划。

随后在官僚威权主义的第一阶段——本文集中讨论的它全面出现的阶段——之后，排除之堤开始溃塌，恐惧变弱，某些一度被迫沉默的声音又一次被听到。紧接着，这些声音不仅通过社会而且在国家机关内产生了回响——或多或少是间接地，但却包含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含义。这些变化不只包括强加在那些被官僚威权主义的全面出现而击败的人身上的沉默的终结，也不只包括对以下看法的许多种证明方式：“默示共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受压制的反抗。这些变化不只是官僚威权主义中某些任职者对调解因素的寻求，这些任职者一方面知道，若没有这些调解因素，他们就不能继续长期执政；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通过试图恢复这些调解因素，他们使那些他们曾试图付出如此高的风险和代价去摧毁的幽灵再生。在这一点上，官僚威权主义的分裂——这个分裂由它的调解因素的缺失所展现——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对这个机会的反应——就它涉及的可能的民主化的范围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在官僚威权主义的植入阶段被根本上排除的人。然而出于整个一系列的原因，这个仍未标绘的未来不属于现在分析的范围。





##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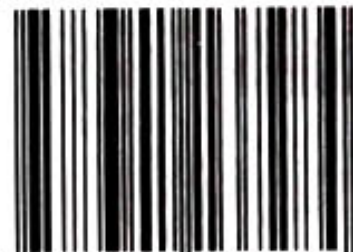
###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政治学家奥唐奈的代表性著作。这是一本有关威权主义政体民主化的杰出著作，它阐释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式，是政治发展理论和拉美政治研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探讨了工业化—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最早突破二者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框架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在比较政治学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 作者简介：

吉列尔莫·奥唐奈是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任圣母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政治学和国际研究 Helen Kellogg 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研究威权主义、民主化和民主理论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威权主义的民主转型、拉美政治与社会。除此书之外，他和另外两位著名政治学家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也广受重视。

ISBN 978-7-301-13728-4



9 787301 137284 >

定价：28.00 元